

#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 【研究报告】

〔编者按：本刊感谢宋永毅和孙大进先生向我们提供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的电子文本，本刊将连载这一研究著作。我们热诚欢迎海内外文革研究者向我们提供他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我们“网上文革博物馆”的收藏。〕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一）

• 宋永毅 • 孙大进 •

（作者简介）

宋永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文学硕士，印地安纳大学图书馆与信息学硕士。出版有《文学中的爱情问题》（上海，1985），《老舍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湖南，1986），《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台北，1993）。发表有英文，俄文论文数十篇，曾任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和东亚图书馆中国文献学者。现任美国狄金森学院图书馆系技术部主任。

孙大进，美国图书馆协会及美国东亚图书馆协会会员，美国依利诺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主要研究兴趣含图书馆自动化及Internet网络资源应用。发表有关图书馆与信息技术方面的英文文章数篇。曾任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技术部主任。现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任职。

∞ ∞ ∞ ∞ ∞ ∞ ∞ ∞ ∞ ∞ ∞

## 目 录

序一 杨曦光序二 王绍光

总论：异端初露，思潮迭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一．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1. 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2. 做顶天立地的人 3. 从对联谈起 4. 谭力夫在8·20辩论会上的发言 5.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6. 紧急联合通告

二．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

1. 出身论 2. 出身论之二：谈“纯” 3. 出身论之三：“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 4. 出身论之四：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5. 出身论之五：谈鸿沟 6. 出身论之

六：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 7. 出身论之七：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

三. 怀疑一切：从怀疑反革命到怀疑最革命

1. 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 2. 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3.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

四. 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

1.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五. 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

1. 首都五·一六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

六. 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

1. 中国向何处去 2. 我们的纲领 3. “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4. 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5. 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七. 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

1. 北斗星学会宣言 2. 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摘要） 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摘要） 4. 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摘要） 5. 决派宣言（摘要） 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摘要）

八. 清华四·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

1. 和周泉鏐谈话纪要（摘要） 2. 四一四思潮必胜 3. 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

九. 上海新思潮：在炮打张春桥的背后

1. 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2. 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 3. 中串会：一切为了九大

十. 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1.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序言） 2.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本文）

后记



## 序 一

• 杨曦光 •

看到宋永毅，孙大进先生编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惊喜之余，也深感触动创伤的痛苦。宋永毅先生的总论是我看到的对文革分析最深刻的文章之一。它摆脱了中国政府官方对文革歪曲宣传造成的偏见，不再在“两条路线斗争”，“拨乱反正”，“十年浩劫”这套话语系统中讨论文革中的现象。它特别指出文革中的变相结社自由和有限的出版自由这种制度变化造成的异端思潮迭起这一特点。此书特别给各种文革中曾出现的各种思潮以平等的处理，不管是保守派的联动思潮，反中央文革思潮，还是造反派的反血统论思潮，和省无联思潮以平等的处理，编者在总论中对它们也有相当客观的评价。

这是跳出了那些视保守派思潮为正确路线和视造反派思潮为错误路线的流行看法的束缚

。最近我还看到有文章将造反派争权视为“野心家”而将保守派争权视为正统和天经地义，这篇文章的作者自视为研究文革的权威，却并不认真引用前人对文革的研究。

此书最可贵之处是揭示了文革中的异端思想与后来中国思想发展的关系，恢复了历史连续性的本来面目。

可惜的是此书中收集的文革思潮大多是文革史的杰出学者陈佩华所称的文革中期（1966年末至1968），变相结社自由中公开发表的文章。当时社会上一般不知道的中国地下政党活动中的思潮并没有包括在内。而且此书中即使象李一哲大字报这种文革后（按陈佩华关于文革的定义）的文章也都没有跳出革命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框框。但在文革第三阶段及文革后，李一哲大字报发表前，一些造反派中就出现了反革命和代议民主，人权思潮。但那时已没有变相结社自由，文革中有限的出版自由也不再存在，所以那种反革命思潮，立宪民主思潮，和人权思潮都不能见诸文字。而四人帮垮台后，邓小平派非常成功地将中国思想界控制在他的“拨乱反正，批判极左路线”这样一种反立宪民主，坚持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话语系统中，因而再次以思想专制使文革后渐趋成熟的异端思潮失去连续发展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再看不到文革异端思潮及其成熟后的立宪民

主思想，我们从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看到的又是革命情绪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泛滥。1989年前有两篇文章其实代表了文革中异端思想的成熟，但却由于邓小平思想控制的成功，而没有受到人们的足够注意。一篇是刘国凯1979年的《文化革命简析》，另一篇是我1987年的《一位独立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看法》。第一篇文章力图独立于邓小平“批极左路线”的思想控制，保持文革中造反派异端思想的独立性。而第二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反革命思想，将立宪民主与革命民主主义相区别，提出了政党自由，禁止政治迫害这样一些诉求。这都代表了一九七〇年造反派中异端思想成熟的倾向，也比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中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潮更为成熟。

我希望这本书作为中国人尊重历史连续性的一个引子，使我们能进一步反省中国自清末以来的立宪过程，使台湾目前的立宪民主所继承的中国历史上的立宪民主精神能在中国大陆恢复其连续性，也使中华民国用公平选举分配政治权力的宪政游戏规则在整个中国实现。

□ 1996年7月

∞ ∞ ∞ ∞ ∞ ∞ ∞ ∞ ∞ ∞

## 序 二

• 王绍光 •

近三十年过去了，但我依然记得一九六七年秋的那个星期天。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一大早散步到武汉二中门口的大字报栏前。街头没有什么行人，我漫不经心浏览着新贴出的大字报。一篇题为“北斗星学会宣言”的大字报引起了我的兴趣。文革中，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成千上万，但它们的名称中总少不了“革命”、“造反”、“捍卫”等字眼；而且它们一般称自己为“什么什么战斗队”“什么什么兵团”“什么什么总部”，“什么什么司令部”。可眼下却冒出个自称“北斗星学会”的组织，这可得看个究竟。宣言的文字果然不俗，一扫时下流行的文革八股那种刻板文风：

“……要当官的就让他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究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

显然，这个“北斗星学会”是由一批自以为“善于思考问题的人”组成的。宣言的结尾一句，更显示出锐不可挡的气势：

“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是谁主沉浮？”

不久，我便打听到，“北斗星学会”的灵魂人物是华中工学院的两位学生，一位叫鲁礼安，一位叫冯天艾。从此，我开始留心他们的文章。他们的思想像他们的文字一样超凡脱俗、振聋发聩。当时的主流造反组织正忙于在形成“大联合”、结合“革命干部”组织“革委会”的过程中争夺更多的权力，而鲁礼安、冯天艾和他们的同志却大谈，“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消灭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常备军”、“实行武装割据，建立新农村”、“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在派性斗争的一片喧嚣声中，这些提法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在理念上，我不能接受这些在我看来过于激进的主张；但在感情上，我却十分钦佩鲁礼安和冯天艾的过人胆识和文采。

一九六八年夏，鲁礼安和冯天艾先后入狱。一九六九年秋，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九二七指示”。“九二七指示”把“北斗星学会”和鲁礼安搞的另一组织“决派联络站”（全称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以及鲁冯

二人主持的刊物《扬子江评论》统称为“北决扬”，并把“北决扬”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和“武汉的五一六”。由此，“北决扬”的名声传到了武汉以外，成为全国著名的“新思潮”的流派之一。

一九八六年，文革二十周年之际，我开始回头研究文革。武汉的“北决扬”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潮”成为博士论文中三章的内容〔1〕。尽管，当时我化了近一年时间查阅武汉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和美国各大图书馆所收藏的文章报刊，但除了武汉的“北决扬”、长沙的“省无联”和广州的“李一哲”以外，我没能找到其它代表“新思潮”的文献。由于资料的缺乏，理清“新思潮”发展的脉络十分困难。我论文中对“新思潮”的讨论也因此显得比较单薄。因为这个原因，二年后，当我把论文修改成书时，便将关于“新思潮”的讨论忍痛完全删除了〔2〕。

今年是文革三十周年，我应邀为一个文革研讨会提交一篇关于“新思潮”的文章。无独有偶，国内的几位文革专家也对“新思潮”表示极大的兴趣。但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原始文件不足。北京的朋友向我要武汉“北决扬”的材料，我则向北京的朋友讨北京能找到的材料。而我们都无法接触到其它地方有关“新思潮”的文献。正在我们大为苦恼之时，“及时雨”出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宋永毅先生告诉我们，他正在编辑一本题为《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的资料集。依据宋先生提供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我得以对“新思潮”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线索重新进行认定和梳理，而加深了自己对“新思潮”历史意义的认识〔3〕。我相信，凡是对文革，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尤其是对文革中的“新思潮”有兴趣的朋友，都会感谢宋永毅先生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编辑这样一本内容详实的原始资料集。

只有曾经花大力气试图收集此类材料的人，才能体会宋永毅先生的工作对文革史研究的贡献有多大。文革中的小报和传单有很强的地域性，一般只在本地流传，外地很少能看到。因此，传到海外的文革小报主要来自北京（经由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和广东（经由港客）。其它地区的小报，在海外流传的总数也许不小，但极不完整、极不系统。在国内，文革后期，官方几次收缴文革小报，使藏在民间的小报遭到很大损失。各地图书馆虽然收藏有大量文革小报，但它们不对公众开放；即使是研究人员也要凭特殊介绍信和特殊关系才能有所接触。这几方面的限制，使得编辑这类资料集困难重重。只有宋永毅先生才能担此重任。作为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宋永毅先生当年就收藏了不少宝贵的资料；作为东亚图书馆员，他懂得如何在卷帙浩繁文革文献中发掘瑰宝；作为文革史研究的大力促进者，他的热情，他的真诚，他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动了不少朋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收藏品，共襄此举。可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能编出包含如此之多“海内孤本”资料集的人，除了宋永毅先生，别无他人。我也希望本书的读者，如果手中掌握未曾收集在此的文革异端思潮文献，能与宋先生联系，使此书再版时能不断充实。文革已过去了三十年，但文革研究只能算刚刚起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耕耘这片肥沃的园地吧！

1996年8月4日 美国新港

注 释

〔1〕 Shaoguang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0.〔2〕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不过论文的中译本《理性与疯狂——文革中的群众》(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保留了关于“北决扬”的部分。〔3〕 Shaoguang Wang, “The New Trends of Thought among Radical Groups”,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etrospec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6 July 1996.

∞ ∞ ∞ ∞ ∞ ∞ ∞ ∞ ∞ ∞ ∞

## 总论：异端初露，思潮迭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作为人类最古老文明的一支主脉，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并不乏洪波涌起，星汉灿烂的局面。但就其思想史而论，思潮迭起，学派林立的景观却非常罕见。自周文武王到民国五四的数千年间，还仅有二次蔚为大观。第一次可上溯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第二次却已是本世纪初五四文化革命期间。如果说近三千年前的诸子百家的兴盛是由于周王朝王权式微，礼崩乐坏，完全失去了在政治、军事和思想上一统天下的能力，那么诸侯兼并，战国并峙以及群雄为谋天下而兴的“养士之风”正从诸侯割据的地理上和多元政治的需要上保障了诸子百家的共荣共存。自秦汉以降，伴随着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和思想统治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无论在思想上和规模上都可以和封建正统思想分庭抗礼的众多学派。

然而，即使在这数千年漫长的黑铁时代，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大脑也仍没有停止其异端的思考。尽管叛逆的呼声极其微弱，其思想的闪光更包裹着扭曲的，乃至怪诞的外壳。但“异端”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两汉，有以王充（27——约97）的《论衡》发“疾虚妄”之论；魏晋，有嵇康（711——794），刘伶等“竹林七贤”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之声。即便在理学盛行的宋明之际，仍有王阳明（1472——1528）的“心明便是天理”之说与王船山（1619——1692）的“天下惟器”之论。至于李贽（1527——1602），更公开以“异端”自居，挑战孔孟之说，结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被迫害致死。

五四是一个异端思潮正面地、大规模地挑战正统思想的史无前例的时代。一时社团林立，学派纷起。无论是陈独秀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声呼唤，还是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求实态度，抑或鲁迅对“礼教吃人”的激愤控诉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念；都是一种挑战与颠覆正统的异端合力。探究五四思潮迸发，异端迭起的景观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外来思想的大规模冲击，影响；另一方面，执政的北洋军阀政府实际上并没有一统天下，各地仍是割据局面。此外，执政者对于思想自由，尚取相对开明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教育部的小佥事鲁迅，竟一状告败了教育总长的章士钊〔1〕。

二十年代末以后，中国思想文化中心南移上海。十里洋场中西方列强们的租界--尽管它们均是形形色色的屈辱的条约的产物——却匪夷所思般地保护了种种自由民主思潮，从而也保护了共产主义思潮这一当时最大的异端。

纵观自春秋战国到民国五四思想史的沿变，我们可以大略揣测出这样一些并不成体系的

结论：其一，中国历史上社团，学派林立，异端思潮纷起的壮观大致只发生在中央集权并不强大时期；其二，它同时常发生在政体变动，思想嵌制松弛之际。反之，即便有异端的存在，也不过是几丝形式扭曲的微弱之光而无法透过如磐的夜气，更枉论会形成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中国正是一个反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社会主义”。历经“三反五反”，反胡风集团，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等等，无产阶级专政的奴役已从政治、经济延伸到每个人的心灵，任何一点最轻微的抗议都会立即招致精神、肉体的双重消灭。在这样密不透风的政治黑洞中，异端思潮是无法产生与风行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那十年天翻地覆的文革，自由，民主，人权与法制的思潮--作为共产主义的异端，是决不会如此迅捷地在中国年轻一代中得到传播与认同的。或许，至今我们还只能悲哀地看到一个无声的中国。

一九六六年在中国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十七年长夜茫茫万马齐喑局面的终

止和一个新的万象杂陈，异端初露局面的开始。仅就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中央文革及各级革委会公开批判过的文革中“左”的或“右”的反动思潮就有数十种之多：“血统论”，“出身论”，“怀疑一切论”，“四三思潮”，“五·一六思潮”，“经济主义思潮”，“省无

联思潮”，“四一四思潮”，“李一哲思潮”……作为社会性的异端。这些思潮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矛头直指或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等中共最主要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体制，在其流行程度上更有极大的广泛性与群众性。常常是一论既出，震栗全国（如“血统论”）；或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如“出身论”），甚至发展到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数十万云集广场的群众已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这样异端口号作为他们共同斗争的信仰。一句话，这种异端的社会思潮以其流行性与普遍性绝然不同于异端的个人思想。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如张志新，王申酉等，也曾拍案奋起，反对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但他们先知先觉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则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

〔1〕 1925年8月，身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因支持北京女师大的学生风潮而被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免职。鲁迅即向平政院控告，获胜诉。详情可见林志浩《鲁迅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71—175页。（未完待续）

##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二）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续上期 总论：异端初露，思潮迭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 ◇ 一. 悖论：文化大革命对异端思潮的造就

历史的发展真是充满着悖论，由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带有宗教性狂热的动乱来充当异端思潮的母体，这本身就向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饶有兴趣的问题。例如，文革作

为毛泽东的权力角逐和在全国建立他个人绝对权威及专政的手段，为什么反而促成了异端思潮相当规模的产生？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究竟在哪些形式与内容上提供了异端思潮的催生素？又如，文化大革命爆发在那段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时代，毛泽东与中共已在十七年中建立了一个极端封闭、专制乃至凝固的思想环境。与五四拥抱与迎接西方民主思潮的开放胸襟截然不同，文化大革命把人类所有的进步思想都置于“横扫”之列，即便是当时国际共运中的不同思潮流派，也都列入了“修正主义”的另册。那么，那些异端思潮又从哪里汲取了它们赖以孕育与发生的思想营养？再如，文革中骚动不安的异端思潮，大都打着诠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有的甚至比毛在当时的思想更为极“左”。浮面看去，它们大多没有挣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樊篱，为什么竟成了后文革时期民主主义思潮的滥觞？而他们中的不少活跃分子，最后百川归海般地成了民主战士？看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这样的复杂课题，是无法用“彻底否定”的方法一言以蔽之的，必须认真地探究其更深刻的历史动因。

早就有人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象《水浒传》里的洪太尉，揭开了那块贴着‘社会主义大民主’标签的大石碑，放出来的一百另八道金光，就永远不会回到那暗无天日的地洞中去。至于这些好汉们要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那就再也由不得毛泽东的徒弟徒弟们了。”〔2〕这一生动的比喻至少可引申出以下两层耐人寻味的意蕴：其一，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特定形式本身——“社会主义大民主”（即一度写入中共宪法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一种有益于异端思潮产生的形式。其二，这对于发动者毛泽东本人来讲，是无意的，或事与愿违的。

确实，作为中共社会主义制度缔造者与文革发动者的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夏至秋冬之交的文革发动期中，奇迹般地跳到这一制度外来抨击这个他所缔造的党和制度，甚至号召群众猛烈地冲击和批判之。然而，毛泽东为什么要冲击这个党，批判这一社会制度？是因为这个党的专制，这个社会的集权与广大人民群众发生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因而使他不满意吗？不，完全相反，是因为他仍嫌这个国家和这个党还不够集权，还不够专制，党内还有很大一部分权力还旁落在他人的手里，因而他要冲击它，粉碎它，重建一个由他一个人独裁的毛氏王朝。显而易见，毛泽东要打的是一场完全逸出常规的战斗，他要以个人战胜整个党的官僚机构，以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少数去征服党内的多数。他只能向党外寻求盟友——深受十七年中共官僚制度欺压迫害的人民群众。而要发动和利用这些群众打垮这个党，来清洗自己的政敌，运动便只能取非常特殊的形式——这便是“社会主义大民主”产生的真谛。

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的形式一旦产生，便立刻有了它本身的意味。尤其对一场千百万人投入的群众运动来说，再严密的中央集权都是难以控制的，更何况这场运动的锋芒所指正是一专制制度的全部组织根基——随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党组织在群众运动冲击下的全面瘫痪，毛泽东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控制不了用他自己的符咒所唤出的魔鬼了。简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形式至少在以下三点上突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传统与常规，有利于异端的孕育和产生。首先，它给了群众以“四大”的形式去揭发、批判和斗争除了毛泽东的司令部（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外一切党组织的权利，上至中央副主席，下至一个车间支部书记；而文革前十七年哪怕向一个党员提一丁点儿意见都可能被认为是十恶不赦而“运交华盖”。这一形式解放了民众的为十七年的专制所囚禁的思想，更有利于他们的独立思考。如同“李一哲大字报”作者之一的王希哲在他那篇著名的长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里总结的：



“毛泽东为了打垮党内民主改革派（指刘少奇等人——引者注），实现他个人专制不得不鼓动起人民群众，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起了冲击，这样就带来了两种结果：一个是毛泽东实现了他个人专制的目的，一个却是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们与中国数千年畏官的传统决裂了，他们在官僚面前再也不感到自卑了，而这正是实行民主改革的精神前提，甚至他们还敢于从制度上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了，文化大革命似乎是造成了一代敢于独立思考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3〕

美国学者梅尔·哥德曼（Merle Goldman）则从另外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对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党的官员和学生来说，‘文革’间接的后果是他们意识到，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在‘文革’仍然进行之时，‘文革’这一代人就已不断显示出其独立性。尽管那时派性斗争激烈，形势一片混乱；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是因为派性斗争和形势混乱，才使得控制变松，触发了种种独立思考和行动。而这一情景在‘文革’前当党领导着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领域时，则是不可能发生的。”〔4〕

第二，文革中的群众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结社自由，而文革前除中共领导的组织外，任何一个自治的群众组织都可能被视为“反动组织”而立即取缔。自“清华附中红卫兵”以来的文革中数以百万计的群众组织，如果都作为一种“社团”或“准社团”来看的话，就其巨大的数量而言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由于结社，产生了派性，继而是某种权利及保卫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而群众只要有了组织，便会发现自己的力量，最后便会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而导致意识形态的失控。文革中已有不少这样的例子：由于某一群众组织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不和而遭到镇压，强烈的结社意识使这一派的群众奋起保卫他们的组织权利；或转入地下，或成立变相的组织。从而，这成了他们成为自觉的异端的开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和“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总部）二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例。如果说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后的第一次炮打是因为他们与张春桥关于夺权的意见不合，那么一九六八年四月的第二次炮打就带着耀眼的反迫害、反镇压的民主色彩。最后，他们中出现了“胡守钧小集团”、“反复辟学会”、“中串会”那样的异端思潮组织。又如湖南的“湘江风雷”，在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中被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政府派镇压。但已经有了政治派别意识的湖南造反群众激烈反抗。不但被捕的绝食抗议，同一组织的监外成员又改头换面，重整旗鼓继续活动，最后由于党内权力斗争的缝隙，“湘江风雷”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获平反。平反后，“湘江风雷”内即分裂出了“省无联”这样的异端思潮组织。

第三，文革中报禁有某种程度的开放。自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夏，群众组织，尤其是青年学生组织办报刊风行全国，这恐怕也是中国报刊史上的一个奇观。尽管大多数群众报刊千人一面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但也有不少成为民主思想和新思潮的重要阵地。曾刊载遇罗克〈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便是一例。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早在毛泽东批吴晗和“海瑞罢官”时，他便给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及《红旗》杂志投稿反驳。但由于当时报禁未开，他的文章除了一小块得以刊出外，均被退了回来。他的〈出身论〉，原来也是一份自刻自印的油印传单，一贯反对“血统论”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在极偶然中看到了电线杆上的张贴稿。起初牟志京只是想把它变成一份铅印传单，结果在排版

时因为字数不够，有很大空白，经排版工人提醒，牟当场决定办成一份报纸，并取了一个响亮的“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作为主办单位〔5〕——这样，〈出身论〉这样一份黑暗中的中国人权宣言书才正式上报，立即在全国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而在文革前十七年，是绝不可能想象象牟志京、遇罗克这样的普通青年可以如此轻易地办起一份宣传异端思潮的报纸的。

对于异端思潮的流行来说，仅有运动形式上的有利而无运动内容上的有用之处，它们仍不能流行起来。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异端思潮——从〈出身论〉到“省无联”——大都孕育和产生于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之中。注意到这一事实，便应当研究一下这一为毛泽东所号召的群众性的造反运动的发端，是否也带有相当的民主性或人民性？答案是肯定的。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以“打成反革命”等手段迫害了无数政治异己与对他们不满的群众，至文革爆发，中国社会已蕴积了一个巨大的反迫害资源。文革初期，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官僚阶层，为在与毛的权力斗争中保全自己，不惜牺牲无辜的人民群众。一方面，它们试图把毛点起的文革大火烧向群众，以“反右斗争”的传统方式在全国知识分子与学生中大抓“反革命”；另一方面，它们利用它们子弟组织的红卫兵“纠察队”大搞“红色恐怖”，以横扫“四旧”与“黑七类”为名，残害无辜的人民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二千多教职工，家在北京的便有一百多人被抄家。“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6〕，显然，毛泽东的文革目的主要是打倒他的党内政敌而不仅仅是破“四旧”与反“右”派。虽然他对于这些被残害的无辜群众也毫无怜惜之心，但他意识到他可以打一张民意牌、人权牌，以反迫害作为号召——那就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中“省无联思潮”的代表人物杨曦光在一篇化名为“习广”的纪念文革二十周年的文章中指出：

“毛泽东号召反迫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其号召的核心当然是人权问题。十七年来，每次运动总是用打反革命等残酷的迫害手段来对待政治异己，反迫害和平反的口号无疑是真正能号召人民的。从此，毛泽东开始重新抓到了民心的脉搏。他的成功之处并不是单纯左的经济路线，而是同时也配合了一个打人权问题牌这种右的策略。至于究竟是毛泽东利用市民运动来搞宫廷斗争，还是市民利用宫廷斗争来追求自己的人权，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也值得史学家去重新研究的问题。”〔7〕

另一位文革中异端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李一哲”之一的王希哲，则早在一九八〇年便提出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那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便是可取的了。”〔8〕这一说法后来又被八九民运的领导者之一的中国作家郑义深化为“两个文革”的理论：

“第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一个利用群众运动冲垮共产党各级机构，从而打倒政敌，以夺回失去权力的高级权力斗争；第二个文革，人民的文革，则是一个利用皇帝（虽远非自觉）来打倒贪官污吏的民主斗争……虽然文革口号纷杂，目的含混复杂，但反抗暴政却是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根本的动因；”“本来，历经两千年君主专制残酷塑造的中国人民是绝不敢轻言造反的。毛的号召，使一切造反行径名正言顺，现在不反，更待何时？这一下，平日逆来顺受的人民便如火山爆发一般喷射出仇恨的岩浆。毛和人民同时找到了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林彪九大报告）。这就是毛的权力斗争和民众的民主斗争相互交叉，相互利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9〕

尽管对于“批判资反路线”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造反运动是否已是一场“民主斗争”可再作探究，但它带有广泛的人民性应有定论。这一点，国内的研究者亦有同感：“平反在政治层面上动员了与当权派有矛盾的群众，批判血统论则在社会层面上发动了更多的群众……由于资反路线是通过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贯彻的，各级领导几乎人人有份。因此，批判资反路线带有群众与领导干部的群体冲突的色彩。不仅如此，批判资反路线提供了一个群众发泄对领导不满的机会。长期积累而不能不宣泄的不满、怨恨藉此机会表达，从而使对当权派的批判一发不可收拾。”〔10〕不管毛泽东是出于什么个人权欲的目的而打了这张反迫害的民意牌，也不管当时的造反运动是否自觉地利用了毛泽东的口号，当时的运动走向对于异端思潮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千古难期的催生机。这一点，无论是当年异端思潮的代表人物，还是国内审慎的文革史研究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大体相同的肯定。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正面地探讨一下异端思潮在文革中产生的思想条件了。如同物理学中力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会伴生反动的附衍物，任何一次反动也会产生革命的副产品。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是旨在消灭全民族的任何独立思考（用张春桥的话来说，是“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建立他一个人的思想统治与精神奴役的一种手段。历史的逻辑却朝“伟大领袖”意愿的相反方面走去，异端思潮就迭起在文革之中，思考的一代的崛起正是文革最积极的副产品。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究细察一下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人何以会成为哺育它们的那种制度，那个社会的异端，更会惊讶地发现原来是初源于那种制度，那个社会本身以及作为它们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自身的巨大矛盾性，这一矛盾性首先表现在作为毛泽东指导文革的那个理论体系，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完全服从于毛泽东权力斗争需要的庸俗性。如前所述，毛泽东的文革的目的明明是消灭所有独立思考，但为了炮打刘邓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一再公开号召和鼓励青年人“独立思考”。毛泽东是中共集权制度和官僚制度的缔造者，他决不讨厌这一制度，但为了发动群众帮助他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他一再发表言论抨击这一官僚制度，给群众造成他是民主的代言人的错觉。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决不是“血统论”的反对者，但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在六六年底的“批判资反路线”中却号召全国群众批判“血统论”。对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来说，这并不奇怪，在为他们自己和他们那个集团争夺权力时，他们总要隐瞒自己的私利，而把社会的公利写在欺骗民众的旗帜上。与翻云覆雨，言行不一的政治老手毛泽东等人不同，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青年一代是虔诚的、纯真的、执着的。他们在文革中很快便汲取了、抓住了、继而延伸了毛泽东等人那些不论是出自什么目的而讲的颇具民主色彩的言论，合理地推导出了颇具独立性的理论体系——异端思潮便由此应运而生。其二，毛泽东思想自身的矛盾性还表现为它在文革实践中的反复无常性和为了权力斗争而牺牲人民群众的残忍性。如果说毛泽东等人为利用群众作为他们党内大清洗工具时颇带民主色彩的言论激发了异端的产生，那么一旦完成大清洗后，他们翻手为云地镇压人民群众，覆手为雨地重建法西斯官僚专政便使群众对他的幻想迅速破灭，从而产生怀疑和觉醒。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的经历，可算一个例子。〈出身论〉是作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对立物，是在1966年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产生的。当时，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小组已看到“血统论”成了他们的政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用以与他们抗争的有力政治工具，因而，他们声色俱厉地斥责“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陈伯达）〔11〕。虽然由于遇罗克的先知先觉，〈出身论〉初稿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7月。但它仍

修改并正式出版于“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在《出身论》及其他文章里，遇罗克有意无意地大量引用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言论，应当说仍是一份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人权宣言。据当时《中学文革报》的实际主编牟志京回忆：《出身论》刚发表时还曾有过二位自称《红旗》杂志、中央派来的记者来过，对他们讲“中央非常重视你们”云云。对于这群坚信“不同出身的青年应有平等的政治待遇”的青年人来说，一直虔诚地相信他们会得到中央表态支持。然而《中学文革报》出到第三期（1967年2月），已传来中央文革（关锋）讲他们“大方向错了”的指示，四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更变本加厉地把《出身论》说成是“大毒草”。〔12〕不久《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遇罗克身系囹圄。如果我们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上层权力斗争的视角来看中央文革态度的剧变，便不难理解其中的一点奥秘。尽管平等与人权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心中不过是一出蒙骗愚民的把戏，但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他们仍需要《出身论》这样的力作去发动群众。到了“一月革命”之际，遇罗克们非但没有象大多数造反派那样由对他们的感激涕零而充当夺权的打手，反而更为认真地研究起社会平等与人权问题来，自然是“大方向错了”。至于到了四月间，毛泽东为了玩弄权力平衡，减缓军方及周恩来为代表的官僚阶层的压力，下令释放了“血统论”的代表者“联动”分子，自然本来就不是他们一路思维的“出身论”要被批判为“大毒草”了。尽管遇罗克被捕，报纸被停，但对他的战友们来说，“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感到整个信仰的基石崩塌下去”〔13〕——这一崩塌的信仰的基石，当然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异端思潮的产生、发展与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民主”的欺骗、玩弄的关系，1968年出现的“省无联思潮”对于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政体的执着应当说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政体，原来是毛泽东最早鼓吹的。他声称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和“北京公社宣言”。在他与刘少奇决战的八届十一全会上，他又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十六条告诉人民：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14〕关于这一民主政体形式，林彪最早作出过详尽解释：“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与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15〕——对于深受中央集权专制之苦，而只知道巴黎公社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民主政体的中国百姓来说，毛泽东冠冕堂皇的许诺打开了一幅何等鼓舞人心的民主前景。当“一月夺权”在上海实行之际（1967年2月5日），上海的造反群众天真地把上述最高指示写进了公社成立宣言：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了的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全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关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16〕

不料，这却引起了“叶公好龙”的毛泽东大惊失色的反对：“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毛甚至公开贬低他一贯倡导的公社说：“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

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不久，毛又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17〕——一言道破天机，原来毛泽东的巴黎公社的全民选举的民主新政体，不过是他翻云覆雨的袖里乾坤。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来讲，核心永远是一个“权”字，而不是什么革命理论。只要他们清除了党内异己，夺回了旁落的大权，他们想到的便是立刻恢复他们那集权专制的党，并使之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更加法西斯化。于是，“上海人民公社”变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巴黎公社的原则顷刻间变成了故纸堆里的垃圾。

然而，在长沙（“省无联”），在武汉（“北决扬”），在广州（“八五”公社），在山东（“渤海战团”），在上海（“炮司”，“中串会”，“反复辟学会”），在北京（“北师大造反兵团”）却有那么一批独立思考的青年人，仍执着地要实现毛在文革初期所作出的“新政体”的承诺，这便是自1967年夏到1968年春被称之为“极左思潮”的“新思潮”。这股“新思潮”的特点，香港学者赵聪在他总结文革的三卷本巨著《文革运动历程述略》里有着大致不差的概括：

“他们死抓住毛泽东在文革初发出的号召不放，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党组织，重新造党，而不是什么恢复和整顿；坚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消灭十七年来新形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而不是个别地罢官和揪斗；坚持把政权机构交由人民大众来掌权，组织人民公社，而不是起用旧干部组织三结合的革委会；坚持人民武力缴还人民，要在军中搞文革，而不是军队与人民对立，进行三支两军的工作。总之，他们主张要把文革进行到底，不能后退，也不能停顿。虽然这些文件并不公然反毛，但却暴露出毛的言行前后不一致，也无形中拆穿了毛实为打倒刘邓一系而佯言进行文革的骗局。文件只是对周恩来一系官僚猛轰，对林彪、江青的讲话指示反而极力称赞，焉知不是他们的一种手段。所以虽然他们某些极左的主张如文攻武卫等与江青所喊的口号相同，而冲击军区和抢枪行动又与五·一六兵团无异，可是中央文革终于嗅出了他们要向毛林集团造反的味道……”〔18〕

一言以蔽之，这些“新思潮”之“新”之处，其实正是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带有民主色彩许诺（理论）的逻辑推理与发展而已，而这些“新思潮”之所以都遭到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残酷镇压，也正在于他们把毛泽东等人的“此一时”的承诺在“彼一时”当真要求兑现，结果便龙颜不悦，恼羞成怒，自然要对他们斩尽杀绝了。

异端思潮初露于文革中的第二个思想条件，源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政治信条之间的矛盾。对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不管是正确与否，毛泽东与他的同僚们在文革中宣扬的东西都是一种它的简单化与庸俗化的变异。然而，他们都偏偏要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最正统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要人民群众去“学习马列”。这样，马列主义的著作成了文革中广大青年唯一可以合法学习、汲取的，除毛泽东思想外的主要思想资源。尽管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并没有达到很高的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水准，但仅这些青年人在政治动荡中接触的有限的马列主义著作，便已使他们发现了差异、鸿沟与矛盾。作为一种“不幸”的结局：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学说竟成了这些异端思潮的倡导者用于批判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思想武器。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以及依据它的体系而推导出的某些立论成了异端思潮的化身——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那些讽刺性的悖论。例如，“省无联”们要求推翻新的特权阶级——“红色资本家阶级”时，用的是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与列宁关于“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分析。又如“李一哲”们呼唤民主与法制时，用了不少马克思关于法国革命的论述。最典型的例子恐怕还是伊林·涤西反对个人迷信的〈给林彪同志的

一封公开信)。1966年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青年学生刘振忠，张立才，用笔名在清华园内贴出了这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因它在当天下午即被撕毁，他们又于11月18日印成传单广为散发。1966年夏秋之际，正是毛泽东通过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制造狂热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之际。伊林·涤西的信中批驳了林彪关于“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吹捧，对林彪讲话中的“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的规律问题”提出了质疑。在提出这些批评时，异端思潮的主要立论竟来自斯大林在《论反对派》中提出的不应当说列宁比马克思高出一筹的论述，他们的结论是：“斯大林的态度是对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搞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19〕事实上，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们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所谓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思想之间，常常厚“马”非“毛”。“省无联”骨干之一周国辉就曾到处扬言：“毛泽东思想除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外，其他都是很陈旧，很落后的。”〔20〕遇罗克对毛泽东思想也一直不以为然，他除了在“文革”一开始就批评大搞个人迷信的种种做法外，直到狱中还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混乱的，他曾对狱友说：“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21〕

异端思潮在文革中初露的第三个思想条件，发轫于中共长期以来鼓吹的共产主义政治理论的虚伪性，它与社会实际的矛盾性，以及文革中公开暴露的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与极端无原则性。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文革中一再打着“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旗号，他们的原意自然是让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到他们的旗帜下来。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成了一场毛泽东思想的大幻灭与人民觉醒的大教育。文革使青年一代看到了太多的打着“马列主义”幌子的黑暗的权力斗争，结果使许多原来忠心耿耿支持这一制度的青年人都开始离经叛道，“血统论”便是一例。“血统论”一开始并不是异端思潮，相反正是建国十七年来已经执行的所谓“阶级路线”。这一路线以家庭成份、家庭出身来划定阶级队伍，将阶级成份的划分永久化，人为地造成世代以血统延续的阶级阵线。对于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弟来说，“血统论”是维护和巩固发展其特殊的政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依据。应当说，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浓厚封建色彩的政党来说，与历代帝王所公开标示的世袭制一样，这正是他们“阶级路线”的真谛。本来，如果中共开诚布公地宣布要搞荫封制，如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的三纲五常，官尊民卑，皇权至上，长幼有序等正统观念一样，倒反而有法可依，至少有搞特权的规则可循。然而，中共一向以不谋一党之私昭示天下，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便使他们不得不虚假地提出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进行欺骗，来平泄民众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但这样对于干部子弟来说，他们的世袭特权便既没有了理论保障又没有了民意基础。对于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要求垄断“接革命班”权利的一批幼稚狂热的中学干部子弟来说，自然不懂和不满中共所谓“阶级路线”的虚伪性和策略性，他们急于要把政治的不平等公开化与永久化，以确保自己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权利分配。老红卫兵以及作为它特有意识形态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说穿了，它不过是中共所谓阶级路线的不聪明的公开版而已。这也是在“对联”刚出笼时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对它以及它所造成的“红色恐怖”在相当一段时间取纵容姑息态度的内在原因——他们在骨子里原是一致的。但当“血统论”成为这些老红卫兵保爹保妈的政治斗争工具，他们本身也成为刘邓在与毛的权力斗争中一支别动队时，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才声色俱厉地将之宣判为异端思潮。而毛泽东及文革派对这批老红卫兵的始利用后抛弃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弹，这些自持血统高贵，一向傲

气十足的干部子弟于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继续以“血统论”为思想组织基础，要求“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22〕等等。与“省无联”等极左派的“新思潮”相比，联动思潮的价值取向是朝后的，即要求回到十七年的中共专制；它的打击面是朝下的，即所谓“地、富、反、坏、右”及“蒋介石分子”。但不管怎样，它仍表达了一大批青年人在其亲身经历的教训中萌发的对文革的不满与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批判。又由于这批干部子弟所处的特殊阶层的地位，他们不仅深切体会到中共理论的虚伪性，更广泛地接触到中共政治斗争的黑暗性和无原则性，他们中最终杀出了魏京生等整整一批这一制度营垒内的反叛者，而且他们的叛逆姿态还往往比极“左”派群众更为激烈，更为公开。

“文革”将中共已延续了十七年的体制和思想发展到极致，并以一种赤裸裸的残酷表现了它的实质。事实上，由于中共上层权力斗争黑暗面在文革中的大暴露，不仅使干部子弟，而且使一大批在运动一开始因个人迷信而卷入运动的普通青年冷静下来，产生普遍的“幻灭感”，这又是“逍遥派”的主要来源之一。又由于动乱所造成的缝隙和某种相对的自由，这些青年人看了不少在当时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的书，并结社研究“真正的马列”。六七年底北京大学何维凌、王彦、胡定国等人组成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便是这样一个异端组织。只要看一下当时他们所潜心阅读、热烈讨论的部分“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的书单——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吉拉斯《新阶级》，爱伦堡《人，岁月，生活》，尼采《扎拉查斯特拉如是说》，陀斯托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便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的思路会终于冲破旧教育所框定的牢笼而走向自由的异端。〔23〕在另一方面，上层权力斗争的肮脏性和无原则性在文革中的一览无遗甚至使追随他们的造反派组织都产生了始而离心离德继而群起仿效的倾向。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原是文革派的嫡系造反派组织之一，然而据史记载：

“自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不久，兵团更加执着于在清华园外抢权、夺权。兵团的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主义倾向一发难于收拾。自1967年初至1968年7月，兵团内就不断出现咒骂周恩来，怀疑康生，批评中央文革，否定陈伯达，斥责江青，抨击谢富治，甚至对毛泽东、林彪本人也有所‘不敬’的事例。兵团内的许多人实际上以知识分子狂热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心绪置身于文革的洪流中……对对手无所不用其极的举措，而自身既有文过饰非，言行不一的劣根，也有惟我独尊、唯我独革的恶习，更有追逐功名、嗜权如命的丑态……。”〔24〕

早就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诙谐而又适当地比作“比赛革命的革命”和“革革过命的人的革命”，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它无规则的斗争的循环性与伤害的普遍性。如果说运动初期是干部及干部子女反“右”——革下层群众的命，那么“批资反路线”又是下层群众起来造反革干部及其子女的命（他们的前任革命者）；接着军队又借所谓“二月逆流”革造反派的命（他们的前任革命者），再下来是干部（官僚阶层）与群众（造反派）联合起来革军队（林彪）的命……如此循环不已，永远是无休止的冤冤相报，永远是无法弥合的心灵创伤，直至八十年代，还有所谓“清查三种人”……革前面所有革别人命成功和失败的造反者的命的后补“革命”。文革的最大缺点同时又是最大优点之一正是革了所有人（从“国家主席”到“地富反坏右”）的命。创巨痛深之余，所有的人对这种“革命”产生了幻灭感，产生了“三信”危机（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危机），这便给异端思潮在民众心田里的滋生、繁殖提供了广阔的自然土壤与养分。

注释：〔2〕汪 〈李一哲给后来人的几点启示〉，纽约：《中国之春》，1983年3月。  
〔3〕王希哲 〈毛泽东与文化革命〉，香港：《时代》，1981年2月。〔4〕梅尔·哥德曼 〈文化大革命的非消极影响〉，纽约：《知识分子》，1986年春季号。〔5〕谷丁 〈一个人的文革史〉（上）（中）（下），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1993，2 / 19；3 / 19；4 / 2。〔6〕高皋，严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页。〔7〕习广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纽约：《中国之春》，1986年春季号。〔8〕同〔3〕。〔9〕 郑义 《红色纪念碑》，台北：华视文化公司，1994，第181页。〔10〕印红标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运动的兴起〉，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11〕陈伯达 〈对两个月来文化革命运动的总结〉（一九六六年十月），载《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9年，第302页。〔12〕同〔5〕。〔13〕同〔5〕。  
〔1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载《人民日报》1966 / 8 / 9。（见本刊zk9608a——编注）〔15〕林彪 《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3日。〔16〕转引自刘国凯 〈文化革命简析〉，原载广州《人民之声》特刊二期。〔17〕《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1969年，第667页。〔18〕赵聪 《文革运动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所，1971年，第二卷，第352页。〔19〕伊林·涤西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1966年11月15日），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20〕见 〈康生同志谈省无联〉（1967年1月24日），载广州《八五》，1968年2月。〔21〕张朗朗 〈我与遇罗克在狱中〉，纽约：《中国之春》，1990年7月。〔22〕〈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003〉，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23〕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学社”及这一小圈子青年人的详细描述，见潘婧 〈心路历程——关于“文革”中的四封信〉，载纽约《北京之春》，1995年1月。〔24〕唐少杰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见本刊zk9607b——编注）（未完待续）

###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三）

• 宋永毅·孙大进 •

（续上期 总论：异端初露，思潮迭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 二．正论：异端思潮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思考

文革历史的复杂与怪诞，匪夷所思般地孕育了异端的萌生，而这些异端一旦形成惊视骇听的社会思潮，便又成了种种不容漠视的历史存在。它们间的关系，一个是悖论，一个则是正论。

现在，我们可以从正面来审度一下这些异端思潮的嬗替更易、变革沿流，研究一下它们究竟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离经叛道的精神探索，给中国当代思想史留下了一缕什么样的一以贯之的文化血脉，以及为什么中共当局要如此惊恐万分地对他们一概剿灭扼杀？



追求人权，追求人生来具有的平等的社会权利——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主要是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受教育的权利——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异端思潮的一个主要诉求和

内容，这一诉求的杰出代表者，首先是遇罗克与他的《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共当局以它所谓的“阶级路线”，实际上已经将一大批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排斥于高等教育的校门之外，同时，无论在工厂农村，又无论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甚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都已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歧视性的种姓制度。如《出身论》所统计，即使按全国地富反坏右分子只占5%的比例计算，加上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等，估计会有近亿人口处于被歧视的社会“贱民”阶层之中。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切都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如果没有平等的政治与受教育的权利，那么这些“贱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只能生活在这一被歧视的社会底层。中共之所以推行这样一条“阶级路线”，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为他们子女搞荫封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制造“阶级斗争”与“阶级敌人”的神话，为了巩固他们的专制而设置一个集体仇恨的倾泻面。在十七年专制的重罗密网之中，这种极为不平等的人权歧视非但没有引发一丝公开的抗议，相反歧视者们还远嫌不够。在公开的舆论中永远重复“歧视阶级”受歧视的谎言：所谓“工农革干子女受迫害论”。遇罗克以及“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伙伴们一开始就冲破俗套揭穿了中共故意混淆是非的做法，指出受歧视的并不是所谓“工农革干子弟”，而是“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年大学招收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五类子女串连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们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出身论》大声疾呼：“‘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25〕遇罗克笔锋仍没有至此顿住，他又进一步揭露了中共当局之所以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正是为巩固他们的统治：“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的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26〕

遇罗克的《出身论》等论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不同于家庭影响，出身不同于成份等角度批判了中共虚伪的“重在表现论”。它利用马克思关于“解放全人类”的观点反唇相讥那些“血统论”的卫道士们：“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深究这一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原因，遇罗克又鞭辟入里地指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什么是《出身论》的结论呢？那便是“平等”——“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了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27〕——当遇罗克用他的血与生命写下这怵目惊心的“平等”二字时，他实际上已使“出身论”越出了马列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樊篱，因为在这一理论体系里，不同的阶级以及阶级出身的人群中，从来是不能用“平等”，而只能用“斗争”与“统治——被统治”这种字眼的。而

“平等”，历来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被毛泽东们加以批判和鞅伐的。

实际上，在所有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中，遇罗克可能是极少数的几个除了马列主义外还深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人。1960年后数年内他因家庭出身之累被中共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社会大学里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其中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使他最为神往。这里是一位他朋友的回忆：

一个寒冬之夜，窗外飘着雪花。屋里暗弱的灯光下，脸盆里残水结冰，一阵阵寒气袭人。就在这时，罗克披着棉袄走进那位青年的屋里，他举着一本书，连声赞叹：“写得太好了！你也应当看看。”

原来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你看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太彻底了。”

青年接过书，看到书上有很多罗克写的批语，如“智慧”，“矛盾！”，“不通”，“远见”“无与伦比的文字”……【28】

当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在其“第一条”中写下：“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永远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的差异”【29】时，曾是人类历史上的石破天惊之声。同样，当遇罗克在中共专制的黑暗王国中，尤其在血统论的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写下“平等”两个劲犹的大字，并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把！”时，同样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惊心动魄之音。尽管遇罗克一直自诩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论文中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思想之光仍是耀眼的，闪亮的。

承递了遇罗克关于政治权利平等的追求，并进一步把这一诉求推进到健全法制的新高度的，是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的思潮。1974年11月10日在广州市最热闹的北京路口贴出了一张题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大字报署名“李一哲”，实为三个青年人李正天、陈一阳与王希哲的笔名。据目击者回忆：“李一哲大字报轰动广州市，市民围观，水泄不通，车辆改道。入夜还有用手电筒照着读的。大家争相抄录，四处流传。李正天又募集纸张，油印散发，因此流传范围相当广泛。大字报空白处，写满了‘好的很！’‘好！’‘说出真正问题！’‘表达了人民的声音！’‘向李一哲学习！’‘向李一哲致敬！’的读者批语。而且掀起了一阵拥李和反李的大字报论战热潮。代表人民群众的拥李派占尽上风。”【29】为什么李一哲大字报具有《出身论》一样的魅力？是因为整个李一哲思潮的宗旨便是：“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如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庄严宣称的那样：“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受到干涉”；李一哲公开要求中国当时名义上的最高法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令：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31】

——这里，我们还可以特别注意到李一哲所列的“专政对象”是现行刑事犯罪分子，而不是中共的“阶级路线”一贯罗列的“黑五类分子”。这一改动，连批判李一哲思潮的官方代表“宣集文”（广东省委宣传部集体文章）都敏锐地注意到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李一哲开列的‘必须实行专政’的对象里面，一，地主阶级没有了，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了，富农阶级、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及反革命分子也没有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二，无产阶级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也不见了，于是，一切封、资、修的反动意识形态，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都可以自由泛滥……”〔32〕。这确实不是偶然的疏忽，因为在李一哲思潮中，遇罗克《出身论》的正义之声被升华到了一种法律诉求的高度，人权的概念又已从《出身论》里的出身不好的受歧视的青年扩展和延伸到一切受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无规则的权力斗争与派别斗争中受害的群众。与《出身论》还只是在文字上批判“联动”等血统高贵者的法西斯行为不同，李一哲第一次提出了人民的法律惩治的要求：“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关于遇罗克所表达的平等的受教育的思想，在李一哲的深切关注中以“限制特权”的诉求得以弘扬的。出现于七十年代初的所谓“工农兵学员”制度大多成了特权人物“开后门”（即送他们子女上大学）的场所，因而李一哲们指出：“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为之，李一哲们呼吁“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从《出身论》到“李一哲大字报”的嬗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权的思想，即维护中国最底层的人民群众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不受政治迫害的权利，正在健康地发展，逐步地升华。既然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褫夺人民的人权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而遇罗克，李一哲们制度内的正义诉求完全不可能得到中共的善意回音（只能换来子弹与牢房），那么这一不可遏制的人民的诉求又将走向何方呢？答案恐怕也是显而易见的。

追求民主，追求人民群众对于这个国家实际的管理权利，这是异端思潮的第二个主要诉求。这一朦胧的诉求，首先是以追求新的政体——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国家政体为目标的。如前所述，关于文革的目标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原是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人民的一种承诺。处于一潭封闭的死水式的思想环境下的中国民众，恐怕实在不知道除了一八一七年的“巴黎公社”外，世界上和历史上还有什么新型的民主政体。但“民主”二字对于处于十七年专制的沙漠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具有天然召唤力的绿洲、甘泉；哪怕它实际是一片海市蜃楼的幻影，但也足以使他们铤而走险地为之奋斗了。什么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呢？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内和有关的《巴黎公社史》的论述，主要是：1）实行普选，代表、官吏可随时撤换；2）法官公开选举，并可调换；3）公社废除暴力，废除常备军，代之人民武装。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还特别指出巴黎公社的本质是“自治”，“是人民为自己的福利管理自己事情”的“自治”。〔33〕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中共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显然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其实，文革中以建立“公社”代替“革命委员会”的极左派“新思潮”派，他们所坚持的“异端”并没有越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范围。“省无联”在它的《中国向何处去》中坚持的似乎正是马克思的上述主张。第一，省无联思潮主张公社的代表应是“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不过在“革委会”里，“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与之相反，大多数群众把文革认为只是一场“连对敌人是一

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更有甚者，“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形式”。第二，省无联们又竭力主张解决中国军队问题：“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大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他们要建立的公社的武装是一支“不同于现在军队”的“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为此，他们歌颂群众性的抢枪运动以及“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态。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应当说，省无联们所描述与憧憬的正是—一种公社式的“自治”〔34〕，他们的口号“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更完全是巴黎公社式的。而他们对于军队参政的“三结合”必然形成新的更为反动的“官僚复辟”的预料——即对于“一月革命”后军人法西斯官僚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应当说是极有洞见的。

与“省无联”相同观点或直接受其影响的群众组织在1967年秋至1968年春在全国大有人在。武汉地区由华中工学院的大学生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先后组织的“北斗星学会”（1967年11月），“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1967年12月）和《扬子江评论》（简称“北、浐、扬”），也坚决主张彻底消灭解放军，并代之以人民武装，还应当推翻“革命委员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体制”，“并使之过渡到巴黎公社式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真正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正式权力机构——武汉人民公社。”〔35〕北京北师大造反兵团“新思潮”代表李公博等人也含沙影射地指责革委会“从形式上与旧社会资产阶级专政机关是一样的。这种机构是官僚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温床。”〔36〕“就是要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与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构，创立起无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坚决反对‘打倒皇帝做皇帝。’”〔37〕广东地区的代表者是广州八五公社。由于这股思潮在一个新兴的造反派组织“粤海风暴”的小报《八五公社》上表现的最为充分，故又称为“八五思潮”。“八五思潮”认为以林彪集团大将黄永胜为首的省革筹小组是“反动势力”，它们“正在汇成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暗流”。它们提出：“大局未定，大权在争”和“广州还须大乱”的论点，并坚持“干部大换班”而不是省革筹小组的“改良主义”。〔38〕

既然“新思潮”的倡导者们要求人民有实际管理这一国家的权利，他们必然反对目下管理这一国家的中共官僚阶层（用“省无联”们的话来讲，是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其实，认为中共的干部阶层，尤其是高级干部阶层已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起源于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的理论。1965年，当毛泽东在为他准备中的政治风暴大造舆论时，他曾在一个报告中批示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39〕然后，当1967—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二十九个省市“革命委员会”广泛建立后，这一“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再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正确对待革命干部”。自1968年“清队”以后，只要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全部作为“革命干部”结合进“革委会”。这一“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便随着毛泽东权力斗争的胜利而悄然消失了。如同民间文革史家刘国凯指出：“许多工厂里的‘造反派’对本单位的厂长、书记揪住不放，陈伯达在七月初说：‘军代表在工厂要帮助革命派解放包括厂长书记这样的大量干部，走资派只是一小撮，不是走资派只是有错误认识了就算了，这是中央的方针。’他说得倒轻巧，如果这些厂长、书记都

重新官复原职，那批判过他们的‘造反派’今后还会有好日子过？”〔40〕因而，群众和造反派中一部分思想家仍坚持“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提法，并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形成独立于瞬息万变的官方理论外的“反特权”，“反官僚”的异端体系，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对反特权以及特权阶层的理论作出最初独立阐述是遇罗克。他在正面批判联动的“血统论”的一系列文章里，非正面地论述到了这一与“新的受歧视阶层”处于“阶级压迫”地位的特权阶层的问题。1967年春夏之交，由于批判反动血统论，北京有不少中学生小报上出现了有关特权阶级（层）的文章，随着北京中学生分为四·三、四·四两大派。“四·三”派似乎更注重关于“特权阶级”理论的独立探讨。风行一时的四·三思潮的代表作《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便是这样一篇压卷之作。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一种新的“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保”的一方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权人物”，反对“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公有”。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激进派——四·三派则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是一种“不断要‘革’，要向前”去“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41〕这篇文章以及它首先提出的“新思潮”给了一年后震动全国的省无联思潮以极大的影响。1967年省无联的理论纲领《中国向何处去》的执笔者杨曦光在北京串联，接触到这些文章。他后来写道：“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思想界比较活跃，但有人写《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重建马列主义小组》，《废除官僚机构》及批判现存国家机器，分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文章，就立即遭到了疯狂的围剿。今年四月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北京的中学四三派有几个激进分子写了篇《论新思潮》也被一片批判反动思潮的叫声所淹没”，〔42〕“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强烈不满，开始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43〕

作为一种深入反思的结果，发表于1968年1月的《中国向何处去》表达了更为激进更为系统的反特权思想。首先，它认定十七年中：“90%的高干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的。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44〕其次，它又指出：“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因而“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与省无联的看法相同，武汉“北决扬”也坚决认为：“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45〕广州的“八五公社”似不及“省无联”与“北、决、扬”那么激进，却也提出了“干部大换班”和“一切权力归左派”的相似口号。〔46〕

既然占95%的官僚主义者——红色资本家阶级掌握了党权、军权，那么对十七年的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乃至砸烂就是必须的了。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1967年底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该文提出：“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一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

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创造出—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在伊林·涤西看来，中国的国家机器应变为“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47〕但是他们并没有指出改善（变）这一国家机器的原因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掌握了这一旧的国家机器。风行于1968年初的全国范围内的“新思潮”更多地主张“应推翻腐化阶级，应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湖南省无联）；“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武汉“北决扬”）。

既然十七年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原来掌权的95%的高级干部要作为—个“官僚主义者”——“红色资本家阶级”推翻，那么革命要依靠—些什么人呢？这便是流行全国的极左派的新思潮的又—异端理论——“阶级关系变动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新思潮”中，最早正面提出—问题的是省无联思潮：“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48〕什么是新的阶级关系变动？如何进行这—新的阶级关系分析？除了提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外，省无联思潮还提供了这样—些大致的分析：保守派自然不是依靠阶级，造反派中不少人虽然也参加了革命，“但是对于这场革命也有不少的人很不理解”；因而只有依靠“趋向新思潮，立志改革的激进分子”去重新建党。与省无联相同，武汉“北、决、扬”思潮同样坚信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并在他们那篇著名的《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中，提出了重新组党——以激进分子——“无产阶级左翼队伍”，作为“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的主张。〔49〕广州的“八五公社”在那—时期也提出了“重新划分阶级”的口号。上海的“反复辟学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公开宣称：“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50〕而中申会在其代表作《—切为了九大》中具体阐释这—变动为：“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矛盾，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要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51〕应当说，“新思潮”从阶级斗争上确认95%中共政、军干部是—个“应当推翻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以及特权人物；从国家机构上主张砸烂—切中共官僚机构，包括中共及毛泽东最主要的统治基石——军队；在阶级关系上全面否定中共统治最主要的群众基础——干部与党团员，并主张通过全国性内战重新建党建军，尽管它再打着“毛泽东思想”乃至“毛泽东主义”的旗号，甚至“新思潮”的倡导者们仍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独立思考，但其主张的实质及—旦实践的后果必然使毛泽东思想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体系成为—张没有任何基础的空头支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苦心建筑的“全国—片红”的新权力大厦又会崩塌于再次群众运动的浪潮，这便是“新思潮”饱蕴的杀机及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招致残酷镇压的深层原因之—。

值得一提的是，个别“新思潮”的倡导者们走上了更远更直觉的反体制的道路。1967年至1968年活跃于山东造反派中的所谓“反革命组织”——“渤海战团”便是典型的一例。战团的代表人物丘黎明，王公乾等人在他们的《揭开山东省十七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中这样描绘了山东省的五七年反右斗争：

制造了—系列骇人听闻的冤案、错案，先后株连了—大批革命干部，打击陷害了大批革命的好同志。……连同‘反右倾’，打击陷害了几十万干部。这些同志中不知有多少人，被

无理剥夺政治权利、撤职、坐牢、甚至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至今未给平反，仍戴着“右派”、“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大帽子，不能享受一个普通公民所能享受的权利。〔52〕

因而，他们认为：“十七年来历次政治运动左倾是主要的，57年以来的反右，整风运动，反右倾几乎全错了……十七年来受迫害，受处分的大都是好同志”；“反右斗争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夭折。”他们还公开扬言：“中国的军队，公检法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要彻底砸烂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国家机器，重新建党建军。”〔53〕他们对“新思潮”在全国范围内的产生更有一种自觉的认识：“不论在山东，还是上海，或者是湖南，更不用说北京，不但出现了一些不信邪的激进分子，而且还出现了好些激进的文章。这些激进分子虽是少数，但是思想越来越完整；”“要依靠这些激进分子去重新建党建军。”〔54〕虽然渤海战团很快便被取缔，但从它的文献中却可清楚地窥见极左派“新思潮”的“反体制”内涵。

与发端于1967年春的极左派“新思潮”相比，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的思潮似乎肇始得更早。1966年底风行于北京的联动思潮被人认为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逐渐觉悟，自发反对错误路线的体现，是‘文革’中人民起来反抗‘四人帮’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行动。”〔55〕联动由一大批出身高干的老红卫兵组成，在1966年8月当了毛泽东和“江青阿姨”的宠儿完成了街头“红色恐怖”的任务后，因为他们对文革所整的重点——党内走资派，即他们父母的天然抵触，以及他们死抱住不放的“血统论”客观上已成了刘邓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权力斗争中较量的一个重要政治武器。毛泽东及文革派决定抛弃这些“宠儿们”，并发动被他们执行的“资反路线”“压制的一大批群众起来造反取而代之。对于这一大批不可一世，自负好斗的贵胄子弟来说，被利用后被抛弃，每被批判的滋味当然不是好受的，他们“愈来愈感到味道不对头，革命似乎革出鬼来了。自己的老子执行了资反线要作检查挨批判。更可怕的是那‘走资派’的帽子竟总在自己父辈们头上盘旋，不知什么时候会飞下来扣个正着。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革命’，这个词本来是那么潇洒写意。老子们天生下来就是革命者！老子们的老子革了旧中国的命打天下，是英雄。今天轮到老子们继承父业去革那些‘黑六类’，‘狗崽子们’的命，是好汉。抓、抄、打、游街、随心所欲，何等快意！革命的涵义本来就理当如此，何为现在竟节外生枝，搞起什么批资反线揪走资派来？这也算是革命？革谁的命？随着批揪声浪的高潮，一切伦理关系都在改变颠倒，过去那些连大气也不敢出，低眉顺眼的狗崽子们神色自若了，尤其可恨的是那些‘灰色阶级’的混蛋们竟大模大样口出狂言，而自己那一向令人钦慕的高干子弟地位正在向黑帮子弟转化。‘黑七类’之中的老七就要由自己去充当，自己就要从社会金碧辉煌的最高层跌入最黑暗凄凉的深渊！……为什么灾星会出现在自己家庭的上空？为什么自己的境遇越来越不得意？为什么从前的少数派这样肆无忌惮耀武扬威？”〔56〕在被利用被抛弃后的自身痛苦经历的独立思考中，作为文革牺牲品的联动萌发了对文革，对中央文革乃至对毛泽东的强烈不满。这些不满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他们要求河归旧道，即回到十七年的中共专制（“一九六五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第二，他们要求文革不触及十七年的官僚体制（即“反对揪斗革命老前辈”，“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生命安全”〔57〕）；第三，他们要求抵制对“血统论”及他们执行的“红色恐怖”的批判（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58〕）。平心而论，联动思潮表达了不

少极宝贵的思想，例如他们喊出的“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口号，应当说是文革中第一次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正式挑战。但在文革期间，联动的行动非但没有引起人民群众的同情与反响，相反在相当孤立中走向失败。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人民群众受够了他们“血统论”，“红色恐怖”之苦，而他们却没有起码的自我批评，反诬对他们的批评是“新的资反路线”；他们反对迫害中共老干部，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对自己继续唯我独革地迫害普通人民群众（如他们所言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如同北京的一些中学普通群众所认为：“学校中多数同学对‘联动’是反感的，认为‘联动’所为只是一种失宠后的发泄而已……他们出尽了风头，被‘中央文革’捧上天，他们似乎天生具有决定可以斗谁，不可以斗谁和决定命运的权利。当他们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当他们在学校的领导地位受到冲击后，才打出反对‘中央文革’的牌子，并用极端方式与其他群众组织对立。这使很多人认为，他们只是为着自己一伙人私利反对‘中央文革’的，是想恢复他们自己有过的高居于群众之上不可一世的优越感与特权。”〔59〕这一出自普通中学生之口的评价，应当说是公允的，也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人心向背和为什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一九六六年底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民意牌会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所在。

紧跟着“联动”炮打中央文革的是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保守派红卫兵的代表，这一思潮后来被毛泽东在六七年初称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反动思潮。这又是一次规模不小的对文革的公开抵制。其抵制的主要方向是中央文革纵容与支持造反派对他们所执行的批判与斗争。本来，这些保守派红卫兵的代表只不过是既执行了工作组的指示“反右派”，又按中央文革的精神破四旧，抄家，打人的。但中央文革非但没有象一般群众那样给他们一点应有的袒护，相反煽动了两派学生中越来越严重的对立与斗争。当这些红卫兵反中央文革时，使用的武器也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制定的《十六条》。1966年11月24日，29日，12月2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和“野战兵团”赖锐锐等人“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二问中央文革》，《三问中央文革》和《也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学生，甚至扩大了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学生中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1966年11月27日，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贴出质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和“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标语。他又在12月1日的辩论会上对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却没有经过群众选举，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认为各校组成群众组织，“搞的四分五裂”也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60〕不过数日，北钢，北大，清华，北航，北矿都出现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与“刘少奇万岁”的大标语。这一思潮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抓住了毛泽东及其文革派打民意牌的假民主，第一次正面揭穿了他们真专制的面目。而这一思潮的失败之处与联动思潮相似：他们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一些执行了“资反路线”的高干子女。由于他们缺乏对执行资反路线的自我批评精神而失去了群众的支持与同情。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出自一己私利而反“中央文革”的印象。因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很快利用专政机关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镇压。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从毛泽东及文革派的重要政治工具——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分裂出了一个叫“清华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的群众组织，这一组织作为当时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的分化物，代表了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最完整最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大都出自该派主要理论家周泉纓对文革的独立思考。四一四派的基本理论正好和极左派“新思潮”的阶级关系变动论相反——“阶级关系不变论”。在四一四纲领性的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中，他们提出：十七年“全体劳动人民是有权的，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文化大革命中，



决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因而，他们认为“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造反派可以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出于这一基本估计，他们当然要求文化大革命进行“收”，造反派应当作为“革命的同路人”抛弃，整个文革应当进入“修整、巩固、妥协”的“相当长的必要阶段”。实际上，就是河归旧道于十七年，就是他们所主张的“对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二”。

四一四思潮其实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有任何成绩，但周泉纓使用了非常隐晦曲折的历史比喻来进行含沙射影，他把文革的成就比作“秦始皇修长城”，虽然也抽象地肯定历史功绩及长城的作用，但具体地谴责他的“残暴的阶级本性和操之过急。”〔6 1〕出于这一基本认识，周泉纓于1967年10月公开贴出炮打陈伯达的大字报，声称陈伯达歪曲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利用群众运动搞乱了文革”。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对待群众运动上搞的不是“阶级分析”，而是极‘左’的颂歌，全民式的‘颂歌’；不是“引导”，而是“放任自流”。周泉纓的结论是：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身负领导文革重任的陈伯达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窃国大盗袁世凯式的人物。”林彪，江青等人，是“极左路线的总根子”。在决定炮轰陈伯达期间，周泉纓及其四一四部分同学们聚会公开指责文革的发生“一则是个人集权需要，二则是排除异己”；“打倒‘刘家军’，换上了‘林家铺子’”。周泉纓还公开说：“别看这说出去非常反动，其实政治斗争就是那么回事。”〔6 2〕

虽然周泉纓以及四一四的伙伴们在公开的大字报上矛头只指向陈伯达，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其实质是指向利用、愚弄并最终镇压了造反群众的毛泽东。周泉纓等人关于“政治斗争”种种肮脏黑暗的私下议论，正反映了这一代青年人在充当狂热盲目的毛的政治斗争工具后的冷静与清醒。尽管，周泉纓等人的“理想国”是朝后的——文革前的十七年。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环境下，青年人除了知道他们经历过的“十七年”或马克思书本上的巴黎公社外，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参照的“桃花源”呢？象杨曦光、鲁礼安们一样，周泉纓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思考也太多了，发表个人意见更太多了，因而他也很快被送入了社会主义的班房。然而，清华四一四们作为造反派的一翼对于十七年中共专制的留恋（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十七年是以刘邓等一批中共官僚为代表的），却明白无误地反映出这样一个信息：身处文化大革命无规则政治斗争及不间断的社会性动乱中的中国民众，在目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更黑暗更残酷的权术表演后，期望安定，希冀停顿，两害相权取其轻，连他们曾厌恶的“十七年”的官僚们都显得不那么狰狞可恶了。

这一微妙的信息，在1974年异端思潮集大成者——“李一哲思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可说是集中与扬弃了上述极“左”与右的异端思潮的特点。首先，“李一哲思潮”对于“林彪体系”的批判，可看作是伊林·涤西“反个人迷信”思潮的系统化；而李一哲对于文化大革命所有“新生事物”的全面否定以及对于“林彪体系确立的……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四人帮”之流的全面理论清算，更远远超过了“联动思潮”与“怀疑一切思潮”的感性反抗。第二，“李一哲思潮”既坚持了“限制特权”的呼吁，但又恰如其分地指出：“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6 3〕尤其是“李一哲思潮”的反特权不仅指向十七年的旧官僚，更指向“大开后门”的林彪、“四人帮”及一切新官僚、暴发户。这不仅发展了遇罗克的思想，而且远比省无联的“红色资本家阶级论”有分寸和符合社会实际。第三，“李一哲思潮”既肯定了文革中人民反对十七年官僚体制的革命大民主，但又升华了清华四一四的“修整、巩固、妥协”论，主张在政治上安

定，经济上建设，体制上民主。坚决反对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搞新的、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的“整顿”的一切阴谋事件（如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事件等等）。这里，我们看到了“李一哲思潮”对“省无联思潮”、“北、决、扬思潮”的一个重要扬弃。后者在现实政治斗争上的理论认为，周恩来是右派，是文化大革命要彻底铲除的官僚阶级及制度的总代表。他的力量之强大使毛泽东不得不一再迂回，退让，并把红卫兵、造反派作为他每次退让的牺牲品。与此相比，“李一哲思潮”超越了这一精神负累。如同《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执笔者王希哲所解释的那样：

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宽松一些政治桎梏，对人民略为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毫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中央文革要求批判李一哲思潮（注意：不是极左思潮，他们是分得很清楚的）的时候，共产党的老官僚们却表现出对李一哲的同情。〔64〕

应当说，李一哲思潮的右转和它对文革中极“左”派“新思潮”的扬弃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正是异端思潮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然而，“李一哲思潮”作为文革中异端成熟的标志和现代意义上民主思潮的开始，更在于它提出了一些现代民主宪政的纲领性要求。就他们向四届人大提出的六点要求“1.要法制，不要‘礼制’；2.限制特权；3.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4.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5.落实政策；6.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来看，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提高到法律高度，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坚持人民的民主权利还在经济领域内也提倡切实可行的原则，已俨然是一份全面的雏形初具的异端纲领了。

当我们说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对平等，民主与法制进行了独立思考，其最主要的可贵之处是指这一思考本身的“独立”两字，而不是指这些思考所到达的高度。就其思辨的高度和深度而言，更多的仍是在马克思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内。即便是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批判，也大多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的。如同“李一哲思潮”的倡导者自白：“李一哲们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现对它的忠诚。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65〕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他们其实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者。其次，除了少数人（如遇罗克）外，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大多没有到达系统化全面化的水准。但他们有幸结合自己文革中的痛苦实际，对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的疑惑和对理论问题独立思考的本身，都导致他们走出了背离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关键的第一步。最后，尽管有一些异端思潮或多或少地正面批判了毛泽东（如“联动”思潮），但毛泽东本人对整个异端思潮来讲仍是批判的一个盲点。这一方面固然是文革中盛行的个人迷信对这些异端思潮的局限，造成它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表象，但从这些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们的私下议论及觉醒历程来看，他们对毛泽东的错误已有相当的认识，只不过新思潮的轨迹常常沿着旧框框迂回奔突，“打着红旗反红旗”无论在意识和下意识中更容易被采用（这也是一种个人迷信的惯性）。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中异端思潮本身，都向着一个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的，最终必然走向平等、民主、法制等健康的方向走去。

注释：〔25〕遇罗克《出身论》，北京：《中学文革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26〕遇罗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北京：《中学文革报》第四期，1967年2月21日。〔27〕同〔25〕〔28〕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北京：《光明日报》，1980，9/12—9/22。〔29〕《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译文载广州《人民之声》总第六期。〔30〕漆豪《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载李一哲原著，漆豪校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1976年，第3页。〔31〕同上，第50页。〔32〕宣集文《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载玄默编著《李一哲大字报论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6年，第241页。〔33〕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4页。〔34〕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原载广州《广印红旗》1968年3月。〔35〕鲁礼安《决派章程》，原载于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36〕《公社早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1967年2月，载上海市委写作班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1970年）。〔37〕《造反兵团关于井冈山公社大反新思潮的严正声明》，1967年2月，同上。〔38〕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出版社，1971年，第329页。〔39〕毛泽东《关于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1965年1月25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1969年，第548页。〔40〕同〔16〕。〔41〕《论新思潮》，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42〕杨曦光《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43〕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纽约：《中国之春》，1990年12月。〔44〕同〔34〕。〔45〕冯天艾《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原载武汉《扬子江评论》第十期，1968年6月12日。〔46〕同〔38〕。〔47〕同〔19〕。〔48〕同〔34〕。〔49〕同〔45〕。〔50〕《反复辟学会宣言》，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51〕《一切为了九大》，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52〕《揭开山东省十七年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载山东师范学院革委会《黄河评论》，1967年第3期。〔53〕《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引自山东大学《红二三战报》，第三十九期（1968年4月10日）。〔54〕同〔53〕。〔55〕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199页。〔56〕同〔40〕。〔57〕《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003》，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58〕乔伊，徐雅雅《联动事件始末》，载《红卫兵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71页。〔59〕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203页。〔60〕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3页。〔61〕周泉纓《四一四思潮必胜》，《与周泉纓同志谈话纪要》，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62〕《历史的判决》，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63〕李一哲原著，漆豪校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1976年。〔64〕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洛杉矶：《中国之春》，1994年12月。〔65〕同〔64〕。（未完待续）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四）

• 宋永毅 孙大进

•

（续上期 总论：异端初露，思潮迭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 [编辑]三. 反论：异端思潮成熟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般而言，滥觞于十九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件毫无新意地模仿着，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开了一个个独出机杼的迷局。已故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称它为“比法国革命无论在规模与意义上都更值得我们世代研究下去的历史事件”，并长叹感喟：“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对我们仍是一个个谜。”〔66〕究其独特之处，其一是在形态上不是一群人（一个阶级或一个流派）革另一群人的革命，而象一场全民族的“革命”与“被革命”的循环混战。其二是它在结果上竟在没有与外界文化大规模正面冲撞的情况下（如五四），从内部完成了原有正统意识形态的全面大崩溃。文革后弥漫于全民族的“三信”危机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的风起云涌（从“民主墙”到“八·九”学运），异端思潮凤凰涅槃的彻底性与普遍性都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如果说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是异端思潮在完成其理论成熟后（以“李一哲思潮”为标志）的第一次大行动，那么就其规模——云集在广场上与“秦皇”及其追随者对峙的数十万群众而言，就可以看到“异端”在人民，至少在“思考的一代”心中的人心向背。这种意识或下意识的人心抉择并不是说群众都已受到了异端思潮的影响，而是说李一哲等人大字报正是人民心中自发的异端心态的一种理论化的表述。简言之，这些民众，尤其是相当数量的年青一代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异端思潮的群众基础。

又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这些民众从“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转化为异端思潮的基础的过程中，有什么极有意义的步骤或阶梯促进和推动了异端心态广泛地萌生和迅速地播散呢？人类不可能一无依傍地凌空建筑他们的思想殿堂。知识的承传，思想的沿革，都必须有其继承与发展的一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书作为知识与思想的有形载体是必不可少的媒介物。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其鲜明的“反文化”的特征，恰恰是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焚书坑儒”运动。浮面看去，似乎那一代青年要读其他的书已是一种奢望，其实不然。由于对各级党组织的冲击，文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中央集权失控阶段。大批判的盛行，扫荡了封、资、修留下的一大片心理空间，单靠“毛泽东思想”是填不满的。而十七年正规教育的戛然停顿更腾出了成年累月的自学时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烧掉所有的图书馆，由于抄家，父母被囚禁，红卫兵掌管了图书馆等种种原因，不少文革前非正式出版的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灰皮书”和“黄皮书”——其内容大都是介绍种种西方现代政治思潮的——开始流落到他们子女及一般青年学生手里。文革前公开出版的许多西方著名哲学、文学、经济学著作也同样成为流行读物。加上出版手段（从油印刊物到铅印小报）在文革中的民间化，不少资料还可以翻印出版，这样就更扩大了流传的外延。伴随着“革命者”在文革中不断地被“革命”，毛泽东思想在一代青年人中一次次失去宗教的权威，而心中的问号迅剧地叠列，幻灭成一次次地加深——“谁之错？”——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极“左”派学生，都带着这样的疑惑始而向马列主义，继而向人类所有认识世界的思想宝库中寻找答案。甚至一位北京红代会的常委在目睹“自己曾经抱以极大期望，并以满腔热血为之奋斗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政权，只不过是一种欺人耳目的形式”后，都有这样的感觉：“正是在那所谓‘权力之巅’的时候，我开始产生了苦闷，也产生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从这时候起，我开始重新认识‘文革’的目的，思索自己多年来据以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然而总是对不上号，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把自己投入到书籍的海洋，从马列著作开始，去寻求答案。”〔67〕——这便是十年文革中蔓延全国的地下读书运动的缘起。

根据目前非常有限的资料，这一自发的地下读书运动大约始于一九六七年“全面内战”阶段，又而在一九六八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风潮里得到更猛劲的推搡。被毛泽东及其

追随者利用后抛弃的老红卫兵——联动分子，厌倦无休止无规则内战的造反派红卫兵和一次次成为文革殉道者的极“左”派新思潮倡导者们，都开始形成一个个地下的读书圈子。由于毛泽东指导文革理论的出尔反尔和前后矛盾，最初的读书与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与文革有关的许多问题。“李一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王希哲曾回忆1967年的这种读书会和讨论会道：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走资派？有无‘主观走资派’与‘客观走资派’之分？中国的十七年特别是教育部门的十七年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文革两派的实质和解决它的正确方针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化讨论，又不可避免地触及了过去没有触及过的哲学领域的一些问题，如毛泽东思想是否也是一分为二的，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转化，量变与质变及其临界点的确定等……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辩论的双方的持论都未免幼稚，甚至它的某些前提本身即属荒谬，也不可能在那种大环境下得出什么正确的结论，但它对我们这些已经为文化大革命付出那么大代价并希望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启蒙，可以说，这一次关于文革理论的讨论几乎决定了我后来一生的道路和命运。我渴求获得更多的政治、哲学、历史的知识。”

为了读书与讨论，王希哲甚至利用武斗中控制的广东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从建工局医疗所楼爬进了哲研所图书馆偷了一旅行袋书籍，包括有《三个国际的历史》、《托洛茨基传》、《联共布党史》、《经济学辞典》等……我在造反派楼辟了一间小书房躲进去去读书……”〔68〕

尽管缺少文字记载，但类似王希哲和他伙伴们的小圈子读书会，在全国范围内，自1967年起就十分普遍。前面提及过的异端组织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青年社”，上海的“反复辟学会”，武汉的“北斗星学会”，出东的“马列主义小组”，其实都是一些类似的小圈子。笔者作为一个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在1967—1968年间就参加过不少类似的地下读书活动。当时正值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第一次“炮打张春桥”被镇压下去不久，流传于各个小圈子内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油印本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等等都惊世骇俗般地大开了我们的迷蒙的眼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斯大林残酷的大清洗如此同出一辙，希特勒对罗姆冲锋队的清洗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利用又何其相似乃尔……也正是这一读书运动，推动了后来上海造反派红卫兵运动中“反复辟学会”，“胡学钧小集团”，“中串会”等异端思潮的形成。

自1968年起，打倒了政治对手后的毛泽东决定整治为他效过犬马之劳的红卫兵。“上山下乡”的发动便是他收回给青年学生的结社自由权并企图从组织上作为一个整体彻底打散他们的运动。尽管国内外学界目下仍主要从国民经济、毛泽东的农民乌托邦主义等角度去分析这一运动的动因，但毛在这场运动中已公开把“红卫兵小将”作为革命对象（“再教育对象”）——他政治斗争的对象——本身就明白无误地透露了这一政治权术的蕴奥。然而，插队落户却增进了这一地下读书运动的发展。据各种知青回忆录记载，知识青年带书下乡和回城读书聚会曾风行京城。一位在河北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原北大异端思潮“共产主义青年社”读书圈子成员后来回忆道：“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的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对我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经

历了一个全面的压迫和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托氏的书无疑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至此，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魇般的桎梏和愚昧。”她还无不留恋地回忆了当时极有规律的读书生活：“那一时期生活是振奋的，白天读书，作笔记，自己为自己强行安排课程：中午到学生食堂吃饭……”【69】

陈小雅曾有一篇文章记述到老红卫兵的创立者与联动思潮的倡导者们在插队落户期间读书的情景：

“后来我回北京，其间读了毛主席的《读〈政治经济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吉拉斯《新阶级》、《赫鲁晓夫传》、苏共二十大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其他人——引者注）已经把马恩选集前22卷从头过了遍。同时，我还翻阅了1957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向党交心材料，以及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茨基的言论和斯大林的《论反对派》什么的。给我震动比较大的是《新阶级》，斯大林的黑幕，赫鲁晓夫苏共20大报告引起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解冻’所带来的影响……看了七千人大会讲话后，有一种眼前突然一亮的感觉……又把所谓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翻出来看，在农村呆了几年之后，就觉得太是这么回事儿了。而且觉得份量并不那么重，是那么的客观那么谨小慎微。尤其是还看到大右派向党交心材料，给我印象很深。”与此同时，他们还“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同时搞建设，搞学习。”【70】

从上述非常有限的引述材料中便可窥见，这一代青年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即这代人十七年来被培养起来的政治信念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声音（中央文件，报刊社论等）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而一旦对文革本身取怀疑态度，这代动荡不羁的青年，尤其是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们则更要找寻一种可以替代的理论。他们先是向马克思主义经典，后扑向浩瀚的知识海洋。出于某种逆反心理，他们还有意地潜心阅读和钻研从前被他们批判过的“毒草”，被毛泽东们封禁的书籍，加上各种以前他们无法翻阅的“内部读物”——他们自觉把自己的思绪延伸到“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头目”等等的思想脉流里去；他们完全用反“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思想”以外的思想自觉地重构他们驳杂的思想体系。这种自觉，正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朦胧的异端心态走向清晰的异端理论的自觉，又是他们从感性抵制向理性反抗的飞跃与成熟。作为主要是政治性的地下读书运动的副产品，后来还产生了文学艺术的异端——朦胧诗与“星星”画展，这则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了。【71】

真正使这代青年的异端思潮臻于成熟的，不仅是书本和任何纸上的东西，更是社会和只须睁了眼看的悲惨的中国现实。对于杨曦光、王希哲等文革中尚十六、七岁的理想主义充溢的少年人来说，尽管他们开始独立思考，但十七年的“左”的教育仍然是无形却强大的思想牢笼，束缚着他们的思考去逾越正统意识形态的樊篱。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他们一个个接触与深入社会的机会：大串联，社会调查，上山下乡……当他们忽然脱离了常规的、惯性的轨道，不再有父母的管束和老师的教诲，面对着破碎、痛苦的悲惨世界，他们忽然觉得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所信奉的主义，是那么耐不住深入的探讨，尤其是经不起现实的验证。他们不仅对文革，而且对整个十七年的专制、荒谬都有了制度层面上的认识。曾有一篇由当年红卫兵写的关于“省无联”理论家杨曦光思想转变的文章指出：“杨曦光是生长在一个特权阶层

的家庭里，他一出世就受到毛泽东思想教育。他的物质生活是美满的。他成年以后肯定是特权阶层的接班人。从父母的影响和整个社会的接触，应该说他对现实十分满意的。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他也是和其他的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一样，带头去斗牛鬼蛇神……。”促成他思想的转机是他调查了湖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运动。在1967年夏季的湖南武斗中，湖南各地的上山下乡知青曾是造反派的主力军，但中共在利用过他们后，由周恩来出面高压他们回农村去“抓革命，促生产”，却不解决他们上山下乡中遇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杨曦光和其他的青年学生，为求彻底了解上山下乡青年的现实状况，就走到上山下乡青年队伍中，问他们为什么不听中央指示，不回农村去。上山下乡青年就将实际情况摆出来，大家激烈地辩论起来。上山下乡青年要求杨曦光到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后来杨曦光和其他青年学生连同上山下乡青年组成调查组到农村去实地调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亲身体验，杨曦光的整个思想都变了。他自己问自己，搞了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搞出什么名堂来了？”【72】

按杨曦光今天的自述，当时是由于两个原因使他形成了震动全国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异端思潮：一是“我觉得这种社会矛盾（指干群矛盾——引者注）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找答案……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二是“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组成工会式的组

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73】杨曦光在他的《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写道：“知识青年运动集中暴露了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74】——从“省无联”思潮的形成和杨曦光思想的发展来看，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理论家深入社会后的思想变化是极大的。

“李一哲思潮”是另一个典型例子。对省无联极“左”思潮的扬弃而向右转曾是“李一哲大字报”的不同凡响之处。而在这一转折中，社会考察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希哲在回忆这一思想转折时讲到有三件事对他思想上震荡极大：一是林彪一伙在“左”的旗帜下屠杀广东群众；二是广东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复退军人要求恢复工资运动……它也教育了李一哲：“文革左倾的经济政策及左派鼓吹的共产主义分配方式是行不通的”；三是在专门的社会考察中，他亲眼目睹广东大规模的农民、知青逃亡港澳潮流，“开始使他朦胧地感觉到：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充分给个人以发展天地的经济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的吸引，都是不可阻挡的。”【75】人们的怀疑精神一旦打开了闸门，思想的洪水决不会再被阻挡在小河道里，必然汹涌泛滥，冲击整个体制。作这一如是观，李一哲第一个在文革中喊出“民主与法制”的口号，又转而成为第一批成熟的民主主义战士，也是水到渠成般地可以理解了。

或许，我们以魏京生的思想转变为例更能说明问题。文革初期，由于高干子弟的背景，魏曾先是一个“狂热的毛主义分子”的老红卫兵。在老红卫兵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利用后抛弃时，他也加入了联动，反对过江青。如果魏京生思想以后只是停留在这一感性反抗的层

面，那么他今天极可能是大小高干子弟，第三梯队的一员或某个官倒公司的总经理。是什么使魏京生从一个感性的异端思潮分子转化为一个理性的民主主义战士呢？同样源于

对文革疑窦初生后的“社会调查”。他发现报刊神话中的仙境，在现实中竟是鬼域：在“河西走廊”，他目睹成群结队衣不蔽体的乞丐，甚至其中有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在新疆，他看到被当作囚犯一样失去自由的上海知青和“完全是好人”的右派……魏京生写到：“从这时我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看见报纸上登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描述和听人讲起社会主义如何胜过资本主义的大道理，就在心里骂一声：‘扯你娘的淡’。虽然从书本上看到的资本主义也并不好，可是我不相信还有比我所看见的这些更不好的了。”〔76〕继而，在1968年下乡插队中，魏京生更进一步了解到了五八年“大跃进”带来的大灾荒和饥饿的农民被迫易子而食的血淋淋的事实。人是有思想的，最悲惨的人间现实教会了这个十八岁的青年思想，不是任何教条所能禁锢的——魏京生全面的反体制思想以及他对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刽子手”的深刻认识就是在对中国社会底层的悲惨世界的观照中成熟的。

或许，又正如魏京生所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乱了一切秩序，包括正常升学。虽然如此，我觉得文化革命的动乱给我们这一代年青人思想上的益处，可以抵偿不能继续升学带来的损失。因为在这动荡的年代中，人们被迫放弃了头脑中的迷信和偏见，被迫不断审查他自己的看法和思想方法。从而有可能真正客观地分析一切事物。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作到的。”〔77〕

以一张大字报开端，以四位显赫人物的倒台告终，十年文革，一场动乱。但毕竟是给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及其思想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教训与经验。异端思潮在这场动乱中的萌芽，产生，成熟，更说明了在任何大圆昏黑的岁月中，中华民族优秀的大脑都没有停止其独立的思考。尽管在那个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年代里异端的呼声仍显微弱，被摒弃于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主流之外，但它毕竟是在逐渐壮大中的、中国当代思想史上最希望的旁流支脉。在反体制的意义上，无论“左”的或右的异端思潮，都已在文革中汇成了一股挑战与颠覆正统——毛泽东思想的合力。从这一意义上，异端思潮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思想财富之一。

[编辑]注释

〔66〕 John Fairbank, *China Watc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58.

〔67〕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第237页。

〔68〕 王希哲〈从李一哲到王希哲〉，洛杉矶：《中国之春》，1996年3月，第19页。

〔69〕 潘婧〈心路历程——关于“文革”中的四封信〉，纽约：《北京之春》，1995年1月。

〔70〕 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眸〉，载余夫、汪毕华编《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北京：团结出版社，第10—17页。



〔71〕可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

〔72〕黄风〈敢捋虎须拔龙牙〉，香港：《中时周刊》，第105期（1969年9月26日）。

〔74〕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纽约：《中国之春》，1990年12月。

〔74〕杨曦光〈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75〕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纽约：《中国之春》，1994年12月。

〔76〕魏京生〈从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思想发展（之一）〉，载《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香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香港《观察家》出版社联合出版，1982年，第269—285页。

〔77〕同上。

（总论完，待续：第一章 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取  
自  
"<http://www.recordhistory.org/mediawiki/index.php/%E5%8F%8D%E8%AE%BA%EF%BC%9A%E5%BC%82%E7%AB%AF%E6%80%9D%E6%BD%AE%E6%88%90%E7%86%9F%E5%9C%A8%E6%96%87%E5%8C%96%E5%A4%A7%E9%9D%A9%E5%91%BD%E4%B8%AD>"

本页面已经被浏览 34 次。 最后更改 17:28 2006 年 1 月 9 日.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五）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第一章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本章论述部份已经由本刊发表在增刊第138期（zk9711b）上。此处刊载这一章所附的六篇大字报或讲话。关于这些历史资料的背景介绍，请读者参看上述论述部份。——编者注〕

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 •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

有人诬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诬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個，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我们的老子跟著党、跟著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他们对毛主席最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党和毛主席有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你们是在资产阶级高级玩意、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受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崽子们：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自来红”，我们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出身革命家庭的“自来红”比你们出身反革命的“自来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强得无法比！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在革命立场上最最最坚定，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最最最热爱，我们的革命之心最最最红。

我们有没有缺点，有！但这比起我们的优点来是次要的！为了革命要彻底，为了我们红得更纯，缺点我们一定要克服的！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权力，谁敢反对，我们就坚决专他们的政，要他们的命！以前，我们这些“自来红”，被那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王八羔子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我们老子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可他们的后代反而低人三等，连那些资产阶级小崽子都“不如”，今天，有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自来红”扬眉吐气了！往日我们矮三寸，今天是顶天立地的人！所有的“自来红”，拿出我们大红的革命精神来，和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以及他们的崽子，和一切大大小小牛鬼蛇神斗到底！有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反我们造定了。不反到底，死不瞑目！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精神代代传。我们不但自来红，而且要现在红，将来红，永远红，红到底，闹他个全球红，都红遍！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放心，我们这些“自来红”，一定要读一辈子您的书，听一辈子您的话，一辈子按您的指示办事，一定把红色的江山给您保下来，把您的伟大思想红旗插遍全世界！

原载北京《兵团战报》1966年11月26日

∞∞∞∞∞∞∞∞∞∞∞

做顶天立地的人

• 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高六五五班核心组（即领导小组）•

工农革干子弟们，我们过去受压迫，受排挤，受打击，受尽了凌辱，受尽欺负。现在我们要翻身，要造反，要做主人。

过去一些工农革干子弟在敌人软硬兼施、名利诱导的情况下，唯唯诺诺、不声不吭，做了一名不闻不问的小人。

一些工农革干子弟造反未成，灰心丧气，敢怒而不能言。

一些工农革干子弟甚至开始蜕化变质，成了敌人的马前卒，牺牲品。

现在，我们要站起来革命了！要造反了！

还能再“老实”下去吗？眼看著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兴风作浪，赤膊上阵，屠杀我们的阶级弟兄却无动于衷？不能！不能！不能！再“沉默”下去，千百万人头落地，大好江山丧失乾淨！

还能再“畏首畏尾以小人自居”吗？让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当官作老爷，俨然以老子命令威胁我们？不能！不能！不能！再这样下去，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就会重新夺权，重新掌权，在精神上压倒我们，而我们仍然是敌人精神上的奴隶。

不能呀！千万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同志们啊，过去我们矮三寸，现在我们要做顶天立地的人！

班里大权我们掌，核心小组要永远为你们服务！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我们要批判一切旧制度，打击一切反革命，我们要“神气十足”，“作威作福”，要以高姿态出现在高655班。我们要喝斥那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不准翻天，如若乱说乱动，立即镇压！

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任何非工农革干子弟对我们必须尊重一些，不准恶意中伤！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还要敢于做工作，和群众紧密结合。谁要有思想问题，我们最有责任去工作！我们要成为高655班的革命先锋，任何革命工作都要成为全班的榜样！

我们有责任，有权力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主人！懂吗？我们是主人！

光荣的、伟大的、自豪的工农革干子弟们，放手干吧！谁敢动工农革干子弟一根毫毛，就砸他个稀巴烂！

让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做主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

□原载北京：《兵团战报》1966年11月18日

∞∞∞∞∞∞∞∞∞∞∞

从对联谈起

·谭力夫·

对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这也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发明创造。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一颗火星燃起来了熊熊烈火。

有人说它“糟得很”；有人虽然稍加赞许，但也不能全然否认一个“糟”字，在“但是”后面作文章；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

有人说：“上联不利于出身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下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修正主义大讲所谓重在表现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出身不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修正主义用“红色包袱”把广大工农革干子弟压得抬不起头来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何其不公正啊！

什么是大多数呢？在修正主义办的大学里，“自来红”们暂时是少数，但就全国和全世界来讲，他们是绝对的大多数，即使在大学里也终将会成为真正的大多数，请你们放心，我们会用我们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我们的大学！就眼前来讲，混蛋们也决非大多数，职员、自由职业者、普通知识分子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们，请你们不要痴心，你们的老子大多数不属于反动之列，即便是黑五类的子弟，你们也可以想想，虽然老子反动，你们是否是混蛋？我们热烈希望你们做“基本如此”之外的人。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是不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有的同志讲“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后来又产生一幅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较完全了。

第一幅对联描绘了一个基本状况，是讲唯物主义的，第二幅对联是指出了发展前途是讲辩证法的。“基本如此”加上“应该如此”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了。

这两幅对联的确触动了某些人的灵魂，有的同志加上三个字“鬼见愁”或“鬼见怕”，很有意思。有的同志不敢触及某些人灵魂深处的那个小王国，老是不痛不痒，马马虎虎，以

求得和平共处。“岂不知，哄来的孩子，终究不是自家的孩子。”“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否则，貌似爱之，实则害之！

有人写了另两幅对联和前两幅对联唱对台戏，一曰：“我父革命我光荣，娘胎里是自来红，他父反动他倒霉，天生永是自来黑——形而上学。”

这对“红五类”子弟是多么可恶的戏弄。对“黑五类”子弟又是多么卑鄙的挑拨。

二曰：“老子革命儿应继承，老子反动儿应造反——重在表现”。

在这里红与黑半斤对八两，“不偏不向”都叫作重在表现，阶级分析的影子一点也没有了。这简直是彭真言论的翻版！四幅对联这样针锋相对，难道不发人深思吗？有人问我们：“你们说党在学校的阶级路线是什么？”

我们说：“我们理解就是坚决依靠革命左派去牢固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知识分子子弟和一切革命师生，就是左派的主力军。”

又有人问：“哪一个文件哪一条这样写了？”

我们说马列主义教导我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辩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我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进行实践、进行创造。对阶级路线的这个理解就是在进行创造，就是一部份革命同志的创造，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不信也请你们到实践中去检验！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在实践中修正。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在8·20辩论会上的发言

·谭力夫·

刚刚这位发言的，点了我和刘京的名，既然点了将就得上台，所以我抢先发言。行吧？！（笑声）

我昨天发言，有人底下跟我说：“你说彭真的观点还有人鼓掌，这不是盲目崇拜吗？”

还说要写大字报。刚刚这位发言的，也问我所说的右派指谁？大概也是指所谓“彭真观点”的这句话。我愿意把这句话重说一遍，我问白之其，你们那伙人为什么说气候不适宜？他说：“一是由于文革领导不力。二是由于工农革干子弟老说阶级分析，老说阶级斗争，别人就不敢说话了。”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压制一部份群众而发动另一部份群众啊？”他又说：“啊呀！我考虑得不全面。”（笑声）本来嘛，文化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为什么不能讲阶级斗争？！我看，这就是彭真的“放”！这是只准右派放毒，不准左派消毒！（掌声）就是只准右派进攻，不准左派反击！（掌声）就是只准右派翻天，不准左派造反！（掌声）就是只准牛鬼蛇神出笼，不准革命人民降妖伏魔！（掌声）叫我执行彭真的“放”的政策，罢了我的官，我也不干。（热烈掌声）我昨天的话就是这么说的，今天还这么说，以后我还是这么说！（掌声）

到底有没有右派？工大这么个烂黑窝怎么会没有右派？我看今天来参加会的人当中就有右派。（热烈鼓掌）谁敢保证工大五千人里就没有右派？我们认为辩论会开不好，是有人捣乱。当然捣乱的人是少数。“一个游鱼三个浪，三个游鱼九个浪。”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上台讲话很威武地说：“我们不是一百人，是三百人！”你就是有五百人，那我们全校五千人怎么样？你们才几分之几呀？！百分之十还没达到呢！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右派是什么？其实这三百人中，是有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从现在辩论会上就看得出来阶级斗争很复杂，过去我们对阶级斗争、右派势力估计不足。工大这么个烂摊子，为什么这么平静？为什么几翻骚动又下去了。有问题！你们看，现在又蠢蠢欲动了，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工业大学就这么坚强？工大的左派这么多？见鬼去吧！（掌声）

我上台不讲宣言，不进行自我表白。有人心虚，上来就讲参加辩论会的目的，咱就用不著来那一套！宣言管什么事？一文钱不值！（掌声）我不讲宣言，见鬼去吧！就看你的实际行动嘛。有的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掌声）其言善辩，而其行极丑！（热烈掌声）

为什么辩论会开不起来，为什么有对立情绪？革委会在杜万荣支持下成立起来了，酝酿是“不够充分”的。不然，我们还可能上不了台。我们上台，有些人看了不舒服。他反正看你横不是鼻子竖不是眼！我们主持这个会，要是不发言，他说你高居于群众之上，置身于运动之外。你要是发言呢，开头发言，说你划框框定调子；中间发言，说你态度暧昧；最后发言，又说你作结论。别活了！（掌声）不是要开会斗黑帮吗？斗宋硕是刘京的大阴谋，斗晋军是谭力夫的大阴谋，他说你是为了转移群众的视线。你要是不斗黑帮，他又说你放弃了主攻方向！撤你的职，罢你的官！怎么办呢？（有人喊：“让他们发言！”）我看少奇同志讲得对，只有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再说开辩论会，不开吧，他说你心里有鬼，不运用“四大”，不敢发动群众；开吧，不上台又说气候不好，说老讲阶级斗争，溜之呼也。这种人，就是会躲在暗角里，吐几口唾沫，吹吹阴风，登不得大雅之堂。也不过是跳梁小丑！（掌声）回忆回忆，出了一个好汉叫郑志强，我们为他鼓掌（掌声），其他人就是草包，软骨头！都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热烈鼓掌）只配夹著尾巴过日子，（热烈鼓掌）大将一名，叫做吴钊，给三系点了一把火。可是上台来，讲了十五分钟，十分钟开场白，五分钟论据，虚晃一枪，下去了！你说没辩论吧，上台了。你说观点吧，他不讲。（笑声、掌声）刚刚又上来一位大将叫做张晋民，不讲别的，上来念别人写的大字报，说什么工大有没有群众斗群众，可到北大调查！莫名其妙！（笑声）这是什么问题？我只知道主席教导：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得亲口尝尝梨子。没听说吃了苹果就能知道梨子滋味的！（大笑掌声）莫名其妙！这是什么问题？我们是土包子，脑子死，我们是山沟里出来的，说话粗。

辩，又不辩，又要辩。只派几个小卒子在台上晃，就是拖，他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要生什么鬼儿子？！（热烈鼓掌）有人不讲，说材料还不充份。“十大罪状”，一个月前就出来了。我就奇怪，结论怎么出在材料之前啊！（大笑）这些同志们，或者暂时叫他们同志，你们不要糟踏手里的语录本子吧！（热烈掌声）你们不配！

有人讲我和刘京在昨天的讲话，是犯了大罪，竟敢不按十六条，而另给群众划框框。我们原来想：讲或不讲反正都得得罪人。干脆还是讲。我们划什么框框了？不是讲了主流和支流、全局和局部的问题吗？刚刚这位发言的，还要求别人对他们的看法，要注意主流和支流，为什么你就可以说，你说行，我们说就是划框框，这根本不平等！（掌声）刚刚有同志给我递条子，说有的人使劲记我的讲话。同志们，不要紧，让他记，我还得照样讲。共产党员是襟怀坦白的！（热烈掌声）

关于曲钟绥的辩论会上，有人在台上喊“要罢刘京的官！”有的同志上台去说：“谁敢动以刘京为首的文革一根毛，就和他们拼命！”会后有人说：“刘京听了鼓掌了”，但是据我所知，要求罢刘京官的人讲话刘京也鼓掌了。为什么看不见呢？不鼓掌，他说你冷若冰霜，鼓掌他又说你带有倾向性。我看是你自己带有倾向性！同志们，请你们记住这样一个格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热烈掌声）根本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人反问什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们老拖时间，算什么？就是有这种人，我们明明知道有人手里有厚厚的一迭材料，为什么不上台讲讲，还说需要调查。你还调查什么？工作组刚一进校你就作记录了，你还调查什么？他逗一逗，讲一点，这是为什么？明明在他的心里的那个黑角落里，还有他自己的私货！（鼓掌）

我们辩论，目的是为了总结工作，更好地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怎么会关心扫除他们的方法呢？（掌声）我和刘京昨天只讲了两条，还有第三条保留了，王明环还讲了一条标准，我们昨天没好说，就是斗了“左派”还是右派？是革命群众还是牛鬼蛇神？（掌声）老实说，罚不当罪的极少（热烈掌声）。我们现在总结经验，为了今后更好地集中兵力，解决主要矛盾，长长知识，各个击破嘛。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敌人很多，我们打完一个再打一个，呼呼地扫一片，扫不乾淨。（热烈掌声）党中央文件明文规定：真正的右派要放到后期处理。（掌声）在这里辩论，是总结经验，是为了今后更有利地斗这些人！（热烈掌声）他们怎么会对这个这么关心？怪事！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他们说我们怕辩论，我们怕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有强烈的阶级性，你也念语录，可是你念的语录倒帮了我们的忙。（大笑）是不是？同志们，（群众：是！热烈鼓掌）同志们，这是个最朴素的真理。毛泽东思想要是能用来打革命群众，那还叫什么毛泽东思想！（热烈掌声）

怎么能叫这些人没意见？我们下台，你们上台。当然，你们不做出样子来，看来我们也不下台。（大笑，掌声）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能理这一套，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著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热烈掌声）

你们要辩论我们给你们讲台，给你们准备扩音器，要会场给你们会场，要听众给你们听众，你们还要怎么样啊？！你们又不敢上台，你们再不上台，运动可要往前走了。

有人对三大任务根本不感兴趣，正如王明环说：你说自己心中只装革命二字，怎么上台来净散发个人主义的臭味？运动已经拖了一个星期了，得出什么结论了呢？革命的同志心如火焚。有人说我们抢话筒打断人家讲话等等。因为我们看不惯你们那一套，就是要夺话筒。（掌声）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群众：干革命）是让我们干革命的，不是来扯皮的！（热烈掌声）吃著人民给的饭，穿著人民给的衣，住著人民建造的高楼大厦，你们整天想什么？你们认为可以拖，下星期可能干脆不出面。搞舆论准备，你们准备什么？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我们绝不答应！（掌声）没办法，立场不一样，结论就很不相同。（掌声）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的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著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有人喊：骂得好！热烈鼓掌）

一讲阶级路线，他们也来讲几句。怎么配呀！（掌声）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同志们，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热烈鼓掌）同志们，这就叫“阶级烙印”。看到杜万荣为首的工作组撑我们的腰，“土包子”上台掌了权，有的人在底下骂我们，我们是知道的。他们在底下的磨牙声音我们都听到了。（笑声）（掌声）我们认识杜万荣，就从这一点开始，也将由这一点达到结尾。（掌声）这一点就定性了！（热烈掌声）事情一定了，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热烈掌声）老杜进校第一天，给我们做的第一个报告，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掌声）老实告诉大家，那天很多同志哭了。象那些狗崽子们怎么能理解？那天，我们第一次在工大听到了我们在家才能听到的话，第一次感到工大象个家的样子了。我们说一声：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从此照进了工大。（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热烈鼓掌）那些被打翻在地的人，那些从此感到前途渺茫的人，那些从此感到自己的弟弟，妹妹，自己的家庭在政治上都没有了希望的人，怎么能和我们有同样的感觉，怎么能和我们有同样的语言？这就叫“阶级烙印”。（热烈鼓掌）有人说，学生不能老说什么“阶级烙印”。还有人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小资产阶级范畴，而且还引经据典的说什么这是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把主席在二年代讲的，拿到六十年代来硬套，那怎么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地主，大资本家专政下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还是一样？“你是贼，我也是贼。”这是什么逻辑？（笑声）解放前有这么多工农子弟上学吗？那时有革命干部子弟吗？（笑声）这种人对主席的书简直狗屁不通！（笑声）有人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对待我们都应该实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象对老教授那样？！（笑声）知识分子的队伍在不断变化，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如果大家都一样，什么时候有我们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要区别对待。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家外人就是家外人，不能混为一谈。（掌声）

开关于阶级路线的辩论会，不来参加，表示“罢会”。这才是真正问题的核心。我们认为，杜万荣之所以好，第一条就是好在这里。有的人之所以以为他“坏”，也就“坏”在这里。董舒的大字报论点没驳倒，这问题早有人谈，但没抓住。为什么核心问题要回避呢？董舒不是说：前一段运动冷冷清清的的根本原因在于杜万荣实行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阶级路线。一语道破实质！有人说我和刘京的大字报反动，篡改了党的政策，要把我们的大字报批倒、批透、批臭！跟你们吹个牛吧，关于阶级路线的问题，你们来一百人，我一个也能对付！（掌声）老实告诉你，我们的根子硬，我们的根子在哪？（群众：毛主席！）你看，这还怕什么？（大笑，热烈鼓掌）



老实说：我们在修正主义的学校，上了几年学，火气已经小多了。比起我们的小将来，差多了，回家弟弟妹妹批评我们都有修味儿了。可是，听了我们的话，你们还嫌扎耳朵。我们的小将还没来呢？小将来了，就该把你们吓死了！（大笑，热烈鼓掌）

我说了很多话，可能有错误，请大家批判。但是，中心一个意思，我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掌声）有人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利于团结，这是断章取义。我们要革命，有人不让。他不革命也不许大家革命。比如开辩论会的问题，那我们只好让他滚蛋。（掌声）我们的运动不管出现多少曲折，都是要照样向前发展。该打到的，还是要打到。（掌声）我们做到仁至义尽，给你们辩论台，给你们麦克风，给你们时间，给你们群众，你不讲，那我们就往前走了！（掌声）无产阶级总不能让你们牵著鼻子走！（热烈鼓掌）

老实告诉你们吧，你们给我们准备的几顶“帽子”还是还给你们。你们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头上有蓝天，有红太阳，而你们，是蝙蝠！（大笑，热烈鼓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不是靠嘴皮子说出来的，它是客观存在。你在底下准备了多长时间，拿著一迭稿子在那里念，而我毫无准备，上来就讲，信口开河（掌声）

同志们！工大的阶级斗争要找到现象，要找到根子，在我们工大阶级斗争到底尖锐不尖锐？（群众：尖锐）复杂不复杂？（群众：复杂）严重不严重？（群众：严重）要想这些问题。运动拖了一个星期，这是怎么回事？要不，别人牵著你走，人家宰了你，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应该想想这些问题，不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为什么？前途是什么？要想一想？成天该睡觉的睡觉，该吃饭的吃饭。象那些人（指著游泳池）还有兴趣游泳。（笑声）就是不愿想大问题，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掌声）希望大家好好想想，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串起来想，有人反对阶级分析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列宁教导我们，要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理出个头绪来，只有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没有这个观点，就是一个盲目的人，就是一条糊涂虫！

我校运动怎么搞？今后我们怎么走？（群众：按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对！要冲破重重迷雾，跟著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现在迷雾还不算多，我们要有充份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在群众运动的泥坑里打千百万个滚，摔了跤，爬起来，又摔了，再爬起来，心中要有一个“敌”字。我们的运动还没有摔过大跤呢？我们现在有的人，一天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工农革干子弟们！我们的父辈可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都二十好几了，我们的历史从哪里开始？就从现在！（热烈鼓掌）若干年后，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后辈们问你：“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的？你当时如何参加的？”我们一红脸，对孩子们说：“我虽然不是右派，也是中间偏右的。”（大笑）同志们，我讲话不好听，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说话粗鲁，但是，我爱讲老实话。

有的人不爱讲老实话“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说：“老子反动，不要把反动扩大到无产阶级家庭。”你们说：“这话好乖巧呀！”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是什么？我们必须揭露！

（掌声）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世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静场，群众呼口号：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

还要怎么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热烈鼓掌）一讲就是团结，怎么一种团结法呢？斗争中求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掌声）拿块糖，哄你来干革命？有人说要讲究策略。该孤立的先孤立，孤立完了，看有可能团结再团结，我看这就是最大的策略！（掌声）我们这里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工农革干子弟，刚搞了这么几天，就有嚷嚷过“左”了。修正主义统治了六七年之久，我们才几十天，这力量对比太悬殊了。这么短的时间，老实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犯错误呢！（掌声）我们还没有充份发动，而且，我自己的组织还没有成立，是不是？（群众：是！）不要著急，同志们！该诞生的时候自然就诞生了！（热烈鼓掌）反“左”？怎么关心党的政策？你们离毛主席比谁都近，从哪儿够得著脚呢？（掌声）

阶级路线问题是个焦点问题，以后还是要大谈，有不同意见的，请上台来谈你的高论。不愿上台的可以下面开小会谈，不愿意谈的可以写大字报。总之，希望能说出来，在讨论和辩论中，我们共同进步。本来是阶级社会，不让讲阶级，不行！当老百姓时要造反！当了官还要造反！以后当上当不上？我们努力争取，反正要造反！（掌声）君子坦荡荡，有话当面讲。（掌声）我就敢说。无产阶级，两个肩膀支著一个脑袋。没有坛坛罐罐，怕什么？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就是刺刀见红。我们端著枪要对刺，心里急得象揣著一个兔子，你们围著树绕圈子，跑得象个兔子！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掌声）无产阶级天下坐定了！

有人说：“工作组的遗毒未消，工作组的阴魂不散”，我看是修正主义的遗毒不消，是彭真的阴魂不散！工大不彻底改造不行！我们说这个学校太烂了，我们不要它！我们出去和工农兵结合去！你们敢吗？（群众：他们不敢！）说到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人躲在被窝里哭，打碎了毕业分配的美梦，说：“贯彻阶级路线我的前途完了，我家庭的前途完了！”这十七年对你们也太宽宏大量了，你那个家还不完？早就他妈的该完了！（热烈鼓掌）我造反是造定了，骂也骂了，人也得罪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掌声）但是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有革命前辈给我们撑腰，有亿万工农兵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准备在群众中滚它千百万个滚，爬起来，洗乾淨，再前进，在斗争中我们扔掉的是修正主义毒素，我们得到的是无产阶级斗争性，（掌声）我们得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热烈鼓掌）有人说共青团要打烂，连党也算上，该砸烂的就砸烂（掌声）。连这个学校我看都得砸烂！（热烈鼓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习惯于翻本本，找条条，都等中央指示，还要你“首创”什么？我看只有工农革干子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事，你们其他人谁敢？（热烈鼓掌）看来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群众：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热烈鼓掌）

说到这副对联，我又想起，有人老爱强调大多数，说我校百分之八十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得听大多数的。毫无阶级分析，到劳改队里谁是大多数？我依靠谁？简直一窍不通。在工农当政的国家里，工农基本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他们的子女在大学里却只占百分之二十还不到，你怎么不说说这个大多数呀？！这是个阶级感情问题，是个阶级立场问题。

一提到阶级路线，大家都喊万岁，天底下没有这样的怪事，无产阶级喊它万岁！资产阶级也喊它万岁！我活了二十几岁，我没见过，我爸爸活了几十岁，也没听他说过！（笑声）有人说百分之一错也不能说它好得很。世界上哪有完美无缺的东西？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就是毛泽东思想也还要不断发展，必定还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掌声）搞这种怪论点的人，大概连他们自己的存在也给否定了。（笑声）这种人是虚无主义。说得好听，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可是举著红旗干什么呢？（群众：反红旗）打著红旗反红旗，最后露出白旗。“旗帜白”，白之其，反正是白旗。（大笑）有人跟我讲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泽东！（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提个严肃的问题，以后我们运动如何搞，希望大家认真考虑，群策群力。我们相信我校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也是可以革命的。我诚心诚意说这句话，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搞文化大革命嘛。团结要讲，我们讲两种团结。第一种是核心力量的团结，没有这种团结，而空谈大多数，那就是右倾，就是陈独秀的路线。有了核心的团结，还要有外层，再外层，直到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叫第二种团结。只讲第一种团结，不讲第二种团结，那就是“左”倾，就是王明的路线。一定要做好团结中间的工作。但是没有第一种团结，我们不打几个胜仗，中间派还瞧不起我们。那就谈不上什么团结。从某种定义上来讲，我们加强阶级队伍的组织和团结工作，正是为了更好地争取中间，团结大多数，主席在七大上曾讲过这么个意思。中农、小资产阶级等是中间的、动摇的。他隔著窗户一看，屋子里无产阶级没有几个人，他就该说：“我老婆有病，孩子无人管，牛还没喂呢！”如果他隔著窗户一看，无产阶级的队伍很整齐，再打他几个胜仗。好，你不用去请，他自己就来了，这回，他老婆也没病了，孩子也放心了，牛也喂过了！（大笑）同志们，真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人讲什么“平等的团结”，什么“不分高低主次”，意思是“你不团结我，我还不团结你呢！”这种人一边去啦！他都不承认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怎么可能诚心诚意跟我们闹革命。（掌声）你们还要他干吗！！

同志们：我校运动怎么搞，搞成什么样，可全靠大家了。靠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工业大学有特殊校情，对这个烂摊子估计不足，我们就要犯极大错误。从我们系、我们班、从我们接触的同学中，确确实实看到，要革命的，可以革命的是多数，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志，表现很好，使我很受感动。革命的更要革命，不太革命的要革命，不革命的别捣蛋，反革命就叫你完蛋！（热烈鼓掌）言多语失，有错误请大家考虑。怎么看我们周围这些活人，他们和我们呼吸著同一空间的空气。却可能想著两样心思。同志们如果头脑不清醒，我们就要吃亏、上当。希望大家想一想，有人空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看具体化，第一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群众：党的阶级路线万岁！）

一切革命同志：让我们携起手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热烈鼓掌）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发秘字003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①坚决、彻底、全面、乾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副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②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③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④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⑤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指示。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它的成员，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著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著历史赋予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使命，“我们一定要英勇、忠诚、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项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党党员团结起来！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份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

□原载《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一九六七年七月

∞∞∞∞∞∞∞∞∞∞∞

紧急联合通告

中发7431密字3452（注意此为暗号！）（下发各纵队各校支队）

继本联合行动委员会十日发出密件后，各纵队、校支队立即行动起来，战斗成果辉煌，大长红五类威风，但近日狗崽子活动更为猖狂，尤其是四中王八蛋的“红四月”运动流传全市，企图煽动全市的狗崽子对我们革干革军子弟进行专政。

希各纵队、校支队配合当前形势立即行动起来，再次打击狗崽子的进攻，显一显我们红五类的威风，每个战士务必召集革干革军子弟借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给压下去！搞坏这些“左派”和解放军的关系，狠打狗崽子的威风，把他们整下去。

各纵队、校支队，每个战士见此通告后，立刻照此精神紧急行动起来，给“左派”们加上“反解放军”、“反军训”的罪名，直至搞臭，搞到红五类上台。

打倒狗崽子！镇压流氓！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特急火速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第一章完，待续：第二章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六）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第二章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

〔本章论述部份已经由本刊发表在增刊第150期（zk9806c）上。此处刊载这

一章所附的七篇文章。关于这些历史资料的背景介绍和评论，请读者参看上述论述部份。——编者注】

## 出身论

•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

【《中学文革报》编者按：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待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却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得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呢？

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唯出身论。

过去各中学所普遍执行过的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子不是别的，也正是反动的唯出身论。

反动的唯出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份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份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还是它，使许许多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志至今坚持其错误。还是罪恶的它，使多少同志至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面畏缩恐惧！

同志们，这样可恶的东西，不打倒它，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打倒它，哪里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不打倒它，中国的颜色就必将发生改变！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们，你们不是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吗？你们不是要发动起千千万万群众共同战斗吗？那么，你们就掀起一个狂涛巨浪，彻底冲垮反动的唯出身论的堤岸吧！到了那一日，千百万群众就会冲决束缚他们的一切，和你们汇成一股不可抗御的力量。也只有到了那一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会彻底被葬入坟墓，中国的颜色才永远永远是鲜红的。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发表的〈出身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说，它的出现好得很！它宣告了反动的唯出身论的破产，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出身论〉敢于冲破社会上旧的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向尚有强大社会势力的反动唯出身论宣战，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出身论〉的出现，不免要被一些人认为是株大毒草，但这算得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也曾被认为是毒草，然而今天却成了世界人民的指导思想。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们深信：反动的唯出身论虽然貌似强大，但它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它只是一只腐朽的纸老虎，革命的〈出身论〉今日虽是星星之火，明日必

成燎原之势。

同时，我们认为，由于作者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有限，由于对社会进行的调查研究不够全面，〈出身论〉必定存在不少缺点和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热切希望广大的革命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武器来衡量它，并真挚地欢迎同志们对〈出身论〉提出批评。】

※※※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面我们就从毛主席著作和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幅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著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彻底改革。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属于一种错误路线，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 二. 重在表现问题

如果你没有理由驳倒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也驳不倒现在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也不得不赞同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重在表现”的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说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可见他们对这项政策根本不理解。让他们来解释这项政策，就必然会任意歪曲。限于篇幅，这里只检查三种提法，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 1. 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貌似公允的同志常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这样讲：“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政治表现……”〔1〕这是不看对象。

江青同志解释过这句话。她说：这是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份子讲的。江青同志的解释是甚么意思呢？举例说，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成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阶级杰出的领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资产阶级份子的委员，但他们是工人阶级公社的代表。我国革命时期也有这样的例证。我们能不能因为他们成份不好而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呢？不能！我们要重在政治表现。这就叫“不唯成份论。”我们认为相反的情况也使用于这个公式。对成份是矿工，但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革命的份子，也要重在表现，也没有一点可以轻恕他的罪恶的理由。小而言之，李鼎铭是地主份子，但他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毛主席赞扬说：“不管甚么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人害言，亦即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归为哪一范畴。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说：“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又是一个例证。

由此可知，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见得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这一点连阶级敌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运动期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上写道，一个反革命富农分子，因为三个儿子检举了他，夜间持凶器砍死、砍伤了他们。又据一份传单，市内某公社工厂书记--一个蜕化的变质分子，临自杀前，亲手溺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也不会为自己报仇的。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甚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份论都没有道理，那么为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有些人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

重要的是社会。今天的社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划清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 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的同志不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份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在本文第一个问题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连。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绝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如果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超经验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看一看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吧，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这唯一的标准是出身吗？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出身这一条吗？

十六条中的第五条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谈到要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有出身这个根据吗？

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

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2〕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着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我们说，你表现不好，比如：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不学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于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干、革军、革烈），也一点没有用处。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 3. 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的同志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子……”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因为：“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又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一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而领导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銷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

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陈伯达同志还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惧怕毛泽东思想，不贯彻党的政策，又怎么能相信革命的青年？可笑！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绝不会在接班人的条件中写上出身这一条的，因为他的政策最正确，路线最鲜明。在他领导下，青年也就最保险。否则，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青年出身都不错，也是不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象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不像！这是“阶级偏见”，它和无产阶级无缘，和小资产阶级倒挺亲近。这些人头脑里没有树立公字，私有意识浓厚，所以度己度人，没有不变样走形的，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3〕

我们必须相信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份人抬高一部份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不允许用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当然，任何一个有出息的青年都应该下定决心改变自己。这样即使影响不好，也能变坏事为好事，变阻力为鞭策。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也就无所谓有好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堪设想了。

### 三. 受害问题

〔这一部份已经由本刊发表在增刊第96期（zk9608a）上。——编者注〕

注释：

〔1〕〈出身论〉刚发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写。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在团中央九中全会上讲这个话的李雪峰及其一流人物，现在都成了怎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2〕〈出身论〉刚刚张贴时，在这句话的旁边，写满了“大毒草”、“胡说八道”之类的话，发泄够了谭力夫之流的廉价的愤慨。他们有眼光，因为这正是〈出身论〉的主题。可是历史毕竟是无情的。今天不少红卫兵组织已经引用这句话做为自己的组织纲领了。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宣言写道：“过去的红卫兵组织只能由所谓‘红五类’子女组织和参加，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是要造它的反。”谨向这些组织的大无畏的行动，致以革命的敬意。〔3〕“自来红”是北京的一种月饼的名称。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1966年7月初稿9月定稿11月修改

∞∞∞∞∞∞∞∞∞∞∞

## 出身论之二：谈“纯”

•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

联动是声名狼藉了，但联动的原则还被某些人奉若神明。不是常常听得到这样的怪论吗？“你们组织的成员都是什么出身？”如果对方回答：“什么出身的都有。”于是乎他们就会大摇其头，说：“不纯，不纯！”

“不纯”？这个词多么耳熟！

窃据了中央文革副组长、全军文革组长的刘志坚不是大讲红卫兵的出身要纯、纯、纯吗？谭力夫不是也要他们那一伙纯、纯、纯吗？联动更纯得可以。要是谁的老子没有福气当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连边也不要沾。可惜！提倡唯出身论的纯字号的人物，大都没落到好下场。不论他们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下台的，我们推测，和唯出身论的思想基础总是沟通著的。这个推测有没有根据？假使有功夫，同志们可以研究研究。

这且不提。有趣的是：今天大力提倡“纯”的，已经不再是联动诸公了。他们的老子是英雄还是反动，实在大有讨论的必要。假使老子反动了，还偏要喊“老子反动儿混蛋”，混蛋的口号还能算数吗？所以除非是毫无羞耻之心的，多半不挂老子这块金字招牌了。实际上，今天继承联动衣钵的，往往是被联动排斥过的，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激烈反对联动的那样一伙人。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了。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危害大众的东西，大公无私的人要造它的反，私心杂念颇重的人有时也要造它的反。前者提出的口号是“造反有理”，后者的口号是“造反有利”；前者要粉碎的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说：“我们要取消一切特权阶层”，后者要取消的只是它的表面的一部份，他们说：“为什么你是特权阶层，而我不是”；前者要扩大革命队伍，并把表现杰出的同志吸收进来做中坚，后者则采取关门主义，唯恐人多手杂碰掉他们自封的乌纱帽。一个坦荡荡，一个长戚戚，同是造反，本质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也。

那么，你们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不是反对纯洁阶级队伍吗？非也！我们是坚决提倡纯洁阶级队伍的。在我们的队伍里决不允许一个剥削阶级份子混入，但是我们的标准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你们的标准，唯一的就出身；我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根本的分歧。

你们认为出身相同的人都是一个阶级的，出身不同的人都不是一个阶级的，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认为：是不是一个阶级的，要看他们有没有一致的目的、纲领、方向、行动，而不是看他们的出身。出身相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相同；出身不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不同。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谭力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贫民家庭的，就都是一个阶级吗？时传祥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赫鲁晓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不好的人就跟你不是一个阶级了吗？王光华烈士也

不跟你一个阶级吗？马、恩、列、斯、毛这些伟大的导师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按照你们的标准去纯洁你们的“阶级队伍”，势必把谭力夫、时传祥、赫鲁晓夫都拉进去了，势必把王光华这样优秀的战士都排斥走了。下过这么一番去粗取精的功夫，你们的队伍将会纯洁到何种程度，等你们冷静下来自己做结论去吧！

依照我们的标准纯洁阶级队伍，就不会发生你们的弊病。我们的标准就是一个，这就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拥护它的，我们吸收；反对它的，我们不要；执行它的，我们吸收；抵制它的，我们不要；特别是在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吸收，不高举的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的队伍就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坚硬如金刚，纯洁似水晶，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这就会是一支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

的确，我们的成员出身是不同的，不同的岂止是出身？性格、年龄、经历、性别等等不同之点还多的是。但是，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好象是一种元素，在这毛泽东思想的大熔炉中，经过一番冶炼，就会变成一块再也分不开的化合物。这个化合物比起以前单个的元素来，真不知要强硬几万倍。

的确，你们的成员都是相同的，但共同的思想基础却不见得相同。你们不能熔炼成化合物，而只是一堆貌合神离的混合物。你们当然可以夸口说：“我们的颗粒都是圆的。”但也只是圆的而已。雨一淋就会流掉，风一吹就会扬开，实在成不了事业。

目前，正当左派大联合，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全面夺权的时候，还有人企图“左”实“右”地混进阶级队伍，大讲唯出身论的“纯”，我们对他们的最好的回答就是：要做化合物，不做混合物！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二期 1967年2月2日

∞∞∞∞∞∞∞∞∞∞∞∞

出身论之三：“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

去年十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舞台上，出现了几个跳梁小丑，这些小丑是西城、东城、海淀三个纠察队阴魂的化身，他们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诽谤中央文革小组，辱骂亲爱的江青同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挑动武斗，制造混乱，查抄革命组织，散发反动宣言，种种罪状，举不胜举。这些小丑，就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们以自己的滔天罪行，招致了革命组织的共同征讨，招致了西纠、东纠、海纠等反革命组织相同的命运。如今他们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是在群众之中，“联动”已经成了反动集团的代名词。各种小报，无不罗列他们的丑事。唯有知音，也远在大洋彼岸，实在爱莫能助。用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的话来讲，算是咎由自取。

从联动表演的乌烟瘴气的场面里能让我们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在我们与之几个搏斗的

回

合之中，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我们不由得想起列宁的一段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示了一个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剖析一下联动的本质呢？

迄今为止，正因为没有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武器，从思想上击溃联动，所以他们还不服气，还在没落中挣扎，还在失败中狂吠，还在梦境中描绘凯旋的场面。正因为我们没有从本质上揭露他们，没有触动他们的灵魂，所以至今还有一批年幼无知的小家伙，心甘情愿地充当殉葬的金童玉女，并且还准备继纠察队和联动之后，成立其它换汤不换药的组织。从理论上击溃联动，显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任务。

用阶级观点分析联动，对于那些只善于贴阶级标签而不会做阶级分析的同志是个难题。假使联动分子都是些黑七类狗崽子，那也就另当别论；可是，他们偏偏是出身在光辉耀眼的家庭里，他们的老子都是十三级以上的大干部。说他们要复辟，要阶级报复？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太坏，打上了资产阶级烙印？很不容易为这些同志所接受，于是只好存而不论了。

联动成员不但以自己的出身迷惑了别人，也迷惑了自己。他们坚持自己的本质是玉洁冰清的，他们犯错误是纯属偶然的。按照最近替联动的幽灵大唱挽歌，抛出“论〈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话来说：“虽然干了许多错事（即使现在仍发生），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好同志。”没有疑问，这种不要脸的腔调“表明幼稚比表明恶意更多些”（马克思）。我们批判联动的同时，也不能不对阐明联动思想基础的“评〈出身论〉”进行严肃的批驳。

毛主席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我们就根据这一教导，尝试一下，怎样应用阶级斗争学说来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课题。

※※※

联动的骚乱告诉我们：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是资产阶级复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继承人。“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的宠儿？”清华附中红卫兵受不住这样尖锐的论点，忍不住用谩骂代替了论证：“这些混蛋！”（显然这句话不象是骂自己）。但是谩骂摧不垮铁的事实。请看！

### 一．物质上的特权阶层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著教育部门的时候，给高干子弟安排了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造成了一个新型的少爷阶层。

最近被革命群众查抄的联动老窝——八一学校，就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陈设之豪华，其生活之优越，完全是培养资产阶级幼苗的理想的温床。“他们住在花园式的校园里，校内有动物园、游泳池、假山、大观园等等。一般教职员成了某些贵族少爷小姐的集体保姆，动辄遭到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辱骂。”（据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传单）每逢周末，小轿车排成一条长龙，迎来送去，川流不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是一个小姐少爷的安乐窝。据云：每个学生除去国家负担吃、穿、住及生活用品之外，还要发给十八

——二十五元零用钱。我们可以和下面几个数字做一比较。国营农场的—一个壮劳动力，每天工资八角；一个社员的收入比它还要低。一个工人，能够维持生活的费用是每口人每月十二元。但是军工大读书的一个普通学生，只零用钱—项，就达二十几元！这样的青年那里懂得艰苦朴素？怎么不大肆挥霍？只要看看联动开会时，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叼著烟卷，穿著呢子衣服，乱放花炮，大嚼特嚼酱肉、点心、水果糖，便很令人痛心了。此外，高干子女可以任意挑选“理想”的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任意调校。一些培养国家特殊人才的地方，不仅剥削阶级子女无权问津，就是广大工农子女也只占极少数。一个青年人，长时期在这样脱离劳动人民的环境里生活，就必然会象毛主席所说的：“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的一部份，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我们奉劝那些主张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联动的成员之一——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得不承认这一论断。但他们想用“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不可分割”的论点来分庭抗礼。他们说：张地主的儿子接触的必然是王地主、李地主。这个狗崽子看见自己的爸爸剥削贫农，“想来”是不会感动的。这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论〉的读者群主要是今天的青年人。迄今为止，还真没有看到修正主义分子开办过“地主子弟专类学校”。所以张地主的儿子从上小学起，经常接触的必然不是一些地主。而且“想来”也没有“福气”见过自己的老子剥削贫农。但是，这群联动分子的论点对他们自己倒很合适。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囿于自己的集团之中，连十三级干部以下的子女都耻于交往。只有他们才有权力依靠父母的功勋，享受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因而也就很少接触到劳动人民，也就根本不能领会毛泽东思想。

## 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控制宣传和文化部门的时候，也拼命造就这些青年的贵族心理。翻开以前的杂志、报刊，回顾以前的戏剧、电影，以教子为题材的故事多得惊人。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某甲，一个出身好的青年被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坏了。某甲的朋友（是个出身相同，而且一点缺点也没有的青年）和某甲的父亲（是个当权派）就开始帮助他了。怎么帮助呢？不是要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是要他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而是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晚上，带他到烈士陵园前，宣读一份血书，于是霹雳一声，这个青年就翻然醒悟了。前中宣部网罗成群的末流作家，大搞这类作品，难道不是别有企图吗？他们歪曲阶级斗争的规律，要人们相信：老一代死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敌对阶级了。而高干子弟是最理想的青年，即使暂时有个别人落后一些（那时无数事实迫使这群阿谀成性的作家也不得不客观一点），但只要等到打雷的时候一念血书，便可以臻于完美了。假若事情真这么理想，今天的联动问题也就用不著伤脑筋了。可能是血书丢了的缘故吧？旧中宣部如今是批臭了，可是由他们制造出来的盲目优越感却被接受下来。正如造谣者被抓住了，谣言却被相信了一样，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不少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是不够艰苦朴素的，个别的甚至到了腐化糜烂的程度，当然也有很值得敬仰的律己极严的首长，但是因为他们终日为国事操劳，对子女的教育未必是深入细致的，至于一般当权派，大家都深有体会，他们过去对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都是不够的，何况对子女？所以，一个青年人，长期在这种经济地位中生活，很容易养成奢侈、放纵的毛病。正如列宁在阐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特点时所说的



那样：“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著的腐化活动制造著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我们奉劝那些大讲出身好家庭影响就一定好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联动的喉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只承认别人的家庭影响不好，不承认自己的不好。要是他们不把家庭影响神秘化，那么，他们成为特权阶层的“理论基础”不就动摇了吗？所以，他们就用上级的口吻教训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真正应该告诫的不是他们，而是你们！出身不好的青年几年以来承蒙帮闲文人讥讽嘲骂，承蒙好心的同志无休止的提醒，对自己的家庭总是存在戒心的。大多数青年是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往往老子说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反对什么。我们应该相信这些青年人，是能够在他们的老子磨刀霍霍的时候，把老子揪出来的。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接受了党十七年的培养；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主动地抄了自己的家，向毛主席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但是，对于相同的家庭影响，对于那些“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著的腐化活动”，谁的抵抗力更强呢？你们盲目崇拜自己的家庭，正象一个娇滴滴的姑娘所说的：“我的红爸爸、红妈妈，用通红通红的烙铁，给我打上了鲜红鲜红的烙印！”这样，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红烙铁的时候，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用反感去抵制的东西，你们就用同感去接受。你们就容易饮鸩如蜜，夜郎自大，放松思想改造。你们根本不了解他们。在你们中间已经形成一道深沟，筑起一道高墙。你们的危险，不在哪一个莫须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你们，而就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之中，季孙之忧不在颡臾，而在萧墙之内，此之谓也！

### 三. 丑恶的灵魂

长期受修正主义的毒害，长期以贵族自居，长期放松思想改造，势必使一部份革干子弟的灵魂，变得十分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请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吧：

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在武斗当中，制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例如：

浇、烫、烧——浇：被打的人昏死过去之后，用凉水猛浇其身，使其清醒，然后继续逼供拷打。烫：用滚开的水向被打的人头部猛浇，受此刑法后，人的头皮脱落，脸色红肿，胸前背后都是烫伤，惨不忍睹。烧：凶手最初是用一根火柴烧被打人的头发，后来竟发展到用整盒的火柴烧，另一做法是把火柴燃著后，向被打的人脸上按，或向嘴里塞。

吊、踩、刺——吊：凶手有时拿人命开玩笑，将活人做上吊的试验，用绳套套在被打人的脖子上，猛力踢倒他脚下的凳子，使其悬空，吊到半死，又猛一松绳子，使其重摔于地，再找人做人工呼吸使其苏醒继续受刑。踩：被打者躺在地下，几个人轮流踩之，受此害者往往内脏严重受伤，上吐下泄，大便不能自控。刺：凶手用木枪猛刺受害者，直至刺得对方躺下为止。

跪、剃——跪：凶手将凳子翻过来，令受害者跪在凳子上，长时间不得起来。有时令受害者跪煤渣，使跪者两膝疼痛难忍，鲜血直流。剃：凶手用刀剃受害者背部，直剃得血清渗出，方肯罢休。

磕响头：凶手令受害者给他磕响头，如果磕得不响，就用脚向他头上猛踩，受此刑后，受害者大都脑震荡，记忆力衰退。

诸如此类的刑罚，名目甚多，举不胜举。

再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杀死十九岁的学生王光华的，而他的全部罪过，只因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王光华被带到六中“劳改所”，刚一进屋门，西纠头目之一姜××马上抽了他一巴掌，随后又被带入里屋，令王脱去上衣，解下皮带。这时屋里屋外都有看守，戒备森严，屋里的暴徒均为西纠队员，他们兽性大发，蜂拥而上，拳打脚踢，对王使用惨无人道的暴行。用木枪向王猛刺，并用枪托劈头盖脸向王打去，使之无法忍受，倒翻在地。十来个暴徒手持各种凶器进行为时三十分钟的毒打。王肋骨被打断三根，昏迷过去。这时，一个西纠队员一面踢王头部和颈部，一面恶狠狠地说：“触及触及你的灵魂”。有的一边打一边大声怪叫：“要馒头不要窝头”。（即要武斗不要文斗）。就这样王光华被打死过去几回，后经“劳改所”中“黑帮”给予做人工呼吸，才免除一死。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王光华已经面部青肿，浑身重伤，危在旦夕。去厕所时还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上，小便出血。事态已这样严重，可是一小撮人还不死心，而后，粟××和陈××等又曾殴打王光华，逼他写材料。写不出来仍是一顿毒打。恶毒的看守也为虎作伥。在残酷的法西斯暴行下，就在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左右，王光华被这群暴徒活活打死了。夜晚，十二点多钟，趁夜深人静，就把王光华的尸体送到东郊火葬场焚尸灭迹。

还可以看一看，一个在旧社会颠沛流离的老工人是怎样被活活地害死的。

退休老工人徐霏田（七十六岁）于十月三日下午，被六中红卫兵领导，西纠队员王××和陈××带到淋浴室。他们说：“给你洗澡”于是这群暴徒们开始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个老工人。先是用冷水泼身，只听老人惨叫：“冷啊！冷啊！”然后又用滚开的水向老人头上猛浇。王××，陈××等人一面浇一面狞笑著说：“老头子，今天让你洗个痛快！”老人被折磨的死去活来，连声惨叫“热啊！热啊！饶了我吧，老祖宗！”这伙暴徒兽性更是大发，反而浇的更厉害了。老人的头皮被烫去一层。当老人勉强爬向宿舍时，已经奄奄一息了，不省人事了。四日早晨，徐要求医治，但他们不许出屋，不给医治。当天十点四十分徐又被王××，陈××等人拉到后院，进行种种毒打和戏弄。他们强迫七十六岁的老工人学哭，学笑，令其吃屎，喝尿，过够瘾后，又把徐嘴堵上，带到后院厕所中，将徐吊死。这群暴徒真是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竟扬言徐上吊自杀了。

老工人徐霏田在旧社会里，没有死在国民党侦缉处的手里，侥幸死里逃生。今天，这位有三、四十年工龄的老工人却死在西纠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手里（以上均摘自北京六中红旗公社公布的材料）

无独有偶，一中的刑罚和刑具也足以说明与六中比美。而且打死了人，还得让“劳改犯”（大都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去和死人亲嘴。握手，说：“亲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见一中传单）这就是联动的前身，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称之为“好同志”的那些人！

我们奉劝那些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的同志，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中的这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少。……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

为联动招魂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摆出一副让贤受禅的高姿态，说什么“随著运动越来越触及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有一部份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已经不能充当革命的主力军了”。触及党政军的领导机关，碍高干子弟何事？说穿了，就是这些高干子弟的老子已经成了黑帮人物，再靠“老子反动儿混蛋”吃饭就该打自己的嘴巴了，只得忍痛把他们割爱。实际上，以前谁又承认你们这些“好同志”是主力军呢？这样一些嗜血成性的人配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吗？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清华附中红卫兵装腔作势地说什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二十年以后的今天。”算了吧！设想，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不正是你们这些——西纠、东纠、海纠、联动这一伙人当政了吗？不正是今天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杀人凶手但具备了那样心灵的人当政了吗？

你们和你们的这些“好同志”不是在不久以前以当然左派的面孔担任了一切领导职务了吗？那么，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不仅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世界的命运也要葬送在你们这群败类的手里！

“我们打人，动机是好的！”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你们打人，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的“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去打所谓的“反革命”的。不管你们打谁，在客观上就起到箝制了革命群众之口的作用。你们威胁著左派，吓唬住中间派，这是多么为大众所唾弃的效果！你们为了逃脱罪责，妄想求助于别人看不见的动机，那是站不住脚的。你们真的有为无产阶级事业贡献终身的动机吗？那么你们的联动就不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中央文革了，就不会大冲公安部，就不会高呼：“刘××万岁”了！今天都没有好的动机，难道当初就会有吗？很明显，你们的动机就是要做刘邓路线的宪兵队。就是要扑灭革命烈火的刽子手！

我们要郑重地指出：“评〈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不了整个革干子弟，更代表不了整个红卫兵。我们敬佩那些进行过刻苦的思想改造，不以出身当作包袱的革干子弟。这样的同志，总是革命子弟的多数。因为我们从来就承认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承认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我们是承认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我们是反对以出身来分界的，我们没有忘记，运动初期，一些优秀的红卫兵发表过“致爸爸妈妈的公开信”他们勇敢的承认自己的家庭影响不是鲜红的。我们也怀著十分的感激心情，铭记著一个来访者——某校高三年级同学的话，她对接待人员说

：“我是革军的女儿。我完全同意〈出身论〉。”接待人员问说：“有人说〈出身论〉对出身好的有压力，那么，你不感到有压力吗？”“不，我不觉得。我只觉得十分高兴，因为有更多的青年又可以和我一起闹革命了！”听著！自以为血统高贵的小丑们！这是多么伟大，宽阔的胸怀啊！你们是不配替革干子弟说话的。让你们的大作和联动的在天之灵一起见上帝去吧！

#### 四. 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小撮处于贵族地位，具有卑鄙污浊的灵魂的高干子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宠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准选民。

正是这一小撮人，在“评〈出身论〉”中散布流言蜚语，杜撰最高指示，造成一片假象，好象复辟力量的继承人不是他们，而是出身不好的青年。故说什么“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即使非常积极，也要拼命看他们的实质。”“不管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革命的重担反正不能落在他们身上。”言外之意，重担他们是挑定了。这显然是违抗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接班人条件的。我们不能不指出，哪些人会变成资产阶级最可靠的金童玉女，也是随著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固定是一些人的。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贯穿著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矛盾。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事物发展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往往互相区别。这时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期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那么，具体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激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像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土改时期，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反右斗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吗？是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吗？不是，都不是。固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自有它特定的主要矛盾。十六条中的第一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五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条也指出：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可见，在目前主要矛盾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正在开展的广泛夺权斗争，说明了这个矛盾达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在阶级斗争的新阶段，资产阶级必然会寻找新的机会，新的舞台，新的代理人又必然寻找新的御用工具，必然会使用新奇的、巧妙的、隐蔽的手段，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唆使他们，挑动他们，利用他们和自己一起演出复辟的丑剧。而不幸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正是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这样，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顶峰，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西纠、东纠、海纠、联动等反革命组织就应运而生了。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我们奉劝那些顽固地坚持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保险，出身越好越保险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复辟力量）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

“这真是奇谈怪论！”在联动的安魂术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这样喊道。他们或许会反问：“谁敢说我们要复辟？难道我们希望蒋介石回来吗？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吗？”替你们说句公道话吧，你们的确不希望蒋介石回来，的确不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但是，复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赫鲁晓夫复辟，沙皇尼古拉并没有上台；铁托复辟了，贝尔格莱德有限股份公司股东并没有被找回来当经理。同样的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等篡权分子，也并不打算请蒋介石回来实行独裁，也并不让原来的剥削分子发号施令。难道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不够用吗？他们不是早已建筑了八一学校，哈尔滨军工大这样的复辟温床了吗？西纠，东纠，海纠，联动不就是修正主义合格的苗子吗？你们在“评〈出身论〉”中，一口一个资产阶级屠刀，殊不知和平演变并不希望刀光剑影。而到了关键时刻，敌人的屠刀也绝不会落在你们的绿军衣上，正是你们用双手接过去，挥舞著它，砍死了王光华，砍死了徐霏田！这不是复辟吗？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或为了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的利益，最后为了你们个人和你们反动小集团的利益，行凶、抢掠、捣乱、破坏，这种种行为，就是复辟！你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不希望蒋介石回来，就不承认自己搞复辟活动。

联动就是自觉地搞复辟活动！当然，这是指他们整个组织而言。至于个别成员，总是有自觉和盲从的区别，自觉和受蒙蔽的区别，改正错误和坚持错误的区别。而清华附中红卫兵，过去是联动瘟神的膜拜者，不知闭门思过，却等待秋后算帐，不知痛改前非，却到厂矿农村捣乱，拒不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平等的革命权力，拒不放弃自己得天独厚的贵族地位，今天又妄想借批判〈出身论〉捞取发言的机会，当作一根救命的稻草，这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告诉你们：如若“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你们“抛到茅厕去”，那就悔之莫及了！

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受反动的唯出身论蒙蔽的小伙伴们，你们读了我们的文章，不要以为这是侮辱你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一种怎样的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著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并成了怎样一种荒唐的观点，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身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共同革命，共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吧！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三期 1967年2月10日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七）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续上期第二章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

## 出身论之四：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

《中学文革报》嘱咐我们写一篇悼念郑兆南烈士的文章，这个题目出得好。郑兆南同志的一生是一首壮烈的诗。她把自己年青的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的英雄业绩不朽！

### 一. 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不顾修正主义校领导的重重围攻，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从此，刘邓反动路线的混血儿--工作队、黑党委、保皇派联合在一起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要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渡过了四十七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但他们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最后四天里，勇敢的郑兆南同志仍然坚持战斗。她给党写了两封信，控诉了反动路线的罪行，对革命运动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信中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怨艾。就这样，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现，写完自己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最后一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主席早就为革命烈士做出过这样崇高的评价。郑兆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而郑兆南同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费一倍的勇气。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都更不容易为习惯势力承认与谅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沮丧、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无论是传单、是标语、是发言、是议论，我们不是听熟了这样的观点吗？“黑五类狗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彭真集团一贯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这股阴魂还大有可依附的躯壳。当时炙手可热的刘少奇、李雪峰也大讲革干子弟的优越性，秉承他们“圣旨”的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做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可是多么奇怪！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有持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象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是的，是要老实。不过要看对谁老实。革命的青年要对毛泽东思想老实。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热和光。请问唯出身论的同志们，你们何必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爱？为什么只让他们独享毛泽东思想的光和热？你们可有这样的好心肠吗？没有！那么，你们就是要他们和你们一样，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忠实的工具、打手。这就是你们的“老实”！郑兆南同志不做这样的老实人，她就是要说，要动，就是要向你们的主子投以长矛和匕首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甚至撒娇、骄横、耍无赖。因此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宁可相信后一种人而不可轻信前一种人。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郑兆南同志正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她在第二封遗书中分析过当时的思想动态：“拿我来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但是，郑兆南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她没有被这些制人于死命的包袱所压倒，她“听了动员报告，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它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郑兆南同志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敲响了战鼓。

## 二. 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面对这样大无畏的宣战，牛鬼蛇神颤栗了。郑兆南同志在遗书中如实地描叙了这一时期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活动：“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怎样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从自己乌七八糟的武库里，为工作队和保皇的赳赳武夫们寻找弹药了。那便是他们过去从小汇报中汇集起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不贯穿修正主义决策人所倾心的“重在表现”这样一条黑线。

先谈谈小汇报制度。单有一群“积极分子”，这是最受反动主子青睐的“大有可为”的人物。他们以搜寻小是小非、琐琐碎碎的新闻为能事。动辄运用他们的“天才”，加以夸大、渲染，以便于他们的上级随时利用，务使人人变成不敢造反的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后快。小汇报制度首当其冲的牺牲者，除去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正确立场的革命左派外，就是无论是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认为有“阶级感情”的。郑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问题也就更“严重”了。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苏联画报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再比如：她指导学生批判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油印时没有加按语。又比如：她曾在几年前的一堂课上说过一句错话（天晓得他们的记忆力怎么这样惊人？）有了诸如此类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无耻的捏造，就不难做出尖锐的结论了：“反党”！

这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这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上面所谈的只着眼一个人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我们在《出身论》中谈到过，一些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菽麦不分，把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的郑兆南同志打成“反党”分子！

《中学文革报》记者为我们走访了郑兆南同志的各届学生。其中有党团员，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回忆烈士的吧！

一位同学说：“郑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我到底在她的帮助下，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又一位同学一往情深地说：“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去队日，给烈士墓献花圈。在出发前下起雨来。同学们犹豫了。可是郑老师脱下雨衣来盖在花圈上，淋着雨，领我们走了。这次队日活动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班上发生过一次丢钱的事，”一位同学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来。郑老师知道了，便在晨会上给我们宣读几则毛主席语录。她说：‘请拿钱的同学再好好学习学习这几段语录。如果想通了，我劝你把花剩下来的钱不要再花了。如果彻底想通了，可以把钱交给我，我负责保守秘密，不损害你的名誉。因为这证明你提高了觉悟，还钱的勇气是大于拿钱的勇气的。’不到中午，钱就还到郑老师手里了。”

“郑老师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语录批改作文了！”许多同学都这样说。这就是郑兆南！这是她多年以前刻苦改造自己的结果！这是她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结果！

这也许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弹药”来，哪一个更能代表郑兆南同志的本质呢？哪一个应该算做“表面”，而哪一个又应该算做堪称本质的“政治表现”呢？天下竟也有这么一帮糊涂虫，会认为政治表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因为郑兆南同志是个“狗崽子”吧？难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的：要在大风大浪中，要在群众斗争中识别干部。我们认为郑兆南同志的



第一张大字报和两封充满革命豪情的遗书，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她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了，她完全够得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最令人感动的是：郑兆南同志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于那些令人难堪的造谣诬蔑，并不想申辩澄清。在她交给党的遗书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种种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还用得着逐条驳斥那些谰言吗？用得着涕泪横流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隐衷吗？用不着，用不着！胸怀坦荡的郑兆南同志不肖于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做出正确结论的。其实，她在与死亡搏斗的四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下得正确或不正确。那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学校，是整个中学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她在遗书中大谈特谈的就是这些。至于她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她认为没有什么谈的必要，这就是郑兆南烈士的气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所必须具备的气魄！这也就是她的表现，是麀集在反动路线麾下的苍蝇们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表现！

### 三. 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郑兆南同志象挺拔屹立的青松，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阴风吹不倒她，工作队的暗箭也射不垮她。于是保皇势力伙同流氓和暴徒，带着皮鞭粉墨登场了。举凡控制了群众的“多数”，还采取武斗的，都是虚弱垂死的表现。五十二中也决不例外。

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沉痛地对记者说：“这一小撮人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载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打着鞭子，象对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后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她在盆里拉痢疾，要勒索两元钱！……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扯谎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为了证实这些话，《中学文革报》的记者访问过亲眼目睹郑兆南同志受害的学生家长，其中有老工人，有干部，所谈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莫不唏嘘感叹！听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叙述，再想一想毛主席的话：“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任何一个革命同志都会对罪恶的刘邓路线引起愤恨，这是一条多么残酷的路线啊！

然而，在当时，那些挥舞着皮鞭耀武扬威的流氓，那些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篡夺革委会大权的保皇分子，那些默许行凶、遥控大局的工作队，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这一群张牙舞爪的活疯子用了这么多凌辱人格的酷刑要把政治头脑如此清醒的郑兆南同志逼到和他们

样疯狂的地步！你当真以为他们是在打“地主狗崽子”？你以为他们当真要让她“背叛家庭”！那才是梦呓！他们打她，是因为她紧紧跟着毛主席，打她，是因为她听了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了！而什么家庭出身黑七类八类的，那才是招摇撞骗的幌子！

但是，这些人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在这种情况下，象郑兆南同志这样的处境，很容易迷惑，张惶或者误解。但是，她非但没有为个人的安危所忧虑，反而为纯洁红卫兵的组织而担心。遗书中是这样写的：“我爱红卫兵，我恨流氓。在大量可爱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中间，也混杂了少数个别的流氓。我建议运动后期，应当清理这样的流氓分子，不能允许他们沾污了光荣的红卫兵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运动中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流氓能如此得逞，这和革委会的无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人借机发泄私愤见死不救），因此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也是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阴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再让我们回想一下，郑兆南同志一个人，关在阴暗腐臭的牢房之中。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忍受着刑后的创痛，忍受着精神上的刺激，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长夜，整整四十七天！也许她真的疯狂了？失望了？怀疑了？消沉了，不！她一直琢磨着怎样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真正能代表党的人。她坚信：“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这就是她对待阶级敌人的最好的回答！

我们再强调一遍，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是一个地主出身的人！你可以不解释事实，但无权篡改事实。事实就如此。郑兆南同志的这种感情究竟算不算得无产阶级感情？你看她对毛主席、对党、对真正的红卫兵，是多么爱戴，多么关心。不管处境多么恶劣，不管反动的东西把红旗打得多么高，伪装的多么好，而英雄的郑兆南同志总是最能听到党发出来的真正声音！同属于无产阶级的同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他们的思想总是沟通的。这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在起作用。我们简直不愿意再提起“联动”那一小撮败类。他们的出身倒不错，可是同郑兆南同志比较一下吧！一个是侏儒，一个是巨人；一个是粪土，一个是金石！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出身并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决心！

#### 四. 论致死不渝的战斗精神

按照革委会里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想法，郑兆南是被他们整个制服了。由于内脏损伤，她已经浑身浮肿，遍体疮痍，白血球接近到最低点，看来没有几天活头，更不会有斗志了。为了减轻罪责，他们就把郑兆南“释放”了。

到医院去治疗吧？第一句话就是“病人什么出身？”听了答复，便被拒之门外了。郑兆南同志感到胸口闷，想喘又喘不出来。特别是在晚上，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就在一个椅背上，放一个枕头躺在枕头上。她的面前放上纸笔，因为她“有许多许多的话（不只是我个人安危的问题）要向党说。”她要继续战斗！她要 and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那时候外间还不知道刘邓受批判）进行浴血的战斗！但是白天她不能写，怕引起还不十分懂事的女儿的思想混乱，只有在晚上，她才向党倾吐自己的心曲。这时，她还对唐锡阳同志说：“即是市委不处理我这封信，将来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用大字报贴到学校去，也表明我对革命的态度。”她就是这样满怀胜利的信心，克服了难以形容的困难，把这封长信写下去了。

到了第四天头上，信还没有写完，郑兆南同志的病情恶化了。她咳嗽、吐血、坐不住了。锡阳同志把她送到第六医院，大夫先是不收。几经周旋，再和五十二中交涉，最后才勉强收下了。郑兆南同志躺在候诊室里，最后和死亡搏斗。她第一次喊叫起来。她是想把死神吓走？还是想倾吐她向党还没有说完的话？这就不得而知了。她的女儿唐桦劝她说：“妈妈，你学学麦贤得、刘英俊吧！”“妈妈，大夫答应给你看病了！”大夫走来了，开始听她的心胸。需要安静。郑兆南的眼睛已失去光泽，她的嘴唇发乌了，可是她还是咬紧嘴唇，有一刻没有出声。不过，这时候她已经不行了。一个年轻的、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折磨死了！

人死了，还没有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她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败坏她的光辉的名字！受蒙蔽的群众中，包括她的女儿，十三岁的小唐桦。她对父亲说：“你不应该哭！妈妈死得轻如鸿毛！”在她的眼睛里看来，妈妈是被“群众”打死的，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唐桦呀，你今天所以有这样的品质、好思想，其中不是也有你妈妈的一份功劳吗？你不是也清楚地记得，她在灯下和你一起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思想要求你，给你讲英雄人物的事迹吗？难道你从母亲那里受到过一丁点地主阶级的教育？锡阳同志为了不给女儿加重思想负担，几乎含着眼泪回答她：“你要和妈妈划清界线，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这就是在反动路线的统治下，革命同志的“永世不得翻身”！不仅郑兆南本人要戴着“假左派”的帽子被“群众”打死，连知情的爱人也要嘱咐女儿和她革命的母亲划清界线！

直到亲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召以后，锡阳同志才把这两封遗书给女儿读了。这天晚上唐桦哭了，第一次哭了，伤心地哭了。是党和毛主席给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哭悼自己妈妈的权利！

可以想象，郑兆南同志是在怎样一种逆境里战斗的。但是是什么东西支持着她致死不渝地为党的事业战斗的呢？不是别的，正是毛泽东思想，正是她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正是她对党无限的忠诚！联系起她平时行动刻苦要求自己的精神来看，这决非偶然了。郑兆南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女儿。革命的同志不应该再套上修正主义集团制造的死框框，因为她的出身而贬低她。更不应该象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如庸人看历史底伟人，拿破仑是一个伟人，他做了许多好事，也做了许多坏事。”我们只能根据郑兆南同志的阶级立场，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和她的功绩来给她的一生做一个正确的评价。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谈到的：“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得到同志的纪念。”“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今天，五十二中的革命群众起来了，全市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郑兆南同志得到了昭雪了。其他单位受过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同志也得到了或将要得到昭雪。这种令人鼓舞的情景，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当革命群众真正夺权以后，那些出身啦、职位啦、级别啦等等死框框是再也不会害人了。那些小汇报啦、只重表面不重表现啦等等修正主义统治手段，是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你的表现是革命的，群众自然会认可；你的表现是反动的，无论你的嘴巴多么伶俐、血统多么高贵、手腕多么圆滑，群众也会把你扔到垃圾箱里去。因为那时的天下，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天下。那时的人们，是敢想敢说敢干的真正大无畏的人们。那时的思想，是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思想！

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鼓舞踏着她的足迹继续战斗的勇士，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从血的事件中吸取血的教训！

让我们把一首战歌献给郑兆南的忠魂吧：

春雷天降起东风，浩荡污浊横扫空。恨黯苏修一片土，喜瞻马列最高峰。千年大业奇勋建，九域熊焰异彩虹。神鬼“何其毒”计破，雄兵誓死捣黄龙。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四期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

出身论之五：谈鸿沟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编者按：在学校里，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对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对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并且延续到现在，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谈鸿沟〉一文是着重针对血统论进行探讨和分析的。现选登出供大家研究，希望同志们读后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进行辩论。

〈出身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热心的读者便写信来问，这位首长是谁？是不是黑帮分子？可以请同志们放心，这位首长是个“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不是黑帮分子，你们查一查一九六一年的《中国青年》，就可以找到这段话。

引用这位首长的话，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现象不合理；第二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事实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九六一年就已经存在了。不但存在，而且已经“不可逾越”了。这对于今天多忘事的贵人，是一个最好的答复。他们不承认彭真集团歧视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勉强承认一点，也只承认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青年才受歧视。大概如果今天再没有人谈这个问题，过不了一年半载，他们就连这一点也不承认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即使不说这些贵人过去曾经为虎作伥吧，不说他们今天用不承认来逃脱罪责吧，起码也可以说他们本人体会不深，不懂得在反革命集团压制底下是什么味道。

有不少同志不理解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而这些同志往往在现象面前停住了。实质是什么？他们并不懂得。比如产生鸿沟的渊源是什么？反映在哪些方面？有什么危害作用？说明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不知道，自然也找不到填平鸿沟的方法了。的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蕴藏已久的矛盾激化了，爆发了。“对联”出来了，谭力夫出来了，红卫兵纠察队和联动也都出来了。面对无数丰富的事实，这些同志迷惑了

。他们本来最善于责备别人没有阶级观点，但他们自己却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事实。他们认为，谭力夫就是谭力夫，好象这么一个上了三年大学的蠢学生有本事一手扭转乾坤似的。他们既闹不清谭力夫怎么会成为谭力夫的，也不想知道为数颇多的群众在当时接受它的思想基础。直到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发表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是“血统论”在作祟。但也就到此为止。不少人还以为自己既不是联动的一员，也不是谭氏麾下的战将，大概血统论和自己毫无关系吧？于是，当那篇与血统论宣战的《出身论》出来的时候，这些同志便跳了起来。他们一方面高喊“打倒血统论！”（因为人民日报社这样写的，他们虽然还迷迷糊糊，但也是要喊几声避避嫌疑的），一方面又高喊“打倒出身论！”（这一回他们清醒了，因为这和他们头脑里的混蛋东西大相径庭了）。于是他们也继承了联动的衣钵，在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乱撒传单，大放二踢脚，大有联动少爷还魂之势。因此，如果说只是谭力夫和联动一小撮人有“血统论”观念，大部分人没有，那实在该为那一小撮人抱委屈了。血统论这种东西历时已经很久了，大约有四五千年了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自己头脑里有没有血统论的烙印，倒是值得深思的。

下面我们就系统的谈一谈血统论和有关鸿沟的几个问题。

### 一. 血统论的历史渊源

在奴隶制社会，血统论这种东西就挺时髦了。比如在古希腊，那里的人起名字，先要把老子的名字冠在前面。比方老子叫贺拉斯，儿子就叫贺拉斯的×××。这和联动张口老子闭口老子是很相象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雅典城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知道，希腊人对于体育运动是十分重视的，举行一次运动会就好像过一个最隆重的节日。在这次运动会上有兄弟二人得到两项冠军，哥俩就把老子抬起来，绕雅典城走一周。于是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便对这个老头子喊：“喂，你得到这样的幸福，还不死吗？你还想得到更大的幸福吗？还想做天神吗？”于是乎老头子一高兴就呜呼哀哉了。这样的事情今天的人看来，实在荒唐。你儿子是冠军，碍得着你的事吗？但那时候的人就是这么个思想感情。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相传那时有个叫做舜的皇帝，他的爸爸是个十分可恶的瞎老头子，几次要害死他，但他还是替自己的老子隐瞒这些事，直到他做了皇帝，也还是没有再提起。多半他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老子反动，他便是混蛋了。因此还是不说的好。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的伦理关系发展到了极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社会的常纲，是定而不可移的伦理道德。据说有一个牧羊的人，看到自己父亲偷了羊，便揭发检举去了，这件事让圣人知道了，他便大摇其头说：不大对头。汉朝有个皇帝叫做刘邦的，他在当皇帝以前就是个大流氓，时常到他哥哥家去骗饭吃。有一天他哥哥家的饭熟了，但偏对他说没熟，好不给他吃。等到刘邦做了皇帝，应该分封诸侯了。照理说，姓刘的都该是诸侯。可是他的哥哥分封不分封呢？刘邦一想，自己的长兄表现可不好，要是按重在表现的原则，那是不够资格的。不过后来到底是血统观念占了上风，他的哥哥还是被列为藩镇，只是叫做“剩饭侯”，多少还不能忘记表现。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记得，贾府有位凤姐。凤姐为了修缮大观园，得找个监工的。她明明知道贾府里的人没一个不贪污，可也偏得找姓贾的。找姓甄的不行吗？不行。因为封建的伦理观念不允许她这样做。明朝有一个叫做方孝儒的，犯了罪依我们的想法，他犯罪把他杀了就完了。但是没那么容易，得“灭门十族”，连他的老子、老娘、再加上其他的亲戚，再加上亲戚的亲戚，都得杀掉。这下子可真是斩草除根了。封建统治阶级把他们的这一套伦常关系编进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二十四孝”，内容主要

就是谈儿子、老子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归根到底一句话，便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不是英雄怎么办？儿子也偏得说他是英雄，即便老子反动透了顶，儿子也得象尊敬英雄那样尊敬他，其目的无非还是证明自己是个好汉。今天不是还有“共产党员”给自己反动的老子树碑立传吗？多半是读“二十四孝”读得太熟的缘故吧？现在似乎有一种风气，谁只要讲历史，谁就是别有用心。干脆告诉你们，省得你们猜测。我们讲这些，就是给明着暗着推崇血统论的人一面镜子，也照照你们的尊容，看和历史上的那些古董是不是有一二分相似？封建社会有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有怎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怎样的上层建筑；有怎样的上层建筑，就会有怎样的法律、习惯、道德和伦理观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阶级关系也不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样复杂。加之交通的闭塞，物物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所造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就造成了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因此，血统论变成了统治阶级赖以维持统治的理论基础了。那时候出身和成份差不多是分不开的。老子打铁，儿子拉风箱。例外的情况很少。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习惯说法。比如：“这位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我是学生出身”等等，那并不是说我的爸爸就是学生。封建社会不象今天这样大分化、大变革、大动荡、大改组的时代，今天资本家的儿子已经不再做资本家，而出身挺好的联动诸位反倒变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一丘之貉，出身和成份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封建时代的家庭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下面摘录《共产党宣言》的一大段，供大家参考。“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系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这些算作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毛主席告诉我们，我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乎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几千年来维持封建社会生存的血统观念带到了今天，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剥削阶级传统观念都要破产的关键性时刻，它们更要进行垂死挣扎。变换各种面目（甚至是极“左”的面目）束缚革命、阻碍革命、破坏革命，那实在是必不可免的事。谭力夫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做为封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命运必定是被革命的车轮碾碎！至于那时候为什么他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通。如果我们掌握了起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由此证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之中。诚如主席所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他老人家又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正是这种剥削阶级的血统论，发展到了今天便是唯出身论，给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有时达到了不可逾越的程度！它在运动中自己蹦出来，让我们将消灭它的战斗部署提到议事日程上，因此，打破它的束缚，消除它的阻碍，防止它的破坏，填平它所制造

的鸿沟，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亟待解决的任务之一，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都是责无旁贷的。

## 二. 从三个方面看鸿沟

### 其一、家庭影响神秘化

一个人受不受家庭影响？肯定是受的。但是究竟什么家庭给予一个人什么影响？在一个人的表现中起到什么作用？答案是有原则性分歧的。由于家庭出身好的青年不理解家庭出身不好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理解家庭出身好的，往往将对方的家庭影响神秘化了。

不少同志忘记了今天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把家庭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一提到剥削阶级家庭，立刻就想到刀光剑影，以为这些家长每天就是教儿子怎样杀人。一提到高干家庭，立刻就想起有一份血书，每天都要给儿子讲怎样高深的道理。这些同志从修正主义分子一手炮制的小说、电影、戏剧、刊物上面承受了这个概念，信以为真。其实这些东西恶毒就恶毒在让青年人理解今天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不懂得和平演变是什么。假若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天只提防磨刀霍霍，而忘记了糖衣炮弹；假若高干子弟只对自己的家庭一味迷信，而忘记了高等生活的侵蚀，那么，或者使他们放松警惕，或者走到极端，造成了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这都是对革命不利的。又有一些同志忘记了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以为家庭给了你什么影响，你就接受什么影响，似乎一个人没有一点可以选择的自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于一种影响，有乐于接受的，有勉强接受的，有引起反感拒不接受的，也有无动于衷的。对于家庭影响也如此。今天的青年人接受了党十七年的教育，对于拿枪的敌人是能够认识清楚的。如果还有哪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在家里磨刀，那个结果是不算太妙的。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对于家庭一般说来是憎恨的，因此，对于家长的言论，他们就具有了免疫的能力。他们时时将自己放在与家长对立的一方，这样，他们在克服坏的影响方面便有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少爷们，那些自认为最懂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就是不在自己的家庭之中的少爷们，却很容易忽视自己家庭的坏影响。一旦他们自己的家庭真的有坏影响，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划清界限，他们甚至也会当作富有营养的东西接受下来。殊不知，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都有市场。对自己的家庭丧失警惕无疑是危险的。

更有一些同志把家庭影响夸大到了无可形容的地步。他们以为除去家庭影响就没有其他影响了，即使有，也得受家庭影响制约。毛主席有一段话，证明了这些同志的荒谬。他说：“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教育（社会影响）是大于家庭影响，并且能克服家庭影响的。毛主席说的还是解放以前的情况，解放以后，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情况会怎样呢？恩格斯在解答“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时说：“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sup>1</sup>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sup>2</sup>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和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失。”

正象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驳斥过的政治庸人那样，今天摇头晃脑的血统论者们念念不忘家庭，念念不忘老子，活脱脱是个封建社会的遗少。革命的导师是这样批判他们的：“

你们却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难道你们（资产阶级）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

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里还谈到：把东方的家族形态看成绝对的，是不合理的。这种家族形态只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系列。

我们所以要引用这样多的经典著作，无非是想证明今天大喊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大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们是群什么东西！他们的水平比起那些用资产阶级偏颇观念灌昏了脑袋的政客还不如！看到他们对家庭这样神秘化，简直让人想起宽袖方巾的时代，十足是一群蠢货！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革命群众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说，这一不是将家庭当作社会上的细胞的那种关系，也不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目前我们国家的革命人民正处在一种无产阶级同志式的关系，这就象毛主席所说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反动的唯出身论妄图改变这种局面，分化革命队伍，以达到其复辟目的。

## 其二、政治表现神秘化

把家庭影响神秘化了，自然要把本人表现也神秘化。因为这样一来才符合封建时代的种种格言。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什么“将门出虎子”，这些陈词滥调都被血统论者奉为至宝。

他们首先认为血统高贵的人处处都了不起，行堪观止，字字珠玑，一举一动都值得记在将来的回忆录上。

这么一来，就造成这些青年盲目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贬低出身不好的青年。怀疑他们，轻视他们，处处以狭隘的偏见观察他们，把他们万分平凡的举动也看得大有申陈。搞得他们紧张、麻木、自卑、甚至心理变了态。女十二中有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长期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竟以为自己顺心的事都是错的，自己不满的事都是对的。他们看了某一篇文章，先是觉得挺高兴，可是立刻就责备自己，回去写了篇批判文章贴出来，不过后来听说这篇文章让某位领导人肯定了，他们可大大慌了手脚！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这还有什么朝气蓬勃可言！他们的心灵简直是经受了无可救药的残害！而残害者不是别的，正是封建的血统论，正是目前大大流行的唯出身论！何其毒也！手头还有一张铅印的传单，是四个学校在运动初期联合组织的红外围。红外围的组织当然都不是出身好的。他们写道：只有革命的左派才能加入自己的组织，可接下去便说，“这个组织要绝对地服从红卫兵的领导”，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格打勿论”！多么典型的奴才性格！你已经是革命的左派了，还要绝对服从一个既非党团，又非无产阶级先锋队，只不过出身好的红卫兵领导之下。大概领导你们的都是超左派了吧？以上这两个例子，说明了青年之间的这道鸿沟已经多么深，多么宽，多么不可逾越了！在学校里，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气氛，一派是专门汇报思想的，一派是专门听汇报的，前一派必然产生阿谀奉承，阳奉阴违的能手，后一派必然出现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老爷。真要问他们是怎样成了混蛋的？不是别的，还是万恶的唯出身论把他们逼出来的！



### 其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任何一种腐朽的思想，都会被剥削阶级所利用。过去修正主义集团大大利用了血统论，运动初期刘邓路线也在出身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这道鸿沟越挖越深，务使我们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想把革命队伍缩小，以利于消灭之，二是想分而治之，三是想拉拢、利用一部分青年做他们顺从的复辟工具。有一段时期，他们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真是达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中学文革报》和其他中学生主办的报纸常常有这方面的报道，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有一张铅印的表格，是一位司机同志托人转交给我们的。他说：“请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人看一看，给他们做个参考。”不负盛意，我们把它抄在下面，以飨同好。

#### 学习驾驶员的条件

##### （一）驾驶员的培养对象：

1. 驾驶员的培养对象要贯彻阶级路线，以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烈军属子弟为主；对家庭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原则上不培养。

2. 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看其政治表现，如果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经过有关部门审查确属没问题的，可以适当吸收培养一些。

3. 所培养的机动车驾驶员，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好同志。

（其余两条从略）

这仅仅是培养一个驾驶员所需要的条件！这张表很能说明问题。在第1款中，是两个不问表现，一不问“红五类”出身的表现，哪怕这些人是联动的刽子手，也要被“贯彻”进去；二不问“黑六类”出身的表现，哪怕是聂元梓、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也都拒之于门外，第2款似乎是重在表现了。这一款是针对除去黑六类以外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那不用说，就是小业主出身的了。这回重在表现了。可是，一要划清（划清了还不相信），二要审查（审查到了没有问题），才能培养“一些”！根据出身这么一鉴别，于是乎再也用不着进一步审查了，便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好同志”了！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这种现象究竟能不能容忍！这不过是千万个例子中的很小的一个。凡是克服了偏见的革命同志都可以为我们证明这一点，举出你亲身经历的更多事例来。

社会地位是这样悬殊，还谈的上什么团结，什么了解？更谈不上共同战斗了。有的只是隔阂，是生疏，是淡漠，出身真是压死人啊！

以上我们就从家庭影响神秘化这个方面，从政治表现神秘化这个方面，从社会地位的平等这个方面，分析了在青年之中存在不存在的一道鸿沟。我们说，是存在的。它的存在是由血统论，唯出身论一手造成的。它严重地阻碍着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阻碍着我们的前进，到了彻底填平它的时候了！

### 三. 填平鸿沟的办法

我们必须用阶级论代替血统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干革命。阶级论就是“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这里所说的成份不是出身。比如你成份是个工人，是个学生，这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不能唯成份，不是说是个工人都是革命的，还得看表现。象江青同志所说的，要时时处处看一个人的观点、立场。这和出身都毫无关系。让那些死抱着家庭粗腿不放的人见鬼去吧，这个鸿沟我们是填定了。

革命的同志要在斗争中填平这道鸿沟。过去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这道鸿沟把革命青年分开了，使他们站在天河的两岸，遥遥相望，几乎使运动夭折。现在，我们应该在彼岸此岸共同填土，让它变成一道通途。这道鸿沟只能在大联合中填平，在夺权斗争中填平，在斗批改中填平。只有共同斗争才能彼此了解，才能克服神秘化的倾向，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识别一个人表现的好坏，才能验证一个人所受影响如何。那些受过一些委屈躲在家里不愿出来的同志，应该鼓起勇气，重新投入战斗了！那些压制过别人，无形之中帮了修正主义分子的忙的同志，也应该扪心自问，努力改正了。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涤荡我们脑海中的剥削阶级观念，才能使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改造成一代新人。而要使这些都不至于变成空话，要使中学革命运动不至于冷冷清清，要使今后的革命能顺利开展，我们首先应该强调：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我们讲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屈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不在于他的性格，不在于他的年龄，而在于他的表现，在于他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高不高？思想改造得好不好？通过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出，决不是出身好的人一定比出身不好的人表现更好。联动的骚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党历来是主张革命青年应该平等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他亲手拟定的接班人五项条件中，并不曾提到“出身”二字。他的那篇足以鼓舞我们青年无限勇气的讲话中所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是对所有革命青年说的，不是对某一阶层的青年说的。我们的导师早已为我们指明了航程，谁要想扭转它，想阻碍它，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鸿沟等待着我们填平，血统论、唯出身论等待我们消灭。革命的青年人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在斗争中相互了解，这样才能向一切腐朽的东西开战！胜利必将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原载《中学论坛》创刊号 1967年2月27日

【历史资料】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八）·宋永毅·孙大进·

（续上期第二章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

## 出身论之六：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旭日战报》，不惜以六版篇幅，对《出身论》大肆攻击，发表了一篇又长又臭的文章，“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大联合大夺权的阶段出现，是必然的。

大家总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当火势燎原的时候，是反动的血统论配合着刘邓路线将这场大火窒息的。随着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反动的血统论又找到了旧同志。它配合着保皇派别、联动分子、刘邓路线的忠实信徒，配合着社会上的习惯势力，再一次进行新反扑，这当然是“必然”的！

该文的作者实在没有时间概念。《出身论》出现在去年秋天，当时大联合、大夺权还不是高潮！有的却是西纠的猖獗，联动的骚乱。《出身论》敢于面向这些嗜血成性的反动组织下战表，敢于动摇他们的特权地位，即使缺点再多，也足以使庸人惭愧。而那时候你们这些好汉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谁人不知你们轻院东方红承认过谭力夫的讲话，承认过反动对联！你们可曾触动过你们的错误思想，哪怕是一丝一毫！即使是现在，指导今年运动的元旦社论明确地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又有哪个人看过你们的表态！如今你们在批判《出身论》——这个向反动的血统论的宣战书上充当英雄好汉了。你们和轻院“红爆队”大联合了。就连你们的编辑也不否认他们是保皇势力和执行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大杂烩，你们为了装门面，竟和血统论的崇拜者，联合在一起“批判”血统论了，岂非咄咄怪事？而发表于贵报的“红爆队”们的大作中，不知道从《出身论》的哪一节找出“男女关系”这一条罪状，这大概就是他们要批判的血统论吧？

该文（指“大毒草……”，下同），首先从理论上，继而从政治上否定《出身论》，我们有必要逐一批驳，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批驳，指出他们趁此机会攻击毛泽东思想，颠倒历史之真实目的，我们就是要暴露这些跳梁小丑们肮脏的灵魂。

### 一. 《出身论》从理论上“铲除”不动

该文反驳《出身论》的第一个论点：“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并能克服家庭影响”。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社会影响不大于家庭影响，社会影响不能克服家庭影响”。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笔者）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又说：“家庭给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对他的立场、观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他给人以认识问题的基础。”请看，家庭影响又起“很”重要的作用，又是“基础”，又不容“忽视”，显然家庭影响是远远大于社会影响的，是社会影响所无法克服的。

这是放屁！

该文的作者不会不知道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讲话。她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这决不是偶合）你们都还年青……大多数是在红旗下、新社会，受了党多年教育，所以出身对你们影响不大。”在这一篇讲话中，江青同志又说：“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决定作用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

以该文作者之矛，攻该文作者之盾，请问你们的“矛头对准了谁”？

江青同志的这个讲话，也雄辩地说明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个人的努力”，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也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否认内因也是由外因形成的；但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内因和外因有着质上的不同。我们处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作为外因，是同时存在的。尽管从总的方面来说，一个是强大的，一个是相对弱小的。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情形又有异样。他总有自己的选择性。对于同一种影响，往往有的人起同感，有的人起反感；有的人爱好，有的厌恶，有的人强烈，有的人淡漠，有的人接受，有的人抗拒。这就是内因在起作用。即如你们，为什么和血统论的倡导者红爆队大搞联合，而不和反血统论的人搞联合，也是内因起了作用。

对于家庭影响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上的好影响是强大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因此，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从小受的社会教育，就是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教育。长大以后又知道阶级斗争，知道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再强调一遍，从小（照该文作者唯一清醒的时刻所说的话，即刚刚脱离“本能”，刚刚有了“思想”的年纪，亦即从7岁）起开始长期接受这种思想，这就形成了内因。这时对于自己的家庭影响就会是反感而不是同感，是厌恶而不是爱好，是抗拒而不是接受。当然这也是指一般情况，例外也是有的。不过不管诡辩论者怎样曲解例外，真正了解了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就不会把家庭影响看得神乎其神了。江青同志的讲话当真是给了“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内因，什么叫外因”的“先生们”一记“耳光”！当真是给了只承认老子而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先生们”一记“耳光”。不但给了耳光，而且很响亮。

返回来看社会影响是不是能够克服家庭影响，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为了证明该文作者对于毛主席著作是怎样的不学无术，我们摘录一段毛主席的话就足够了。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教育，是社会影响吧？可见，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不是家庭影响，而是社会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社会教育儿童的结果。

但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却立论：家庭影响是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基础！

在发难的开头，他们本来说，《出身论》的这一段是“不值一驳”却驳了三千字。不幸的是那驳的结果，原来是他们自己违背了最高指示。

该文在做了这样的“文字游戏”之后，又反驳《出身论》的第二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大”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出身既然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就必然会对这个人的行动（即表现）发生作用……有着紧密联系的。”

发生作用，固然是对的。我们说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并没有说一点没有。但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则大错而特错了。

上文，江青同志已经批驳过你们了，出身是不起决定作用的。但为了使你们再多享受一次耳光，把教训记得牢固一些起见，还可以就这个问题再多讲一讲。

出身和表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有个中间物，那就是“影响”。

正如一位老工人所讲的，出身、影响（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表现是一个索链的几个环节，那边烧热了，这边不见得热。

表现和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和社会影响。因为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而思想是表现的根据。所以，表现是受社会影响制约的。

对于一个人的表现，家庭影响自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不过不是主要作用。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只有家庭影响和一个青年的出身才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新社会，社会影响和出身是没有多大关系。今天的学校都是无产阶级开办的学校，并没有地主子弟学校或资本家子弟学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同样是社会教育。当然，对于高干子女，出身和社会影响常常是有关系的。例如寄宿制高级学校，即那些只供高干子女享受的修正主义温床，就是和出身有关系的。不过，举出这个例子，对你们的结论实在太不利了。因为这只能证明出身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并不好。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提的好。

出身只和家庭影响有关系，家庭影响又在表现中占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么，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与表现关系甚小。

光是论证到这一点，已经足以动摇血统论的基础。但是，我们还要证明出身即使和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的同一性。——尽管这个论点会使“炮制”该文的“混蛋”们暴跳如雷。

“当然在部份工人贫下中农中也有着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极个别反动的。”——谢谢，这是该文作者神志不清时提供给我们的论据。

联动成员的出身都是最上乘的，但是陈伯达同志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并不好，因为这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相反的，列宁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但他从哥哥姐姐那里受到了很好的革命影响。毛主席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尽管他的父亲是个富农，但是他从母亲和家里的雇工那里，受到了

许多好影响。无论血统论者多么一厢情愿，一个老子总是组成不了一个家庭的。

这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

“这是少数！这是例外！这不是主流！”血统论者振振有词地念咒了。不过，既然已经承认是“少数”、是“例外”、是“支流”，那么，就是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就无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阶级敌人还是少数呢，但并不等于没有。那么，说明这些例子的道理是什么呢？该文作者说不出。别人说出来，他又跳脚！这个道理，《出身论》说得很清楚：“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

如此说来，出身和构成表现的次要因素——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联系了，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出身只能作为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这几条气势汹汹的好汉，在两次碰壁之余，开始反驳《出身论》的第三个论点了：“出身不是成分”。按照辩论的原则，它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就是成分”。

它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我们必须坚持第一有成分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也即既要重视出身，但又不光看出身……”显然，作者是把成分当作出身了。

把成分当作出身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老子是老地主，儿子是小地主；老子是老高干，儿子是小高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也。

我们在论证“出身不是成分”这个论点时，有这样一个论据：“毛主席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哪一个范畴。”蒙作者费心，找到了原话。原话说：“从它们的家庭出身看，从它们的生活条件看，从它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于是它们便手舞足蹈起来：“殊不知毛主席在讲这一段话时首先就讲到了家庭出身。”按照他们“混蛋”（对不起，这是借用）的头脑所得到的“混蛋”的结论，便是“哪一个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就应划归哪一个阶级范畴。”真要给他们讲点初级历史了，可怜的大学生！请问，当时能上得起学的知识分子，什么家庭出身的居多呢？显然，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居多。可是，他们的大多数偏偏不属于剥削阶级，而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前面援引过的毛主席的话：“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都雄辩地证明了：“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哪一个范畴。”

出身不是成分，儿子的职业不是老子的职业，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浅显的道理吗？“出身不由己”，所以是死框框；成分可选择，比如，从前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放弃了继承权而参加革命的，如今也有成分不好的人改造好了摘帽子的，所以是活框框。既看成分，也看表现，是对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是不对的。因为成分和表现是密不可分的。地主的

表现和贫农的表现就是不一样。而出身和表现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有的，甚至是一点也没有关系（例如列宁）。所以，用一个死框框，同时又用一个活框框衡量一个人，是为《出身论》反对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愿意对“出身”这个词做做正名的工作。“出身”有两个含义。今天普遍的用法是指父亲的职业，亦即家庭出身。我们文章里的“出身”，都是指家庭出身。出身还有传统用法，是指阶级出身，即本人过去的职业，亦即本人出身。例如：第一个发明电器的爱迪生是报童出身，不是说他父亲是报童，而是说他本人过去曾做过报童，在我们的文章里一般是用“成分”代替了。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常常有着不同阶级的属性。所以，在我们看到一些材料的时候，有必要分清哪个是出身的时兴用法，哪个是传统用法。既然出身不是成分，请问铲除《出身论》的劳动能手们，你们何曾见过：“一、有出身论，二、不唯出身论，三、要重在政治表现”这样的阶级路线？你们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党的阶级路线！

由于你们连这样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所以就写出了那样狗屁不通的文章。的确，《出身论》是提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对于过去长期受压抑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是会起一定积极作用的。但你们抗议了。你们说，这就是“他们还梦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出身不好的青年骑在人民头上来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何谈重新二字？显然，出身和成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你们又说：剥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正当权利，“这就是我们党的阶级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制度。”你们多么恶毒地挑拨出身不好的青年与党的关系啊！请问，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吗？对地富反坏专政，难道对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人也专政吗？出身和成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一个堂堂大学生，把影响也看成老子，把儿子也看成老子，横竖都是，老子，念念不忘的也只有这个老子，简直高举老子这面大旗死耍赖皮了。倘不是犯了偏热狂，就是中了修正主义流毒太深，大概快不可救药了。

你们想驳倒《出身论》这三个主要论点吗？遗憾的是你们只停留在谩骂的水平上，一个也驳不倒。你们在理论上“铲除”不动《出身论》，因为《出身论》是以毛主席著作作为依据的，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你们这几个神志昏溃，头脑混沌，思路紊乱，词不达意的家伙们妄想及锋而试，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到了极点。

## 二.《出身论》从政治上“铲除”不动

有一些人信奉这样的原则：用理论打不垮人家，就希望能用帽子把人压垮。看来，北京轻工业学院就很有几个这一流人物。

帽子之一是：“挑拨各种不同出身的青年之间的关系，蓄意制造宗派对立。”这个帽子要是给反动对联戴上倒是合适。但我们何尝提出过“老子英雄儿混蛋，老子反动儿好汉”这样的“鬼见喜”来过？并没有。我们只是提倡“出身不同的青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而且我们深信这是党一贯所主张的政策。难道提倡平等，就是“制造对立”吗？你们真是到了发昏章第十一的地步了。

挑拨关系的恰是你们。正是你们恶狠狠地说：“老实告诉你们”，（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这是根据毛主席著作的

哪一章哪一节？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哪一条哪一款？你们还煽惑说，“这是党的阶级政策”，用你们的话说：“作者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你们也许会诡辩说：我们是在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前面加了定语的啊！我们指的是“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原文如此不通，非笔者引错）之云云的青年啊！

参照上下文意，那么不甘当“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剥削家庭阶级出身的青年，就可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了吗？显然，这也是要被你们否定的。所以加上了那一大长串的定语，足以证明了你们逻辑上的混乱，思想上的空虚。这样你们就越来越糊涂。比如对于没有定语的，而又不是工农家庭出身的青年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是没有答案的。

退一步说，你们加上了定语，我们暂且认可吧。那么，试问：“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出身好的青年——例如联动分子——能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呢？无论现在你们和这帮家伙怎样联合组织“批判《出身论》联络站”，在那里暗递秋波，恐怕你们口头上也不敢承认这一点。用中国人的话，简洁地说：坚持反动立场的（哪怕是出身好的）青年，也不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可见，这里只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问题，而不是家庭问题。只是表现问题，而不是出身问题。只是定语问题，而不是主语问题。是你们把本质的东西变成了定语，把非本质的东西当成了主语。因为自己的荒谬，而在那里“怒不可遏”，这个脾气可真发得没道理。

你们或者会大叫：出身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没有呀，出身不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全部呀！应该说今天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无论什么出身的都是少数。这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谈过了。现在再退让一步，就说即使如此吧，也只要提出“凡是不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一个口号就可以了。因为照你们的结论，只要这样一提，自然而然就把出身不好的人排除了，把出身好的人留下了。你们既然认为出身是表现的唯一的原因，表现是出身的必然的结果，那么，表现之中已经包括出身了。用不着把这二者相提并论了。可是你们偏偏要齐头并进。其实，文化革命以来的表现，用不着问老子，自己最清楚。不过你们怕谈表现。因为一谈表现，你们就吃亏。对你们这一小撮人，不拉出身这面大旗做虎皮，岂不露出庐山真面目？特别是对于你们的联动“小将”，这就更不利。

那么，是谁“为害人虫混进革命阵线进行活动提供了组织路线”呢？不是别人，正是你们。

是谁在挑拨关系呢？不是别人，也正是你们。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请听你们自己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吧：“我们就是要考验你们！”“你们”——根据下文，是指出身不好的青年，那么，“我们”是谁呢？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吗？这些英雄哪里比得上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这样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你们还要考验人家，配吗？如果，这里的“我们”是泛指出身好的青年，则又大错特错了。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应该接受党的考验。可是，他们中间，不存在什么特权，不存在一个是考验别人的阶层，你们分出了这样的阶层，不是挑拨关系又是什么呢？

帽子之二是“为彭氏路线喊冤叫屈”。什么是“彭氏路线”呢？照你们的说法是“抽掉了重在表现的政策中的阶级内容，而把‘重在表现’变成了‘重在表面’。”或者说，是“剥削阶级子女受修正主义宠爱”，是“不讲出身”。这是最疯狂地颠倒了历史！如果说什么



是“重在表面”，那么，只问出身，不问表现就是最严重的“重在表面”。因为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出身和阶级内容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只有成分才是和阶级内容有关系的。即如你们，对于出身好的联动分子那样客气，而对于出身不好的不问其表现如何都那样霸道，实在就是典型的“重在表面”。

血统论既然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的那样顺手，那么，这个古已有之的东西，也不会不为修正主义集团所利用。血统论的作用，就是缩小革命队伍，扼杀革命热情，制造人为的对立，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哪一个反革命分子不欢迎这种东西！

我们在《出身论》中“受害问题”里举出了大量的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例，这都发生在彭真集团统治时期。今天本报发表的这一篇调查材料，也发生在文化革命之前。有无数事实证明旧团市委推行的是“唯出身论”的反动路线。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血统论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

我们控诉彭真集团形“左”实右地推行血统论，你们则说没有那么一回事。请问，这到底是谁“为彭氏路线喊冤叫屈”呢？是我们还是你们呢？

你们颠倒了历史，但历史是忘得了的吗？问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现实。你们为彭真集团翻案，把他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罪行，美化为实行了一概平等，把他不讲党的阶级路线，美化为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为了让反动路线推行“血统论”，继续歧视、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并使它合法化，同时也为了减轻你们过去迫害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罪责！总之，你们是想推行比彭氏形更“左”实更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们最恶毒的是，竟把修正主义集团欠下的这一笔血债记在党的帐上！

是谁告诉你们，彭真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是现实吗？非也！是中央文件吗，中央确实发表过一篇社论，谈到彭真的招降纳叛。可是，这里指的降和叛，不是出身，而是成分。指的是彭真招降了一些无耻叛徒，反动权威，蜕化分子，奴才走狗，哪里说的是出身？于是，头脑简单的除花勇士们又迷惘了，既然彭真招降的是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又怎么可能迫害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呢？如果，你连这也迷惘，那么，你可以回答一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情景。这总没忘记吧？那是千真万确地迫害了剥削阶级子女了吧？告诉你们，这恰好证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广大的剥削阶级子女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正和广大的出身好的青年与修正主义集团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一样。那么，是谁告诉你们，彭真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

不是别人，是刘邓路线。是刘邓路线指使他们的喉舌，所谓新改组的《北京日报》告诉你们的。翻开那时候的报纸一看，北大的孔繁不是大喊陆平优待“狗崽子”们吗？从此开了先声。至于孔繁是什么东西，现在大家都了解了。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道，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演出了。“对联”问世了。血统论变本加厉了。回顾历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以《旭日战报》为首，召集了三十个学校，大为彭真翻案，莫须有地大讲出身不好的青年“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纷纷出笼，他们自称‘左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借批判形‘左’实右为名，行攻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工农子女之实。”好一幅不准人家革命的赵太爷的劲头！今天有哪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专门打击工农子女了？工农子女也有左、中、右之分，工农子女和非工农子女一样，既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集团，假使有个别的工农子女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理应所有的子女（

当然是要革命的子女) 共同打击之, 其实这并不是打击工农子女, 而是打击反动路线。你们把打击反动路线当成打击工农子女, 这是对工农子女最大的诬蔑; 你们又以工农子女为幌子, 不许人家打击反动路线, 实际上是肆无忌惮地包庇与袒护。你们颠倒历史的最终目的, 就在于此。你们和修正主义集团, 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

历史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 小心你们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帽子之三是“拼命地鼓吹反动的‘阶级熄灭论’(疑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不过, 对于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们, 错了一个术语也算不得什么怪事), 鼓吹荒谬的‘阶级调和论’。”

在我们的《出身论》中, 一直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我们强调无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 强调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 强调了与反动路线的斗争。我们所没有强调的, 所不赞成的, 所激烈反对的, 是“出身好的青年与出身不好的青年之间的斗争”。我们说, 这是人为的鸿沟, 理应填平。

但是, “聪明”的该文作者, 说我们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就是“阶级调和论”! 在他们看来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两个对立着的阶级。

这个帽子, 提出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 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

毛主席告诉我们: 阶级斗争将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的始终, 阶级斗争要持续五代到十代。

今天的阶级敌人诚然是地、富、反、坏、右分子, 是剥削阶级分子。那么, 下一代的阶级敌人是谁呢? 解放快十八年了, 上一代已经遵照自然法则而将近老迈了, 下一代却成长起来, 逐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部门唱主要角色了。对于下一代, 阶级斗争的对象是什么人呢? 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反动对联告诉我们: “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阶级敌人有了。老一辈一死光, 他们的儿子就会是阶级敌人的替死鬼!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点也不甘示弱, 他们追随反动对联之后, 继续把剥削阶级子女当作新的阶级敌人看待, 谁替剥削阶级子女说话, 谁就是“摇旗呐喊, 为那些牛鬼蛇神, 反革命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阶级斗争的规律当真是这样吗?

毛主席亲手拟定的十六条告诉我们, 革命的依靠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 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看来, 主力军并不只是出身好的人。

那么, 革命的对象, 即阶级敌人是谁呢? 过去揭出来的敌人姑且不说, “这次运动的重点, 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来, 这个新登台的阶级敌人, 也还不是出身不好的人。

特别是通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泛滥时期，特别是通过西起、联动骚乱时期，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以出身来划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够多么荒唐！

歧视、排挤、打击出身不好的青年，绝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接班人）的阶级斗争。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经验告诉我们，否定式的回答要比肯定式的回答容易一百倍，我们择易而行，可以这样回答，绝不能把唯出身论当作下一代阶级斗争的规律。

而以轻院为首的这一小撮人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斗争的学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观点。从而搅乱了阶级队伍，放跑了阶级敌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调和论”。

我们记得林彪同志的教导：“没有阶级观点，没有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右倾思想的根源，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根本的根源。”不难得出结论，所谓的“批判《出身论》联络站”正是一群满脑袋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蠢人。形“左”实右，是严重的立场问题，而不是认识问题。

《旭日战报》发表的这篇“臭文章”（这都是借用原话），通篇没有提血统论的一条罪状，没有列举血统论的一条表现。但为了遮掩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在文末居然也喊出了“打倒反动的血统论！打倒反动的《出身论》！”足以使不明真相的人迷惑，以为《出身论》就是血统论。实际上，什么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呢？这篇洋洋大观的铲花文章，就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它反血统论是假，反《出身论》是真。因为《出身论》嗅出了他们思想深处血腥的血统论的秽气。《出身论》当初可以作为进攻西起、联动的武器，当然更不惧怕你们这群蟹将虾兵。我们既不怕你们的大帽子，也不怕你们的人身攻击，不怕你们沿街卑鄙的造谣！让你们在真理面前颤抖吧！

轻院东方红公社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它是要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继续受血统论的迫害，它是在挑拨广大的出身好的革命青年与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关系，它是在颠倒历史，替彭真翻案，它是在抹杀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没有忘记，前一阶段中央文革率领着革命小将，费了多么大的心血，才扭转了血统论猖獗一时，独霸一面的局面！可是，现在轻院东方红公社及红爆队这一小撮人却含沙射影炮打江青同志，竭力把已经前进的历史拖回来。我们说，他们完全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而是怀着狼子野心，企图实现上述一系列丑恶目的。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反动的血统论正在反扑，同志们千万要提高警惕！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 ∞ ∞ ∞ ∞ ∞ ∞ ∞ ∞ ∞

出身论之七：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再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

• 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 •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小撮人（即《旭日战报派》）摆出一副狗气杀的架式，与该院的一种小报联合起来，又拾起血统论的大刀，要和《出身论》血战到底了。

他们纠集了三十个学校不多的几个糊涂虫，其中包括他们的联动“小将”，要开“批判《出身论》誓师大会”了。遗憾的是响应者寥寥无几，终于没有告成。他们并不甘于失败，上窜下跳，妄想“以数量压倒质量”，大造声势。在他们特刊一号上，用了六个版的篇幅，非要铲除《出身论》不可。

我们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上给了他们致命的批判。我们说：《出身论》在理论上是铲除不动的。

聪明编辑们果然不再在理论上碰壁了，他们开始反击《出身论》的第二部分：“受害问题”，我们还记得，是他们说“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个理论是贯穿整个《出身论》的第一线。这次回避了理论，“受害问题”（这是实际问题）又成了“精髓之所在”了。

对于他们的朝令夕改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人总是顽而不会固的。

好，你们要辩论“受害问题”，我们就辩论“受害问题”。不过，事先告诉你们，稻草是捞不到的，这正好会暴露出你们的“精髓”。

“受害问题”这一节，举出了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等各方面大量的事例，证明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不象刘、邓路线控制的《北京日报》所说的，是受修正主义集团的宠爱，相反的，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你们承认不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呢？这是根本没有办法否认的。但你们说这是“特例”，“特例就是诡辩”，于是你们就以阿Q精神得胜还朝了。

不过，要反驳我们，总得举出相反的例子呀！说起来令人寒心，你们有关社会方面的例子只有两个，我们原封抄在下面。

其一，“在控诉彭真集团时，京郊的贫下中农愤怒揭发道：彭真之流，在四清运动中大喊大叫什么以后地富子女叫什么名字，需要研究，总不能叫他们地富子女吧？他们还别有用心的起了‘新式农民’之称。贫下中农还揭发了彭真之流在一个生产队以搞《青年联合会》为名，不仅吸收了百分之三、四十地富子女，而且还让一些地富子女掌握了《青年联合会》的各个环节。复查时，还改划了一批地富子女为‘劳动者’，企图使青年一代混淆阶级界限。”

其二，“有的贫下中农这样说：以前他们（指地主）的孩子上洋学，咱们上不起，现在还是他们的孩子能上学，咱们还是不能上……，这也许是个特例，但是值得深思！”

第三个例子呢？没有了。但他们的结论是得出来了：“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草率，而是因为人家“不必多费笔墨的缘故。”

无论是从我们长时期的社会调查的结果中，还是从全国各地广大农村青年的成千封来信中，本来很容易挑出大量事例证明你们在说谎。不过，因为我们的“特例”都是诡辩，不如你们的“特例”那样“值得深思”，看起来，这样作的结果，对你们的花岗岩脑袋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请听我们问几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

去年夏天，当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写出《出身论》，进攻猖獗一时的血统论的时候，你们还在沉睡，或者说正在帮凶。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你们都没放过一个屁。谁都知道，你们轻工业学院在“辩论”对联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一边倒。在白色恐怖下，几乎没有一个“黑五类”子女不承认或不默认自己是“混蛋”，也没有一个“红五类”子女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好汉”的。当然了，你们东方红公社诸公也“绝对如此”。按理说，血统论统治得这样结实的地方，在今天大家都批判血统论的时候，应当有所作为，那怕写一篇文章，装装门面也好。但你们却连这一点表示也没有。这是为什么？

或许如你们所说：“谭氏路线要反，彭氏路线也不能放过呀！”先说说你们思路的糊涂。谭力夫不过和你们一样，是从蠢人堆里挑出来的区区大学生，他算得了“什么氏路线”？就说有个“谭氏路线”吧，它和“彭氏路线”究竟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可以告诉你们，“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围绕着我们党的每一次政策，都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里还有什么第三条路线呢？再退一步，就如你们所说吧！“谭氏路线是形‘左’实右路线，彭氏路线是形右实右的产物。我们总得杀退两边进攻的敌人啊！”为了给批判谭力夫讲话及其所代表的反动血统论的人加上一个罪名，你们不惜把彭真算作谭力夫的对立面，从而把他的“形”也变“右”了。你们真正觉得谭力夫形“左”实右吗？未必。不过事情相隔不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刚刚将“谭氏路线”置于死地。大家对谭力夫讲话的流毒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件也还记忆犹新，这时候，你们不得不咬着牙根说，这是从“左”边杀来的“敌人”。但彭真迫害这些青年的事件就数这一些了，大家的印象可能淡漠了，这时你们便指鹿为马，把彭真说成是形右的，以为搞了这样的把戏，就可以作为你们打击反对血统论的同志的借口了。不过，我们要问：彭氏路线真的形右实右吗？

党中央通过它的刊物告诉我们：彭真集团推行的是形“左”实右的路线。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请问，你们是和谁唱对台戏？

你们的那两个特例，是想说明彭氏路线不仅是本质上的右，也是外形的右。请问，这个形“左”又“左”在何处呢？

你们回答得了这几个问题吗？

颠倒历史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让我们回顾一下1964年以来的历史吧！

1964年5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一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

那么，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毛主席分析了几个大的方面。综合起来看，第一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的复辟活动、恢复封建的宗族活动和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的活动；第二是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第三是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活动；第四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的活动；第五是贪污盗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没有单单把地、富子女提出来呢？

没有，一条也没有。到了1964年9月，为了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彭真亲手炮制，刘少奇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出笼了。在这株毒草里，就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修正”得面目全非了。修正主义分子首先否认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该文件说，即使是那蜕化变质的5%，“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只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其次有否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且不准许向雇工剥削等现象做斗争。该文件说，不应该给当时猖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富裕中农戴上资产阶级份子的帽子，甚至不应该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百般包庇这些人，还让其中“公认能干”的，继续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接着又混乱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阶级队伍。对于那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可以不讲“成份”（注意，是本人成份，而不是家庭出身），而只能根据抽象的“德”、“才”标准来衡量他们。同时，那些贪污盗窃、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也还可以是“依靠对象”。把修正主义分子提出来的政纲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几大表现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把本质上的许多东西抽去了！那么，阶级斗争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他们不敢更改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这一方面了。

但是依照宇宙的自然法则，到了1964年，这群地富分子很多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他们一死，别的剥削分子又都被否认了，岂不是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和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公开顶牛了吗？为了掩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掩护他们自己），为了掩护真正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了迷惑视听，这群修正主义老爷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个阶级，那就是“出身反动的青年”！该文件分析约占农村人口10%（其实远不只此）的地主、富农子女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时说：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父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这就是新的阶级敌人。多数呢？“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还站在十字路口”。这就是新的特殊“阶级”。当然也可能有极少数，“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即便是他们，也“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不用说地富子女本人，就是和他们通婚的干部，也要“抓紧教育”。以上这些，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阶级斗争的“创造”。可见，最先提倡“血统论”的，最先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也正是修正主义分子。

《旭日战报》派说：“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是不是指的以上这些规定呢？你们还要“左”到什么地步呢？非得把地富子女全部搞成敌对阶级不可吗？那么我们要问，究竟怎样划分阶级？毛主席告诉我们，划分阶级有两个标准。一是经济地位，二是对于革命的态度。难道在解放后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地位吗？

没有。那些真正具有特殊经济地位的，比如投机倒把分子、雇主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反而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那么，是根据“对于革命的态度”才视出身反动的青年为敌人的吗？也不象。假使真的以此做标准，首先那些蜕化变质的干部，那些贪污盗窃分子，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人就应该算做敌人了。但这些人又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何况，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大部分算做“站在十字路口”、“划不清界限”的集团，也是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他老人家和他的战友们多次告诉我们：大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这样看来，把“出身反动的青年”算做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便毫无道理了。其实，这也只是出自真正的阶级敌人的政治上的需要而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政治原则的。

把敌人拉进来，谓之“实右”，把自己人打出去，谓之形“左”，这就是我们在《出身论》中所分析的：“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进党内，给某些五类份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旭日战报》及其同伙清华附中的联动分子，两次为这一段“笑掉大牙”，但是我们偏偏把这一段再写出来，直到你们的大牙一个也不剩为止。

我们也觉得可笑。但我们笑的是：所谓谭氏与彭氏，所谓的彭氏与你们，是何其神似！更可笑的是，谭力夫和你们这群小丑，一起在那里拾彭真的余唾，却还把自己打扮成反彭的英雄！怪不得在最近一次辩论会上，你们还公开为谭力夫讲话辩护呢！

修正主义分子的好梦是不长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亲手拟定了“二十三条”，及时扭转了这个局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不再指向出身不好的青年了，却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决策人和他们大大小小的喽罗！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只字没有提出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怎样的走在十字路口，相反的，即使对于他们的老子，还规定：“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又说，“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掉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请看，二十三条中对待地富分子态度，恰好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待地富分子子女的态度！同样的文件，还有1964年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这里也丝毫没有提出身。这就是说，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只要你按照五项标准去作，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

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不禁高呼：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你是多么英明啊！

但是阶级敌人并不死心，他们还在煽阴风，点鬼火，他们的影响也远没有肃清。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殊死的搏斗，血统论、唯出身论这些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货色，就赤膊上阵了。请看：

刘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的讲话吧：“他们（指地、富、反、坏、资）的儿女要报仇呀！有杀父之仇儿子不报孙子还得报。”又说，“对他们的子女……要提高警惕。”还说，“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对在场谈话的多年革命的老干部，还这样讲：“你们情绪不对，有几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你们的思想感情不对，值得警惕。”（

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的材料)。我们都还记得刘涛的检举吧？她说：当她向刘少奇汇报“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被同学奉若神明的时候，“刘少奇微笑地听着。”按理说，出身地主家庭的刘少奇，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他的老婆，本来应该不爱听“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不过，他们听了还是很高兴。因为具体到自己，那是“值得人深思”的“特例”。当然，对于大多数人，可就“基本如此”了。要举出郑兆南、王光华这样的例子呢？那可又成了“诡辩”的特例了。

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这都说明家庭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强调家庭出身，并不等于强调阶级斗争。再重复一遍，本人出身，即阶级出身，即过去的成份，当不在此例。我们反对血统论，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血统论和修正主义决不是毫不相关的东西。

可敬的《旭日战报》一小撮先生们，却张牙舞爪地大喊大叫：“把出身放在第一位，这是党的政策！这是阶级观点！”请问这是谁家的党？什么阶级的观点？当修正主义集团在出身问题上和毛主席对抗的时候，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围绕着阶级政策决战的时候，你们究竟是站在那一边？你们是为谁唱颂歌？

也许你们会不服气。“我们是为修正主义路线唱颂歌吗？我们不是把修正主义的头子彭真（的名字）排成了头朝下吗？”的确，你们是这样做了。我们早也没有把你们看得多高明。你们纵然很反动，但真的到了“抚哭叛徒的尸体”的时候，你们却还没有那样一分狗胆。你们有的只是“狼性”。据说阿拉斯加有成群奔驰的饿狼。当它们的头目因为多消耗了体力而精疲力尽的时候，它们就把它吃掉，再往前奔跑。你们正是这样做的。你们可以毁坏修正主义分子的外壳，但你们却拼命保存他的精神。你们的愿望就是，彭真可倒，刘少奇可倒，但他们印在你们头脑里的思想，他们为你们制定的反动路线，却要永远传下去。而你们竟说：这是“党”的声音！这难道不是为反动路线唱颂歌吗？

当我们的《出身论》到了农村的时候，革命的贫下中农子弟写信热情地支持我们，地富子弟也是十分赞同的。他们说：“读了《出身论》，知道党和毛主席是爱护我们的！迫害我们的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饱含热泪读着这些信件，但你们这一帮无耻的小丑，却嚎叫：“就是不给出身反动的青年以平等，就是要无限期地‘考验’他们！”而你们竟说，这就是党的政策！

你们的嚎叫根本不是党的声音，这是彭真1964年9月已经喊过的，是刘少奇1966年8月还在喊的，你们是为他们唱颂歌！可惜“时兮时兮不再来”，如今你们的颂歌已经是回光返照，已是无限空虚，无比忧郁的垂危着的挽歌了。不过你们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你们在同党的政策对抗的时候，尽量把自己摆在“左”的位置上，认为失败以后，还可以落一个“认识问题”，而并非立场问题。你们错了！形“左”实右，本质上是右，还是立场问题。谭力夫不是立场问题吗？他何尝不如你们聪明！你们的立场是十分反动的。

历史早就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1930年，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立三路线”的“左”倾路线时，王明等假革命派却批判“立三路线”的“右”，从而庇护并发展了“立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今天，毛主席又发起批判彭真集团执行的形“左”实右的路线，而刘少奇却利用他的宣传工具，说彭真执行的是形也没有什么“左”，倒是实右形也右的东西，接着便有《旭日战报》、《教工战报》……一群英雄好汉，跟在刘善人屁股后面跑。请问，这究竟是为哪一条路线捧场呢？



若不彻底清算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有重演历史丑剧的可能。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各种卑鄙的攻击的。“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曙光即在前头。”

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六期 1967年4月1日

（第二章完，待续：第三章怀疑一切：从怀疑反革命到怀疑最革命）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九）·宋永毅·孙大进·

第三章怀疑一切：从怀疑反革命到怀疑最革命

“怀疑一切”作为文化大革命中风行一时的口号，大约发端于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在首都造够反的北京红卫兵开始向全国各地输出“革命”与“造反”，到处炮轰当地的省市领导，“怀疑一切”便成了他们的纲领性信条。本来，“怀疑一切”源于马克思与他二女儿劳拉的一次谈话。当马克思的女儿问他：“你所最喜欢的座右铭是什么？”时，马克思毫不迟疑地回答：“怀疑一切”〔1〕。马克思的这一回答恐怕更多地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内讲的，但同时也多少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偏激的底色。这一语录被中国红卫兵们不分场合地应用与扩展到近百年后的政治斗争领域，并成为他们造反有理的哲学支撑。在他们造反斗争的各个阶段，“怀疑一切”都被作为高高祭起的理论法宝。有关“怀疑一切万岁”的标语，口号，文章不胜枚举。北京红卫兵在八、九月份用它来炮轰各地党、政、军领导，在十到十二月又用它来怀疑刘少奇、邓小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北航红旗战斗队在他们那篇著名的《论“怀疑一切”》的所言：“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怀疑一切’，作为口号被提了出来。这个口号一经同广大工农兵，尤其是革命的青少年相接触，就紧密地和伟大的革命实践联合起来，一经被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闯将所掌握，就变成了摧毁旧世界的物质力量。”〔2〕

本来，用“怀疑一切”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指导思想，必然导致摧毁一切权威与政府机构的无政府主义结果，这无论在强调“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建立在宪政民主制度的西方政治学看来，都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常识性的错误。然而，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二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如中央文革小组）正希望通过红卫兵运动达到“天下大乱”，从而全面清理他们政治对手的目的。因而他们非但不制止这一狂热幼稚的口号，还加以倡导与推广。而另外一些中共首要人物，为了祸水他引的政治斗争目的，也同样为这股“怀疑一切”的风潮推波助澜。例如，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称之为“刘邓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陶铸，就十分赞赏这一口号。他曾在多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时说：“现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但是毛主席不能怀疑……，此外，一切都可以怀疑。原来好的，怀疑一下就行了，如果不好的，怀疑下去，就把他打倒”〔3〕。他甚至主张：“每个司令部不知是什么司令部，现在就是要炮轰一下领导机关，试一试嘛，为什么不可以？我是主张普遍轰一下的……”〔4〕被历来认为是军内保守派代表的叶剑英，也非常赞同“怀疑一切”，他指出：“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儿子掀老子，掀爷爷。多数掀少数，象×××，就要多数帮助。要允许人家怀疑，大胆怀疑，怀疑一切。”〔5〕——应当说，中共高层领导的“左”、右两派势力在倡导这一口号上是大体一致的，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私利目的，狂

热的群众运动都在他们的引导下去摧毁各级政府组织，造成全国上下的无政府主义局面。大体上，北京红卫兵或学生一到外省市，《“怀疑一切”万岁》是他们必然散发与张贴的传单、标语，然后各省市的中共领导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造反与炮轰的对象。下面辑录的“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串联先锋队”撰写的《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不过是千百张这样的传单中较典型的一篇而已。

从政治上来说，鼓励千百万对上层政治斗争毫无所知的青少年学生去“炮轰”，去“打倒”远离他们的最高党、政、军首脑，实际上是倡导某种全民性的政治狂妄症，这一点在某些文革研究者的笔下已经被涉猎了。〔6〕这里要补充的是，鼓励别人去“怀疑一切”的人，其基本的潜藏逻辑是：“我是最革命的，所以我不怕（也不容）怀疑。”然而，历史的逻辑和他们开了不大不小的玩笑：一旦这种怀疑的狂潮成为全民性的思维定势，他们怎么可能不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呢？而一旦他们遭到炮轰与怀疑，他们又必然会利用权力对被他们称为“革命小将”的人横加迫害。而狂热幼稚的年青人正是在痛苦的迫害中才逐渐觉醒起来，从而进一步怀疑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体制……从这一点上来讲，大概正是这一思潮所起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吧。

文革中被作为“怀疑一切”思潮的典型后来加以挞伐的，是被称作“十一月黑风”的北京地区炮打中央文革与林彪的事件。这一炮打，是由原北京大专院校的保守派红卫兵普遍发动的。作为“红八月”中“红色恐怖”的执行人，他们一直是运动的当然宠儿。没想到自十一月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开始打“民意牌”和“人权牌”来反对他们及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对普通群众的迫害。〔7〕由于他们在思想上远没有转过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弯来（在他们心中，跟着工作组“打右派”，“反干扰”，迫害出身不好的学生及其他造反派学生是中共十七年的天经地义），加上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他们的批判与他们所执行的“资反路线”当然是使用同一方法手段，他们自然不服与不满。他们中不少人的高干子女背景和流行的“怀疑一切”思潮更使他们有恃无恐。于是，他们开始直接炮打中央文革。

1966年11月8日，清华大学出现“刘少奇万岁”的大标语。

11月下旬，以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为首的十几所院校的保守派红卫兵，组成了“批判戚本禹联络站”，计划从戚本禹下手，对中央文革各个击破。

11月25日，北航“八一纵队”赖锐锐，李明清等人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抨击中央文革支持少数派批判“资反路线”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学生，大字报认为：“最近又有一批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并且全国通缉，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与前一阶段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字报谴责中央文革小组“挑动群众斗群众”。〔8〕

12月4日，清华大学“清华红卫兵”和红雷小组贴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错误必须批判”的大字报。

12月9日，清华大学“清华红卫兵”颜晓东贴出了《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指责“批判资反路线”后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2月10日，北京大学“虎山行”贴出《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的大字报，又一次指责中央文革及首都三司红卫兵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9〕

在这一后来被称为“十一月黑风”的风潮里，最活跃的是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作为保守派红卫兵的头头，他在自身受批判的经历中体会到了共产党“阶级斗争”的滋味，并有所觉醒。但对自己执行整其他学生的“血统论”毫无认识，又十分不满。他先后写下了《剖析戚本禹同志的讲话——评戚本禹同志11月12日的讲话》（11月27日）、《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12月2日）、《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毒草——评陈伯达“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12月8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方？——评江青同志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12月12日）。在数次辩论会上，他一方面指责中央文革违反《十六条》，分裂群众组织；另一方面又积极为谭力夫和“血统论”辩护。从上述“十一月黑风”的流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异端思潮的价值取向是明显向后的——即倾向于维护十七年政治秩序的。他们主张为“血统论”与谭力夫翻案，主要是维护十七年的所谓“阶级路线”；他们反对“批判资反路线”，主要是维护十七年以“反右斗争”为原型的政治运动形式。因而，他们中不时有人喊出大逆不道的“刘少奇万岁”的口号并不是怪。因为刘少奇正是他们要保卫的这一政治秩序的代表人物。这无疑使他们的炮打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然而，他们的“炮打”仍然标志着中国青年一代的初步觉醒，他们从“整人”到“被整”的经历更说明了中共阶级斗争理论本身的荒谬与残酷。他们利用文革派制订的《十六条》之矛去攻文革派之盾，更揭穿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派虚假的“民意牌”与“人权牌”。

同样在“十一月黑风”中出现的伊林·涤西的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却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并有着其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这一大字报作为十一月黑风中“怀疑一切”的代表作，主要是因为：1.文革初期谁都可以怀疑，但毛泽东与林彪被排除在外，按倡导“怀疑一切”的陶铸所言：“除了主席，林彪同志以外，其他都可以炮轰”〔10〕。2.当时林彪是作为“文革派”代表，似乎是支持造反派的，而伊林·涤西反对他，似乎便成了保守派红卫兵的一员。其实，这一大字报表现的，完全是一种激进的造反倾向。伊林·涤西是北京农业大学附中高三学生刘振忠、张立才的化名。他们于1966年11月15日清晨7时左右在清华园贴出这张大字报。当天下午被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撕毁，将其骂为“毒草”，“反革命大字报”等。于是他们又将此信印成传单散发在北京大街小巷。在传单末尾，伊林·涤西还加上了挑战性的“附注”：“既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你们说成是‘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你们就应该发动广大群众批判之，批倒批臭之，既要让群众都看到原文，又要看到批判文章，然而，你们为什么竟然据其防止流毒更广，而把大字报撕毁了呢？你们到底相信不相信群众呢？显而易见，你们这种包办代替的方法是愚蠢的，是软弱的表现。”〔11〕

这张大字报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了引人深思的新思想。首先，它用马克思主义驳斥了林彪制造的个人迷信。《公开信》对林彪的“天才论”，“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吹捧公开表示了异议。并公开诘难林彪，要求他把自己放在同一平等的政治标准下来接受群众的监督，批评：“有错误就得批判，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要指出，难道你是不可有批评意见的吗？（有些首长讲话似乎对您提出批评意见是不可以的。）我看您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12〕。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时代，政治上批评与被批

评的平等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对文革派的不恭、不敬之词都会被看成大逆不道，更何况矛头直指林彪。但从另一面看来，这又真是他们的难能可贵之处。其次，《公开信》公开提出了“公社”这一新的政体形式，并且强调“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一思想或许也发源于运动初期毛泽东关于“巴黎公社”的承诺，但比毛的思想要更完整更激进。因为它已要求对“陈旧的”国家机器进行“强大的摧毁”和“强大的炮轰”〔13〕。从而成为1967年后激进的造反派“新思潮”所崇扬的“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论”的第一声。最后，《公开信》批评了林彪对“步行串联”的讲话中没有提倡毛泽东青年时代式的“社会调查”。这表达了这一代青年人企图对中国社会及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作出自己独立思考与评判的最初

倾向。青年毛泽东已大不同于晚年毛泽东。青年毛泽东曾是反对正统思想的激进分子，而他的最初异端思想也正是在“社会调查”中逐步形成的。《公开信》对这一形式的“渴望”（《公开信》之言）无疑是某种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朦胧向望。事实上，一大批青年红卫兵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调查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悲惨现状并开始觉醒的。

与“十一月黑风”中某些大专院校红卫兵对中央文革的炮打相比，伊林·涤西的信多理性的思考而少感情的发泄；着眼于新理论的创立而不是冤冤相报式的“阶级斗争”；向往于对中国社会的独立思考而不是单纯地回归到以刘邓为代表的十七年旧政治秩序。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两个年仅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以今天的理论水准来批判林彪及其思想体系，但无论其胆其识，都无疑是“惊雷”之声。

“怀疑一切”思潮正式地被中共在文革中批判是在姚文元发表于1967年6月7日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姚文指责陶铸倡导“怀疑一切”是为了“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14〕。从陶铸在毛、刘两派的政治斗争中有意鼓吹“怀疑一切”而言，姚文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但无论是姚文元还是陶铸都没有想到，这一思潮在中国青年学生中流行而产生的讽刺性的后果：年青人最后不仅都怀疑到了他们两派之上，而且对他们所代表的那种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 注解

〔1〕《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04—305页。  
〔2〕《论“怀疑一切”》，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3〕陶铸1966年8月23日在中国医大的讲话，转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上海：上海市委写作班编（1970）。〔4〕陶铸1966年12月2日在接见武汉红卫兵代表团时的讲话，转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同上）。〔5〕叶剑英1966年11月13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在京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同上）。〔6〕林焱《“新时代的狂人”陈里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7〕习广《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纽约：《知识分子》，1986年春季号。  
〔8〕江沛《红卫兵狂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172页。  
〔9〕《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北京：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第76

—79页。〔10〕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2页。〔11〕《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12〕同注〔11〕。〔13〕同注〔11〕。〔14〕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载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

∞ ∞ ∞ ∞ ∞ ∞ ∞ ∞ ∞ ∞ ∞

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造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和一切革命者的本色。要革命，就得造反。对待革命造反的态度是区分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你是革命派么，那你就必然积极支持革命的造反。你是反革命派么，你就必然对革命的造反怕得要死，你就必然污蔑、阻挠、反对革命的造反。

革命的造反好得很！只有革命的造反，才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才能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毒根，使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

要造反，就得怀疑。马克思曾说过，他最喜欢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怀疑一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精华。

“怀疑一切”是久经考验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它，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貌，指出共产主义道路的方向。列宁运用它冲破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运用它，把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引向光明引向胜利。

怀疑一切，就是用毛泽东主义检验一切。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牛鬼蛇神企图变天，修正主义到处泛滥，我们不怀疑一切，不用毛泽东主义去检验一切，不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对派的反，那怎么行呢？

“怀疑一切”是建筑在相信群众、相信党、坚信毛泽东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办好一切事情。我们无限信赖、无限崇拜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毛泽东主义。对于其他人，其他东西，我们都要疑它一疑，检它一检，符合毛泽东主义的，就坚决拥护，坚决照办，违反毛泽东主义的，就坚持反对，坚决斗争。

敢不敢“怀疑一切”，敢不敢“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敢不敢造旧世界的反，标志着一个人对你死我活、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有无认识，是否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作为观察分析一切事物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否用毛泽东主义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统帅一切。

有些人问：“你们什么都不相信，都要打倒么？”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怀疑一切”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无产阶级才能垄断的战斗口号。当无产阶级掌握了“怀疑一切”

、“造反有理”这一光辉的思想后，被怀疑、被打倒的只是资产阶级的一切，而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一切。奉劝那些小心翼翼的同志们，不要再做旧世界的顺民了，起来，造旧世界的反吧！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则隆起脖子嚷道：“你们反对党！”先生们，别再卖“老子就是党”的狗皮膏了。你们这撮阳奉阴违，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表面是人，暗中是鬼的野心家、阴谋家们，你们的保皇党，修正主义的党，为什么不能怀疑呢？！老实告诉你们，我们就是要将你们置于死地而后快。一切牛鬼蛇神，不管它职位多高，“声望”多大，不管它隐藏在市委也好、地委也好、省委也好、中央也好，只要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它们就混不下去了，它们的丑恶嘴脸就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就要彻底完蛋了。

一切牛鬼蛇神都对“怀疑一切”的口号怕得要死，但是“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经过阶级斗争大熔炉的烧煅，“怀疑一切”的口号正日渐射其真理的光辉。

一切保皇党徒们滚它妈的蛋去吧！“怀疑一切”一旦被人民群众掌握，它必将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在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无产者，刮起“怀疑一切”之风吧！无产者，刮起“造反有理”之风吧！

举起你的双手，挥舞毛泽东主义的千钧棒，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建设一个通红通红的新世界！

“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统帅一切的毛泽东主义万岁！万岁！万万岁！

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原载《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1966年10月7日

∞ ∞ ∞ ∞ ∞ ∞ ∞ ∞ ∞ ∞

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同时又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在这里十六条没有说是哪一级的文革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十六条同时又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而中央文革小组的产生是不符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的精神的，况且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坐在上边不广泛深入下层，不作全面的调查研究，到处游说，发议论，作指示。

他们的讲话不管对与否，到处传抄翻印，拿到手里视为珍宝，去指导运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主要带指导性质的，总得提出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予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穿它……”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鲛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

所以象今天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踢开哪儿行呢？不解散哪儿行呢？目前它是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脚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必须把它搬开，自己起来闹革命，紧紧跟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彪副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勇猛前进。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北京林学院《一·二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红卫战斗兵团《永向东》战斗队《革命到底》战斗队红卫兵《永向党》战斗队《好的很》战斗队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

□原载北京大学《文化革命通讯》第四期一九六七年一月

∞∞∞∞∞∞∞∞∞∞∞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敬爱的林彪同志：

近日看到你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的讲话记录，直爽地说，有几个关键地方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

您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重点是我加的）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最近翻阅斯大林论《论反对派》的一些论文，见到论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功绩的一段：“同志们，必须承认正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胜利的真理，不能抹杀理应属于列宁的功绩。不要惧怕真理，要有勇气说出真理，要有勇气公开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

我这些话绝不是想说明作为思想家的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高出一等。（重点是我加的）我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两个事情。

第一，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切可能性。

第二，列宁作为恩格斯或马克思的天才学生，能够看得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因而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斯大林的态度是对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它会给各国修正主义造成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毛主席也绝不会答应！

正如您说的：“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斯大林正是在怎样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和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开的。如今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并将继续进行大分化。在大分化中，那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固然是非常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主要应批评的），但那种估计超出历史发展的倾向同样站不住脚，也容易一头栽入反毛泽东思想的邪路。林彪同志，用斯大林同志当时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其他态度统统是错误的。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您是在军事学院讲的，无论这个99%是指学习时间，精力之比还是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适用。

第一：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显然不能成为99%的理由。

第二：专门的理论是需要的，而中国的现状是特别需要的。毛主席早在二十四年前就深刻地批评道：“但是要照中国革命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程度。你们看，中国的



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态度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象在中国经济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提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象样的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

二十四年前毛主席这个批评，在二十四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暴露出来了，在我们不但要解决国内问题，更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候特别地表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书店的书柜中看不到什么系统的周密的（哪怕是较系统较周密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著作！过去书架上倒是摆过一些厚本、专著，但文化大革命表明，他们的作者不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混蛋，就是钻进书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或空谈家。

在您的作用下，解放军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全国学习解放军，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空前广泛的运动，就是说一个工农兵广大群众直接掌握理论的伟大时代出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给目前范围有限度的提高以基础，也是给将来范围以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条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提高的问题自然而然的突出出来了！大批真正的理论家，现在和不久将来的革命运动很需要。

第三：既然我们现在很需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有大批的理论人才，那么这些理论家，不管其专长是什么起码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备一个较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而毛主席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而这个99%比例是不正确的，对大专院校不适当。

第四：毛主席著作虽然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一部分，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无疑是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战斗。我们不是否认这一点，而是肯定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个彻底的了解，清楚毛泽东思想如何前进，因而就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有个相当的认识，从这里您的“99%”也是不适合您所讲话的对象。一般说，用主要的精神，大部分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正确的。

其次，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规律问题，我国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这一点加上上面的，给人以马克思著作似乎已经过时之感，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基本，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从“左”的方面，同样走到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沼泽中去吗？您的意思似乎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飞跃，根本的质的飞跃！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请你解释这些。

顺便向您提出一个批评，在天安门上，您已经发表了对当前文化大革命具有决定性指导意义的六次讲话，可是这次运动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学生运动，却没有看见您来亲自参加，如同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一样来参加我们的辩论会，亲自看大字报，接见学生，给我

们讲话。我很怀疑你讲话绝对正确。就拿九月十五日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资产阶级份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市委”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省市中，大多数也不一定“炮打司令部”，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击中其中个别人，或冲决“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有讲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因而讲话不但没有注意引导这方面，反而给全国运动一个阻碍，造成一个反复（虽然不大），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张平化9·24讲话就是乘机抛出来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对于您的六次讲话，很希望您能象毛主席那样“理论应跑到实践前面去”。但说老实话，失我所望，您的六次讲话跑到实践后面去了。比如吧，第六次讲话虽然指出了“步行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去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的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这文中没有突出毛主席学生时代就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式的“社会调查”。而这一点，您讲话之前，清华大学里的大字报已经渴望了好几天了。

希望您特别深入运动，不然久而久之，也会有“靠边站的危险”，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我们的付统帅，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许多中央首长这样讲，人民也这样讲）。为什么要给您寄这封信呢？我认为，应坦白地向您公开我的目的，您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希望您具有毛主席那样高的理论，那样高的实践，象毛主席那样正确、完整，因为中国党的领导所领导的不是中国一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而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条道路上，斗争异常尖锐，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危险存在。这条道路毛主席是走上来了，如果毛主席的接班人不能象毛主席那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国党还会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再说一遍，无情的辩证法将会请您“靠边站”。

为什么要公开呢？就是要促进人民进一步取得您所提出的批评，监督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各级领导人的“大自由”。

有错误就要批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要指出，难道您是不可提批评意见吗？（有些首长讲话似乎对您提批评是不可以的。）我看您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赤胆忠心之言，见之请您斟酌，歪理之处，给以批评指正。

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北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注：

此公开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还扬言“要批倒、批臭”等等，既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你们说成是“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你们就应该发动广大群众批判之，批倒批臭之，既要让群众都看到原文，又要看到批判文章，然而，你们为什么竟然据其防止流毒更广，而把大字报撕毁了呢？你们到底相信不相信群众呢？显而易见，你们这种包办代替的方法是愚蠢的，是软弱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奉告你们，你们要真防止流毒更广，真心批判的话，希望你们亲手再把原大字报贴出来，让大家来批判鉴别！

同志们！既然有人不让此公开信公开，那就将转为另一种方式，印为传单。

伊林·涤西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读者注意：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靠边站”对个人过分的话，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批评的。

伊林·涤西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第三章完，待续：第四章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宋永毅·孙大进·

第四章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

一九六七年四月，经历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取得主导地位的北京中学造反派骤然分化与组合为两大派：“四·三派”和“四·四派”。浮面看去，这源起于文革中的“中央首长讲话”及其对它们的臧否。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所编的“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所载，这一分裂的过程如下：

“四月三日至四日，二、三月间，北京中实行军训。各造反派组织都解散了，打算按班级实行大联合。

但是，两种思潮在造反派队伍中的斗争依然存在很剧烈。

四月三日，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中学革命师生代表，指示：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一部分中学生认为江青同志讲话好的很，马上组织起来。众称其为‘四·

三’派。

四月四日，另一部分中学生也组织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四·四’派。

两派分歧是：‘四·三’派认为必须彻底批判联动思潮；‘四·四’派认为‘四·三’派不能团结大多数，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

‘四·三’派认为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要以左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但在军训中许多中学革命组织被解散。

‘四·三’派认为当时中学军训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提的不高；‘四·四’派则认为中学军训好的很。”〔1〕

尽管这一“大事记”只是粗略地对两派的思想分歧作了记录，但从中仍可以看到大致的焦点所在：1）军训；2）联动思潮。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共有八条内容。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停止外出串连，进行短期军训。三、整顿红卫兵，使之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一贯表现好的也可以参加。同时解散“联动”。四、建立三结合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五、上文化课与“文革”结合。六、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师生，必须平反，反对武斗。七、整顿清理教师队伍。八、爱护学校设备与国家财产。〔2〕这一文件表现出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中学运动的两方面期许。第一，抛弃“联动”及其老红卫兵，重新组织新的红卫兵为其政治工具；第二，以军训--最可靠的军队去限制新的红卫兵的作用，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总的讲，军训的目的无非是要把红卫兵这匹乱踢乱咬的野马套上笼头，用缰绳把它牵上毛主席既定的‘文革’的发展道路。”〔3〕

在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主要的就是批判“血统论”，即批判工作组，老红卫兵（及联动）对普通师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师生的迫害。军训团，即解放军本身是一个在中共“血统论”的阶级路线上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他们在军训中自然表现出了对批判“血统论”的天然冷漠及其抵制。这引起了“四·三派”学生的不满。此外，在“血统”上并不占优势的“四·三”派刚刚取得了革命权利，立刻受到了“复课闹革命”及军训团的不少限制。加上许多出身干部子女的老红卫兵都转入“四·四”派成为干部与骨干。又使他们对“联合”不抱幻想。从“四·四”派来讲，也正因为他们队伍的“血统”构成和他们多多少少把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不愿深入批判“血统论”。加上他们早在一九六六年底便已成立了全市性的组织——“红卫兵首都兵团”，这又使他们在大联合力量对比上绝对不会吃亏，因而他们拥护“军训”，拥护“大联合”——这便是出自两派利益所在的不同而造成分歧的原因。

自然，从两派“比赛革命”，即争当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新的政治工具的角度去看，这两派的分歧并没有什么大的现代民主与人权意义上的积极意义。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两派分歧更深层的社会思想原因——血统，那么，“四·四”思潮更多地表现出对中共十七年的阶级路线及政治秩序的一种维持，而“四·三”思潮则不时表现出对它的挑战、颠覆，甚至进一步的独立思考式的否定。如同红卫兵运动的研究者的分析：“说到底，‘四三派’、‘四四派’之争还是个家庭出身问题之争、政治待遇之争。在这方面，‘四三派’的理论实际是遇罗克的〈出身论〉”〔4〕如果说毛泽东及中共期许通过军训使红卫兵运动失去它的独

立性与自主性，通过“大联合”及“红代会”的成立结束所有中学生对中国政治的独立思考，那么“对于曾对造反抱以极高期待的红卫兵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红卫兵运动，可说是这代人要把以往学到的东西，放到他们感到神秘且无法左右的社会现状中去实践的初次尝试。这种尝试的动机，包含着许多崇高的理想和愿望。有人想籍此创建一个没有任何杂念的单一社会，使生活其中的人完全平等；有人期冀以巴黎公社为蓝本改造社会的政治结构，使之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有人试图建立最能发挥学生积极性和能力的教育制度，来培养出一代真正的新人，当然还有其他许多。而期望本身不在于它是否合理，而首先在于它是否具有实现的手段，倘若没有，那么期望越高，痛苦越深。到了这个时候，红卫兵们发现，他们已经再也没有力量和手段去实现造反的理想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与他们的初衷已越来越远。”〔5〕这一对他们狂热投身于的“革命”的失望，无论对于老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都是一样的。而在此失望的过程中，“四·三派”思潮仍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思考，〈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是遇罗克〈出身论〉等一系列文章中表述的“反特权”思想的延续，但是它也表达了如下几个创新的观点：

第一，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归结为“革”与“保”的矛盾，其斗争焦点又在于“权力再分配”。〈论新思潮〉认为：社会主义之前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伴随着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样，这些“特权人物”蜕化后“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而“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6〕

第二，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权力对中共各级当权派无可幸免的腐蚀作用。〈论新思潮〉指出：“‘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7〕

第三，指出了这种“再分配”斗争的持续性与永久性。一方面〈论新思潮〉认为“四·三”思潮“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的实质是“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另一方面，〈论新思潮〉又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因而，在第二次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了”。〔8〕

从这三个创新理论观点与中共长期以来信奉的正统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观点相比，即使是与毛泽东创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相比，仍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从来没有推翻过他一贯倡导的正统阶级路线，对造反派的倚重只是暂时的、功利的。而〈论新思潮〉想把它固定为“革”与“保”式的阶级分析，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其二，〈论新思潮〉过分地强调了权力——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专制权力——对其干部的腐蚀作用，甚至对新上台的造反派的迅速蚀化作用，这等于是正在否定这一制度本身，自然

更是大逆不道。于是，这一文章很快在北京以及全国部分地区遭到了批判。但因为它影响并不大，批判的规模也很小。

但有趣的是，〈论新思潮〉的作者自称为“异端邪说”，并认为：“一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和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一个个被否定，而许多‘异端邪说’居然正确”。〔9〕而且这篇当时影响不大的文章影响了后来在全国影响极大的湖南省无联思潮的思想家杨曦光，使他接受与发展了中国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的思想。从此，“新思潮”成为激进的造反派思想的代号和一种反体制的符号。此外，它在理论上公开表明反特权与对“权力再分配”的渴望也从一个层面揭开了“四·三派”——这一骚动不安的中学激进派思潮深层的原因。

应当指出，〈论新思潮〉只是一种并不成熟的中学生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如同今天的研究者指出的：“反观红卫兵派性斗争的发展，同‘新生代’共同接受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思想灌输有很大关系……‘四·三派’对反动‘血统论’的批判和老红卫兵的痛打落水狗之役，都没有脱出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时代巢臼……这不过是以恶易恶，想以新的阶级斗争和新的阶级路线（‘四·三派’划定的阶级路线），取代原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囿于亲身的感情和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封闭式的思维方式不过是低层面的历史循环”。〔10〕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然而，〈论新思潮〉中表现出的对中国社会体制和文化大革命独立思考与探索，却正是在思想的层面上对这一历史局限性的—种试图超越。从这一意义上，“异端邪说”自有它的思想史意义。另外，正是这种可贵的独立性与探索性，使北京中学“四·三”派中后来无论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文化复兴，抑或是民主运动中都涌现出了一大批佼佼者。

#### 注解

〔1〕《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北京：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第111页。〔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编》（第二集），天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研究组，1968。〔3〕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第228页。〔4〕同上，第230页。〔5〕同上，第238页。〔6〕载《四三战报》，北京：东方红抗大电校，第1期，1967年6月11日。〔7〕同上。〔8〕同上。〔9〕同上。〔10〕杨健“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1968年秋—1971年秋）”，北京：《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2期，第27页。

∞∞∞∞∞∞∞∞∞∞∞∞

####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中央首长的四·三讲话把“四·三”、“四·三派”、“四·三思潮”这些名词带入了中学的政治生活。

许多人为了驱逐“反动的四·三思潮”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人为了攻击对立面而甩给后者以“四·三”的帽子。

然而，四·三派却在一片嚣闹声中逐渐形成公认的势力并比任何一种势力都富有生气，富有革命精神，富有组织纪律性地成长起来。

关于四·三的神话可休矣！

现在，是我们公开申明一些实质性问题的的时候了！

### 一. 特权人物和人民

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是特权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相应地伴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即把社会上的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某些人，而每次分配的结果，都是使统治阶级——代表少数人的阶级占了绝对优势，使他们掌握了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而这些人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第一天起，就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再分配日益趋向统治阶级的继续进行，这种矛盾逐渐尖锐，两极分化突出，于是发生一次大的变革，再一次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使自己在财产和权力方面占了优势，由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它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这次的再分配实际上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该保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时就出现了远比其他历史时期复杂的局面：社会上较次要的矛盾当然还是再分配后被打倒的阶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同地富反坏右派的矛盾；而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则不能简单地按掌权的人与人民的矛盾来划分了。必须加以分析：

（1）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当权派，分配在他手里的财产和权力是公有的，他只起一个暂时代替掌管的作用。并且他们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公有。显然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将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变革行动来促使财与权的公有化，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革”的实质。

（2）逐渐蜕化的当权派。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有巨大能量，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无时无刻不在腐蚀人的灵魂的情况下，蜕化是很有可能。何况“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这个引人注目的当权派地位是阶级敌人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所以只要稍微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看不到历史的辩证法，就会陷入被动。可以断言，不仅这一次，而且今后几次文化革命都必然要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

资产阶级初期有过很强的革命作用，而上述特权人物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反动作用，因而他是腐败了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今天利益的集中代表，他竭力阻止历史的再分配——这个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革命进程。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

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但鉴于四旧的影响，也因其他地位的不同而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要求。

必须指出，刘邓路线在某些群众中得以推行，除了某些人的地位之外，重要的是运用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能量及群众中应用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不够。

## 二. 四·三思潮是新思潮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审查一下中等学校四·三派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是全体）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正是前面所谈的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个结论恐怕有些四·三派的同志都感到偶然，但是在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列主义者看来，这实在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中学里第一次的阵营分垒就如此鲜明，而且还导致了大专院校表态的吻合：响当当的造反派支持四·三，“温存的”老保支持四·四。

所以，四·三派就必然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革命有着朴素的理解和热望并很快上升到自觉的认识。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四·三派——老造反派们在八月份敢于抵制血统论，十月份猛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份激烈地与联动血战，一月份毫不含糊地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而一些半工半读和中专学校的四·三派，则大反校党委内的黑帮分子，大反工作组，大反伪革委会，大反各部、局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少人曾被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这两种情况无一不是体现了以上的结论：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这种不断地要“革”，要向前，要提高的奔放的力量也体现到军训中，他们要求提高班级大联合，要提高军训的水准，提到更加适合于再分配的高度，而不使之降到“复旧”的程度，这与红旗第五期社论及4·15人民日报社论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攻击四·三派是反解放军，甚至是靠反解放军起家的，这种论调是对一个问题的性质没有起码的判断并对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丝毫了解的谬论。

顺便提一点，署名李××的三月廿七日的讲话有严重的错误，体现了一个“干部子弟要掌权”，即再分配的被动势力（当然不完全是）要掌权的精神。因为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一小撮特权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特权思想在一些高干及其子女中颇有市场，它的作用比地主资本家的反动思想所起的作用还要坏，因为现在社会上的最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特权人物的矛盾。同时辩证法也惩罚了那些自认为“红透了”（其实家庭影响并不好，因此毫无准备与抵抗力）的特权人物子弟。他们一向以挂着“老革命”招牌的特权人物而自命不凡，一旦“老革命”成了“反革命”，即将失去特权“天堂”的时候，他们



就出自没落阶级面临灭亡的愤恨而对革命势力疯狂反扑。所以，四·三派批判这种特权思潮仍然是如前所述的新思潮的反映。

总之，四·三思潮是一种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的因素，从而不断飞跃，突变的新思潮。我们欣喜地看到四·三小将具有最新鲜的政治头脑，最焕发的精神面貌，可以不愧地说，他们集中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的最优秀的因素！在这次文化革命中，只有他们掌权，才能向解放全人类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开来，也才能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所应该完成的再分配任务。

### 三. 文化革命中的思想分裂

历史上每一次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都要引起思想上的分裂。无比深刻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毫不可免，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撕去了在“和平时刻”可以遮颜的虚伪的面纱，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大舞台上奔忙起来，全国各地毫无例外地都出现了那么几派：一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和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一个个被否定，而许多“异端邪说”居然正确。

四·三思潮是先进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在大专院校，在北京，在全国都可以找到它的同胞，虽然开始时都是弱的、小的、被多数人反对的，但它代表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联动思潮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它用特权人物的和没落阶级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保守派所代表的思潮是想维持现状，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很不理解，他们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却看不到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是何等壮丽辉煌。所以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充当了旧势力的卫道士。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观点，是与他在这次再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因之带来的态度密切相关的，（当然不是全部，因为思想上的改造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所以对犯错误原因的种种唯心解释（如阶级感情深）及不顾是否能担当重任而要求掌权的作法都是不正确的。

必须指出：分久必合。当再分配接近尾声并将以新的分配法则相对稳定一段时期的时候，必将有一个思想吃掉一个思想的局面，如果怕被吃掉，不投降，就会走向反面，以至象历史上某些革命行列中由于观点的分歧而堕入反动的人一样被抛进垃圾堆。而且，在“一次”再分配中，思想的发展也是按照“一个”规律进行的，这一个基本上（包括革命动力、对象）是完整的。如果依了什么“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每个转折点都要重新组合”的观点，就等于说这次再分配没有它的阶级基础。实际上只有两个可能：（1）按照这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规律前进一步。（2）本来前进一步，但在“新阶段”中又退了回去，甚至退得更多。

还应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所以，合久必分。但现在我们已经对第二次文化革命有点看法，即那时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了！反之，在四·三派充当重要突击力量的时期，必属于这一次文化革命。所以说掌了权的革命造反派务必充分注意，一定要不断前进，让毛泽东思想占领灵魂深处，不然辩证法的惩罚将是同样无情的。

#### 四·四·三派的几点政策和一些问题的看法

前面讲的“分久必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种是思想上，指先进思想吃掉反动的保守的思想，这一点在一些左派强大的单位已完成了大部分，在落后的一些单位还有待努力。另一种组织上，指革命造反派从人数上占绝对优势。这里可以指出一点，即在一些思想上左派已占优势的单位，保守派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或不愿参加造反派，这时再对他们施加压力甚至武斗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同他们合并（但必须保证左派掌权）并准备进行下一次的思想斗争，因为在不少单位需要尽快联合。

但是思想斗争绝不能放弃，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占绝对权威，让保守派从思想上投降。一些人打着“解放全人类”的幌子，却干着压迫革命小将而纵容联动的勾当。革命小将要彻底批判联动思潮，要让犯错误的同志从思想上而不是从形式上新生，这才是真正的解放全人类的气魄，而决不象那些连革命同志都容纳不了的最大分裂主义者所说的“关门主义”。

目前，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以前犯过错误的“老”红卫兵和联动老百姓，正大批地站出来投入运动，这是好现象。但必须指出，要站出来革命只有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这些人，以前犯错误就是因为他自认血统高贵，脱离群众，现在唯一补救方法就只有到群众中去，到革命造反派中去，大杀回马枪，这样完全可以成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实际上也有不少“老”红卫兵这样做了。可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联动分子把毛主席对他们的宽大，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拉起人马，向造反派夺权。一些貌似岸然的先生们却还在为他们唱赞歌，双手把权送过去。而革命造反派对这些顽固分子，只有坚决斗争，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权如果落到了他们手里，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和对革命造反派的阶级报复，必是历史的大倒退。

一些联动分子在军训上大作文章，说革命小将“反解放军”“反军训”。同学们大概还记得，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进校时，是谁最欢迎！谁最支持军训？谁最积极参加军训？是革命造反派！当军训一段时期后，由于一些解放军经验不足，出了一些问题，革命小将本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对军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有些方式不对！）这更充分表明了革命造反派是真正支持军训的。可是一些联动分子，在军训开始时，抵触军训，在军训进一步提高时，他们又跳出来，打着“保卫军训成果”的幌子，极力把军训往后拉。

中国反对再分配的最大人物是刘少奇，所以对他的批判是极其重要的，是占这次文化革命很大比重的，同时通过对他的批判，可以从根本上粉碎反动的特权思想，解放大批干部和犯过错误的同志，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重要的一环。

革命造反派是中学红代会的当然主人和中坚。遗憾的是，现在某些核心人物利用革命造反派给予的权力反过来打击革命小将，压制民主，制造分裂，这种“复古”现象决不能允许长期存在。必须指出，其中某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而是破落户的飘零弟子，是再分配中的被动角色。

矛盾永远存在，新思潮在这个问题上战胜了、统一了，还会在更新的问题面前与保守势力形成不同看法。可以预计，今后在干部问题、教育革命问题上必定会有斗争；为了使文化革命不半途而废，代表新思潮的革命派就更不能轻放了“权”！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且大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是我们全体湘江人民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本文参照以下各文写成：江青：〈为人民立新功〉八中红旗：论四三思潮。清华井冈山毛泽东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青年一代思想上的分裂。新四中公社赤潮：驳联动反动政治理论。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引自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第四章完，待续：第五章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一）·宋永毅·孙大进·

第五章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

在风云瞬间变幻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中，“五·一六兵团”一直是一个十分诡谲的谜。在1967年开始的“砸烂反革命阴谋组织五·一六兵团”的高潮中，把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普通的组员林杰说成是它的黑后台，但不久不了了之。从今天的材料去看，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这个被中共多次称为“秘密组织”、〔1〕“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2〕其实不过是被“怀疑一切”的狂潮鼓动起来的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而已。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炮轰周恩来”，认为周恩来为代表旧政府机构是“又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的总后台。所以他们要打倒这“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3〕，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4〕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在1967年底批判资反路线中，北京地区国务院各部所属的大专院校，如外语学院（外交部），钢铁学院（工交），外贸学院，商业学院（财贸）等校造反派红卫兵由批判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副总理与部长的“资反路线”，开始怀疑到总理周恩来头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周确实竭力保护他这些老部下；另一方面，周又在全国镇压了不少造反派（如湖南“湘江风雷”），引起部分省市造反派的强烈反弹。〔5〕在“怀疑一切”思潮鼓动下的红卫兵不断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其中尤以北京外语学院刘令凯领导的“六一六红卫兵团”，北京商学院程镇华领导的红反军决战纵队，与钢铁学院张建旗为首的“钢院五一六兵团”炮打次数最多，最为狂热。这一炮打行动在北京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洪涛等造反派知识分子中亦有不少共鸣者。

1967年6月14日，刘令凯、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语学院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坚持他们炮打周恩来的立场。6月30日至7月2日，他们又在北京外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进行“二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并作出了“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的决定。〔6〕

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固然是“怀疑一切”思潮在青年人中的产物，但周恩来本人在文革中又何尝不是这一思潮的赞同者与鼓吹者？1966年9月间，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署文化大革命时，就提出过“要把所有的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的口号〔7〕。据此，五·一六兵团的红卫兵火烧了他的部长、副总理乃至他本人，又有什么奇怪呢？另一方面，五·一六兵团的行为又是在国务院各部各口造反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学生们批判那些部长们执行的“资反路线”，也自然而然地顺藤摸瓜到总理周恩来头上，把他作为“总后台”。目下在大陆学界有一种很流行的官方说法：“五·一六”炮打周恩来是受“四人帮”指使的。其实，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在当时便坚决反对并阻止了“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行动。1967年5月29日，在张建旗等人在钢院刚刚成立“钢院五·一六兵团”后，陈伯达立刻接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指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6月3日，陈伯达、江青等警告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说：“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8〕从1967年八月至九月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近十次点名“五·一六”为“反革命组织”，宣布“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9〕在他们的指挥下，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等很快被查抄，刘令凯、张建旗、程镇华等人很快被逮捕。应当说，事实上人数并不多，也没有任何政治后台的一批红卫兵组成的“五·一六兵团”至此即被消灭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批红卫兵原想通过打倒周恩来来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矛盾，可举手消灭他们的却正是“新文革”的代表人物——毛泽东的文革派。这批天真的学生低估了上层政治斗争的诡谲与险恶：毛与周之间并非不存在着鸿沟与矛盾，但1967年间他们尚需要出自各自政治利益的联盟。这些学生们妄图在不适当的时候去动摇这一联盟，自然被他们轻而易举地联手投入了牢房。

照理，“五·一六兵团”的事至此应当了结了。1968年后的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但在六十年代末开始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五·一六的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大声呼叫要彻底清查五·一六。至此，所谓“五·一六分子”已延伸成为一切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政权的人民群众。1971年2月，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上层政治斗争中与周恩来联手，使“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式扩大到全中国范围。中共中央2月8日决定，3月27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联合专案组”，在全国大整人民群众。〔10〕这一运动按中共中央“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逼供信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把敢于“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尤其是首都地区的造反派知识分子几乎一夜之间全部整成了“五·一六分子”。据十分保守的估计，这一运动都迫害了几十万群众，使数万无辜的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致死致残。如同文革史研究者所言：“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反对周总理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对人民专政的一种手段。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彻底垮台后，才不了了之。”〔11〕

如果说这场“新文革”与“旧政府”联手推行的对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大专政与大迫害说明了一些什么，恐怕首先是说明了中共党内的两大派系在镇压敢于反抗他们的人

民群众上毫无矛盾。另外，在中共每一次上层政治斗争的分化、妥协、与再组合中，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常常是他们首先抛弃乃至出卖的对象。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一六”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最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命名，最后却成了毛泽东清查与整肃的最大的敌人，这也正微妙地意味着毛在取得政权后又一次对被利用来打天下的人民群众的态度截然转变。

#### 注解

〔1〕陈伯达1967年8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讲话。〔2〕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载《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3〕〈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上海：市委写作班（1970年）。〔5〕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6〕同注〔3〕。〔7〕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页。〔8〕《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北京：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第120页。〔9〕〈中央首长痛斥“五·一六兵团”〉，载《砸烂反革命阴谋组织——“五·一六”黑兵团》（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1967年）〔10〕〈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1〕严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4页。

∞∞∞∞∞∞∞∞∞∞∞

####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片大好形势下于1967.6.30—7.1在北京外语学院胜利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和目前形势作了充分的讨论和估计，大会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的高潮和热烈庆祝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一周年的一片欢呼声中硕果满载，胜利地结束了。

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首先进行了“两忆三查”的运动，即忆全国许多地方革命造反派惨遭迫害之苦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的反扑，竭力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夭折的阴谋，代表们检查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决心今后要用无产阶级革命性取而代之，同时，对自己的斗志和工作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代表们一致认为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达白热化，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败退，国内国际资产阶级已勾结起来，正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热情向无产阶级发起攻击，4万革命造反派战友倒在血泊中！千万的阶级弟兄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首都5·16红卫兵团万众

一心，同仇敌忾！决心“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我们誓与全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彻底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摧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5·16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坚信：我们必胜！因为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我们也坚信，反革命两面派必败！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都是必然要灭亡的一具僵尸。

代表们一致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决不能打乱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及他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又要展开为革命造反派战友和群众所能接受的形势的各种针锋相对的积极的斗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我们决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启发造反派内部觉悟上，应该从国务院各口各部内因入手积极工作。

代表们一致认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目前不会收尾结束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今天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决战时刻，我们尤其应该牢牢记住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教导：“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代表大会认为：斗争是长期、曲折、复杂而艰巨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只要毛主席身边这颗定时炸弹没有消除，我们《首都5·16红卫兵团》就坚决与之战斗到底！

代表大会决议：《首都5·16红卫兵团》成立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并推选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部阶段作战方案。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全体战士“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谁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跟谁亲，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地解决。”我们全体代表决心以中国共产党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力求在火线中在思想上首先加入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终生，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第五章完，待续：第六章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

刊登在 1999 华夏文摘增刊 zk9905a.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二）

• 宋永毅·孙大进•

第六章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成立于1967年10月11日，它是一个由湖南省二十多个群众组织组成的，作为官方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对立面的群众组织。“省无联”的规模并不大，其主要思想家与领袖人物均为学生，有杨曦光（长沙一中高二学生，现改名杨小凯），张家政（长沙银星电影院工人），周国辉（湖南大学电机系学生）等。其主要成员，计有以下九个组织：

1.湘江风雷（只限以张家政为首的“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他们反对以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总部）；2.湖南井冈山（中学生组织，领导人为长沙一中女学生谢若冰）；3.湖南红旗军（复员军人组织，领导人为毕建）；4.红中会（长沙中学生造反组织，领导人为孙学申）；5.青年近卫军（中学生、社会青年、青年工人混合组成）；6.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7.高校风雷（大学生中的造反派，领导人为周国辉）；8.矿冶井冈山公社（大学生中的造反派，领导人为张玉纲）；9.湖南省直联络站（省级党政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10.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文学家，艺术家造反组织）；11.教师联合会（中小学教师造反派组织）。

省无联还出版一个刊物叫《湘江评论》〔1〕，其各参加组织也出版各自的铅印小报。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杨曦光执笔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作为“一份征求意见稿”在组织内部传阅，当时只油印了八十份而散发了二十余份。接着张玉纲写了〈我们的纲领〉再作补充与进一步阐述与发展〈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一些观点，但也都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常见传单与大字报而已。

然而，这些“省无联”的“内部征求意见稿”与传单被湖南执政的“省革筹”上报中共中央。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当时中共中央执政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姚文元和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公开点名“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中国向何处去〉为“实质是极右的”。“它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当代的，最伟大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毛主席，反对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这个纲领不仅反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把整个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否定了。”〔2〕不久，杨曦光等人即被正式逮捕，一场全国范围内批判“省无联”思潮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一份仅散发了二十余份的“内部征求意见稿”被全国官方与群众组织的各种报纸成千上万地作为反面教材刊登转载，“省无联”成了令中国家喻户晓的极“左”思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思潮”的代表。

一个问号迎面而来：为什么存在着尖锐矛盾的中共“文革派”康、陈、江（他们背后是毛泽东）和“政府派”的周恩来要如此大惊小怪地联手在全中国范围内镇压一种以一个中学生为思想领袖的“新思潮”？如果认真地阅读一下杨曦光执笔的〈中国向何处去〉、〈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及相关的〈我们的纲领〉等文，便不难明白：这些文章尽管运用的还都是钦定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义，但它的理论分析已形成了一种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意识形态，它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了一种全面的反对整个中共体制的激进倾向，尤其是以它为代表的“新思潮”以反对文革中在一月夺权中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的政体形式为直接号召，以“中华人民公社”——巴黎公社式的新的民主政体为奋斗目标，对处于文革暴风骤雨中的群众运动，会带来极大的煽动性并进而造成不可控制性，最终必将形成对整个中共所代表的制度（不管是“文革派”还是“政府派”）的挑战与威胁，深知理论对群众运动的能动作用的中共当局决不允许“星火燎原”，他们必须联手扑灭这一“新思潮”于其未燃之际，无情地扼杀它在萌芽状态。

“省无联”思潮全面的反体制倾向首先表现在它对十七年（1949—1966）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它认定中共的整个上层统治阶层已形成了一个“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而“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中国向何处去〉）。也如同康生敏锐地感觉到的：“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干部队伍绝大多数说成是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因此那些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要推翻他们所谓的特权阶层，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3〕

如同杨曦光后来所回忆的，他的上述思想并非他的独创，而是来自北京学生运动中激进派的影响：“一九六七年……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强烈不满，开始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4〕另外，又如同他所言：“从小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自己被当局迫害时，希望找一种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政治利益或使其在马列正统理论上合法化，而马克思关于民主主义的观点及反迫害的观点，自然成为他的思想武器。”〔5〕然而，在省无联思潮中自有它完全创的部分：即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已形成的新的政体——革命委员会的思考。在省无联看来：革命委员会是“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中国向何处去〉）。因而，省无联的政治纲领决不仅是推翻十七年内的一个从共产党高级干部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还要推翻作为毛泽东及其“文革派”直接夺权成果的“革命委员会”——在这方面，省无联理论的特特点在于，它认为“一月风暴”只是“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



器”；因而，它号召建立“极左派自己的”新的政党——“毛泽东主义的政党”（〈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组织“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利用“革命的不平衡性，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中国向何处去〉）

无论从建党建军，武装夺取政权，还是“不断革命”和对革命不平衡的分析中，我们均可一眼瞥见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理论分析的投影和他夺取政权的方法与途径。即便从“省无联”对巴黎公社式民主政体的向往，也没有多少超越中共中央在发动文革时的指导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6〕按省无联的理解，这一新政体应当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中国向何处去〉）。而〈十六条〉则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这里，又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既然省无联们笃信“毛泽东主义”，并完全在钦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思考问题，所循的路径也基本是毛泽东式的“井冈山道路”，它似乎理应被视为一群毛泽东的忠诚学生与活学活用的标兵，为什么相反被判为一个极端危险的反革命集团？

如果我们注意到〈十六条〉颁布在1966年8月，毛泽东发动文革阶段，而省无联的文章则发表在毛泽东已决定放弃群众运动与开始整造反派的1968年，原因便迎刃而解。不管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发表了多少冠冕堂皇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籍口，对于他们，核心问题永远是一个“权”——即夺回被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掌握的权力（在文革前，刘邓确实掌握了党与政府的大部分权力，毛则大权旁落。）因而，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必须与群众结成同盟，利用他们对十七年共产党特权阶层的不满，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愤恨去打碎旧法制，去打垮各级党组织，打倒政敌。为了发动群众，他们必须利用马列主义教义中有利于群众运动与包含民主追求的部份（例如巴黎公社的民主制）作为号召群众揭竿而起的旗帜和收买人心的大纛。而在经历了“一月革命”和建立革委会以后，毛泽东已成功地利用了造反群众夺回了大部分失去的权力，他要回过头来收拾已日益坐大并不再驯服的造反群众了。在这一时刻，他怎么还会容许群众中产生有自己独立理论体系（哪怕这一体系只不过是他发动群众时的理论的系统化和一些顺理成章的发展而已）的激进派呢？他们关于“巴黎公社式民主”的许诺，完全是一种发动群众运动的理论欺骗和利用群众运动去进行上层权力斗争的幌子而已，在他们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没有一个是按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产生的。然而，年轻的省无联们却信以为真，硬要把这一理论幌子当做奋斗的终极目标认真去干，去推翻这些“革委会”。这正触及了他们讳莫如深并无法自圆其说的痛处。他们便只能在恼羞成怒之际大开杀戒了。

另一个使他们深感危险的是，省无联们运用的又正是他们一再宣扬的马列主义体系，他们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却用这一武器去批判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现实。这更使他们痛到刻骨铭心之处，因为这不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撕下了毛泽东思想的“皇帝的新衣”，而且任其发展下去，他们便会失去对马列主义教义的任何解释

权，他们是决不能容忍群众与他们分享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权力的。因为分享便打破了垄断，从而跨出了平等的第一步，从而形成一种民主的多元政治的势头。因此，他们必须杀掉任何一个手执马列经典向他们挑战的人，从而建立教义恐怖与精神暴政。他们要通过对省无联的杀戮向全国造反群众宣告：中央不允许你们有自己的理论头脑与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权，否则格杀勿论！

透视一下省无联们的理论追求，也不难发现为康生所指责的“极右实质”。当杨曦光们把90%的共产党干部作为一个腐朽的，应当被推翻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把毛泽东及“文革派”夺权后的“革委会”说成是“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时，省无联已完全走到了整个中共制度——包括政府派和文革派——的对立面，这时，尽管幼稚的杨曦光们憧憬的政体只是一种纯而又纯的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权，但对中共来说，自然是极端的反革命的，是必然通向多元政治或资产阶级民主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省无联的极“左”思潮给中国文革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璞玉含沙，良莠混杂的思想史料。

#### 注解

〔1〕见广州《一月风暴》第23——24期合刊，1968年3月。〔2〕康生同志谈湖南省无联，1967年1月24日晚，原载广州《八五》，1968年2月。〔3〕同上。〔4〕《“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载《中国之春》1990年12月号。〔5〕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p. 7。〔6〕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简称《十六条》。

∞∞∞∞∞∞∞∞∞∞∞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稿，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1968年1月12日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 一. 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1967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 二. 一月革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着这一教导来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90%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零，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

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90%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1965年1月25日〈关于李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为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 三. 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

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着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共产党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 四. 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90%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

“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〇”，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 五. 八月局部国内战争

一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

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些文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义的事物。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多好啊！“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论述军队问题文章的精华有两点：

(一) 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象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对象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 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暴发了：人民在八月暴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〇”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的尝试。一月革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这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一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十几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呢？如前一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因而这个问题自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象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 六. 九月的转折

正在人们欢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彻底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危险的内容吧！一方面，由于“二月

镇反”的露骨，所以“红色”资本家阶级失利的必然性连他们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示出“热情”，他们纷纷亮相支持炮轰军区的革命群众，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这一手就容易地骗取人民的信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篡夺八月风暴的胜利果实是必然的这一客观规律，同时二月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匆促镇压和无产阶级的迅速反击使向“公社”过渡的中介时期——革委会的专政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而没有一个过渡时期来让骗取人民信任的“红色”资本家来镇压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实中认识到走资派是一个阶级，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那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要实现五·七指示实现军队变动的要求就要把野战军内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让野战军“支左”，实际上搞野战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没有开展野战军内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胜利是左倾盲动。

还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农村如果不来一个革命的风暴，那任何一种“夺权”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工厂办农场，农村办工厂就预示着在新的公社中工农、城乡差别要比现在小得多，而这种缩小就要发动农民运动，靠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来实现，在农民运动没有起来时就要求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也是空谈。在彻底胜利实际上不可能时，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彻底胜利”的叫喊的虚伪性。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大权在手的话，就必须利用权力禁止人们叫嚷，煽动“立即推翻革委会建立公社”，以免“公社”这一光辉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实的现象沾污。同时党内军内的资本主义官僚阶级在八、九月份开始大举向中央文革怠工和进行破坏，他们故意制造军队的混乱造成经济等方面的停滞。一个军队高于向中央文革的公开狂妄叫嚣，就是他们的八九月份的总方针，“中央文革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们就打起背包回乡去。”“中央文革把军队老干部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极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却而不至于退入坟墓时，同时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已得的成就，稳定资产阶级，不至于他们狗急跳墙，英明的统帅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不顾性急的革命者要求胜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后作了大幅度的退却，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治形势——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建立了，向公社过渡时期——革委会统治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开始了。

这次退却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来干部政策的无限放宽实际上是向走资派的一个大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陈再道的处理，主席甚至说他学习的好，可以出来工作。

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象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

革委会中的资产阶级要篡夺无产阶级在八月份的胜利果实由“群众专政”又重新变为官



僚主义统治首先就必须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工人阶级手中的枪支是使工人权力无限增大，对资产阶级致命威胁，并产生对工人掌握枪支的恐惧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发的对官僚们的篡夺胜利果实的仇恨，喊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交枪等于自杀！”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运动”。

八月的抢枪运动是伟大的，它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空前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文化革命前官僚们不敢把枪支真正交给人民，民兵不过是官僚控制武装力量的一种装饰物，它决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而是官僚手中驯服的工具。而抢枪运动，群众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从官僚手中夺取了枪支，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枪支，毛主席“武装左派”的令人兴奋的号召就是工人阶级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的下达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 七. 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八月份，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的要求。需要革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共产党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初期北京个别知识分子重建马列主义小组的空想第一次变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但是革命委员会是“罢官革命”的产物，湖南罢了张平化，刘子云的官，并没有消除新的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尖锐对立，而是新的形势革筹小组和省无联所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尖锐对立表现出来，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出现了。彻底稳定的“财产权力分配”并没有实现。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迂迴曲折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光罢几个人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的结果——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又实行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的地方就证明着这个教训。中国不能

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那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

而要使人民懂得这真理自己下决心来干，而不是我们替人民下这个决心“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实行各种改良主义的不彻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种万应灵丹行不通时，革命人民才会下决心走那条最痛苦的破坏性最大但也是最彻底的真正革命的路，革委会这一过渡时期的斗争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心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万应灵丹彻底抛掉幻想，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去丢菩萨。”革命人民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用自己铁的手腕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捏得粉碎。

九月份以来的斗争的阶段就是在这一点上教育着人民的新生的阶段。

由于斗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革命人民的思想成熟过程也进入了高级阶段，新思潮（被敌人骂成“极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等等道理，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政治思想武器，开始以新的状态在“极左派”中出现。在中国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革命人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斗争开始由自发进入自觉，从必然进入自由。

九月以来的斗争的高级阶段还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合同工，临时工的新的斗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想”来说，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吸收了这一部分坚决的革命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较深刻的了解，填补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矛盾极不了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出现的政党（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必然是为革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大的召开只不过是地方“革委会”这种过渡时期在中央的一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大”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就提到突出的地位来了。

①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可能性就成为革命能否迅速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象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发阶段，不平衡性对于革命的发展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样。

②真正要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触及到十七年怎么评价的问题，这也就是从根本上教育人民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是什么的大课题。

③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

这一系列新问题都由江青同志在1967年11月12日讲话中提出来了，江青同志这个讲话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重要讲话虽然讲的是文艺界，但“文艺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中国文艺界欣欣向荣，如火如荼的斗争就是中国革命将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前一段革命不论采取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问题，是搞庇护十七年的五十天的问题。是刚把资产阶级护身符搞了一下，真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开始，目前应该进入触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阶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革命政党）的指示和林付主席10·24指示具体的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要朝着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方向去，决不能朝着收场，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讲话当中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指明了伟大的11·12讲话，10·24指示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

对于江青同志伟大的11·12讲话中谈到的三个问题，我们以后将另外具体阐述（第三个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重新组合问题）。

10·24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

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 八. 驳反动的“二次革命论”

目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这个样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据变成“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陈独秀的反动的“二次革命”就应运而生。“二次革命论”用政权表面上的变动欺骗人们说“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掌了权，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只能等待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反动的思潮当时不但在全国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甚至在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官封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所规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尽管有貌似强大的二次革命风行一时，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更加猛烈和深入进行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矛盾所要规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如前几节所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否解决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积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的军队的变动，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的实现过，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革终于流产，社会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的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暴发的基本社会矛盾，既然没有解决，而是以新形式发展的越来越尖锐，因此虽然有貌似强大的反动的，“二次革命论”统治着思想界，用政权形式的表面变动欺骗群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发展，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篡权的资产阶级想以二次革命论腐蚀革命人民的反抗，谁支持他们统治的阴谋必然破产，正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救不了蒋家王朝的命一样，也如强大的宗教思想的统治不可阻挡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一样，新思潮（极左思潮）虽然目前还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败貌似强大的传统观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统治的政权形式，描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世界上完美无缺的东西，新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右派的猪狗们如今正是这样抽掉“革委会”

的临时二字，肉麻地吹捧，马列主义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会镇压革命人民的本质，必须大力宣扬中华人民公社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这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社会，必须大力宣扬革委会必然崩溃的趋势。

反动的“二次革命论”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陈伯达同志早就批驳过的“新阶段论”，“左派转化论”，有露骨的还原论和收场论，还有盛行一时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尾的谬论等等，江青 11·12 指示，林彪同志 10·24 指示就是对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以迎头痛击。有些人指责我们想一步达到共产主义，想立即消灭阶级和三大差别，说毛主席预见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空想，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

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们决不是想立即消灭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这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只能作为我们最高纲领，而不是最低纲领。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小三大差别，当然不可能消灭剥削阶级。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正是那种新的阶级变动又引起新的社会改革这样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正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而并不可能消灭新的剥削者产生的可能一样。

这样指责我们的人们无非是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社会不可能发生新的飞跃，财产和权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来点改变，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已经创造出的（尽管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和整个社会质的飞跃，不是早就把你们散布的灰色的取消主义论调撕得粉碎了吗？

由于无产阶级的干部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起来，革命人民还没有自然地产生具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因此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我们要把一切干部靠边站，说我们不要干部，这是由于目前不少人对官僚还存在幻想的原因。他们没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风暴的感性知识提高，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官僚，社会将要“崩溃”。我们确实认为 90% 的高干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从过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大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这个阶级而劝说他们放弃高薪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益，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无产阶级确实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大幅度退却，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表现，但是他们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断头台，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一个腐朽的阶级会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

但是必然随着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自然产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

上

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结果。

### 九. 驳“左”倾一次革命论

革命队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没有一次两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这种“左”倾的一次革命论。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少，他们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将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开导，革命还是要分阶段的，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也是阶段革命论者。

“左”倾一次革命论者没有提出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此，他实际是降低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使革命人民不能为完成这一阶段能实现的目标充满信心地去斗争，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须纠正。

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以毛泽东主义为伟大旗帜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下坡路，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伟大时代。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在这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伟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泻千里的时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许多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奇迹”！（陈伯达3·24）。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必定到来。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载《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第六章未完，下期待续）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三）·宋永毅·孙大进·

## 第六章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续）

### 我们的纲领

· 张玉纲 ·

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以苏修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及其他七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面对着现实的严重挑战，面对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的严重挑战。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以他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胆略接受了这场挑战，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发动了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列宁在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一样，毛主席在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

在新的历史阶段，衡量革命者的标准不仅仅是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当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二.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构成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其中极少数是自觉的，多数是不自觉的。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他们中多数觉悟了，是会跟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觉悟是一个痛苦，曲折的过程，这是世界观的彻底改造，必然地会有反复。极少数自觉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就是要推翻的特权阶层。

对于我们的国家机关，摘列宁的一段话是十分适用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认真的改变的旧的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而作为国家机关的主要组成部份的军队、监狱、法院、警察，则除了军队在六〇年后由林副统帅主持，基本上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外，长期被罗瑞卿盘踞的公检法已经完全烂掉了。

特权阶级的出现标志着部份的生产关系已经变质，虽然经济基础总的来看还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都基本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障碍作用，于是在中国已经进行的对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改造是不彻底的。对上层建筑的触动更少。因此，这次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开始。

三.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只是开始。

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所取得的最大成绩是群众的发动, 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

但是, 由于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利用他们仍然把持着的权力, 愚弄群众, 干扰毛泽东思想, 尤其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传播; 由于反动的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 很大一部份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还很不理解, 对特权阶层的反抗往往还停留在改变自己受压抑的地位上。

尽管在去年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但是批判局限于对个别人的罪恶的揭发, 而很少接触到反动路线产生的阶级根源和为反动路线服务的官僚机构。

尽管今年一月风暴揭开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序幕, 但是夺权却被理解为对个别人的罢官, 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 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 再加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幼稚, 政权仍然落在官僚们手中。夺权成了形式上的改良。

尽管今年五月以来全国各地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战争, 但是一般的只认为这是武斗, 而没有看到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 是大规模的政治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国内战争, 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夺取政权, 巩固政权所必须的暴力革命。

因此, 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只是使广大群众对文化革命有了感性的认识。运动总的来说还是处于自发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还远未完成, 万里长征, 刚走完第一步。

四. 林副统帅对湖南所作的十·二四指示, 江青同志对文艺界作的十一·十二指示展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

文艺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 十一·十二指示预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

江青同志指出了发展的不平衡, 因此文化大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 彻底的胜利。

林副统帅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首先取得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

应该指出, 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 基调是改良。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

我们必须认清这个转折, 跟上这个转折。

五. 湖南要彻底革命, 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



当今的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它也必须实行同样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人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

六. 机会主义思潮在转折关头表现出了它更大的危险性。在目前由退却向反攻的转折关头, 机会主义思潮瓦解革命队伍的斗志, 使反击成为分散的甚至不可能。

必须摆脱受机会主义思潮腐蚀的头头的束缚, 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必须肃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不肃清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就会肃清革命。

七. 在转折关头更表现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要把还处于自发阶段的运动提高到高级的阶段, 要实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希望,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就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 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就是革命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的开端。广大革命群众在生动的革命实践中学习, 理解、运用、掌握毛泽东思想, 终将揭穿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为维持他们的统治, 愚弄群众而对毛泽东思想作的歪曲, 终将抛开习惯势力的束缚, 把革命进行到底。

“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 那就是世界共产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给我们展示了这光辉的前景。

(作者当时为中南矿冶学院学生, 现为湖南科技出版社副总编辑)

□原载《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

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通过)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 这是一个将永远载入湖南文化革命斗争史册的光辉日子, 就在这一天, 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旗手毛主席来到长沙, 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号召我们在革命的原则下联合起来。

在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的号召下, 在这光辉的历史背景下, 《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于十月十一日正式宣告成立了。

《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作为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生事物,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的集体, 她出世就遭到了一切反动势力的猖狂围剿。

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正是在这场反动势力的空前围剿中显示出了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也正是在这场围剿中发展壮大。

今天，是我们向全省三千八百万人民公布我们的政治主张和战斗纲领的时候了。

## 1.大好形势与逆流

毛主席在巡视华北、中南、华东等地途中最科学、最深刻、最精辟地概括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份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形势大好，这是我们坚定不移，从不动摇的信念。

但是，我们所说的形势大好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大好。而决不是资产阶级老爷和他们的走狗所鼓吹的取消阶级斗争的“形势大好”。

我们不仅从正面，从革命群众的充份发动来分析形势大好，而且我们还从反面，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垂死挣扎（不论是在全国还是在湖南）来理解形势的大好。

当前，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一股自上而下的反极“左”的反革命逆流。使我们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必然覆灭更充满了信心。逆流的出现，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回光返照，“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一边高唱凯歌，一边迎接反扑。在二月逆流中我们是这样，在今天，还是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决不能因为形势大好而放松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拼死反扑的警惕性。

“谁要是只看见光明的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在大好形势面前，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 2.新的进军号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肯定了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的初步胜利。应该看到这个初步的胜利还是只是打乱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阵脚，湖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没有被摧毁，《决定》的发表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结束。而只是预示着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夺权斗争的开始。

林副统帅十月二十四日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作的指示是这场新的夺权斗争的进军号。

林副统帅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南的烂摊子大，三条黑线又粗又长，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

合，湖南还没有乱透。

林副统帅的指示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这个部署的核心就是湖南必须大乱，乱敌人，乱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丧钟敲响了。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和林副统帅十月二十四日的指示，划分了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不同的时期，贯穿其中的是一条不断革命的红线。

### 3.彻底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是推动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林副统帅 10·24 指示中指出的反革命三结合，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湖南旧省委没有被广大群众冲垮之前，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通过旧省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旧省委被冲垮之后，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利用省革筹的招牌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复辟资本主义。尽管省革筹这种三结合的形式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但是，内容才是事物的本质。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

彻底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是林副统帅给我们提出的战斗任务，新的夺权斗争就是夺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

由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炮制的长沙、株洲、邵阳等地的市革筹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司令部新的重要的据点，这些市革筹必须连同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起彻底摧毁。

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维护上台黑线人过关，他们把一些台下人物作牺牲品抛出来，欺骗群众，以转移斗争目标，把摧毁反革命三结合的革命斗争引向揪革命组织“坏头头”的错误方向上去，对于他们的诡计必须坚决戳穿，必须立即引导革命群众投入摧毁反革命三结合的革命风暴中，彻底埋葬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 4.所谓反极“左”的实质就是反革命

由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策动的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反极“左”运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所谓反极“左”的实质就是反革命，反极“左”运动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在革命阵营中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极“左”思潮，所谓批判极“左”思潮就是批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造反精神，就是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的灵魂。

所谓反极“左”运动，这是省革筹中黑线人物为了保护自己过关，维护他们已经窃取到手的政权，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新的镇压。

所谓反极“左”运动从对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过火的行为的无限上纲，横加指责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的歪曲和否定。

“反极左运动”控制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局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必须迅速批判这股“反极左”的反革命逆流。

#### 5.联合必须服从于革命原则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联合必须服从于革命原则。

放弃原则的“联合”，是迎合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胃口的杂烩，它必将断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拿原则去作交易，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背叛。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线人物为了掩护自己过关，为了使他们已经窃取到手的政权具有更加完善、更加合法的形式，他们收买了胡勇、叶东初这样一批工贼，利用大联合作幌子，取消革命原则，软硬兼施，用反革命的凑合代替革命的联合，吞并、瓦解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工代筹”的产生只不过是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计划中的一个部署。

对于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背叛革命充当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走狗的工贼，我们只有毫不留情地坚决揭露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也只能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其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革命联合，他必定在革命斗争中茁壮成长。

在反革命凑合“工代筹”的破旗前高高地树起《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革命大联合的大旗。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力量必将粉碎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计划。

#### 6.坚持文攻武卫的正确方针

在湖南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之后又出现了反革命武斗组织工联八·一九主义兵，八·一九主义兵的出世正象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的出世一样，标志着工联少数决策人及其后台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的失败。

挑起武斗，是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黑线人物穷途没落的一手。对付反革命武斗组织，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文攻武卫，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镇压他们的任何挑衅。

#### 7.肃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省革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交替使用镇压和收买的两种策略，并且在收买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机会主义思潮已在革命队伍中蔓延，成了一种危险的病症，湘江风雷总部一小撮叛徒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投降只是更加大规模的叛卖革命的序幕，革命阵营的分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深刻。

列宁曾经强调指出：“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在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想……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开展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毁灭性的进攻，为了获得对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胜利，必须看清受机会主义思潮严重腐蚀的头头，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 8.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胜利发展。

这场斗争仅仅是开始，更伟大的革命决战还在前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关键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出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敌人正以新的斗争策略和斗争形式来挽救他们的灭亡。斗争的形式在变更，但斗争的阶级内容丝毫也没有改变。

任何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乘胜追击，才能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紧跟最高统帅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 ∞ ∞ ∞ ∞ ∞ ∞ ∞ ∞

## 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我对知识青年运动还刚刚有一点接触，看了一些材料（能收集到的都看了）开了一些座谈会以及个别交谈，可以说还是个门外汉，知识青年的革命精神使我非常感动。调查中，知青运动的许多道理使每一个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力量，得到了巨大的鼓舞，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知识青年暴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使整个社会为之震动，一些反对知识青年运动或冷眼旁观的人，不得不重新来评价和注意知识青年运动了。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所有的人都将在他们面前受到考验，真正的彻底的革命派无不为之欢

呼，为他们的革命精神所鼓舞，为他们推波助澜，擂鼓助威，一切假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在他们面前撕去了他们的伪装。暴露了他们对这场文化革命的极端不理解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一切反革命眼见知识青年运动触动了他们的根本，他们暴跳如雷了，他们妄图镇压了。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地方发生革命暴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们强烈的普遍的感觉到，因此还不能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预示着农民革命的伟大风暴，知识青年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老爷们，你们的掘墓人的新的觉醒宣布你们的死期不远了。公开镇压，经济收买和改良主义都不可能阻止你们的死亡！

#### ◇新的觉醒

湖南的知识青年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发展过程。

文化革命初期知识青年受到的压迫是很大的，他们几乎只有所谓“自我革命”“互相揭发”的权力，他们的反抗也是最强烈的，是他们写出全县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他们很早就起来反工作组，湖南知识青年几乎全是造反派，所占总人数的比例比学生和工人都多。

一月革命风暴时，知青运动曾一度兴起，甚至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因为他们批判刘邓安置路线的斗争锋芒触痛了一些窃据中央的老爷，又因知识青年多是造反派，因此二月镇反时他们被反经济主义文件第三条和2·17通知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而惨遭镇压。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虽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低下，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觉悟还未提高，不少人还认为这是应该的，因此知青运动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今年八月风暴以前，知识青年和各地造反派并肩战斗，还未显露出知青运动尖锐的斗争锋芒，因此各界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知青作战勇敢、斗争坚决，造反派的头头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九月初知青中的少数勇敢分子开展了造户口反的斗争，同时“砸烂刘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旧教育制度的受害者”等等知青运动的道理在知青中迅速传播，随着这种以奇特速度和空前广泛的传播，知青运动很快进入了高级阶段，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他们“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了”，顺服的奴隶一旦打碎了套在他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就如火山暴发出强大的反抗精神。

湖南知识青年运动目前成为全国知青运动的一面旗帜和中南知青运动的中心。湖南关于知青运动的理论是较高和系统的，湖南知青报纸空前的多，他们的强大生命力超过了任何小报，因此湖南知青在社会上的舆论是强大的，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通过标语、报纸等多种形式在人民中迅速传播，甚至流传到外省，唤起其他地区知青的觉悟，由于有统一思想作指南，湖南的知识青年的观点又是空前的统一，造反精神也最强，几乎所有的知识青年都组织起来，团结在砸烂刘氏“上山下乡”的旗帜下，向旧世界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

#### ◇知识青年运动的伟大历史使命

知识青年运动集中暴露了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

知青运动的兴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社会的中上层走向了社会的低层，由城市走向了农村，知青运动第一次把农民变革社会的强烈要求反映到政治舞台上，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他们处在尖锐的三大差别的矛盾中，他们看到了极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剥削农村，脑力劳动者剥削体力劳动者，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过份悬殊，十七年来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和特权阶层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三大差别。农民对此是满腹牢骚的，不少人只想往城市里跑。他们要求在文化革命中对此来个变革，而知识青年反映了这种强烈要求。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农民革命的暴风雨。

知青运动的兴起最明显的暴露出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最实在的显示出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文化革命的引起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态”。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形成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刘少奇所代表的特权阶层，十七年就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加剧了阶级分化。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们刚下去是有雄心壮志的，也作了吃苦的精神准备，但是现实呢？插队的就是变为小私有者的前景，办农场的就是养不活自己的生活。最近揭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中甚至有把知识青年当农奴搞变相贩卖。知青阶层和特权阶层的怪胎——联动的那些少爷小姐是我们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最尖锐最鲜

明的对照，知识青年处在这种地位，他们对社会矛盾最了解，他们发现刘少奇正在把我们国家往资本主义拉，这种阶级分化现象不就是复辟的暴露吗？因此知青要求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这乃是文化大革命暴发的真正原因和直接目的。知青关于阶级分化的理论给那些散布文化革命是单搞意识形态，妄图否定毛主席在一月风暴中所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的家伙当头一棒。知青运动标志着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的思想将真正被群众掌握，预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进行，任务的真正完成。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地方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有些工厂是为新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有些农村，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林彪同志说我国没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而知识青年运动把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吃人的资本主义东西和本质揭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来了。那血泪斑斑的控诉暴露出来的不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十七年来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吗？

为什么插队知识青年养不活自己？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牵涉到目前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状况，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以及出现同工不同酬的剥削现象就是问题的症结。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除开那些想自己一个爬入社会上层或安于被奴役状况的奴才）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主义（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思想，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找出自己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的真正原因，你们才能自觉的投入彻底的革命，只有真正

的彻底的政治革命才能真正解放你们和贫下中农，工人。单纯的安置路线和单纯的知青问题是不行的，必须把毛泽东主义和知青运动相结合，把知青运动的理论提高一步，发展一步。革命的知识青年，你们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未来是属于你们和我们的，你们要看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决不仅仅是安置路线而是宣传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思想，完成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毛主席语录）

◇ “极左派”和知青运动（“极左派”指红中会、高校风雷等）

只因为知青要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因此他们就成了“极左派”的同志和战友。“极左派”的斗争锋芒是直指特权阶层，官僚机构及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极左派”是要求彻底革命的，知青也只有来一个较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真正解放自己，因此两股革命的潮流汇合了，这就是敌人把知青运动纳入“极左思潮”的原因吧！

然而“极左派”却与知青有很大的差别，每一场革命的爆发都有其经济上的原因，而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这些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几乎被一切“马列主义者”所遗忘了）说实在的，不少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很多并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了特权阶层的压迫剥削。不少是旧教育制度的宠儿，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敏感性，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知青运动面前暴露了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而知识青年呢？他们优点和工农相似，他们是自己生活不下去了，他们深受特权阶层、官僚机器、旧教育制度的压迫。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有对旧世界实行叛逆，坚决造反！“不是在沉默中暴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因此就决定了他们比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还要坚韧不拔和革命彻底。稍举两例就可看出这种差别。

学生中的逍遥派之多，难道是因为没有复课吗？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目前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出现了许多颓废、整天无所事事，逍遥，对文化革命不感兴趣以及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投降，叛卖的行为被当成革命的妥协而得不到惩罚。而只要你迈开你的双腿，到知识青年中走一走，只要你是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你就会感到从来未有的痛快和令人鼓舞。知青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是所有知识分子比不上的，八·一九时那种沸腾的场面随时都可以在知青中看到。

另外，人们可以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在知青中的传播是惊人的，知识分子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社会改革等问题往往单纯从时髦出发甚至是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和他们谈社会改革，谈文化革命引起的原因、特权阶层，他们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能接受，往往把毛泽东主义最激进的内容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而知识青年呢？他们是自己深受压迫剥削，为了求解放他们就要找理论，以明白根本原因。他们有一种真诚强烈的学习毛泽东主义的要求。即使是一个对理论毫不感兴趣的知识青年，和他谈起社会中的阶级分化，社会改革，他们也是津津乐道。因为毛泽东主义把他们经常接触到的东西提到了理性认识，正如他们所说，象一把钥匙打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从种种社会矛盾中惊醒。一个知识青年讲出了他们要求理论的朴实性：“你们谈的是从革命的原则出发，玩弄词句术语（指那些知识分子）的造反者，我们是从吃饭问题说起革命，讲哲学。”知青经济最困难，但他们办的报纸最多，每出一种新的能解释说明知青现状的新观点，不要一天可以马上传到每一个知青。因此你去走访知青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关于知青运动的论点几乎完全一样。在知青中理论变为蓬蓬勃勃的运动，这种飞跃更是屡见不鲜。如桂林知青九月份还在农场安于现状，几张长沙



知青的报纸到了那里，讲出了他们切身体会到又没有理解到的东西，他们立刻造反了，掀起了批判安置路线的运动。桂林知青告诉我，长沙知青的报纸在那里传来传去，大家抢着看，磨成了碎片还传着看。这些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动人情景，是那些住高楼吃白米过着舒适闲散生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也不可理解的。伟大的知青运动一定会放出灿烂的理论之花，思想之花。

知识分子中的极“左”派向何处去？是走颓废的道路，还是走象牙塔尖上的“革命”的道路（这是最终也会动摇以至叛卖革命），这是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到社会最底层去，到工农中去，到知识青年中去，而目前知青运动最突出地暴露了工农进行社会革命的要求。因此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知青运动相结合是当务之急。丢掉你的臭架子，抛弃一切剥削阶级成见，跑到知青中去，握着他们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仇恨些什么？要求些什么？和他们一起研究社会矛盾，真正在调查中掌握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革命的力量，才能使改革社会，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否则知识分子高谈的“革命”。“造反”将是在一种多么空虚的沙滩上啊！

目前有些知识分子逍遥得太空虚了，想搞点复课闹改良，复课闹复辟。他们应当明白，作为旧教育制度的宠儿的他们，是不可能懂得吃人的旧教育制度的全部罪恶的，是不可能懂得被旧教育制度吃掉的那些人的心情的，知青提出了一个论点，旧教育制度培养了一批特权阶层分子，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辩证法，同时造就了一批奴仆和剥削对象。他们有的被赶入社会的最低层，他们也是旧制度的掘墓人。这难道不是对旧教育制度本质的最深刻的揭露吗？我们的教育革命必须与工农和知青运动结合起来，才不至于走上改良主义甚至复辟的道路。复课不是把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学生扯在一起，搞一个和和气气的大杂烩，而是要把那些愿意革命的人召唤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 ◇糟得很和好的很

知识青年回城市造反，搅动了那班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造反派右翼，无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舆论的压迫，他们闭眼一想知青造户口反的“流氓”相，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知青运动的锋芒所向，乃是这次文化革命所必须摧毁的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乃是十几年刘少奇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拼命扩大的三大差别，乃是资产阶级旧教育制度，乃是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知青运动把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露骨地暴露出来了。许多长期在文化革命实践中积累的问题，可以通过分析知青运动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找到答案，人民对文化革命的理解将大大飞跃一步。这标志着革命人民掌握毛泽东主义的一个飞跃，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农民运动的暴风骤雨，一切真正献身于文化革命决心搞到底的人，对这样一个群众运动怎能不放声歌颂，虚心学习，和他们相结合，并肩战斗呢？

“糟得很派”明明是站在文化革命的对象——新生产阶级的利益方面，打击革命人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资产阶级老爷企图保存资产阶级的旧秩序，阻碍革命暴发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一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到知青中去走了一遍的人，你必定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痛快。千千万万的农奴摆脱了任人宰割，惟命是从的精神状况，他们向压在他们头上的种种吸血鬼，旧制度发动了猛烈的

进攻，革命知识青年的举动好得很！好的很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的同志须知，文化革命需要一个较彻底的社会革命，需要推垮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一切改朝换代，改良主义，结构改良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拥护革命的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

#### ◇所谓经济主义问题

革命都是有经济上的原因的，恩格斯说经济斗争到处发展为政治斗争。群众在推翻旧制度的初期提出经济要求决不是经济主义，而为了维护旧制度，用金钱来收买知青，妄图使他们停止斗争，这就是经济主义。目前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刘氏上山下乡运动，大讲什么“安排好知识青年的生活”，大搞经济收买，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经济主义。而广大知识青年呢？他们有明确的政治口号，他们所进行的是惊天动地，泣鬼神，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斗争。他们的经济条件比任何人都苦！但他们的革命斗争的热情比任何人都大，这是经济主义吗？

知识青年中也确实有败类，有些人对砸烂加剧阶级分化，复辟资本主义的安置路线不感兴趣，急于自己爬入上层社会，脱离知青阶层，他们这些人是想当新生的资产阶级份子，他们将成为知青的贵族。他们决不代表知青阶层的利益，决不代表知青运动的方向。相反知青的利益决定他们决不能妥协，决不能搞经济主义，经济主义将断送他们。

那些动用大批工厂资金的工贼，那些整天逍遥的知识分子，你们花费成十万数的国家资金却在那里贩卖机会主义，妄图使革命就此止步。你们在知青推动历史的革命运动面前指手划脚地咒骂经济主义不感到可耻吗？

#### ◇彻底打倒反动的血统论——痞子运动还是革命先锋

血统论为什么被文化革命的仇敌利用成为反动的理论，是当今许多用漂亮的批判血统论的言词继续贩卖血统论的说客文人所不愿回答和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干部子女在文化革命中暴露出的阻止历史前进的反动性比其他非劳动人民子女要厉害得多呢？什么是正确的

阶级分析法呢？是不是被某些人所认为的分析阶级出身就是真正正确的阶级分析法呢？不，阶级分析必须看人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文化革命的政治态度。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十几年来形成的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在中国的统治。对这场革命反抗最力的是新资产阶级其子女。而知青身受特权阶层扩大三大差别的迫害，他们处在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中，他们最了解社会，他们是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不错，他们有不少人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这就造成了他们革命时身上背了很多包袱。但这并不是事物的本质，本质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总不该被人遗忘吧！以前学校里所谓贯彻的阶级路线是培养新生资产阶级，使干部子女青云直上，这就是它的本质和总宗旨。所以以前学校并没有真正向工农开门，而是向高干子女开门，有的地方的团支部甚至干部子女夺工农子女的权，反动血统论是压在知青头上的一座山，必须推翻。知识青年决不是什么“狗崽子”，而是革命先锋。

#### ◇所谓宣扬社会黑暗面

毛主席就是为了党的腐败而担忧才发动了文化革命。看到我国社会的矛盾才能革命，才具有起码的当造反派的资格。保守派保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社会矛盾，或不愿看到这些矛盾尖锐化必将导致革命的暴发。而知青最懂得这些社会矛盾，最明白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这恰恰是他们的优点。恩格斯讲到巴黎公社的意义时说：“1864在全欧洲，即在群众中间，运动的理论性质还很模糊，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为工人党存在……连美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他们可以按照规章所陈述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大成就应该是破坏各派的幼稚……，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个成就。”前一段当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还不很明确时，我们和各种机会主义者也有一种幼稚的合作，而知青运动的大成就就是很不明显也是第一个打破了这种幼稚的合作，把各种假革命，反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知青运动使文化革命看到了新的希望。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毛主席说：“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的认识而定下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时节。历史以从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造反到底，我们黄金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拼命向前啊！

（注）补充一点——

知青的利益与贫下中农是一致的，农村中走资派的压迫剥削的花样（如在工分上玩的花招）都是对富裕农民有利而不利于贫下中农和知青的。知青对国内存在的变相剥削异常愤慨，他们的这种情绪也反映了贫下中农在农村中进行文化革命的要求。

知青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成了社会的对立面。”这句话反映了他们彻底革命的政治态度，他们决不满足于湘江风雷翻案这样的变迁（这在庸人眼里可以说是极大的变迁了），他们要求更伟大更彻底的社会变动。

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

∞∞∞∞∞∞∞∞∞∞∞

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世界东方兴起的二十年代就深刻地指出：“我觉得许多人讲改造，却都是一个空泛的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最终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研究的很少……，这几个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

我们今天参加了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天讲造反，天天讲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但却是一个空泛的目标，对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的完整的阶级分析，对于引起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这场革命肯定不能称为“文化革命”，暂用此名代称）的原因、性质和目的（即

这场革命的“底”等等), 这些问题有研究的很少。

为什么毛主席说：“连我提议的印小册子的意见全被否决……有时只我自己同意自己的意见。”为什么林副主席指出：“我们国家机器有很多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了就让它垮。”为什么江青同志说毛主席在中央确实是少数，为什么陈伯达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最新动态，为什么戚本禹说中央很高的负责人都说为中国的命运担忧而哭过？为什么中央里几个忠于毛主席的人对中国现状都估计得如此激进？对于中国十几年的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估计？

为什么各级党委都被摧垮？为什么揪出来那么多走资派？

为什么要搞一月夺权风暴？为什么党团员、干部在文化革命中不少趋于保守？为什么文化革命前的先进人物现在几乎都是钢杆保皇？如尉凤英、时传祥、张百发、夏菊花、刘考安、瞿太安。为什么一些敢于想问题，有头脑，敢于造反的人以前被视为调兵捣乱，如郭嘉宏，有的长期被拒之于党团员大门之外，如刘英俊等。为什么文化革命中揭发出来的事实简直与文化革命前一般人的认识相颠倒？为什么文化革命中造反派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为什么？为什么？

激进的造反派经过一年多的残酷斗争的实践头脑里堆砌着许多问题，找不着答案，很多人虽不自觉，但对理论研究的一种强烈要求产生了，滋长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纪元。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大叫人感到不满。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政权以后停滞了，甚至倒退了。在列宁逝世以后，思想界很不活跃，新东西很少，人们的思想感到几乎要僵化。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第一个打破了沉闷的空气。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第一个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没有结束，谁胜谁负并未解决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此后，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活跃。57年和58年，毛主席多次讲到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强调了反官僚主义。60年毛主席以他那无比的马列主义天才创造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类似既得利益集团。62年毛主席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强调了干群矛盾，指出中国搞得不好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非常反动的法西斯专政”。1964年毛主席指出：“现在的党内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并以他那深刻、准确、尖锐的见解第一次提出了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毛主席后来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号召地方向中央进攻。毛主席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伟大思想，象一小幽灵一样，徘徊于中国大地，从她一产生起就毫不畏惧地向一切反动思想界，向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发动了不可抗拒的猛烈的进攻。毛主席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伟大导师，他站在最前列，他的思想使中国的思想界又重新趋向于活跃。

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套理论，思想是崭新的，由于作为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她一掌握了群众，就必将致强敌于死命，因此国内外一切反动思潮，整个反动的思想界以及旧习惯势力结成了神圣同盟，对毛泽东主义发动了猖狂的围剿。尤其是在国内，毛泽东主义直接触

犯了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中国的特权阶层的根本利益，毛泽东主义遭到了更加残酷的围剿。联动叫嚣拥护60年以前的毛主席思想，（60年以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逐渐形成）就是这种对毛泽东主义刻骨仇恨的最好表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利用权力，把毛主席的最激进、最革命、最生动、最活泼、最本质的思想严密的封锁起来，只传出一些一般性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人们头脑里的旧习惯势力，对新思想的不理解，在十几年中千方百计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光辉的名称搞成为一个神像式的东西，千方百计地阉割和歪曲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灵魂。

尤其在今天，在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的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句口号在不少场合几乎变成了攻击毛泽东主义的挡箭牌，长保军正是喊着这句口号残酷地围剿毛泽东主义，长高司也是喊着这个口号可耻地背叛了毛泽东主义。如今工联一小撮修正主义头头也在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后边迅速地走向革命的对立面。

作为马列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的毛泽东主义，她关于中国的特权阶层的论述，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论述，都是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过，因此理解的人很少的。不少人一听毛主席讲“可能会变成法西斯党”，就想不通。地富反坏右还能来掌权吗？他们不知道地富反坏右没有了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资本，但是在政权内部掌权人中却出了修正主义集团，他们会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法西斯党啊！毛主席说：“我们一套在中国不灵了”（毛主席的一套贯彻不下去了！）有人一听就跳起来，“十七年的成绩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有人立刻大叫，这是否定共产党，……。

对于毛泽东主义，对于在中国大地上暴发的这场伟大革命，人们是多么不理解呵！不仅是保守派，造反派也不见得很理解。不少造反派虽然参加了这场革命，但是对于这场革命也有不少的人很不理解（正如很多工农刚参加民主革命时对于民主革命的纲领，性质，对象，动力等并不了解一样）。不少人口里喊毛泽东思想万岁，而实际上对主席的思想根本接受不了，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他们也发生过动摇。目前革命出现的曲折使“极左派”中产生的思想混乱状况，不就很说明问题吗？可以断定在今天的中国，真正的而不是抽象的信仰毛泽东主义（真正接受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思想）的人，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是很少的。

不少人都这么想：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报纸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必去研究。结果很少人象毛主席刚参加革命那样，敢于想，敢于提出新的社会革命的思想。毛主席认为建党初期，我党是很活跃的，而解放“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由于上述的旧习惯的顽抗，目前很少有人象建党初期那样形成对于政治变革的主张的讨论风气，很少有人提出新思潮和进行社会改革的独特见解；中国的思想界目前还不够活跃。不可否认很多报纸上的社论和编辑部文章提出的理论已不够用。如“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一篇思想性很强的文章，给人启发很大。但它是从理论到理论，从刘少奇的词句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没有讲出刘少奇猖狂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没有具体分析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有哪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产生了发展了。有哪些刘少奇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发展了产生了。红旗杂志的社论是较高级的。它提过一个重要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讲到为什么时，它只说了地富没有资本，但如果问到党内产生走资派的条件，原因，社会基础，却没有很成熟的看法。很多地方都可以遇到这种社论不够用，甚至束缚思想发展情况，需要用触及本质问题的理论——毛泽东主义

直接武装群众。

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思想界比较活跃，但有人写《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重建马列主义小组》《废除官僚机构》及批判现存国家机器，分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文章，就立即遭到了疯狂的围剿。今年四月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北京的中学四三派有几个激进分子根据这一思想写了篇《论新思潮》也被一片批判反动思潮的叫声所淹没。可见毛泽东主义这种新思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和思想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思想界有一种压抑感觉，从另一个问题上也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为什么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可能存在呢？在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中国，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列宁在讲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条件时指出：“布尔什维克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思潮和政治派别。”文化革命前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而毛泽东主义这种独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派别还未在群众中形成，所以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目前还不能存在。

而毛主席教导我们：“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有革命群众掌握了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主义，革命群众才能产生出自己的先锋队——革命政党，也只有在这时，革命人民才能完全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前段文化革命就是连造反派中最激进分子也很少接受了毛泽东主义，没有认识到政治大革命暴发的原因是中国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向”，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没有认清这场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最终目的。群众基本上是自发的，是中央文革下个指示才能前进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扶着我们，把着手前进的，我们还不自觉，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全国廿十多个省市前一段只有革命群众组织，没有革命政党。“而没有革命的政党，革命是不能搞彻底，不能深入。”毛主席的伟大声音：“形势大好的标志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意味着群众运动由自发进入自觉的伟大转折，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群众发动的很充份，一家人在一起也讨论国家大事，毛主席为什么那时不讲这句话呢？因为那时革命群众中的先锋分子政治思想上还不成熟，而现在经过一年多的斗争革命人民不但广泛地发动起来了，而且还逐渐锻炼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分子逐渐成熟，由自发到自觉，陈伯达同志说：“现在是思想阵地。理论上，作为阵地，落后于运动的形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落后得太远了，因为理论是经验的总结，总是由实际问题提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开出灿烂的花，理论的花。”

这一切都说明在当前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说明了建立毛泽东主义的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必要性。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动了，且开大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接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当前最切最要的问题，即是毛泽东主义小组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过的惊心动魄的路

程教育了千千万万的群众。尤其是一月风暴那扭转乾坤的伟大场面，八月风暴空前残酷的斗争和出于常人意料的变动，更是使新思潮越来越喷薄欲出。毛主席在解放以后把被万把大锁锁住的一系列最精辟的讲话的印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思想的传播更是最好的条件。中国各地出现了那么些激进分子，不但出现了那么些不信邪的激进分子，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好文章（这些文章根本未收齐），这些激进分子虽是极少数，但思想越来越完整。特别是由于毛主席的引导（主席今年提出“财产权力再分配”的理论给了激进分子强大武器）激进分子逐渐趋向于形成独立的政治思潮和派别了，这些都说明了目前成立毛泽东主义小组具备了一定条件。

一切决心献身于这场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革命战士，一切有研究政治的决心真正信仰毛泽东主义、趋向、新思潮和立志改革的激进分子。一切忠于毛泽东主义，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关心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注重于社会调查的实干家！一切善于学习，敢于想，敢独立思考的人，组织起来，建立毛泽东主义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

推翻中国的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纲领，我们为施行这个纲领而奋斗，以推动我国向共产主义迈进，实现我们的最高纲领。（关于实现目前纲领和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必须要写文章，深入阐述这场革命起码要五年到十年）

改造中国和世界——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毛泽东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最高的信仰！

与工农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猛地投入实际斗争并起先锋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作风！

对于毛泽东主义的真正学习，对于政治的彻底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真调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一九六七年十月）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

（第六章完，待续：第七章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四）·宋永毅·孙大进·

第七章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

武汉“北、决、扬”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引人注目的“反革命地下组织”或“五·一六式的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众多的异端“新思潮”里，其重要性大概可以从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直接下达的《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里反窥而见：

“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

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1〕

“北、决、扬”的全称是“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它不过是一个人数不过千把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读书会组织，却引来了中共中央一级的声色俱厉的指责。然而，按文革时双重内涵的官方语言系统，倒是可以从这一文件的字里行间破译出以下几点真实的罪名：1.“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决、扬”是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政见者，而且其观点直涉中共的整个体制）；2.“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他们的不同政见是系统化的，多方面的）；3.“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他们虽是群众组织一员，但在群众中已有一定影响，他们的思想倾向，已和文革中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有天然联系）。作这一如是观，应当说中共中央文件对“北、决、扬”还是作了大致不差的概括。

在“北”、“决”、“扬”三个组织中，“北斗星学会”是成立最早的。1967年1月7日，这一截然不同于文革中多如牛毛的“总部”、“司令部”，“兵团”之类的名称，而用“学会”命名的团体在武汉正式成立，其精神领袖为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与冯天艾。出席开幕式的不到一百人中，竟有1957年被定为“右派”的“老右派分子”，后成为不同政见作家的白桦。从《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群青年学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独立思考的渴望与实践。《宣言》既抨击了“搞什么鸡血疗法”的逍遥派，又针砭了当时已迷恋于权力，“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司令”、“佛爷”（掌权者与造反派）。《宣言》表示，他们要做的是“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2〕，换句话说，他们要在官方报刊社论外自己读书学习，寻找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手段、方法的答案。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及其中共中央需要与要求于青年学生的，无非是亦步亦趋的紧跟。当《宣言》无论在思想上和语言上都表示出某种鲜明的独立性时，它实际上表现出了对当时正统意识形态的某种离心、反叛与挑战。这一读书会性质的组织不久便被当时湖北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曾思玉与刘丰敏感地公开指责为“一个奇怪的组织”，并在无形中迫使它解散。〔3〕

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并没有在初次尝试的挫折前灰下心来，1967年底至1968年初被当作反面典型批判而闻名全国的湖南“省无联”的纲领给了他们极大的心灵震撼。结合马列著作的学习，他们越来越认为中国应当建立一个“北京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公社”式的新社会。1967年12月10日，鲁礼安又成立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从字面上看，它取名于当时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一条最新指示，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它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但从它所表示的思想追求来看，这一革命的“底”在何处，已成了他们独立思考，上下求索的对象。“决派”的组织除了已有数千人登记外，更重要的是它已团结起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共同思考中国社会与革命的众多问题。另外，他们创办了他们自己的理论刊物《扬子江评论》，在上面发表他们共同探索的理论成果——一个



颇具规模的文革不同政见者流派在武汉正式登场了。

“北、决、扬”的不同政见首先集中在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上。他们认为：在一月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并且是“直至今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因而他们宣布：“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放到了‘决派’肩上。”〔4〕什么是他们要建立的新政体呢？那就是“公社”，类似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来建立这一新政体呢？“决派”主张“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5〕“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6〕“北、决、扬”的不同政见还表现在对中国社会政治与阶级状况的分析中。与“省无联”一样，他们认为十七年来中国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一阶级”。〔7〕更深一步，他们还认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一批右倾机会主义者组成的“中派”或“考茨基派”——在中央，则是以1967年开始转而批极“左”，迫害造反派的文革派首要人物康生、张春桥及周恩来等。“北、决、扬”断言：“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中心任务。”〔8〕与他们异常激进的阶级、路线分析相反，在对待中共及保守派历来重视的干部与群众的“历史问题”上，“北、决、扬”却表现出了特有的宽容和理智。早在1967年5月20日，鲁礼安、冯天艾便以“红司新华工敢死队”的名义贴出一张题名为《“大抓叛徒网，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的大字报，文章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现在又能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即使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历史，基本上仍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没有理由在今天把他们仍称为变节自首分子，硬将他们塞进‘叛徒网’之列。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打击革命干部，就是挑拨干部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9〕这一段文字写在毛泽东及文革派正利用“抓叛徒网”把政敌刘少奇等另一大批党内干部彻底打倒之际，不啻是一声空谷足音。

与上述分析相随的是，“北、决、扬”认为中国共产党已“面临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而“决派”——“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10〕换句话说，鲁礼安等人准备建立新的政党取代已经腐化的中国共产党。另外，鲁礼安等人还按照马克思关于“废除常规军”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论述，要求消灭人民解放军，代之以人民武装。“北、决、扬”这一自视为“造反派中先进分子”的认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中有更为完整的阐释。该文认为文革中所有派别可分为六种：极右势力、保守派、革命造反派、中派——考茨基派、形左实右派、决派。作者认为，一般造反派与决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般造反派不仅普遍漠视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而且也很少认识到他们的敌人已形成了阶级这个简单的事实。他们认为‘文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除某个走资派，所以不去反对革委会。相反，他们在革委会相互争权夺利。‘决派’却不一样，他们完全理解，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就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紧张化决定了进行彻底社会变革的必要。这就要求推翻新型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重新分配财产和权力，建立新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社。”〔11〕

或许是由于毛泽东本人“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斗争策略的影响，“

北、决、扬”对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抱以极大的希望。鲁礼安在1967年底的〈决派宣言〉里宣告“决派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12〕与此同时，他还非常赞同农民造反组织“浠水县巴河区第一司令部”的“新农村”的社会实践。这一社会实践搞“耕牛集中、牲猪集中、匠人集中等强化集体经济的工作”，“办合作社，搞综合厂”，甚至“拆除了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起了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13〕这一实践，是有点类似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组织，显然是一种农民乌托邦，鲁礼安却大加赞赏。

由于“北、决、扬”对湖北省革委会权威的公开挑战，鲁礼安，冯天艾于1968年被先后逮捕。但“北、决、扬”的伙伴们仍没有就此止步。1969年5月的“反复旧”运动中，“北、决、扬”成员萧务农创办了一个叫《百舸争流》的刊物，又把被打垮的《扬子江评论》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这些年轻人又为武汉的造反工人群众制定了纲领式的东西，基本思想是使“工代会”和同级革委会平起平坐，并使后者服从前者的监督。这一提议“成了造反派的口号，这表明《扬子江评论》的‘新思潮’正在造反派心中扎根”。如同武汉文革史的研究者后来评介：“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建议。集中和统一一直被看成共产党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石。而且，在经历了两年半的‘文革’动乱之后，毛又强调自上而下重建集中和统一制度的必要性。但这个根本原则现在遇到了挑战，而且，另一个原则——分权与制衡——提出来了。如果实行这样的原则，整个中国政治体制都会从根本上被动摇，甚至毛的绝对权威也可能成问题。”〔14〕正是在这一“星火燎原”之势下，中共中央《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下达了，大镇压开始了。

综上所述，“北、决、扬”的思想体系其实是一种激进的造反派思潮，但它又不过是原本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展与运用而已。此外，关于文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政体，以及对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加以盲目吹捧的理论，更源出于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要把他们视为大敌加以剿杀呢？当“北、决、扬”等人依据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要彻底推翻“革委会”，推翻并重建腐化了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正是毛泽东及其文革派（以及中共的任何一派）赖以建立他们权力与统治的基础。在“权力”与“思想”二者之间，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是永远毫不犹豫地采取前者而抛弃后者的。当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认识到这些年轻人有可能在武汉造反群众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全部投入了牢房，并加以无情的镇压，以免他们的绝对权威在民众中受到更大的挑战。青年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当年以“读书会”（新民学会），建党建军之路而取别人的天下，老年毛泽东们对于任何这一同类性质的组织、道路自然也特别敏感，一旦有任何年青人不愿充当中央顺服工具，执着于独立思考，并妄图延着他青年时期的道路走下去而取（他的）天下，他自然不会赞赏而是格杀勿论了。这一天机，恐怕也是当年执迷不悟于“走毛泽东道路”的激进的青年人无法洞悉的。

#### 注解

〔1〕转引自王绍光《理性与疯狂》，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7—238页。〔2〕〈北斗星学会宣言〉，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3〕同注〔1〕，第211页。〔4〕〈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1968年1月25日）。〔5〕〈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原载武汉《扬子江评论》第十期（1968年6月12日）。〔6〕同注〔4〕。〔7〕同注〔5〕。〔8〕〈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原载武汉《扬子江评论》，第十一、十二期合刊（1968年6月

20日)。〔9〕载上海市委写作班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1970年2月）。〔10〕同注〔5〕。〔11〕同注〔1〕，第217页。〔12〕〈决派宣言〉，1967年12月10日。〔13〕鲁礼安〈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67年12月30日）。〔14〕同注〔1〕，第235页。

∞ ∞ ∞ ∞ ∞ ∞ ∞ ∞ ∞ ∞ ∞

## 北斗星学会宣言

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千百年自然界运动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隐，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更有人结集在一起，奋勇地前进，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

学者们写史，十有八九无血无肉，不是历史创造者的呼声，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名家，是黄鹤楼的秀才，不象长江水里的弄潮儿，懂得波涛是如何汹涌，浪潮是怎样澎湃，回流是何等险恶。一个普通的工人，巴黎公社社员笔下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就远远胜过了好多历史学家关于公社的论述，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总结它，如何承受它，难道还需要等着那些黄鹤楼上看帆船的大人先生去进行，而不是由我们这些多少在运动的泥巴里滚了半天的毛小子和工人同志一道来完成吗？

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至于北斗，乃宇宙间七颗排列似斗的星星，在奴隶的歌中的象征，只有全人类最伟大最天才的舵手毛主席诞生在世上，人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北斗才被赋予最新最美的时代内容。我们的学会取名于此，就是要求永远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把紧航向，北斗北斗，未来的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是谁主沉浮！

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将严格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脏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伟大的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

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力量。巴黎公社社员喊得多么好啊：“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炉火，你燃烧吧，铁锤，举起来吧，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唱起国际歌，决然地抛掉派性、私心的束缚，到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集合，向旧世界发动狂飙般的进攻。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 ∞ ∞ ∞ ∞ ∞ ∞ ∞ ∞

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摘要）

· 鲁礼安 ·

过去时期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都是对农民运动的一个发动。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是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正以无限的生命力磅礴于全中国。不仅在浠水，而且在麻城、广济、当阳，更远一点，湖南、江西、福建、延边、广西等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据我们所知农民运动都在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日报》社论说：群众运动的动向，决定事物的本质，各地农民运动的兴起，决定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狂风暴雨不可避免地到来。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最后走向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我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的这一一般规律，毕竟全部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巴河一司进城占驻红旗大楼，封了《湖北日报》，因为革联会《湖北日报》九·六社论压巴河一司，革联进攻巴河死亡六人，抬尸游行。]

是仍然依照第三个五年计划那样按“调整政策”在慢慢推动农业的发展，还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一个五八年似的大的革命热潮向二级甚至一级所有制进军。贫下中农迫切地希望着后者……在巴河五州地区，技匠集中，办合作社，搞综合厂，是群众早有的愿望。历来因为公社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阻挠而不能成功。五州总部成立后，立即拨款八百多元，加上匠人自动筹款共一千多元，建成了一栋房子，匠人集中管理，深受当地贫下中农欢迎。巴河组织了“文攻武卫团”。巴河一司五州总部的一张布告说：“当此决战紧张阶段，凡是在巴河五州境内从事阴谋破坏，肆意捣乱，勾引煽动，武斗暗杀等破坏中共中央六六通令的行为，经当地人民告发，就地查处，一经证实，严惩不贷。”

随着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步一步的深入，“文攻武卫”应该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提出来。历史将证明离开了“文攻武卫”，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离开了“文攻武卫”农村运动决无彻底胜利的可能。

“新农村”拆除了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起了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而且首先照顾了最困难的贫下中农，深受贫下中农欢迎。那么富农呢？我见到这一个富农，他无可奈何地

说：“我原先的房子又大又宽，如今搬到这里，好，好个屁。”公社的一个干部的家属则向我们诉苦，“我们去年才建的新砖瓦房子，就保不住了，他们折合再多钱我也不走。”我们看了这家既得利益者的瓦房，实在阔气得与众不同，如今坛坛罐罐就要打破了，他们怎么会不痛心呢？当地的贫下中农则高兴地对我们说：“社会主义道路人人都要走的，不过我们先走了一步。”

“先走了一步”。五洲总部成立之后搞起耕牛集中，牲猪集中，匠人集中等强化集体经济的工作便是一个明证。牲猪集中时，社员利用农闲时间，捡石头，买少量水泥，大修猪栏。贫下中农交猪给生产队集中喂养，立即付钱，而对地富则分批付给。少数比较宽裕的落后群众和干部害怕家庭负担受影响而反对。后来的保守组织“雄鹰”总部和五洲总部的分裂，最后就是在三集中这个问题上开始的。

“新农村”，小队并大队实行三集中，农民们的反映是不一样的。他们说：“贫下中农拥护，中农跟着跑，富裕农民反对，干部都跑光了。”何等分明的阶级阵线。

[武汉十七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巴河一司。12月24日又围攻进驻红旗大楼的巴河一司。]

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67年12月30日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为捍卫5.16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摘要)

• 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 •

我们把那些在文革初期，以中派的面目出现，而终于在革命进入了第五个回合时沦为右派的先生们，称为考茨基派……如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余秋里。

他们无视从中央到地方所存在的右倾分裂的严重实质，而荒唐地提出什么观点不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他们还将右倾投降主义笼统地解释为“只保不批”，而首先给人一个对走资派立足于保的概念，他们当中有一员大将，4月4日跳出来说“批判极‘左’思潮不力，也是右倾保守主义”。

[考茨基派的]大棒之一曰：论派性的反动性。……上海有家“权威报纸”则在这场反派性的比赛中成为了伟哉一世的英雄。……根本否认各个派别，各种派性，其实都是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它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极力鼓吹派性均是超越阶级性，无原则性的。

大棒之二曰：无条件实现大联合。毛主席指出“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可是上海有家报纸却公然删去了“在革命的原则下”这个极其根本的前提，而代之以“无条件”三字……什么无条件联合，就是向资产阶级保皇派投降，就是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条件倒旗散伙。

大棒之三曰：“现在的斗争只有公与私的斗争，没有什么革与保的斗争了”……最近这么一个要为刘邓翻案，要为二月逆流申辩的不大不小的反党集团跳了出来，不是给“革和保不存在了”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了吗？

毛主席说“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考茨基]的几种奇谈怪论：“批右可以，批极左也可以。”“批右时，如果‘左’的又跑出来了，‘左’的也一齐除。”“批右时，不要忘记了反左。”“批右要大胆谨慎，要对症，要系统批判，允许核实，领导批判。”

有人（张春桥）说为了避免在某地引起误会，《北京日报》一篇“打倒右倾保守主义”的社论万万不能在当地报纸上转载，有人转载了，便是典型的“右倾分裂主义”……原来社论中指出了“有些人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跳出来为二月反革命逆流翻案。”而此地正是批判极“左”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仅仅在一所大学里就抓出了具有极“左”思潮的“右派学生”两千余名。

我们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继续引申：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路上的障碍。……”这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战争观。

毛主席最近又告诉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国内战争的继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的事实已经，而且正在继续证明着“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这一铁的法则。

革命人民是从太惨痛的教训中才认识到这个真理的。

庸夫俗子们不懂得这一点，或者是不愿意懂得这一点。它们只知道喊叫：文斗，文斗，而不知道“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是指我们大权在手时批判和斗争党内走资派时应取的方法，一旦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时候就是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战争来对付反革命的战争。

这时候宣扬“放下武器”就是对革命人民犯罪。否定国内战争并不能欺骗资产阶级，只能麻痹无产阶级，使它们遭受突如其来的牺牲。

彭勋5月9日在新华工作了一个内部报告，提出：一曰武汉批极左不力，留下了后遗症，现在应该补补火了。二曰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斗争王任重、陈再道、钟汉华的高潮。

王任重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那些和王任重勾勾搭搭的“左派”例如赵文成先生（新华工）；陈再道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那些在革命低潮时和“陈司令员”拉拉扯扯的“左派”精华；刘少奇我们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工

人运动内部的维护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家。无论他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也无论他的职位多高，权力多大。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潮流，冲破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革命收场了的幻想。去年九月至十月的联合高潮，在我们看来，不是革命运动的终点，而是这个运动的起点……运动中的一些政治派别也会急剧而尖锐地分化开来“直至它们跟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而无产阶级会在一系列搏斗中相继博得各个阵地为止。”（马克思语）在这中间保守派们将迅速地倒向机会主义派别或者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的政治派别里面，来向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作战，我们几乎用不着担心它们会愚蠢地独自树旗。

□原载《扬子江评论》总第八期，1968年5月16日

∞∞∞∞∞∞∞∞∞∞∞

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摘要）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的党。

要革命么，必须要有革命党。

从共产党宣言至今的一百多年斗争中，有过许多革命党。

随着革命的推移，党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第二国际在大战中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了。列宁缔造了新的党——布尔什维克。

苏联出现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又使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共产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中国的这一场空前的阶级斗争中，同样也暴露了许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分裂。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变成社会民主党，有的则更成为法西斯党。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面临着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

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随着这样一支队伍的形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才有可能获得最后胜利。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的一批“中派”。经过批判，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可以站过来，另一部分人，必定会最后走上向党闹分裂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革命阵营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中央内部“宗派”的社会基础。

在向党内中派先生作斗争的同时，总要批判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只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取得绝对胜利，只有最后撕下那些顽固至死的中派先生的画皮，第五个回合斗争才可能获得胜利。

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

毛主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写到：“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要生存，就反抗。当革命者也拿起武器的时候，战争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谁敢否认67年出现了国内战争的事实呢？谁敢断言一旦中派里的顽固分子与党最后分裂时，他们不会挑起战争呢？

希望和和平取得全面胜利的思想，实在是有点靠不住的。不应当否认一切战争。要从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权夺过来并巩固下去，没有武力和武力后盾是不可能的。

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期，1968年6月12日

∞∞∞∞∞∞∞∞∞∞∞∞

决派宣言（摘要）

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

毛主席最近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它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这是革命派通过“斗私批修”，从造反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产物。决派，这是一个牢记着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它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的教导的勇敢的大军。在这个的最后分界线上，一切犹豫的，徘徊的，被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拖累得精疲力竭了的人决不能与决派同伍而分道扬镳。决派这是要同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代新人。……

决派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运动，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地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脏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1967年2月10日

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摘要）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消灭两大派的对立，它只不过是用新的两大派别压完全不同于过去钢新斗争的崭新的矛盾，用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取（革命群众组织）而代之的是革命委员会。

但是，与其说是这种革命委员会，不如说取而代之的是以革命委员会中某些人为代表的强势力，与另一支崛起的新军的斗争。

革命委员会又不过是一个各派派性大力被压的一个暂时同一体，更何况是这样一个暂时同一体也是极不巩固的，……这样的各派政治势力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决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而必须由一派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

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

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被放到了“决派”肩上。

直至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决派所摧毁。

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从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正式的国家机器，将采取什么样的道路。

一种人的主张是“和平过渡”，这就是说，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之时，便是革命委员会过渡成为正式权力机构之日，在这时期至多只会发生革命委员会中个别领导人的

成员的变动或撤换。

我们的看法完全和上述相反，而认为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地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

“决派”则将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得到锻炼，上升为统治集团。

无论是哈尔滨的“炮轰派”，还是贵州的“四一一”，他们对临时权力机构的斗争，不管是否意识到了，都是在为完成“决派”的历史使命在进行英勇的尝试。

我们分析工人中造反最早的也多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现在他们多半掌了权。在他们面前也有一个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取得工人阶级的代表的资格的过程。否则一定会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而那些曾经一时受过蒙蔽的工农群众，一经改正，可以很快地成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说我们在宣扬“左派转化论”，我们承认这条罪状。

以“赤总工二司”、“民办工人”等为代表的临时工、合同工，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英勇斗争，很大程度是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出发，为维护并且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而奋斗，这一大阶层被空前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卷进了运动。他们最希望革命越彻底越好，因此留念他们在运动中结成的团体……这中间有相当一批人会参加决派的队伍。

1968年1月25日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摘要）

◇极右势力

北京的“联动”，武汉的“特动”，广州的“主义兵”等，他们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社会上的反映。是他们父母的畸形的病态的再现。

◇保守派

人们曾简单的用“受蒙蔽”来解释保守派的出现，其实……保守派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许多（当然不是一切）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都一次次地落进保守行动。他们不可能都是党内走资派招降纳叛拉进革命阵营的异己分子，不可能都是走资派盗名窃誉树起来的假标兵。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对我们党的组织建设的影响是他们站错队的根本原因。一旦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模范劳动的奖励变成了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特殊政治待遇，一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增加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的义务，而是

取得了从入学，提级，升任领导到安排小家庭的机会，则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几千年的私有观念必然会腐蚀这批同志，使他们与劳动群众日渐疏远，日渐脱离。难怪毛主席在1959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党内走资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他们不闻不问；两者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他们毫无切肤之感，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生出对党内走资派的憎恨和反抗呢？他们政治上的保守情绪正迎合走资派的需要，他们不那么正当的入党，进步等要求，非常容易被走资派利用来镇压革命群众。

保守派中的工人以年龄论，老工人居多；以行业论，铁道、金融、重工业、军事工业工人居多；以企业论，大型厂矿工人居多，……他们安于现在的地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满现状，继续造反的举动非常不满，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想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旧秩序，而不是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

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保守组织的表征是保党内走资派。实质上，它保的不单是个别人物，更重要的是保旧秩序，更确切些说，是保旧秩序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保一条可以由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的反动路线。保守派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是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它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可以调动的力量，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武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保守组织维持原来形态也能扭转大方向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例。……保守组织成员大部分仍然是工人，是劳动人民，这一点，并不影响保守组织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实质。列宁写过“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哪一种阶级斗争是先进阶级的一部分不站在反动派方面的……部分落后工人必然会在比较不长的时间内帮助资产阶级。”

#### ◇革命造反派

相当一段时期，革命造反派的斗争还停留在自发阶段，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逼上梁山的。党内走资派的镇压，不啻是为渊驱鱼。

……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等待每一个战士全认清了革命的终极目的和全部进程后再爆发，更何况文革所要完成的任务，自马克思诞生以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未曾提供过成功的经验，毛主席近几年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又被走资派严加封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革命造反派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无异于要求无产阶级在无所作为中束手待毙。

有两个现象使革命造反派成员复杂化：一批民主革命时期仅仅是团结对象的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解放后政治经济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逐渐与工人阶级一致，他们投入了革命造反派的行列。在自发阶段上聚集，组织和发展起来的革命造反派，虽然按其实质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一翼，但它的组织与其说是单纯的阶级组织，毋宁说是以工人阶级左派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阶层、个人的联盟。另一方面任何一个造反派都很难杜绝狡猾的阶级敌人、变色龙及小爬虫混进来。

革命造反派没有自觉地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标准建立、发展自己的队伍，这给后来的整党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旧的党组织瘫痪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导，政策，方针只能具体地由在组织的严密、步伐的整齐等方面都较革命政党相形见绌的群众组织来贯彻实施，这就大大延缓了革命群众提高觉悟的过程，而且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出现的革命队伍的分化，落伍者的被抛弃，与机会主义派别的决裂等现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得更加频繁和明显。

[湘江风雷、首都三司、武汉三钢是造反派代表。]

#### ◇中派——考茨基派

武汉的新派，北京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右翼，湖南“学司”，河南“河造总”，四川“红成”“八一五”。

中派——考茨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不大不小的集团。它惯用的手法是，借口在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有过火行动，就来取消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并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之。

……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的中心任务。

#### ◇形左实右派

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三个司令部”的五·一六。

受极“左”思潮影响和俘虏过的造反派，多是劣根性远未涤尽，要革命而不会革命的青年。他们不能象工人阶级那样忍受住“二月逆流”带来的暂时挫折，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激起了他们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急躁情绪和报复心理。事实上，他们发烧的头脑已经失去了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对人民群众的信任，将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一场丧失理智的赌博。

####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字报把革命隐藏着的各种矛盾清晰地暴露出来了：从走资派的腐化淫逸到旧公检法的黑材料，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到扼杀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奴隶主义……所有这些，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场巨大的革命震动是有强烈的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的。矛盾没有解决之前，革命绝不可能人为地煞车。

如果说他们开始还不完全理解毛主席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的重大意义，那么在付出巨大代价积累了无数经验后，他们开始懂得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林彪）的真理。因此如同《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些系统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这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必然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它必然经过一级级的阶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来了政权，迎来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意味着革命的真正开始。这个“必须的，非常重要的”临时权力机构，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造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红旗67年第三期社论）这是时代的任务。

最近毛主席精辟地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这就为由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过渡到公社指明了具体途径。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展现了革命人民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的宏伟蓝图，公社必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的最最惊人而又合乎规律的奇绩。

□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一、十二期合刊，1968年6月20日

（第七章完，待续：第八章清华四·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五）

·宋永毅·孙大进·

第八章清华四·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

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以后，造反派又在全国较为普遍地分裂成两派：温和派与激进派。在河南，有“河南造总”和“二七公社”之分；在黑龙江，有“山上派”和“山下派”之分；在湖北，有“三新”和“三钢”之分……即便在中学红卫兵里，北京地区有“四四派”与“四三派”之分；上海地区也有“红代会”与“中串会”之分。如同清 筍 囊凰呐傻闹饕 砾夙以谒 瞧 摹此囊凰乃汲北厥 幽显燠朶徽接训囊环庀拧担 胶焜醇兵 徽绞浚 赋觶骸熬 懿煌 庠 街 旆磁筛饕衅涮庠 渥跃醜潭快幌嗤 渚 降某杉 丁 约八 傅拇砦笄灾食潭雀鞅幌嗤 撬 嵌季晒泄媛尚缘墓餐 浴 庇秩缙 谕 晃恼轮 屑侯 骸吧缙崂铜慕准睹 埽 髁烧 问屏 拿 埽 紫让飧缘胤从车窖 V欣矗 寤 筍 囊凰呐捎庐排傻脑 虬制缙胱槽 系姆至眩 蓄晒腥 缘钠毡囊庖宓摹 币灾了 衍 庵秩 苑至训牧街 旆磁桑 梢苑奖愕爻坪耙 骸八囊凰呐珊屯排伞保 碚飧脚烧 沃 髡诺恼 喻汲笔恰八囊凰乃汲焙屯排伤汲薄薄！迹薄？

当周泉纓在写作这一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纲领性的思潮文献时，他或许并没有想到一年后他会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评判。1968年7月28日凌晨，当毛泽东下决心把红卫兵赶下历史舞台，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所谓“五大领袖”时指出：“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毛泽东又说：“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鉴

于当时周泉纓已在狱中，毛泽东下令放人：“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纓，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抓他干什么？”〔2〕至此，可以认为四·一四思潮已在全国范围内被毛泽东直接点名为一种“右”的异端思潮。但奇怪的是，此后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四·一四思潮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异端思潮象湖南“省无联”，武汉“北、决、扬”，甚至上海中学生的极左思潮“中申会”那样受到过正式的批判。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正面审视一下什么是清华四·一四的主要政治观点，以及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流行的社会思潮了。根据清华大学文革史的研究者所述：“1969年4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团派）和414总部（4派）。两派在一系列文革问题上针锋相对，不可调和”。〔3〕什么是他们的分裂导火线呢，据此研究者的分析，这“主要表现在文革中的策略、形势评估，工作方法、权力分配、干部政策，对文革前清华的评价等方面，而最重要、最集中的就是干部政策。这些伴随着兵团成立，发展而来的分歧和矛盾最终使兵团于1967年4月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和414总部……团派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清华是黑线专政，几乎无可取之处。清华的干部，尤其是50年代培养并相继任职的，是资反路线的第二、第三套班子。这些干部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反动与危险。4派把团派这套理论称之为‘大翻个理论’，即从根本上否定1949年以来的中共领导，颠倒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4〕干部问题的评价，讲到底是一个制度的臧否。当清华四·一四认定“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时，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了四·一四思潮的三大理论支柱。

其一是“阶级关系不变论”。与所有极“左”派的异端思潮认定文化大革命已造成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大变动不同，四·一四的主要理论是“十七年阶级关系不变论”。四·一四思潮认为：“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具体到被认为是“黑线专政”的教育部门，他们仍认为：“从十七年再加上大革命总和来看，主席路线在教育革命中是占领导地位，是不断推行革命，不断压倒刘少奇路线的”。〔5〕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四·一四派中不少人甚至认为：“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二。”〔6〕

其二是“造反派不能坐江山论”。从“十七年阶级关系不变论”出发，造十七年反的造反派，尤其是激进的造反派，自然成了反动阶级的代言人。按周泉纓们的理解，“造反”派并不等于“革命”。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始终有这样一个现象为人们所不理解：为什么反蒋（指原清华大学校长，“黑帮分子”蒋南翔）反工作组的时期，造反派里有不少人出身不好？每个人都认为这不是偶然的。都拼命找各种解释来说明这种现象的必然性。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后，人们发现没有一种站得住脚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能说明这一点。而所谓那里压迫最重，那里反抗就最力的蒯氏理论显然是缺乏阶级分析的。于是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造反不造反，究竟是不是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四·一四们的结论是，他们（即造反派）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混在革命队伍中齐喊造反。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乘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些人一般是出身于剥削阶级”。〔7〕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十七年阶级路线的“血统论”分析法，又可以看到十七年中中共官僚阶层惯用的反右斗争式的政治形势估计。

从此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清华四·一四派在文革中要死死捍卫的是周恩来——旧官僚体制的代表。而在私下议论中，对刘邓为代表的十七年体制更是十分留恋的。

其三是“文化大革命必须修整、巩固、妥协论”。周泉纓在他那篇以〈和周泉纓谈话纪要〉命名的自白中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应当“收”了。周泉纓拐弯抹角地批评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了“人跑长了要昏倒，发动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的局面，因而必须“修整、巩固、妥协，”以防止“一个朝代垮台”，而使“中朝复兴或朝代延长”。〔8〕一句话，在他夫子自道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要求对十七年的干部政策，阶级路线以及整个政治秩序的留恋和要求重新恢复的渴望。

出于这样的一些理论基础，周泉纓们必然对1967年后群众运动的继续推进大为不满。清华团派所办的《井冈山报》在1967年6月22日重刊了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周泉纓便借题发挥，于1967年9月14日贴出一张题为：“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的大字报。此时，作为“中国最大保皇派”的陶铸早已于一年前被打倒，周泉纓的矛头显然是另有所指的。9月17日，周泉纓又嫌矛头所指过于朦胧，又贴出一张题为〈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评陶铸之流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的大字报。这里，“之流”明白无误地暗示他矛头所指的是陶铸以外的人，而“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则明确地点出了陈伯达是当代“袁世凯”。这两文的中心观点，都认为陈伯达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引向了歧途。他们以“貌似极‘左’实是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主要表现是“企图垄断外交权，企图垄断行政权，甚至企图控制总理（周恩来——引者注）的常委大权。”此外，陈伯达还要“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军队”；对十七年的政治秩序“搞‘大翻个儿’”，“抹煞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搅乱阶级阵线。”去“迎合地富反坏右的‘权力再分配’的强烈欲望。”〔9〕

既然周泉纓为代表的四·一四思潮认为陈伯达已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引向了歧途，那么说他们内心深处对文革其实取否定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那篇〈谈话纪要〉里，周泉纓公然把文革的成绩比作“秦始皇修长城”，并指责他“残暴的阶级本性和操之过急而垮台”，自然有影射毛泽东之嫌。〔10〕在私下的议论中，周泉纓和他的伙伴们更是直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干部大换班”；是“打倒‘刘家军’，换上了‘林家铺子’”的“排斥异己”的权力斗争。由此他们更直截了当地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引起的原因，一则是‘个人需要’，二则是‘排除异己’”。〔11〕

清华四·一四思潮自然是一种代表着一种从右的方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求恢复十七年政治旧秩序的异端社会思潮，而问题在于，这一思潮的代表者既不是类似“联动”式的中共高干子女的组织，又不是保守派的红卫兵。而是当时响当当的造反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的一支，却一再批判造反派，似乎有点令人费解。其实，这正说明了文革中的所谓“造反派”，并不全部具有反体制的思想意识（不管是自觉或非自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意识在他们许多人的脑中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旧的政治秩序在他们不少人心中也仍是神圣的。只有造反派中一部分激进派思想家，才具有稍微自觉的反体制意识。

除此之外，四·一四思潮的产生恐怕还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造反派的迅速为权力的侵蚀与腐化，使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此相当失望；第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中央残酷的权力斗争越来越使青年人看清楚政治斗争的黑暗；第三

，文革所引起的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无序性与无规则性使人们甚至觉得还是文革前的旧秩序更为安定。无疑，四·一四代表了一种旧秩序的复辟思潮，而这一思潮的产生，却是以反复辟为己任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直接后果。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毛泽东公开说他反对四·一四思潮，而四·一四思潮却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任何批判。毛泽东对四·一四思潮的态度，其实是矛盾与暧昧不清的。他当然反对四·一四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矛头指向他及其追随者的那部分观点。然而，在文革确实进入“收”的阶段，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开始把红卫兵全部赶下历史舞台，与旧官僚阶层及其代表周恩来开始联盟的1968年下半年，他其实已经开始了有步骤的组织与思想清理。从组织上，他开始重新启用“老干部”——旧官僚阶层和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出身好的党团积极分子。从思想上，他开始反对“阶级关系变动论”，“特权阶层论”和“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论”等激进的造反派思潮，概而言之，他所实践的，正是四·一四思潮所主张的，因而怎么可能再认真地批判四·一四思潮呢。从这一观点来看，四·一四思潮真是一种强大的代表中共本质的旧秩序的思潮，当邓小平终于复辟成功时，可以说四·一四思潮是确确实实地一时胜利了。

#### 注释

〔1〕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2〕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时的谈话。〔3〕唐少杰〈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4〕唐少杰〈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见本刊zk9607b——编者）〔5〕〈四一四思潮必胜〉，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6〕〈历史的判决〉，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7〕〈论造反派〉，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8〕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9〕载《大字报选》（清华大学），1968年9月。〔10〕同注〔8〕。〔11〕〈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第八章未完待续）

####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六）

• 宋永毅 • 孙大进 •

#### 第八章清华四·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续）

#### 和周泉纓谈话纪要（摘要）

〔原文按语：在周泉纓同志被一些声称“群众”的人扭送到市公安局去以前，我们和他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座谈，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已于十月十九日下午将详细记录如实整理成座谈纪要。因为文章很长（近一百张大字报），从禅掌鹞颐墙 峙 叫 1.怵？



鉴于清华某些人不能对事物一分为二，不分析研究，只凭看文章作者的姓名，就对文章采取绝对化的态度。不讲道理，武断撕去大字报，鉴于某些同志对“毒草”只采取“封锁”的手法，不让人家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毒草”，以肃清其毒性，而是简单地对大字报采取“一撕了之”的不恰当手法。我们特此郑重声明，不允许任何人武断地把大字报撕掉。

如果有人撕大字报，只要他不怕真理，只要他讲道理，那么必须在“撕”之前，与我们充分辩论，只要他说的话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自己也会采取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动。

任何人，如果他胆敢无理撕大字报，那么由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策划者全部承担，包括必须无条件接受我们惩罚他的一切合理要求。】

#### ◇一. 文化革命的意义

问：有材料揭发你收集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你到底对大革命怎么看呢？

周：同志们对我说过的一些错话，做过的一些错事加以揭发批评，这是好事，是对我的爱护，革命小将尽革人家的命，也要允许人家革自己的命。过去，我在四一四里尽当“秦始皇”，不当老百姓，逼着同志们按我的想法办事很不民主。这回大家反过来，批评我一下。这很好嘛！特别是三七战团的同志对我的弱点批评的最淋漓尽致，我应当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脸色还比较诚恳）至于收集阴暗面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每个紧要关头慌了手脚，失去信心的人是不不少的。有人动不动就要上山打游击去，我可没有嚷嚷要上山打游击吧？每当东方红战团中有的同志谈阴暗面多一点的时候，我总是说：“眼睛不要光看到鼻子尖儿，世界上的大事不要急嘛。有毛主席在，有林彪同志的一支军队在，你慌什么？”按我看，在每个关键时刻我估计形势在清华还算得上是个“乐天派”！当然战略上估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战术上我和其他同志一样是谨慎的，按习惯语说法是：“决不让老保翻天，也不让极‘左’翻船。”战略的信念是落实在战术运用上的，两者是对立着的统一，不是一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问题，是很大，很深，很长的问题，我按我的理解谈一点看法。有的是在东方红战团常聊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严格地说是无产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用自己的政权反对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改造上层建筑，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

历史上一切旧的社会制度向新的社会制度转变都必须有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毛主席的理论把过程总结出来了，分为二步。

第一步：是先进阶级用暴力从没落阶级手中夺取政权。

第二步：是先进阶级手中的权发挥伟大的神威，反对旧的阶级利用余留下来的旧的上层建筑演变和颠覆新政权。复辟旧经济基础。坚决地变革经济制度；坚决地打烂旧的上层建筑，建立新的上层建筑来适应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完成了上述两步，新的制度就完全代替了旧制度了。第二步比第一步艰苦得多，长期得多。因为上层建筑的东西，

人的精神的东西，不象制度那么好变革，它很顽强，能量很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旧的上层建筑完全可能反作用过来，把新的政权颠覆掉，复辟旧制度，这是历史车轮的倒转。不要太幼稚，暂时的倒转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在整个转变时期内紧紧围绕政权问题，复辟与反复辟就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所谓新政权神威首先是用来反对反动阶级复辟的神威。

历史上，每个制度的大转变过程中，都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的问题。欧洲、法国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复辟过。我国古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变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我国的历史很怪，奴隶社会只有六、七百年，而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则花了近千年的时间。这是什么道理，很值得研究。周朝依靠奴隶革命推倒了殷朝，建立了周朝，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皇朝。以后这个皇朝发挥新政权的巨大威力，变革奴隶制度，使之向封建制度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奴隶主是顽强地搞复辟的，舆论在前，暴力紧跟。（翻小本子）小的不说，最大的所谓“管察武庚”的武装暴乱就是一个典型。奴隶主进行复辟的形式是利用自己在周朝政权中的地位来进行复辟。这似乎和现代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有点类似之处，当然新政权要反复辟。首先是军事镇压，然后在打击一小撮的同时，用软的一手，即用金钱，物质刺激，名利等拉拢大部份，强迫奴隶制的瓦解。强迫相应的上层建筑转变。

由此可见，我们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主席天才地全面地总结了社会制度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中先进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继续在政权问题上与没落阶级展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历史规律。从而破天荒地建立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进行反复辟革命的伟大理论，为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并且进行着伟大的实践。关于这个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报纸上，文件上讲的很多，我就不再重复了。

## ◇二．成绩的衡量法

问：意义谈了，成绩如何估计呢？逍遥派为什么这么多呢？

周：一个伟大的政治事件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意义，伟大的政治事件的意义往往是很难估计的。用物质、用钱、用死人、用眼前利益是没法估计计算的。时间上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范围不是几千里江河的问题，有时候是上百年或千年的发生作用。这给历史家带来难题，他们往往因为自己境界低，眼光短浅而挨后人的臭骂。

问：有实例吗？

周：有的，而且很多，例如，秦始皇这个人物是人人皆知的。但是我看很多关于秦的评论中，似乎很少有比较合理的。秦皇朝兴有十年时间，十年很短吧！历史一刹那时间。可是这个封建皇帝，在这个十年中，为最后向封建制度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统一的封建政权机构。建立了一整套统一的制度。中国在秦以后的近两千年的封建朝代中的帝王将相，基本上是在秦基础上运动。光说筑万里长城一事死了很多人，但是长城以后各代中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救的人，得到的东西比失去的大得多呀！长城是人民造的，但秦始皇的组织是不可抹杀的，尽管这位封建皇帝最后因为残暴的阶级本性和操之过急而垮台了，但是他比起镇压农民战争起家的刘邦、李渊、李世民来说是有贡献的。秦始皇十年中巡视全国多次，要知道当时只有马车！亲阅各种重要文件，我看这位天子，在封建皇帝里是够雄才大胆的了。

可是很多历史学家，不会评论农民运动，连秦始皇也评论不了，他们往往把秦始皇骂得比其他皇帝都坏，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对农民的软刀子和硬刀子没有太大差别，都应该批判，而且软的更该批判，因为他迷惑人，问题是对历史的贡献和政治事件的长远意义，有客观的评价罢了。

封建时代的政治事件的成绩，意义是如此深远广大，何况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伟大人民革命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了伟大的革命，搞掉了政权机构中如此大的叛徒集团，发动倾国人民来搞理论批判，触动着几千年剥削阶级的根基，这种魄力是有史以来没有的，人民直接掌握伟大理论的时代开始了。

革命象核聚变一样在七亿人民灵魂中产生巨大精神力量。它不仅现在震动了世界，而且将对世界的未来起巨大的作用。精神的力量化为物质力量，要有时间，有空间，有人们的实践。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威力，已经在中国、在世界表现出一些来了，将来精神核能放出来的时候，就不得了了。这种能量也可能是要放很多年，很多年，可以预料，用我这点境界去评论世界上第一次广度、深度最大的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不够的。

当然，世界上不可能有不付出代价的成绩，也不可能有不犯错误的革命事业，问题是什么阶级什么革命家用什么立场来衡量这些事业，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上则是最有气魄，最有远见，只有他们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看待革命成绩的伟大意义，主席就是典范。当然有魄力、有远见、敢于付出眼前的一切代价，去换取伟大的成果，并不等于战术上对敌人的麻痹，要知道，每当革命大风暴快要取得成果的时候，敌人总是企图夺取成果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翻船的问题，要记着历史上无数次伟大的农民运动成果丧失的教训。这种气魄、远见，是辩证统一的，这是对革命人民高度负责，主席就是这样做的。对于我们，世界革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一旦颠覆，世界历史车轮将会迅速倒转，这可不是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有志气的中国青年，必须学习毛主席，现在毛主席提出一系列最新指示，全国局势已定，决定了成果的取得，至于一些具体问题是可慢慢解决的。

比如你们说的逍遥派是容易解决的。

第一，要看好的一面。

我进清华七年了，没有象现在这样浓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空气。现在许多人都在看毛选，看马、恩、列、斯著作。人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当然这些学习当中有些是“失败者”“战胜者的军队最善于学习”，这个我深有体会。一年多来，在大风大浪中游泳，许多人都喝了不少水，吃了败仗。现在，战胜者在更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极好的现象，这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具体表现。

第二，要具体分析。

逍遥派中一些人是一直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古今中外的一些文件书籍的

，他们在这里下的功夫很大，他们不仅这样深入细致的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我是很尊重他们的，他们是“小人物”，似乎是默默无闻的，对小人物不要蔑视，对大人物不要迷信，这是我一贯法则。须知在很多问题上，“小人物”往往比大人物更容易理解和应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何等深刻呀！毛主席有句话：“事情是小人物作起来的，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后面记不起来了，这句话很英明，充满了辩证法。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文化革命中的先进分子，有的是“战败者”，当然，也难免有一些“悲观论”者，研究角度不一致，态度不一致，但是我相信，在毛泽东思想光辉下，在大革命威力逐步发挥的状况下，这些人中，必定会有不少人将来很有创造，他们是很有希望的，当然也必定有一些人走向反面，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

还有一些吃喝玩乐的逍遥派，这是少数。只要组织。引导可以不逍遥吗！

第三，要允许不平衡，不要慌，十个指头不一样长，七亿人相貌也不一样，不平衡是绝对的，大家认识不一致，很多人在某个问题上一时跟不上来，水平不同，不断的用毛泽东思想去统一嘛！在一定时间，一定的问题上，多数人总是可以统一的嘛！统一之后又会不统一，在不统一面前不要慌，逍遥派在斗私批修这个伟大方针指导下，总有一天会组织起来的。联合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历史上每一个大突变后，都需要一个相当的稳定期来搞平衡，这是规律。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反右，不是一个个过来了吗？再大吗？世界大战不是也过来了吗？世界上一切事情都不要慌。“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嘛！刚才念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到这儿就很说明问题。

还有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儿的“和平”都首先是以不和平的暴力和政权来保证的。

然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把“妥协”搞成目的，搞成主要的、唯一的手段，放弃武装斗争，搞投降，把权拱手交给阶级敌人。印尼就是这样的，遭到了巨大的挫折，法共对资产阶级妥协、妥协、一再妥协，卖掉了灵魂，完蛋了。

中国人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要对世界的伟大转变作出伟大的贡献，人多应该贡献大，这是应该的。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我们要有苦干一辈子，紧张一辈子的精神，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改造自己。习惯于紧张、艰苦的斗争。必要的修整为更猛烈的斗争，不是逍遥，要永远使人民的锐气尖尖的，活力雄雄的，斗志高高的。平静安逸对全世界革命人民没有好处。

◇三. 修整、巩固、妥协是必要的

问：大革命具体怎么收法？

周：先谈谈为什么要收吧。

问：这不很清楚嘛，也很简单。

周：你说说吧。（等片刻）怎么不说了呢？我替你说，你给我补充。事情的过程必须是波浪形的，有高潮、有低潮，有峰、有谷。一浪接一浪向前推进。高潮、顶峰指的是平衡的

突破，是前进的标志。但不能老向前进啊，人跑累了要休息一会再跑，机器运动长了要冷一冷，维修一下，于是出现了低潮、谷底。这是旧的平衡突破以后，为了达到新的平衡的必要阶段，是迎接新高潮的到来，不是浪费，这是规律，不以你的主观愿望变化的。人跑长了要昏倒的，发动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到这种局面时被动了，再来修整补充，就已经违背规律了，修整的时间反而长，反而费劲，结果想快反而慢，想直反而曲，“以迂为真”是孙子兵法一术语，这术语大概也有这种意思。

一场大革命往往是被根本改变社会制度打开了局面，从根基上动摇了旧社会制度，但完全把旧制度变成新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叫几声“彻底砸烂”就万事大吉，完全彻底地完成转变，要很长时间，要在革命大风暴后的很长时间内完成这个转变是一个很长时期、很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个转变，有条件、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其中包括了群众觉悟、革命力量在一定时期内还有轻重缓急主次的问题，它可能还不是最重要最紧急最主要，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修整、巩固、妥协”是必要的，这种时期有时需要相当长，我相信人的能动性的发挥能够加速完成这种转变，使历史更快地前进。但是人决不能改变革命斗争长期性这一客观规律。特别是“国际性地转变到共产主义”这样一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更不是人们所能改变的。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同时争取尽可能的加快完成这个伟大的转变。

“修整、巩固、妥协”这种词似乎是没有光彩的，其实不然，这是在大革命大变动后的巩固阶段的很必要的手段，其效果是巩固大变动中获得的成果，修整大变动的损耗，总结经验，积聚力量以便第二个高潮更快到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对敌人来说，上述措施能够更好地分化他们，使我们矛头更集中，歼灭战打得更彻底，很多矛盾解决得更符合发展要求、更辩证。此外，及时必要的修整、巩固在某些场合可以防止外来的突然冲击，或有准备应付这种冲击。比如战争中，某些时候能防止敌人翻我们的船，使他们失机，等等。

关于这些，实例很多。封建皇朝统治者有的很狡猾，很善于妥协，结果往往一个朝代要垮台，又搞得中朝复兴或朝代延长，周朝、汉朝都有过中兴时期。各个朝代前几个皇帝都很懂得用一些妥协来修整民力，补充战争的损耗，以便瓦解农民武装力量，维护封建统治。唐太宗、刘邦可算是他们当中最高明的了。相反，秦始皇处在封建制度刚刚完善时期，他残暴过急而不懂得修整、妥协，十年就跨了，这是封建时代。现代也同样，当然事业的本质是不同的。列宁时代有过很多妥协的措施，有的很成功，是很必要的。例如，在1928年和德国订了一个条约，妥协了推一步为的是进两步，因为年轻的苏联实在需要修整啊！否则很容易死亡，当时布哈林这混蛋反对，好“左”啊！但是“左”的结果是要翻船的。我们毛主席的伟大政策也有“退一步进两步”的妥协。比如给定息，可以作为孤立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补充手段！政治上孤立敌人，瓦解敌人，改造他们，而我们的代价可以少些这里钱是次要的，很合乎我国国情，合作化后要整社，自留地保留一段有好处，大跃进后要巩固、调整、充实、提高，不能一直前进，破坏必要的比例关系，困难年间要注意人民团结。

文化大革命后期，“修整、巩固、妥协”的政策也是要采用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成果，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军队问题首先是一个防止翻船，巩固成果，保证胜利的问题。军队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是有的。军队是在社会中的军队，社会的阶级斗争势必必要反映到军队内来，关键问题是如何估计这些问题。要不要搞？肯定要搞。关键是如何搞法，何时搞？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如何？“揪军内一小撮”、冲军区，似乎很革命、很彻底，但是须知用这种方法搞军队，估

计错误且不说，主要的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这样搞是要自毁长城，军权要丧失。

军权是政权之灵，军权一丧失，不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手里。我看外国人不打进来，也被敌人翻了船。当然军权一失掉，帝国主义必然要打进来，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暂时的失败和巨大的挫折是完全可能。不要太幼稚。伟大统帅毛主席坚决反对“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号召“拥军爱民”，这是英明的决策。这个英明的决策粉碎了国内外敌人想翻我们船的阴谋，牢牢地保障最后的胜利。

干部问题，上天安门都是左派吗？我不大信。毛主席说“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嘛！要使用一些犯错误的干部，甚至有一些有过反毛主席错误的大干部，这样做对敌人不利，孤立了敌人，对我们有利，光靠罢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下，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他们嘛！肯定的，干部队伍不可能百分之百纯的。真空抽到了小数点后面几个九，还有百分之零点一或更多的空气呢！宽大一些是一种妥协，一是反面人物还有暴露过程，而犯了错误的干部有个改正过程；二是党内外群众还有个认识过程。斗争是长期的上述两个过程也必然是长期的，违反了长期性的规律，操之过急，扩大打击面，反而对敌人有利，对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好处。

群众认识问题，过急不行，要实践，要有个认识过程。用过急的办法达不到快速的效果。突变和冲击很必要，但不能老突变、老冲击。让人民群众用“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斗私批修”来解决，这是一种修正提高。

文化大革命以后要修整，要巩固成绩，要完成很多具体变革，要发展生产，准备战争，要使精神上的成果落实到人民革命实践中去，要总结经验教训，要聚集力量准备世界的转变或者本国更大的革命高潮。主席好象说过要修整十年不知是否是真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妥协”必须以具体条件来定，必须有大前提，即必须用政权和革命暴力来保证。“妥协”是革命的辅助，如果要使之过火，使之过长那就要走向反面。比如全国解放时，攻占北京城，团团围住傅作义交代政策，迫使他缴枪投降。

#### ◇四．干部问题

问：干部问题如何看？

周：干部问题和看待十七年问题紧紧相关的先得说清楚如何看十七年的问题。这个问题内容很多，也很大。我再谈谈看这个问题的方法，具体的研究很少。

结合教育制度这个具体问题来谈吧。

教育制度是个上层建筑的东西。中国的教育制度成份复杂，有封建主义的，有殖民地的，有资本主义的，有修正主义的，但总的来看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然首先是搞土改、搞镇反、搞经济恢复，使年轻的红色政权站住脚，才能进一步搞变革经济制度，最后才能逐步地花力量来变革上层建筑，使它适应经济制度的变革，进一步巩固政权，这样旧社会留下来的教育制度变革问题才提到日程上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后，具体如何改？如何变？就有一个逐步的认识，逐步的实践，十七年来在教

育变革中，广大干部在毛主席领导下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就是在努力完成这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

有不断实践逐步认识的过程，这一点对任何人都毫不例外，问题是在于对旧教育制度采取什么态度，是彻底革命，彻底砸烂旧教育制度呢？还是进行变革，保留旧教育制度呢？这是两种革命家根本不同的态度。两种态度、两种目的，前者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制度，后者是为了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和制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前者的总代表，而刘少奇则是后者的代表，蒋南翔是他们的爪牙，于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一系列的政策问题上就表现出来了。

一个要变革教育制度，使之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个要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一个要培养劳动者，一个要培养所谓的“工程师、专家”。一个要彻底变革，搞半日制、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亦工亦农亦兵，一个则要搞全日制，保留旧制度。在实践上一个大力提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个则拼命吹捧清华教育质量高，大搞研究院等等。

在斗争中刘少奇的斗争艺术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对主席路线是阳奉阴违，随着毛主席路线的深入贯彻，教育变革也越来越触及本质。与此同时，刘少奇对主席路线的阻力也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最近几年完全公开对抗主席的地步，教育革命进行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只有经过在政权中把刘少奇打下去，夺取他们的教育大权，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的历史分析，教育制度变革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性的东西。第一，有过程；第二，充满这革和保的斗争；第三，斗争形式是在同一面红旗下进行的，斗争是逐步激化的，并非一下子全面展开的，敌人——刘少奇、蒋南翔有一个充份暴露的过程；第四，尽管近几年来刘少奇的路线，在教育界许多环节上似乎特别猖獗，但是，从十七年再加上大革命总和来看，主席路线在教育革命中是占领导地位，是不断推行革命，不断压倒刘少奇路线的，在这些初步的结论性的东西的基础上再来看干部问题就容易多了。

第一，十七年来毛主席统帅着大部份干部对旧教育制度进行变革，变革是逐步向前的，这就意味着是取得一定成绩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靠主席思想的伟大作用。但是具体实践主席思想的是千百万好干部和革命群众，所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有贡献的。

第二，两条路线斗争有逐步深入的过程，阶级敌人是处在掌权的地位，他们的斗争艺术是极迷人的，他们嘴脸的暴露也需要有个过程。因此好干部在主观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时候，客观上恰恰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执行的是刘邓路线，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主观与客观分离的观点，是符合认识规律的。

第三，毛泽东思想有个贯彻过程。干部对主席思想的理解、认识也要有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干部头脑中的旧东西，必然也要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主席的东西，这样就在某些时刻某些问题上执行了刘少奇路线，这是他们的主观原因。

由此可见，毛主席关于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结论是完全符合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客观现实的！作为一个犯错误的好干部身上就有两个方面了，一是忠于毛主席，努力执行主席路线的一面，二是受走资派利用和毒害、执行错误路线的一面。前者是主要的，所以我们才称

得上好的嘛！这是对于一般好干部的两重性。

而刘少奇则诋毁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把大部份好的、比较好的打了下去，直到今天解放干部的问题还未解决。而这个问题在运动后期非解决不可，否则政权巩固不下来怎么办呢？要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干群关系问题。

干群关系（分析中干部都不包括走资派）严格地说决定于干部的两重性。它分为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相应于干部的错误的一面。一切阶级敌人通过走资派扩大和保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法制和法权，腐蚀我们的干部，而我们干部头脑中的旧意识又适应了这种腐蚀，于是乎就被推上了执行错误路线的第一线，压制群众，压制先进事物，逐渐和群众对立起来。严格地说，这是产生新的走资派的原因。由此而产生的干群对立由干部自己负责。

第二方面内容：和干部执行正确路线相对应：我们的干部是毛主席培养的干部，主观上都不同程度地忠于毛主席的，努力改造自己，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去执行毛主席路线。所谓执行毛主席路线，就是直接应用政权力量去改造群众，改造客观，当然群众中旧东西要反抗这种改造，这样也产生了干群对立，这对立的原因主要在于群众中的旧东西。

上述两个方面在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矛盾在人民内部的反映，在社会主义时期要特别注意的当然是第一个方面，这是文化革命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对革命事业来说，政权是主要的，政权一变色，一切都变了，保证政权的红色，干群对立总是可以逐步在斗争中解决，到了共产主义，干群对立就完全消灭了。

分析干群的两重性，那如何解决干部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主席总结了要以斗私批修为纲。

干部经过一年多的锻炼以后，有了进步，但是还要斗私，改造自己，同时批修，这是解决干群关系的第一方面。群众也斗私批修，是解决干群关系的第二个方面。

在斗私批修中，干群进一步结合起来，干群关系大大改善，结果有利于打击一小撮顽固的敌人。群众、干部的斗私批修虽然能解决很多干群关系问题，从而大大地推动和促进“斗、批、改”的完成。然而任何一个政权问题是不可能完全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的，原因是习惯势力很顽强。这里走资派是主要的，干部群众头脑里的旧意识也在起作用，这些旧意识要自觉不自觉地反抗或阻碍新政权的建立，这是阶级斗争长期残酷性所决定的，所以要建立一个新政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力是必要的，它和干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相互结合的，缺一不可，所谓“强制力”当然包括武力镇压敌人、走资派和任命新的领导干部在内。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

（第八章未完待续）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七）

• 宋永毅 • 孙大进 •



## 第八章清华四·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续）

### 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

（原注：据了解，信的作者是四一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的负责人，四一四核心战斗组《云水怒》的负责人周泉纓。）

××同学：

你的来信收到了，请你代我向全体河南造总的战友问好！并向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下流血牺牲的战友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挫折和困难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他将严整我们的队伍，锻炼我们的意志，打光我们的媚骨、“公正”和软弱。形势将逼迫我们更加独立自主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析河南的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的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主张，我们能够修正自己在前进道路上的错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我们决不动摇、决不消沉、决不颓丧。我们更要千百倍地振奋，更加猛烈，更加巧妙地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大联合的核心人物来。

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有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他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

在这痛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因为从祖国的白山黑水到曾母暗沙，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主力军！也只有依靠我们，依靠这一支唯一能够真正代表工农兵和广大劳动人民最高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将是历史的结论。

而上述问题都将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在这里我们作一些探讨，对在艰苦奋斗中浴血奋战的战友也许会有用处。

#### 一．阶级关系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伟大，空前深刻的大革命。它所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而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问题，也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领袖所在的时代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领导中国的工农兵解决这一最伟大的问题。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为任一场大革命都是变更阶级关系并解决一个相应的政权问题。这点文化大革命和一切革命是一样的。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阶级斗争没有熄灭！阶级斗

争依然在急剧地进行着。资产阶级为了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将通过更新的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这种新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指出的，通过党内“走资派”，夺取政权实行和平演变。而无产阶级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决地进行反复辟反演变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它不断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

在这场新形式的阶级斗争中，毛主席首先发现和扶植了一批无产阶级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先进力量，他们在毛主席的统帅下，最迅速地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用毛泽东思想去领导广大劳动人民与自己队伍中演变的走资派作坚决的斗争。并且将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大革命，把他们赶下历史舞台。没有这新生力量来替换先锋队中的腐朽力量，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支力量也在新陈代谢。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相应政权问题的解决。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与民主革命以及苏联本来的革命有着很大的区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特点和基本事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钻到党和国家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正因为这样，“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化。相应的政权，也是局部地改变的，而不是彻底的改变。

否定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新生力量代替腐朽力量的现实或片面强调文化大革命前阶级关系的稳定方面都是错误的，都可能会陷入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泥坑，成为右倾保守思潮。

但另一方面，抹杀文化大革命和其它革命的差别，夸大阶级关系的变化方面，把人民内部少数教育的过程，误认为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和阶级关系的大翻个儿的过程，从而导致什么文化大革命后财产权力必须再分配的估计，也是极其反动的，是极“左”的，其结果必然从“左”的方面来复辟资本主义。

当然，目前来说：第一方面是最主要的，但是也必须注意第二方面，否则革命以后也会出现另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其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分路扬镳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是两种造反派（即团派和四一四）一系列深刻的原则分歧的争论点。

## 二. 派别的规律性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知识，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如大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发生划分和社会政治派别的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就不称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上的派别的实力和人数上完全相等，而是指社会上有那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那些派别。”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也是如此，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首先最明显地反映到学校中来，清华大学四一四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造反派分成了两派，而且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派。

尽管不同地区两支造反派各有其特色，其自觉程度不相同，其尽到的成绩以及所犯的错误的性质程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规律性的共同性。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给予各地两支造反派统一的称呼：四一四和团派，代表这两派政治主张的政治思潮是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

四一四派和团派在解决和党内“走资派”这个主要矛盾时是统一的。因此他们在摧毁反动路线同一战场是战友，在“走资派”的白色恐怖下尤其如此。当然两派在战斗中都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例如有的团派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四一四派一定程度上保了军区反动路线，但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点明，一般他都改正错误，在大敌面前重新统一起来，今天河南造总改正错误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个别地转向反面是有的。

但是在夺权问题上，即由谁来掌权，依靠谁，团结谁，镇压谁这个阶级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就急剧地爆发、激化，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有的地方以至于发生激烈的武斗，几乎在每个地区，当文化革命的主要矛盾稍稍下降时，四一四派和团派在思潮上的分歧就会迅速上升。

由此可见，四一四和团派的分歧是有规律性，而且是非常原则的，不可调和的。

从历史上看，四一四派几乎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最早杀出来的造反派，她的历史最久，在刘邓血战中功勋最大。当团派的很大一批骨干力量外流、躺倒，以至于向保守组织交悔过书的时候，往往都是四一四这批造反派在白色恐怖下，争取胜利。不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由于认识问题也犯有这样那样的右倾错误，但是比起溜走、躺倒，以至于倒戈来总要好上千万倍！退它一万步也为造反派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

从组织上看：四一四派的队伍是比较整齐的，造反派大多数的工农兵基本群众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的党团员和干部，都是“铁杆”的四一四派。而团派的队伍是称不得整齐的，还经常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

从政治观点上，四一四思潮是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比较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关于

防修反修的伟大理论，不仅牢牢地记住当前的主要敌人，坚决地打倒他们，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战，而且能够看到大革命以后的全面的阶级关系以及长远的防修反修的目标。对将受蒙蔽群众，努力团结他们，热情地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和要革命的干部，四一四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所有这些都是防修反修必须的。

而团派，由于他们的革命性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散布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排斥一切的无政府思潮的影响，他们要“大翻个儿”，妄图根本变更十七年来的基本的阶级关系，而重新划分什么“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由“造反阶级”来压迫“老保阶级”，实现什么“财产权力再分配”即是说要把“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据说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又是谁呢？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吗？不是。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有权的。对他们来说是如何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绝不是什么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新中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什么人没有权力和财产呢？什么人对此具有最“激进”的要求呢？只能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只能是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以及被取消了政治地位的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再分配”干脆改名为反动阶级的“反夺权”，不是能够说明它的实质吗？

这种“大翻个儿”重新划分“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实行再分配”等等，团派思潮的实质是十分反动的，这也是团派在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如何正确对待战友和同盟者，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屡犯错误”并且“屡教不改”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造反派中的两个派别，两种思潮向往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前途，因此尽管在当前对待党、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上是暂时统一的，但是一旦这个主要矛盾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两种思潮谁战胜谁的问题就会迅速地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可以肯定，团派作为一种思想是一定要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的，其顽固的代表人物滋长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历史所淘汰。当然团派的多数优秀分子在毛泽东思想的抚育下，将会抛弃这种极“左”的思潮而布尔什维克化，或劳动人民化。

### 三. 斗争的复杂性

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局部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是尖锐复杂的阶级大搏斗，也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各个阶级的代表势力都纷纷出来顽强地表现自己，以便让历史对我们进行选择，胜利的胜利得更彻底，垮台的垮台得更痛快。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这是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新课题，工人运动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需要从外部向工农群众灌输。这个灌输的过程是少数教育多数的过程，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重新学习如何在无产阶级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的过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一部分人会受蒙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内部

也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

毛主席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中正确指出，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一方面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于是文化大革命出现了这样的复杂情况：一方面我们的主要敌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运动中的次要矛盾，比如人民群众中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工农兵和他们的次要敌人即地富反坏右的矛盾来掩盖运动的主要矛盾，转移群众斗争大方向，以图保护自己。有时他们利用“造反派”队伍特别是团派的队伍不纯挑动受蒙蔽群众去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有时他们则通过无原则的吹捧利用团派中的“极左势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所谓“右倾势力”的四一四派，特别是参加过保守势力的曾受蒙蔽的群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等等，等等。归根到底，激化次要矛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手中的大权，并且有朝一日利用他们手中的政权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的次要敌人，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顽强地活动起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混入了造反派的队伍（主要是团派）他们表现得“极左”，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要求最迫切，他们咬牙切齿妄想一棍子把受蒙蔽的工农群众打成“保守阶级”，而他们自己则成为压迫“保守阶级”的“造反阶级”他们仿佛也在革命的航船上划桨，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把船撞到暗礁上，以便来个阶级关系“大翻个儿”复辟资本主义。当然，他们也很清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他们自己在台前表演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拼命地在造反派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企图。在实际中他们和他们的代理人往往利用“团派”中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家的狂热性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去打击四一四派，排斥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革命干部，篡夺政权，为全面复辟作好准备。

应该注意这里决不是“几条小鱼儿”在翻浪的问题，而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隐患，其形式完全和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类似的，只不过是反动阶级新的代理人的手腕，可能更高一些，形“左”实右的迷惑力更大一些。因此我们在夺权的时候不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在各个局部的地区，正如毛主席说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对于这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切不可丧失警惕，被敌人利用。在对付他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有革命的魄力和铁的手腕，为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把走资派手中的权统统夺回来，我们要结集最最可能的同盟军，甚至大魄力地利用一切次要敌人的力量划几桨，然后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彻底暴露本来面目的时刻毫不犹豫地打落水。一切的一切为的是掌握政权，巩固政权。相反，对待防修反修的主力军，对待受蒙蔽的工农兵群众和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必须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力求使之不向敌我矛盾转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努力按照毛主席教导，坚决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这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

列宁对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艺术作过科学的总结，他说：“要战胜比较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那怕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

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那怕是极小的机会，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列宁强调指出：“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这就是说，这种斗争艺术也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法则。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不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超阶级的“公平”“合理”思想，都将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必须坚决肃清他们。

#### 四. 军区问题

全国各军区进入运动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局势起了极大的变化，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支左工作，他们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愧为无产阶级、工农群众的子弟兵。许多军区和部队的领导干部，都在不同程度上执行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坚决支持造反派，特别是支持成份比较好的，代表广大工农兵最高利益的四一四派。

但是就在这时，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抛出一条带枪的反动路线，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利用四一四派和团派的矛盾破坏他们共同对敌的联盟，削弱造反派力量。同时扶植保守势力，并利用受蒙蔽的群众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和团派之间的矛盾，激化这种矛盾，首先打击团派，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河南就是典型。

第二，在政治上利用矛盾的同时动用专政机器，应用枪杆子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第三，在中央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就欺骗受蒙蔽的广大群众和战士，把矛头直指中央，制造暴乱事件，武汉则是典型。

相当多的军区和部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对军内走资派的阴谋估计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条带枪的反动路线，也有的是在策略和方法上犯错误，这样就压制了造反派，特别是团派。而客观上壮大了保守派。

于是二、三月份之后，各地造反派出现分裂，保守派重新抬头，大规模武斗发生，甚至出现了局部的政变，局部的武装暴乱事件，文化大革命遇到新的障碍。

在新的障碍面前，必须出现新的高潮，四一四派和团派都开始逐步意识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当前最关键最迫切要解决的是军权问题和支左问题。因此两支造反派的主攻方向开始统一起来，这里似乎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然而四一四派和团派由于组成成份，发展历史和思潮特点有质的差别，因此在对形势前途。敌我友力量的分析以及战斗的部署和策略等等都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团派认为各个军区犯错误的原因完全是黑手操纵的，完全是自觉地和林付统帅的对抗。

因此团派的同志嘴里不说心里想的是自下而上地象去年炮打司令部那样去冲军区，“彻底砸烂”“彻底平反”。对待压制过自己的保守派，基本上是“文攻武卫”，象对待蒋介石的士兵一样，对待四一四派特别是对那些在对待军区和对待团派有错误的四一四派则是“二白匪”“二老保”坚决镇压，完全吞掉！而且应该比老保首先吞掉！

在团派看来，全国都是如此，枪杆子已经完全被“敌人”掌握了。全国性的内战全国性的武装夺权，是不可避免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为“武化革命”。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枪杆子的领导权，局部地改善军权，变成了全面的大规模的武装夺权，象以前那样，团派对军权问题，对枪杆子问题是很敏感的，很重视的，很坚决的，他们很快就把主攻目标转移到军区问题上，然而私字夺权观，将使他们犯错误。他们想夺权的是基本上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军权，想来一个“造反阶级”压迫“保守阶级”的军权“再分配”这肯定是要碰钉子的。

总之，团派的种种分析和种种作法将更加激化那些次要矛盾，将在实际上模糊主要矛盾和分化、削弱造反派。

我们四一四派则认为，首先必须紧紧跟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部署，对军区的问题，军权的问题，对枪杆子问题必须给以极大的重视和充分的估计，克服过去对枪杆子对权不够敏锐，不够重视，不够坚决的弱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枪杆子是无产阶级的，任何私字夺权观，把阶级的军权割据为小山头的，某个小团体的武装的企图和作法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军权只能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权，而决不是“造反阶级”镇压“保守阶级”吞并自己战友的权。

对于军区错误，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划清界限，对于伸向枪杆子的黑手必须揪出来，坚决斩断。但是，我们四一四派认为建国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毛主席有最高的权威，我们的军权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是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除了无产阶级将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掉“拉出去，打进来”的阶级敌人以后，我们社会主义阶级状况是不可能有什么原则的变化。政权，特别是军权将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因此四一四派在对待军区问题上必须坚持四一四派的特点，坚持四一四派在对待受蒙蔽群众和犯错误干部等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有革有保，该打倒的坚决打倒，该保的坚决保。对因认识问题而犯错误的军区和部队的干部，必须一看二帮，热情地团结和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种不加分析地，象去年冲击省市委那样去冲击大多数的军区是错误的，“彻底砸烂”“彻底夺权”更是要不得，在军区干部问题上，反动路线再想借手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绝对不可能了。

我们认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状况下，党内军内走资派在全国范围内结聚受蒙蔽群众，并使用他们充当全国规模的暴动的工具是不可能的，既没有能使受蒙蔽的群众及战士所接受的公开的政治号令，又没有足够的舆论。因此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可以采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策略，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军区，各个解决他们的问题，实际上目前已经这样做了。

重要的是，主要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听从毛主席、林付主席的号令，进行着一切必要的军事布局和政治准备，以应付一切突然的事变。所以只要处理得当，全面内战是打不起来的。

应当看到，由于本身的弱点，相当大部分的四一四派在对待军区问题上，对待团派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现在在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中，在巩固无产阶级的军权的斗争中，四一四派将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军内走资派划清界限，修正自己过去在对待团派问题上的错误，完成一个痛苦的转变。正如你信中说的：河造总当前就在打倒何远洪，改正错误，完成这个转变。

当然我们这样分析完全不等于不准备战争的一手，特别是有人要用武力吞掉我们，打垮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采用相应的自卫手段，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局部地正在进行着初步形式的自卫现代战争了。但是即使全面内战因为各种因素打将起来，或者继续发生局部暴乱和大规模的武斗，我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状况是不会有原则的改变的。那些只知道空喊武装斗争而不知道对武装斗争的阶级斗争，阶级目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做调查研究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的人和忽视武装斗争的人一样，同样是可悲的。由毛主席把握轮舵的革命航船将绕过一切或明或暗的礁石，奔向共产主义！

我们四一四派应为实现我们的政治观点，实践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努力奋斗！

## 五. 四一四思潮必胜

当前各地团派一片呼喊：“河南造总要垮台了！哈尔滨山上派掌不了权！武汉三新靠边站！……清华四一四派必败！全国四一四都完蛋！”有些团派同志企图把四一四派打下去，扫除夺权斗争中的“隐患”。

可是他们不知道，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即使是日趋破落的政治势力，在未完成历史使命时都不可能人为地将它推出历史舞台，何况一个真正代表工农兵最高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呢！四一四派是压不垮、吞不掉的。暴力有时后看起来是万能的，但暴力一旦脱离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最高利益就会被新生的暴力所消灭，个别的四一四派也许会被走资派所操纵而走向反面或被压垮，但从整体看，四一四必胜！

为什么四一四必胜！首先，在当前的各派别，各思潮当中，四一四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列宁在分析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时说：“革命准备年代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预示着重大的斗争到

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凡是一九零五年——一九零七年间以至一九一七年——一九二零年间引起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他们最初的提法。”……各阶级成份一贯表现，特别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考查，四一四派是最接近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布尔什维克派的。如果说四一四派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那么克服这些缺点错误就将四一四派无产阶级化，布尔什维克化，将四一四派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完善起来。四一四是在克服着种种困难，在各种批评指责，甚至总在打击下“锻炼自己所必须的政治思想武器”。这时为了迎接历史赋予的重任而必须经历的痛苦的过程，困难和曲折的局面，胜利在等待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派。

而团派虽然也有许多真正勇敢的造反派，他们完全能够布尔什维克化。但团派思潮作为



一种社会思潮，更接近列宁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极“左”思潮，这种思潮当中不可改造的真正的代表人物的政治目标并非是为了防修反修，因此作为思潮而言，当他发现已经完成历史交给它的冲锋陷阵的任务了，到那时候这个思潮的顽固代表人物也被无产阶级的手腕捏得粉碎。

更主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从一小撮走资派手中把权夺过来，并且稳固住这个权，就必须有四一四这样一支真正的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为核心，现在全国成立的六个革命委员会中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夺权的，又有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而使政权稳固的，事实证明团派夺权以后，常常不能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不能正确地对待他们战友和自己的缺点错误，甚至不能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使政权不能稳固，这也是我们和团派的根本分歧所决定的。因此，成为政权的稳固基础的成为大联合的核心的只能是四一四派。

只有四一四派能够团结 95% 以上的群众和 95% 以上的干部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一四派必须也完全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团派，团结团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但是这种“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无产阶级长远的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手中，四一四派当仁不让地应当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看不到这一点，在这种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面前总觉得自己比暂时优势或暂时被团结在“统一战线”内的其他派别矮一截，因而软弱退缩，迟疑不前，这是四一四派内部目前最主要的右倾危险。

还必须看到，夺取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列宁说过：“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会发生千百万种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大的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况，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确实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毁他们）这种人在大转变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错误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列宁又说过：“在革命已经暴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可以说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要完成所提出的稳固政权这一系列工作，扫除大革命中反动阶级余留下来的罪过，真正实现防修反修的目的，没有四一四派这样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是不可能的，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的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之后，团结一切力量，尽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派手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呢？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四一四派！

革命化的四一四必胜！你的战友××

〔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东方红支队在四一四内部印发《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按语：

这封信是我们一位同志给他的一位战友的。我们认为这位同志信中的坚持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些观点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四一四思潮”。我们坚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思潮会取得最后胜利。予此我们发表该信全文，以供革命同志参考。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

最高指示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伟大的转折完成了！阴谋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小集团暴露了他们全部诡计和阴谋相继破产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从他们手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文化革命的权，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避开了一大暗礁，将革命的航船向最后胜利的方向急驶！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反革命两面派的顶峰，它是封建统治阶级向先进的革命势力作最后的拼死挣扎的产物。袁世凯以他反革命两面派特别的“机智”和特别的“手腕”夺取了清朝皇朝的政权，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革命志士的血泊中又竖起了一个封建王朝——袁世凯王朝。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袁世凯登峰造极的反革命两面派手腕拉垮的不是革命人民，而是他自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袁世凯和他封建的政权被革命的浪潮淘尽了，而袁世凯以险恶的两面派手腕而遗臭万年。

今天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后胜利冲去了

了，资产阶级要彻底完蛋了！这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势必要以百倍的疯狂，万倍的阴谋来作最后的挣扎，因此袁世凯式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他们看到他们原来的主子已经被革命人民打倒在地了，并且踏上了千万只脚，要重新翻身一时是不可能了。于是他们就利用在党内的地位，搬出了他们老祖宗袁世凯的一套，大耍两面派手腕。在关键时刻，总是以“左”的和“右”的方面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企图使已经取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付之东流，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以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航船翻个个儿，重新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得力干将陶铸就是“袁世凯”式人物中的一个。袁世凯式的人物都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也是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家。他们第一个特征就是千方百计贬低毛主席，贬低林付主席，相

应抬高自己的地位，大肆吹捧自己，这正如姚文元同志所说的：“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的自我吹嘘，他们利用他们的职权和地位，在大革命中拼命地耍阴谋，打击和贬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利用一切机会来宣扬自己，以至于连群众的小字报也不放过，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企图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假象，他们领导文化大革命是具体的真切的，而毛主席、林付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是抽象的、空虚的。他们一方面在行动上利用手中大权千方百计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背道而驰，故意贬低代表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一些文件和口号，甚至干脆无视这些重要文件和口号；另一方面，又装得十分谦逊，以便炫耀自己，腐蚀迷惑和欺骗那种不坚定的群众以及幼稚的青年人，陶铸在中央的几个月中就是这样干的！”

要篡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篡夺党政军大权就必然削弱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以至于搞倒无产阶级司令部。袁世凯式的人物第二特征是：“他们用貌似极‘左’实是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文化大革命来长期存在着一股炮打总理的妖风，这股妖风非常顽强，无论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警告也压不下去，这就是袁世凯式的人物耍的由他们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但就是不怀疑自己，不打倒自己只打倒别人。此外二月以来，群众中广传着一种中央文革分派的流言，什么总理、康老、王力、关锋、林杰是一派，江青、伯达、戚本禹是另一派。袁世凯式的人物自作聪明，以为放出这种风来既能利用极“左”思潮造谣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又能巧妙地掩盖自己；既能促使左派犯错误，并巧妙地利用他们的错误，又能最好地保存自己。可是天公不作美，武汉事件和全国性的5 1 6兵团赤裸裸地暴露了袁世凯式的人物的一切伎俩，这般自作聪明的家伙，真象其老祖宗袁世凯一样，逃不过历史的无情惩罚！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反对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袁世凯式人物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大搞垄断，积极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姚文元同志说得好：“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很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的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

袁世凯式的人物不但企图垄断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垄断了一些主要的报纸的权，而且还企图垄断外交权，企图垄断行政权，甚至企图控制总理的常委大权。不仅如此，他的手伸向了军权，他们运用天空中的一点乌云，神经质地夸大，促进左派犯错误，散布“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企图打烂伟大长城，分裂伟大长城的人民解放军，全盘地搞垮毛主席和林付统帅的军权。一手篡权，一手搞“大翻个儿”，其心何其毒也！

袁世凯式的人物的第四个特征是抹煞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装出一付热情歌颂群众运动的样子，放纵小资产阶级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从而把群众运动引向歧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以马列主义的最高热忱歌颂了贫农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这儿毛主席所歌颂的群众运动具有最鲜明的强烈的阶级性，乃就是坚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毛主席在文章中着重指出了贫农是革命先锋。可是袁世凯式的人物似乎比任何人都热情地歌颂群众运动，但是在极“左”的看来热情洋溢的歌颂下面，把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无政府主义排斥一切、怀疑一切等等资产阶级的东西硬塞到今天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群众运动中，以此实现其“小资

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上台”的阴谋，从根本上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林付统帅说得何等好啊！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毛主席在文化革命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可是袁世凯式的人物违抗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以极“左”的面貌去纵容革命队伍中有的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和派性，并利用这些东西加剧和另一支革命派的矛盾，分裂革命队伍。更恶毒的是将革命派之间的矛盾引向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阶级阵线的轨道。陶铸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来之后大力散布“怀疑一切”的思潮，提出极“左”口号顽强地把运动引向歧途。林杰一方面支持4 1 4，而另一方面又和团派大谈支持4 1 4的辩证法，和其集团上下配合加剧团派和4 1 4派的对立，并且煽动团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武汉事件发生以后，袁世凯式人物大力宣扬极“左”口号“抓军内一小撮”，妄图一举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军队，把运动拉向最右方。但是袁世凯式的人物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枉费心机，这一切的一切连同他们自己都将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个粉碎！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人民革命——历史的火车头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飞奔疾驶的必然趋势，也决非袁世凯式的人物所能扭转！

袁世凯式的人物的第五个特征就是极高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以极“左”的口号来实现其极右的目的。。他们不仅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提出极左口号来把干部、群众、军队推向敌人方面，以达到“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搅乱阶级阵线，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目的，而且不断地煽动我们队伍中的极左思潮，迎合地富反坏右的“权力再分配”的强烈欲望，去冲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官，他们特别重视黑龙江省的革委会似乎比别处更为重视一些，大概是因为东北三省对中国太重要了！

袁世凯式的人物第六个特点就是登峰造极的反革命手腕和反革命的“机智”。武汉事件和武汉事件后的一系列奇怪现象就是袁世凯式的人物继陶铸的换头术后创造了又一次政客手腕的奇迹。

武汉事件是袁世凯式人物的极右企图暴露以后“机智”地退却的一个大阴谋，一方面保护实力，一方面制造混乱，促进左派犯错误，进一步把水搅混，与武汉事件配合，立刻提出“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一些左派一时没有识破此口号的反动性，上了当，于是左派犯的错误被右派利用了，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以至于出现了某种危险。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袁世凯式人物的阴谋。9。1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发表大转折的讲话点破了他们的鬼计，把准轮舵，敌人的布局打乱了，面目暴露了。然而袁世凯式的人物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顽强地耍弄他们“机智”手腕来搅乱阵线，保护自己。于是林杰问题突然泄露了。炮打林的风一下子象老天预先准备好似的乱将起来，运动似乎纳入了袁世凯式人物的轨道，谭厚兰被斗了，师大似乎翻了个儿，全市两大派的内战一触即发。

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及时地戳穿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两面派阴谋，再一次对革命派中的

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引导，袁世凯式的人物为了掩盖已经暴露的黑手的貌似特别“过火”的高级手腕又破产了！结果水并未搅混，反而进一步暴露了自己。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乌云敌不过太阳，小小袁世凯的两下子虽然能够篡夺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果，但也怎能敌得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怎么敌得过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统帅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阴谋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继刘少奇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现代“袁世凯”永远逃脱不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芒，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航道向彻底胜利的方向，突飞猛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看！在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极其重要的战略性的江青讲话发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准了革命航船的轮舵，绕过又一大暗礁！

看！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了！袁世凯式的人物的一切阴谋破产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部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大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空前巩固。

看！上海市革委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迅速成长壮大。所有已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大树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坚决斗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把我们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看！军委扩大会议胜利了！人民解放军牢牢掌握印把子，以保证文化革命后的大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手里，以保证将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把文化大革命牢牢地纳入毛主席指引的轨道！

看！伟大的长城巍巍屹立，军民团结如一人，军支左，军爱民，民拥军。毛主席、林付统帅亲自统帅的人民枪杆子队伍牢牢地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看！全国一个上下结合的大批判高潮迅速来到，刘邓彻底灭亡之时来到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时候来到了！

伟大的转折带来了伟大的胜利！

打倒刘邓陶！打倒大小袁世凯！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 00 支队 1967 年 9 月 14 日

【大字报上有许多批语，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1. “本文作者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同志，真是混蛋透顶！”（北师大井造一兵） 2. “本文是一篇反革命复辟宣言书。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立场错了。”（延河） 3. “他们分析得有道理。”（02 一兵） 4. 此文作者都为《必胜》的东方红 00 支

队。】

□原载《大字报选》（清华大学）1967年9月15日

（第八章完待续：第九章上海新思潮：在炮打张春桥的背后）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八）

• 宋永毅·孙大进·

### 第九章上海新思潮：在炮打张春桥的背后

1967年1月28日和1968年4月12日，上海地区的造反派红卫兵掀起过两次大规模地炮打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的热潮。参加炮打的有红革会（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三司（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炮司（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以及不少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参加炮打的红卫兵几乎涵盖了当时上海地区最主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而且在仅一年多时间内重复了两次。

上海地区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触发点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所谓“一月夺权”运动。作为知识分子的张春桥深知学生红卫兵远比工人造反组织难以在思想上与行动上驾驭，因而在这次“权力再分配”中处处排挤造反派红卫兵。另一方面，自以为是天然左派，又深受“怀疑一切”思潮影响的上海造反派红卫兵又正处于不可一世的鼎盛时期，他们那里忍受得了张春桥的冷落与排挤？由此，由炮司的核心战斗组——复旦大学“孙悟空”战斗组发起，1月14日在复旦校园里贴出了《一问张春桥》、《二十问张春桥》的大字报，掀起了第一次炮打的序幕。接着，红革会扣押了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等，引起张春桥于1月28日凌晨派遣军队去复旦大学进行镇压。这无疑火上加油，掀起了全市性炮打的序幕。当晚，全市炮打的红卫兵策划召开十万人的反张大游行，并在上海工业展览馆责问张春桥、姚文元达六小时。自然，毛泽东及文革派是决不会允许年轻狂热的红卫兵把矛头指向他们的。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即以极为严厉的口气发“特急电报”给复旦大学红革会，指责他们“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是完全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1】伴随著这一电报而来的自然是血腥的镇压。尤其是张春桥，表面上一再说对炮打他的红卫兵一概不算帐，背后一再下令进行残酷政治迫害。

迫害使人成熟。尤其对于卷入狂热政治漩涡的年轻人来说，残酷的政治迫害无疑如一盆当头浇来的冰水，使他们开始被迫冷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这种思考的结果之一是1968年4月12日对张春桥的第二次炮打。与第一次炮打不同的是：1）这些年轻红卫兵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反迫害色彩，而决不仅仅是“权力再分配”中的资源多少之争；2）在亲身痛苦的经历中，他们确实认识到了张春桥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尤其指责了他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然而，揪出一个张春桥还只是浮面的，在当时上海红卫兵，尤其是红革会的炮打中，更多的是一种反迫害的激烈发泄，以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如张春桥）的思路炮打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行动，在理论上与思想上还没有太大的突破。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复旦大学红革会核心战斗组《立新功》的大字报中，仍出于派性式“阶级斗争”的立场，把上海的异端思潮组织东方学会，反复辟学会以及炮司的胡守钧等人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称为“反对上海市革会的逆流”，“时而极左，时而极右，从各方面来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

2】这不能不说是这又一次轰轰烈烈的“炮打”的非常大的思想局限。

迫害使年轻人的成熟不仅仅表现在对某一特定文革派首要人物的反抗，更可贵的是表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整个理论问题的独立思想。自1967年夏至1971年，复旦大学炮司的胡守钧、周谷声等人就以“读书会”等形式，开展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政治斗争的黑暗”等等问题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这批最早策划二次炮打张春桥的年轻人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权力斗争”，“红卫兵是被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利用的工具”等等。他们私下传阅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斯大林时代》等书更使他们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国家体制进一步法西斯化的作用，并开始对西方民主政体有所好感。〔3〕这些活动代表了年轻一代思想觉醒的开始。张春桥当然不能容忍他的老对手们的进一步反抗。于是，1970年春，一场全市范围清剿“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运动大规模地展开，无辜牵连受迫害者达千人之多。胡守钧本人更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判处十年徒刑。〔4〕

迫害造成思考，思考产生异端。在上海参加炮打张春桥的红卫兵中，在文革中形成了异端思潮文件的有红三司的“反复辟学会”和“中串会”二家。“反复辟学会”由原来复旦大学红三司炮打张春桥核心战斗组（反复辟）的学生骨干陈琦惠、胡安宁等组成。在他们的“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中，有二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强调独立的“善于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大革命的学说，一边搞运动，一边搞理论”，要进行“理论性的创造”。在组织成员上，它“尤其欢迎加著狂妄称号的‘狂妄人’参加”。〔5〕在当时的中国，革命理论的创造权无疑是由毛泽东及其文革派为代表的“党中央”垄断的，而“反复辟学会”却要去争夺这一“创造权”，毫无疑问是犯了大忌的。在组织上，它要公开吸收除学生外的工人、农民、干部中的“狂妄人”来一起进行这一创造，自然更是离经叛道了。其二，这一“宣言”强调“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具体如何变动呢？虽然在〈宣言〉中未加说明，但在他们的私下议论之中，他们认为：“每一场大的急风暴雨的政治风暴的政治运动结束，少则几个月，十几个，多则几年，都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有领导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复辟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攻倒算的例子”。因而，他们准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革命的对象又是谁呢？按张春桥等人在迫害他们时的理解，自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6〕

与“反复辟学会”相比，中串会（“中学运动串连会”）的异端文章更具明晰的理论色彩。中串会原是上海地区与张春桥扶植的“中学红代会”对著干的一个松散的中学运动串连组织。自1968年初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中学生理论家毛兵加入后，与红鸥、杨志东、魏威等中学运动中的炮打积极分子一起办了一份影印版的《红卫战报》。毛兵在这份红卫兵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他自己对文革作了些独立思考的文章。其中较著名的是一发表即遭到张春桥、徐景贤等人严厉批判的《一切为了九大》，与风行1967至1968年间的“新思潮”相比，《一切为了九大》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只是重申了“阶级关系变动论”，所谓：“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7〕而在这—“怪现象”前面，毛兵等人还加上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界”这一限制语。应当说，自1966至1967年间的代表中共中央的两报一刊社论中也有不少这一提法。为什么在1968年春一个中学生的一篇传单式的文章，要引起如此兴师动众的批判呢？原因非常简单，1968年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他们仍要使用旧的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即他们首先要抢党权。这样，再讲“党员不如非党员”自然是离经叛道了。《一切为了九大》的作者被“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逮捕达数年之久，因这篇文章而株连受迫害的也达数百人之多。

如前所述，尽管文革中上海近十万造反派红卫兵有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壮举，但在思想理论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有价值的文献。然而，在一个以毁灭一切价值为其宗旨的失重的年代，任何一点思想的闪光都应是难能可贵的。

注解

〔1〕转引自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352—353页。〔2〕见复旦新闻系《立新功》战斗组〈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3〕参见当时上海市委颁发到每一基层组织的《关于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材料》（1970）。〔4〕1978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确认“胡守钧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遭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政治迫害”，“宣告胡守钧同志无罪，恢复名誉，予以平反”。胡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哲学系。〔5〕〈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6〕〈关于反动组织反复辟学会的第一批材料〉，上海：《复旦战报》，1968年3月25日。〔7〕〈一切为了九大〉，上海：《红卫战报》（影印版），1968年3月。

（第八章未完待续）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八）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第九章上海新思潮：在炮打张春桥的背后（续）

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时候到了！法庭开了！现在是把大叛徒、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的时候了。

有人不是说，“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要誓死保卫”吗？

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柯老（柯庆施，曾任中共华东局及上海市主要领导——编者按）逝世以后伙同上海的走资派陈、曹、杨（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文革开始时的上海市领导人——编者按）把上海搞成针插不落，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就是他伙同陈、曹、杨扼杀上海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一月革命以来，张春桥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越来越明显，沿着反革命道路越走越远，就是他，处处和我们伟大领袖相提并论，分庭抗礼，就是他，肆无忌惮的捏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就是他把上海一千万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据为己有，在上海大树特树个人权威。



就是他，大反坚定的革命左派许世友，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军内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他在上海拉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还是他，背着中央自搞一套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相对抗。

总之，张春桥是个大坏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罪魁祸首，决无宁日，象这样一个大坏蛋，就是要把他打倒！有人说，你们是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否，我们说，揪出张春桥上海不会乱。

我们要提醒上海市革委会的同志，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时刻听毛主席的声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要让张春桥引上邪路上去。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从一月革命以来，反对上海市革委会的逆流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时而极左，时而极右，从各方面来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赤卫队、红卫军异党臭联司，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客，反革命东方学会，反复辟学会，复旦的变色龙，胡守钧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是不甘心灭亡的，还有人会跳出来否定反逆流大方向。为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这些臭类，胆敢妄动，坚决镇压。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紧急动员起来，行动起来，揪出张春桥，为保卫毛主席而战，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旦把他们消灭乾淨，鲜红的太阳普照全球，举起你的双手吧，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上海将更加威武雄壮。

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1968年4月18日）

∞∞∞∞∞∞∞∞∞∞∞∞∞∞∞∞∞∞

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

全世界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我们的时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革命营垒和以美帝苏修为代表的反动营垒短兵相接。将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最激烈、最艰苦、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最后斗争局面的新时代！

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派亲手埋葬美帝、踏平苏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惊心动魄的时代！

这是我们创造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的如火如荼的时代！

这是历史大踏步前进。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出现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欣欣向荣的时代！

这是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胸怀坦白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辉灿烂的时代！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什么问题最大？

现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是世界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在中国如何反对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最大！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什么问题是关键？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大立伟大的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关键！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顶峰，就是水平最高、威信最大、威力最猛，就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推进到第三个里程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崭新阶段里，决不允许也绝不可能有第二个所谓“顶峰”。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清醒的马列主义者！我们的时代，谁否认毛泽东思想，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列主义，正如列宁时代否认列宁主义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下去就是犯历史性错误，堕落为千古罪人，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全世界共伐之！

德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学得最好的是俄国，不是德国；

俄国出了列宁主义，学得最好的是中国，不是俄国；

中国出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怎么办？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优秀、最杰出、最坚定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领会最深，是我们时代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们一定要以林彪同志为榜样，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它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明灯，它将永远成为放射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革命圣地！

时机到了！

世界大潮卷得更急了！

神通广大的历史锅炉全部沸腾起来了！

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如何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是反对和防止人  
头滚滚落地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迫切任务，这是决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头等大事，这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一句话，这是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权问题一直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向何处去？是不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关系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比中国红色政权的崩溃有更大的打击了。不管是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或者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出发，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中国，是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的战斗任务，正如恩维尔·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的那样：“支持人民中国，保卫它免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修正主义者的侵犯，是一切革命的和爱好自由的力量和人民的历史性任务和生命攸关的问题。”

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马列主义文献《炮打司令部》一周年，正好也是我们复旦大学《反复辟》战斗组成立一周年，哪里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就在那里反复辟，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里，我们和广大工农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知识分子若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其思想往往是动摇的，容易接受或右或“左”的反动思潮，也是青年运动拉向右转的根本原因。我们一定要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坚决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反复辟学会就这样诞生了！

二十五年前，毛主席明确指出：“按照中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两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高峡雷霆之势，如暴风骤雨，起源于北京，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顺它的生，逆它的亡！

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急剧变化，伟大的革命实践如此精彩，如此丰富，如此生动！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其现状带有普遍性的意义，研究了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等于解决了世界问题的关键，研究中国是研究世界的捷径。我们的时代，谁不了解中国，要了解世界是一句空话，不首先注意研究中国，所谓研究世界问题，一定会犯方向、路线错误，研究现状必须以中国为主！毛主席历来最关心、最重视、最强调中国问题，对中国的国情做了最大量的、最深刻的、最严密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整套最高水平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笔最宝贵的马列主义财富，我们还只是感觉到了的东西，并不理解，“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如果有人借口搞运动，拒绝对这些问题做认真的仔细的研究，正如毛主席所说：“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只有善于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运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大革命的学说，一边搞运动，一边搞理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做出合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意义所在。我们能用毛泽东思想科学地说明一二个实际问题，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我们的成绩也就越大。如果我们身为革命造反派，不以全部精力投入运动，对于中国最高水平的朝

气蓬勃的现状熟视无睹，一无所知，只能背用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未免太坏了，有愧于“毛泽东思想故乡”神圣而光荣的称号！

我们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一定要把破私立公的思想革命化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我们的实践证明：进行客观世界的反复辟，如果不同时进行主观世界的反复辟，不跳出“私”字的局限性，不从“我”字中解放出来，所谓理论研究是搞不好的，其理论也一定是不彻底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反复辟事业必将导致失败！

一切服从于前线的战斗，组织任务必须服从于政治任务，利用业余时间，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有利于本单位的斗批改，一句话，有利于共同学习、运用和传播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成立反复辟学会，我们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反复辟学会是由红卫兵小将发起的，热烈欢迎有热气有抱负的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等造反派参加，尤其欢迎加着狂妄称号的“狂妄人”参加，他们应当是无限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无限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具有冲天革命干劲和相当研究能力的。本学会要求每一个成员充份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刻意识到自己是“革命的主体”。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走到一起来了！

中国是我们的！

世界是我们的！

全世界毛泽东思想化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大刮无产阶级强劲的东风，十级、十一级、十二级……，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试看未来的环球，必将是光辉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哗啦啦飘扬的新世界！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程，无限的光明，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锦绣前程就在前面！

反复辟学会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 ∞ ∞ ∞ ∞ ∞ ∞ ∞ ∞ ∞ ∞ ∞ ∞ ∞ ∞ ∞

中串会：一切为了九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有解放全世界的莫大意义。在这急剧转变的陡峭关头，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将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将如雨后春笋似的出现。

这将是一幅多么振奋人心的壮丽图景。这将是世界无产阶级最盛大的节日。

在这伟大的转变中，东方巨人——红色中国担任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角。伟大导师毛主席是驾驭整个历史进程的最高统帅。

历史的车轮推进了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较量，即将进行一场大决战。它必然带来世界上阶级矛盾的集中爆发，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在世界革命根据地中国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殊死搏斗的现实，已经开始吹响了这场世界决战的进军号，揭开了这场大决战极其激动人心的序幕。

伟大舵手毛主席在决战前夕意味深长的激励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惊人的豪迈气魄，空前的鼓舞人心。

在世界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的重大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世界革命伟大战略部署的重大组成部份，这是整顿和巩固世界革命根据地以利于在整个决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果断英明的战略措施。

在世界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的重大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着以雷霆万钧之势呼啸前进的中国英雄铁军，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九大，将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再一次的交锋，仍是极为激烈的。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焦点的焦点。敌人不甘心死亡，正在焦急的拼凑残余力量，妄图在九大上反攻倒算。

九大，也将直接影响着世界决战的成败。关键的中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条被毛主席所阐明的重要历史定律，在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深刻地反映到我们队伍里来的今天，在九大召开的关键时刻，可以澄清许多游离政权斗争的糊涂观念，丢掉不少敌情观点淡漠的和平幻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会以新的形式不断再现，在整个斗争中，尤其在关键时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前，在九大召开的前夕，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是：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革命的阶级队伍，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向着走资派和资本主义势力继续进行猛烈的进攻，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得的政权，在党内用组织形式巩固下来。

为了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错误的思想作不疲倦的斗争，尽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陈伯达同志指出：“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势力还在天天梦想恢复他们天堂的这样时期内，小资产阶级还会不断生长出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很严重的。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想通过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来篡夺我们的文化、思想、文艺的阵地，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活动，制造便利。”这条规律，在文化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显著特征就表现为：注意力不是主要集中在革命的主要对象——走资派。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把斗争矛头主要地指向革命的一般对象，甚至自己的战友，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到掩护走资派的作用。

在九大召开的前夕，在争夺党权的关键时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再也忍耐不住，破门而出，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连串的东西。

#### ◇中国社会的变动

在清理阶级队伍问题上，我们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上。由于对阶级关系变化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各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依靠对象，对于如何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也各自采取不同的态度。

我们应当很好地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彻底摧毁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阶级队伍问题上的理论基础，为我们夺好党权、迎接九大作好舆论准备。

“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是这么说的。

毛主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应。”

在以上几段论述中，毛主席结合1957年以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状况，阐明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给予我们抨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阶级关系问题上散布的腐朽神话以强大的理论武器。

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举动，就是阶级关系突变的表现，就是阶级斗争白热化的爆发点。社会大变动，社会大革命，是由于长期阶级斗争而引起它们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晶。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比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任何一次革命都要来得深刻。阶级斗争的最重要阵地已经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成败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某一阶级的胜利或消灭。更为突出的，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谁对谁实行专政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关键所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

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主要地

位了。这一基本事实，对于阶级关系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不断铲除这些渣滓，引起阶级关系不断的变动，引起了革命队伍中依靠对象、团结对象、争取对象以及清洗对象的不断变动，引起政权的相应变化，这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史的主要内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得到了深刻的改造和剧烈的分化，这些就构成了阶级关系的变化。

正如列宁所讲的：“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锋利的词句直刺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心窝，剖开来一看，全是谎言的污水，哪有一点血！

诚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用意是回避了一些部门一些单位资本主义复辟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掩盖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十七年来猖狂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攻倒算的罪行。我们倒要问它们，解放前几千年来的阶级阵线是否是基本稳定呢？他们没有说，大概还没有这么蠢，回答起来一定是否定的，那么，解放前一直是剥削阶级掌权，工农兵一直是受压迫的，掌权阶级没有变，被压迫者也没有变，阶级阵线怎么会变起来呢？请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蒋介石由某一段时间的统战对象变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这就是阶级阵线大变动的重要标志。同样，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于掌权阶级变化与否。

杨得志同志说：有些人“看不惯造反派”，“看不到阶级阵线已经变了，老工人、党团员分化了。结果死死地扭不过来。”

教育界的阶级关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革命的主要对象的问题上。

“研究走资派主要的是依靠谁在教育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再决定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教育界走资派本身尚不是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主要对象的理论，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的眼里，已经不适用了，需要重新加以“研究”，然后再“决定”。人们万分惊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第四个里程碑。

研究结果如何呢？敬爱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含蓄地透露了：教育战线上，“走资派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进行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这里，这位革命派先生装起糊涂来了，把毛主席尖锐抨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歪曲成是指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般知识分子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弦外之音自然是：这些知识分子就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兜了半天圈子，还是老一套。剥去保护色，就可以看到刻在他们身上烙印的显著特征：转移斗争大方向，掩护走资派。稍有一点教育革命常识的正常人们，就会清楚回答：毛主席这里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主要是指那些早已浸透了资产阶级灵魂的最典型最反动最顽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对

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指他们十七年来的反革命统治。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离开了阶

级大变动的新特点，离开了政权问题上斗争的新动向，来咬文嚼字，来玩弄概念，是最低劣不过的手法了。某些天真的同志，会觉得很奇怪：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专门喜欢揪斗地富反坏右以及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般知识分子，疾恶如仇，阶级感情不是很深厚吗？岂但是深厚，还极真挚呢！我们实在惊叹“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话的确凿性，你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几分抵触情绪，就会表现几分，自己的言行就是内心世界的绝妙写照，一分一毫也不差。漂亮的言词，慷慨的姿态，也无法掩饰自己在阶级斗争大风浪中的真实举动。

#### ◇政权问题

最初，我们看到前十条里毛主席写下的这么一段话，“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它们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觉得很理解。在这里，毛主席深刻地全面阐明了每次重大革命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在革命中阶级关系变动的必然和实质。这条规律，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反右斗争，直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这场文化大革命，天地间发生了无穷的变化，很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阶级队伍随着革命的深入而改变了。

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界里，走资派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心怀叵测地混淆黑白，搅乱甚至颠倒了阶级关系。被走资派所发现和组织的十七年来的“左派队伍”，并非完全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已经暴露出其中有一些是右派，为数众多的是中间派。

毛主席也发现和组织了一批左派队伍，这就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在文化革命中涌现的新生骨干力量。出于对教育界基本状况估计的不同，也就得出依靠不同对象的结论。两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在依靠对象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了是一场悲剧，是历史利用了造反派，在他们的眼里看来，造反派都是群痞子，“只不过是历史的长河中划了几浆而已”。“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真正掌权的还得靠十七年来的真正的革命派，真正的老左派”。他们在这套所谓的“理论”的武装下，就向我们毫不客气的伸手了。其实，他们还是比较整脚的，他们这套理论也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他们的鼻祖刘少奇、安子文早在1947年绥远土改时就发明了这套理论，什么“土改一开始积极斗争土豪劣绅的都是地主二流子，以后起来的才是真正的贫雇农”。何其相似乃尔！简直就是一根琴弦上弹出来的调。可敬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先生们，难道我们今天还用得着多大的精力去批判刘少奇的陈词滥调吗？

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界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怪现象：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越是基层，越是受到黑线影响小的同志，比较接近生活，比较尊重客观，尊重真理，也就比较能接受毛泽东思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教育界里，党员队伍严重不纯。关键在于政权，在于教育界被资产阶级专了政。不是这样的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种种现象，就一点也触动不了教育界走资派的一根毫毛，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界的问题，教育革命只不过是酣梦中的空想而已。

林副统帅在总结复辟和反复辟经验时指出：“这种复辟的危险是综合的，国内国外，国



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

他们的种种言行，都是反对我们抓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主要危险——走资派，转移视线，不把精力集中在从根本上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问题上，集中在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砸烂走资派的旧班底上。

这种表面上回避政权问题，回避夺走资派的权这一要害问题的手法，这种不断把斗争引向脱离政权的邪路的手法，实际上，是为了建立一个改良主义甚至修正主义的领导班子服务的，是为小资产阶级以至资产阶级夺权的。

林副统帅指出：“政权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班子的问题。”

砸烂旧班底，一方面要把走资派手中的权，把新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没有改造好的修正主义苗子手中的权统统夺过来；另一方面要肃清他们的错误思想，时时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以令人不觉察的方式进行反夺权。要对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谬论加以彻底批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教育界的走资派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发现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不很得心应手了，加上名声又不好，他们本人的政历问题又太复杂。于是，就在青年干部中物色对象，其中有的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有的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走资派里比较狡猾的角色下的种子，必须认真对付。那批修正主义苗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走资派的极重要的工具。在夺权过程中，对于他们应当严加防备。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改好了的也可以依靠，仍在时时窥探方向，对造反派耿耿于怀者，就有可能成为窃取革命成果的政治扒手，继续为其主子效劳。正象张春桥同志指出的那样：“他们对造反派有看法，反对造反派。……看你们在这里开会就不舒服，进进出出都是这些人，他看着就不顺眼，……如不注意教育，这些人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经不住，到那时就有事了。两个司令部都有自己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基础。”

砸烂旧班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巩固新生红色政权的过程。清理阶级队伍，必须从领导班子着手，从巩固政权着眼，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治观。

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就是为着建立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导班子。

革命，从根本意义来讲，就是先进的思想战胜了落后的，反动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实现。当然，要战胜旧的思想体系，必须借助于物质力量，在阶级社会里，得首先并且主要借助于政权的力量。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力量，推出了一个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文化革命运动，同时，这个普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运动，将大大加速历史的进程，大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从这里可以看到，要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权，必须与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作不疲倦的斗争。

#### ◇整顿思想打倒派性

在当前，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并且是提高这支队伍战斗力的重大措施。为了召开九大，必须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作准备。政治上我们把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了

，并在更深入地进行大批判；组织上，我们清理党的队伍、干部队伍、造反派队伍及教育界队伍；思想上我们就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勇敢地“和私”字决裂，这样才能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铁军。有了可靠队伍才能夺取最后胜利。能不能打倒派性，增强党性，就是能不能树起队伍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进一步组织和教育我们的阶级队伍，这是夺好党权，迎接九大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份。

元旦社论尖锐地指出：“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意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党性与派性的斗争，已成为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成为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如果再不自觉克服派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来顽固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终于被革命队伍所抛弃。

文化大革命发展至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组织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和经济上反革命经济主义进攻这软硬两手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原先的“妙用”，他们采取了新形势下的反革命新策略。一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迫切需要进一步组织和教育自己的阶级队伍，来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这时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就千方百计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私”字，拼命煽动派性，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分裂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妄图扰乱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已成了当前他们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种反动思潮上政治舞台表演一番，是不奇怪的，有它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下，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利己主义，历千年之久，根深蒂固，在小资产者阶层里是颇有市场的。解放十八年，人们的精神面貌是在不断更新，但是余毒仍然是很深的。这不但是“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缘故，更应该注意的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十几年来，他们把持着文化、宣传机器，不但不去触动剥削阶级四旧的一根毫毛，还大肆宣扬帝封资修的臭货，更恶毒的是象疯狗一样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禁止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为了篡党篡政造舆论的反革命需要，他们篡夺了文化、教育界的领导权。所以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余毒是更深。

马克思说过：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原因与结果是互相替换的。

毛主席精辟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这种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路线、政策的分歧，并最终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为最高形式。而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走资派，又反过来扶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理论和著作上的代表反动学术权威，及其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妄想通过他们的思想体系来蒙蔽、毒害更多的劳动人民，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阵线，扩大反革命阵线，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林彪副统帅说：“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发展起加速、促进的作用。”这就是先进思想影响与反动思想影响之间的本质差别。

反动的旧思想的阻碍作用，有时并不被人们所十分重视。当反动思潮控制、蒙蔽着一部份的人们，起着恶劣的阻碍社会发展作用的时候，那部份人们往往是毫不觉察的。人们常说：阶级斗争总是走曲折的道路。正是这样，每一曲折，就是先进思想与反动思想斗争的一个回合。

林彪同志说过：“在一个短时期，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这是一个例子。

去年八、九月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又是一个例子。

现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种反动思潮影响了我们队伍中那么多人，已成为阶级敌人利用来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段，是更可说明的了。

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警惕来注意反动思潮的阻碍作用，并用先进思想与之斗争。

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上海是资产阶级的集中地，阶级敌人是非常敏感，非常狡猾的，非常善于利用形势的变化来进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活动的。目前，围剿派性已形成了高潮。在高潮中，某些表面上隐下去的矛盾大有发展的趋势。某些政治扒手妄图用“围剿”“派性”的口号，来向造反派进行反扑，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反对派性，首先应当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应当时时从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党权这个根本角度出发来进行斗争。为反对派性而反派性的斗争是没有的，都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而展开。要么助长保守势力抬头，要么提高革命队伍战斗力以便夺好权用好权，两者必居其一。在派性泛滥时，保守势力，反动势力也从未停止过对革命造反派的进攻。这是一条规律。因为派性斗争是大量的，主要的，就以此来完全否认路线斗争，包庇反动势力、保守势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历史将会证明，这是错误的，历史上已经有过这种例子。在去年十月份以后，或者因为借口反对极“左”思潮，或者因为诚心反对极“左”思潮而没有注意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犯了迎合保守势力打击造反派的严重错误。历史在新的条件下，还会重演一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问题在于善于学习，吸取教训。总是有些人老是喜欢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犯错误，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猛击一掌，才清醒过来。哪一个年头能使这些人自己认清道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呢？有一个好法子，就是深入阶级斗争实际，注意政治斗争的新动向，不要奴隶主义，不要右倾保守，要有造反派的思想感情，才能为造反派掌好权。否则，总有一天要淘汰的。

#### ◇结束语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站在高山之巅，以惊人的气魄，挥动着巨掌，指出了浩浩荡荡的亿万工农群众的红色铁流唯一正确的方向，辽阔的战场上，战尘迷漫鏖战急，鼓角悲壮，马蹄声咽。新的战斗，更加惊心动魄，更加空前规模的战斗展现在我们面前。

历史在迅速发展，革命在飞跃前进。我们正处在伟大时代的转折点上。“一天等于二十

年”，这一科学预言，在今天，在两条路线深刻反映到人们灵魂深处的重大时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九大即将来临前夕，显示出神奇的作用。时间是多么宝贵呵！现在我们顽强地奋斗，坚持不懈的努力，待到二三十年之后，待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月风暴席卷全世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显得极为要紧，极为关键！

有志气有抱负的年青一代，在决定命运的政治搏斗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激烈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失去的只是精神枷锁，革命的铁扫帚将扫荡一切污泥浊水。

原载上海《红卫战报》（中申会影印版）

□引自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第九章完待续：第十章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二十）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第十章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闻名于世的“李一哲”，其实是三位青年的合名。他们是：李——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一——陈一阳（广州十七中高中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乡务农）；哲——王希哲（广州十七中高中生，发表大字报时已下厂当工人）。在这张大字报的酝酿、写作、修改的过程中，广东省电台中共老干部郭鸿志自始至终参与，也应当是文章的作者之一。这张罕见的长达三万字的大字报，王希哲是主要执笔者。

1974年11月10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由六十七张白报纸组成，作为一张大字报贴于广州市最热闹的北京路口。大字报一出：“市民围观，水泄不通，车辆改道。入夜还有用手电筒照着读的。大家争相抄录，四处流传……大字报空白处，写满了‘好得很！’‘好！’‘说出真正问题！’‘表达了人民的声音！’‘向李一哲学习！’‘向李一哲致敬！’的读者批语。而且掀起了一阵拥李和反李的大字报论战热潮。”〔1〕在中共方面，广东省委迅速将大字报呈送中央，据说毛泽东曾手持该文，在某中央会议上询问出席会议的中央要员们能否“批倒李一哲”。尽管“毛泽东对这份大字报的表态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份大字报印发中央委员人手一份，并下发到全国各党、团支部以供批判。这在当时，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首肯，是不可能的。”〔2〕

作为一场从根本上藐视任何民主，践踏了所有法制（其中也包括了中共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文化大革命，在其尾声阶段，却由三个这场大革命的产儿——青年红卫兵，贴出了一张以“民主与法制”命名的大字报，不能不说本身就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悖论，更何况大字报提出了一系列既不同于有意无意地维护了十七年旧秩序的保守派，又不同于由派性而投靠到“四人帮”麾下的造反派头头们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见解。这些异端见解甚至截然不同于“省无联”、“北、决、扬”等“新思潮”的思想家们，而又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一系列

独立政治思考的成熟与升华。

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思想价值，在于它所含有的现代意义上的追求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因素。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序言）》里，李一哲们一开头就无所畏惧地自称“异端”。并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什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作为“讨论”的结果，李一哲们首先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允许有“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其次，李一哲们要求“‘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对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而决不能对不同政见者“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3〕——换句话说，李一哲们主张取消以言论治罪，主张言论自由；主张取消中共镇压人民群众一贯采用的“反革命言论罪”。再次，李一哲们主张反腐败，限制特权，主张用法律保障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李一哲们第一次把林彪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界定为“维护封建礼治的神圣支柱”，主张破除迷信，鼓励不同政治见解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涌现并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李一哲们看来，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什么“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是“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而是“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4〕毫无疑问，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是李一哲们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口号。面对文革的残酷现实，作者愤怒地质问：“社会主义法制跑到哪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有开，现实是无法无天了！”这实际上是“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的演变”。〔5〕虽然，李一哲们的思想在当时还只是停留在“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这一层面上，但他们要求法治（法制），反对人治（礼制），并进一步探讨了“林彪体系”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新命题，并明确提出“反封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切中时弊并直涉体制的。

如同国内外的文革思想史的研究者指出：“作为公开张贴的文章，‘李一哲’虽然抽象地肯定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地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切做法。‘李一哲’提出必须批判‘林彪体系’，指出林彪体系的纲领是‘天才论’，而‘天才论’的要害在于要‘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思想解放这一重要问题。”〔6〕又如海外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揭示：“在李一哲笔下有一个林彪体系，实实在在地压在人民身上，作为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体系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却没有实质的内容……没有毛泽东，何来‘林彪体系’？林彪体系就是实际的毛泽东体系，而毛泽东体系则是理想化了的林彪体系。归根结蒂，林彪体系也就是现实的中共体系。”〔7〕因而，李一哲大字报在客观上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而对毛泽东思想的挑战。当然，如同执笔者王希哲后来反省的那样，在主观上他们当时“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明对它的忠诚。他们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来。他们相信这个制度会优越于资本主义，关键只是在于说服毛泽东。”〔8〕所以，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副标题是“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这一历史的局限，在今天已为李一哲大字报的执笔者王希哲在上述引言中深刻地认识到了。然而，如同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无法缺少必由的阶梯一样，李一哲的大字报，代表着年轻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终觉醒的开始，又启迪着人民群众的更大的觉醒。据说当时李一哲大字报上写满了观看群众的密密麻麻的眉批。在“序言”里，李一哲提出一个观点：“……五十年代后期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一位读者针对这一观点用“又一哲”的笔名眉批道：“党内走资派却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可追溯到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更久远，其根源深植于作为官僚组织的党的本质之中。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过加强了党的官僚化；‘党内走资派’从来就是党和国家的主要危险。”〔9〕与李一哲大字报不同，‘又一哲’的眉批非但否定了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而且锐利地揭示了共产党的“官僚本质”。从李一哲大字报出发，中国的民主运动向更成熟的，“以与共产主义理论决裂为时尚，以反共为特征”〔10〕的方向走去了。

李一哲大字报贴出后，一方面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被视为“社会的良知未死”，李一哲团体得到迅速地扩张。另一方面，中共当局组织了数百场批斗会，动员了数百万人围剿，斗争李一哲。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还专门组织写作班子“宣集文”写批判该大字报的文章。1977年3月，又以“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罪”逮捕了这三个年轻人及其支持者。一年以后，他们在中国思想解放的热潮中被平反。

李一哲大字报分为“序言”和“本文”两个部份。“本文”写于1973年9月13日，是“为了表示对林彪垮台日的庆贺”，〔11〕当时也正是“批林批孔”运动的热潮中。而李一哲们的思想形成得更早，那时，“四人帮”一伙有意将林彪批成极右势力的代表，而李一哲大字报却鞭辟入里地抓住了林彪一伙极“左”的实质。这篇“本文”曾由李正天，王希哲署名作为一封上书寄给毛泽东，而被中共广东省委内部定性为“反动信件”。“序言”写于1974年10月7日。因为传闻四届人大就要召开，而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有向“四人帮”靠拢的倾向，所以他们决定增写一个长序，连同“本文”贴上街头，直接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史实是：尽管这三个年轻人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出身，但他们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独立思考却遭到了原广东省众多的造反派头头的抵制，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充当中共的枪手，参加了对李一哲大字报的围剿。但这也正从反面说明，李一哲们的思想，已完全超越了狭隘派性和造反派的利益。他们所依傍的并为之奋斗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广阔未来。

李一哲的思想同样也不同于以“省无联”、“北、决、扬”为代表的极左派“新思潮”。不错，李一哲承续了“新思潮”关于摧毁“党内官僚资产阶级”，“限制特权”等闪光的思想，但他们已把它们提高到了民主与法制的层面。在政治上，李一哲们决不主张打倒周恩来及一大批共产党老官僚，相反坚决地反对“四人帮”。王希哲后来解释过这一不同：“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并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宽松一些政治钳制，对人民略为有利。因此，在文章里，他们毫不掩饰地为老干部直言，为周恩来说话，并公开地向‘四人帮’宣战。”〔12〕除此之外，李一哲还在经济体制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了独特思考，他们主张“物质鼓励”，从物质上通过法律“保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尽管这一思考并不是系统与深入的，但在文革所有的异端思潮中又是绝无仅有的。

当年，“宣集文”在李一哲大字报的批判文章中指出：“这张反动大字报在‘批林’的幌子下，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伟大的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进行了一系列极其恶毒的攻击。它还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法制，妄图纠集一切牛鬼蛇神，煽动群众，制造混乱，在中国重演‘匈牙利事件’。”〔13〕实践证明他们似乎说对了，一年以后这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四·五运动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数万与李一哲有着同样思想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高呼着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的口号，给了以为十亿人民只会喊万岁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狠狠一击。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尾声中，李一哲们曾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人民——“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14〕们，历史证明了“街头读者”们并没有辜负他们的预言与希望。

## 注解

〔1〕漆蒙校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和尚打伞出版社，1976年，第3—4页。〔2〕王希哲《从李一哲到王希哲》，洛杉矶：《中国之春》，1996年6月，第59页。〔3〕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4〕同注〔3〕。〔5〕同注〔3〕。〔6〕雷颐，石云《狂热·幻灭·批判——文革十年青年思潮初探》，载北京《青年研究》，1991年第2期，第34页。〔7〕漆蒙《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载《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1976年版，第8—9页。〔8〕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载《中国之春》1994年12月，第18页。〔9〕子川《李一哲和我》，香港：北斗出版社，1978年，第55页。〔10〕同注〔8〕。〔11〕同注〔2〕。〔12〕同注〔8〕。〔13〕宣集文《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载玄默编注《李一哲大字报论集》，台北：中共研究社，1976年，第241页。〔14〕同注〔3〕。

∞∞∞∞∞∞∞∞∞∞∞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序言）——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 李一哲 ·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三）关于林彪体系（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五）谈反潮流（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批判，殊不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是，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的（第三稿）前五部份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份——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形势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说一说。

×××××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甚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六十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件事情：一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了，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国家打不过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就是明证。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此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甚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个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一八七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学生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



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同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份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生产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生产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匪帮经常派人来。廿年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维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怎么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这岂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和武汉几乎一样，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

在外国人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皇宫前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报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的大字报”。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准备好水龙头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乾淨。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乾淨，这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曾经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已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十八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地为大字报表了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重新被宣布为合法，十八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十八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十八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并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么？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共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脸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令、五十次申，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入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

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話：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悲剧式的胜利反而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和坚强的大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在和这个敌人斗争中，来发展成了真正的革命党”。（“1848——1850法兰西阶级斗争”）

这就不用我们罗嗦了。

在林彪体系统治十分严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思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指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历史现象，知道它是暂时的，他们满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现在我们看到了，从1968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斗争，对于党内的今后的发展何等重要呵！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空前的激烈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会完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別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哪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五七一工程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一五三页注（三〇）），毛主席对张国焘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二五八页注（一〇）），为甚么对林彪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

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我们看到了那些参与了“五七一”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死党，以所谓的“路线错误”逍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好干部却继续被当作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说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甚么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1966——1971）推行的实右而形极左路线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们能举出一百个、一千个现象形态来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能举出多少林彪作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挂这幅对联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哩！

“黑格尔在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现的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反回潮”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评论中所作的判断已经被证实了。

甚么时候发生了“复辟”，甚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物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我们，“复辟”和“回潮”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了“复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为甚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好的“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复辟”了，那里也是“回潮”了，年代也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这倒是咄咄怪事！

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一九七一年秋的伟大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的进一步

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的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道路吗？这是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嘲弄。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反复辟的，但是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漓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但是，“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际效果比我们原来预料要好，因为人民的革命不会对革命的口号容易发生怀疑的，他们一般没有对一九七二年开始“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大多数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纠缠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毕竟还是成了人民群众向林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现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为甚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地位，是随着林彪的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的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他们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映。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褻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〇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

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挑衅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用说这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馆的始末”……，还有甚么“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啊！

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实确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陈旧东西的回答”（列宁）的东西，可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历史车轮不可抗拒，它是不会照顾甚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奉劝那些狂热追随林彪而至今还保有“高官厚禄”的大人物，不妨把这对联徘徊吟咏，深入领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各种修正主义路线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别境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但现在看来这没有甚么可怕了。儒法斗争史的批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王朝封建的肯定已经开始变得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毫无疑问，法家先驱者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引起的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伦斯庇尔，从“百科全书派”到别、车，从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甚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却要看得那样光明呢？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

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着的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让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呵！“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是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哪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的批判确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真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吗？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的名单，可是为甚么对海瑞却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臭骂几句呢？这说明骂法家的人还是有的。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甚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甚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

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强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批林批孔问题除了应当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的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斗争实质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忘记了我们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么？“炮轰黑省委”、“反迫害、反镇压”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派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么？李庆霖信件的“右派言论”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甚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一九五六年布达佩斯曾经



集合起来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一九七〇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为甚么一九五五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而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了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六十年代以来国际和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似乎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的内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

×××××

关于重写的第六部份，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的希望，无论它们能否得到充份的实现，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溶化，思想开始解放，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不要忘记了一九七一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

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竟能够看得下去，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只能感到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对于“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也算是以身试“礼”吧！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教益，虽然我们并不怎样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读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应该是生长鲜花的时候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稿

（第十章未完待续）

【研究报告】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二十一）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第十章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本文）

人们都在关心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着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法制。人们为甚么这样关心呢？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动荡，发生了一些甚么新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法制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过去的反右和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甚么呢？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早在流失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才帮助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今天的特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企图是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武器去反对他们呢？

##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式上说，实际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武器。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甚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志呢？

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勋。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毛主席愤慨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林彪为甚么要镇压人民的民主呢？他们不是还鼓吹过“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么？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林彪及其党徒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当作他实行篡权复辟的“借用力量”，于是对待“天才”的态度这个准则代替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准则。“共诛之”，“共讨之”和“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原则向法制挑战，成了保卫对“天才”绝对崇拜的上方宝剑。当他的地位一经确立并由党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确立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志时，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这方面，他还有他的董仲舒哩！

甚么“新秩序”？就是“最后胜利论”、“四大过时论”、“政权即镇压论”、“军党论”，总之，就是把我党我军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关系的社会法西斯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的枷锁。

### （三）关于林彪体系

甚么是林彪体系？这是指林彪已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的时期，他在党内推行了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党、全国的东西。这就是哲学领域的唯意志论，历史领域的天才史观，政治领域的政权即镇压论，经济领域的“公产”论和对外关系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天才史观则是其纲领。

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体系发生了矛盾，当林彪体系尚未确立时，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便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而林彪体系一旦确立，并使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临着巨大危险时，这个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

如果我们不去懂得毛主席对林彪法西斯主义镇压人民民主的深恶痛绝，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毛主席为甚么在庐山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斗争所反映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笑话所应当给予我们的教训呢？

“路线斗争不可知”的说法和“路线斗争不过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的说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站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否认了一切错误路线，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给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带来的直接损害。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总是要以各种形式（甚至包括消极或“反动”的形式）去进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斗争无非是社会斗争的集中表现罢了。

###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动，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逐步地懂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历史的外衣出场了，哲学家作了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个人就是杨荣国。

当“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颈上的深痕尚未消愈，杨荣国和它的助手们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礼治”秘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杨荣国同志控诉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

杨荣国反复地控诉“礼治”，反复地控诉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甚么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杀了么？！

毛主席支持了杨荣国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声。给李庆霖那封到处谓之“反动告状书”的复信，是多么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啊！真的，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李庆霖的遭遇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耽心。他们在说：“幸亏信让毛主席收到了”，他们在想，是甚么压制着他们的民主权利呢？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耍了一个诡辩，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体系实质的极右说成是甚么“右倾”，或者回避林彪在成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国的东西，用林彪那些见不得人的反动言论来掩盖林彪见不得人的蛊惑言论。他们站在要求批判林彪体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像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

可笑的是他们也来批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被杨荣国揭发出来的“礼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礼治”说成是一种假仁假义。肯定焚书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们自以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要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动派，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他们不敢触及秦王朝面临的两个否定：即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和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的否定。农民为甚么要反对秦王朝？秦灭六国时，农民“莫不虚心而仰上”，不都是拥护它的么？因为秦王朝终于损害了农民。人民群众为甚么要反对林彪体系？当年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不是高喊着林彪“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口号去作英勇的战斗的么？也因为林彪体系终于损害了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叫做奴隶们创造历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他们客观上要求进步，主观上却不懂得进步而已。这几乎是一个历史规律。被毛主席称为天才的陈胜、吴广，不都是自命扶苏，自号楚王，在反革命复辟的旗号下，举行了他们的革命起义么？既然我们无产者对这样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农民起义都要给予他们以历史上崇高的地位，为甚么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批林斗争中有了一些错误的怀旧情绪，就非大兴问罪之师不可呢？更何况否定之否定，“仿佛是向旧的事物的回复”，不也是列宁的辩证法么？革命的道路要笔直，而笔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学，对革命作辩证的否定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历史的前进。

当然，如果真正的反革命复辟派孔鲋之流可以混进从大泽乡出发的革命队伍，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反攻倒算和辩证否定，便更可鱼龙混杂。我们必须反对反攻倒算派，

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总之，批林以来的形势，纵横观之，斗争是激烈的，批林整风仍是首要任务。第十次路线斗争尚在继续深入。也许在这种深入之中，它还孕育著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哩！

#### （五）谈反潮流

“十大”废除了林彪塞进“九大”的“共诛之”、“共讨之”的原则，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则。这是“十大”的一个大功绩。

然而，现在情况是一个口号响亮了，人人都来喊：反潮流！

今年（七三）年八月，不是有个张铁生的也出来“反潮流”了么？结果一没有杀头，二没有坐牢，三也好像没有老婆要离婚，反倒是扶摇直上，据说到甚么学府深造“反潮流”的奥秘去了。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是杀了；坐了牢的，仍旧坐着；罢了官的，照样罢着。他们哪有那么优哉游哉？“你们是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们是‘571’”，不对。林彪的“571”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借用力量”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罢了。“借B52打B52”本身何罪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被损害的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呢！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深知所受的根源，它们攻击的锋芒是向着林彪体系，他们谁也没有表现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们憎恨那些歪曲和阻挠这个路线和政策的林彪及其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甚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段话。

但是反动派的头上是没有“反动派”三个字的。“只给人民以民主”，很对。可是，你们还为林彪体系大喊大叫时，又给了反对这个体系的人民群众那怕一点民主没有呢？给他们的只是残酷的斗争和拘押呢！“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应该这样。但不要忘了林彪体系风靡一时，甚至庐山成百个中央委员跟着跑，不就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民主么？这个民主不用你给他也有，一他有权，二他有革命的旗号；你不给人民群众，他就没有，一他没权，二他有时也打不出革命的旗号。

历史教训我们，既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派有时会被认为是反动派而没有民主，反动派有时会被认为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现了革命派遭到镇压，反动派青云直上的反常局面。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阶级的民主作过许多论述，他们是把整个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来加以对立的考察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内部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把派别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愿意研究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因为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王洪文同志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古今往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哪里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曾经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所给予中国的社会深刻震动和它的深远意义，必将影响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

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它将怎样反映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它所要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新宪法里，它将怎样表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呢？

现在人民群众在想些什么？要求什么呢？他们对“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抱着怎样的希望？

####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造资反线的反”“夺走资派的权”为其基本内容的。但是可以说，镇压（人民民主）与反（资反线）镇压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社会主义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传统，顽强地盘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如果我们不去反对这种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礼治原则，我们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法治真正实行起来吗？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不用说党的领导应当细心倾听群众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更不用说对走资派造反有理了，即使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过火的，或者对党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发生不满，难道就可以“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么？而且，香花与毒草、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么容易鉴别的，要有一个过程，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因此，我们不应当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 二、限制特权

承认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必须首先指出，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

“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哪里来？对社会的产物肆意挥霍，高级的惊人享受，是从哪里来的？相当的部分高干子弟理所当然有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从哪里来的？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和维护这种占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籍的又是甚么呢？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难道我们不可说苏联的演变是从苏联的高级干部实行了高薪制而向资产阶级专家看齐的么？在我们中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的异议的话，但是我们



能够轻视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的资产阶级熟视无睹吗？

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存在着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

###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同时，也给人民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呢？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应当怎样才能“千千万万”地涌现出来呢？

使“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条，但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条。在林彪体系得到了确定的那几个年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从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选的，还是在大风大浪成长，在阶级斗争中涌现的呢？这个问题直到如今理论和实际还是多么矛盾啊？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我们的干部不应是做官当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权力是最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呢，还是为少数人谋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

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

“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我们的宪法、党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写上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是的，写了，不但写了，而且还规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击报复”，“严禁逼、供、信”。可是事实上

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不惩办一些坚持反革命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的民愤极大的蒋匪帮，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确立不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巩固的。必须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我们认为“四届人大”应重申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通过法的适当形式体现出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那些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应当严肃处理。

##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压制，特别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和对逆己势力采取惩罚主义的人事调动，搞大换班，使得“各尽所能”、“任人唯贤”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摧残。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列宁不是欢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伟大的创举”吗？中国的劳动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涌现了无数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的革命英雄么？这正是极为宝贵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绝对化，认为精神可以代替一切了，可以代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了？显然这是极其荒谬的，它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它也已经遭到了惩罚。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反对了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但是我们应当绝对地否定奖金的

作用么？一个比较积极、认真负责、超额完成任务或者有所发明创造的工人，为甚么不可以比他的同级工资多得些适当的奖励？一个业余从事写作或者对某一专业有所发现、新发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甚么不可以得到适当的物质鼓励呢？空头政治的原则是奖懒罚勤的原则。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而且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条文。我们对“四届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希望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开成一个反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统一意志和愿望的大会。但是，毛主席在与林彪反党集团激战的关头引吭高唱悲壮的国际歌，已经深深地震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知道，新宪法的规定只是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武器，要真正实行还必须靠广大人民自己的斗争。

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不是也规定过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毛主席不是还多次说道：“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么？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为代表的镇压人民的反民主势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人民群众自己对这个民主权利运用得太少了（这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根深蒂固，也由于我国生产还比较落后，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比较缺乏民主精神的缘故），毛主席提出多年的“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

正如一个南方水乡的客人来到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惜一样，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是在遭到剥夺的时候，才更感到民主权利的珍贵。尽管一九六八年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群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一股逆流。”一个彻底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他们必将重新恢复和发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初稿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稿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定稿

〔编者按：《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至此已经全部连载完毕。（原书尚有“后记”一文，已经发表于本刊 z-k 9 7 0 3 b。）我们再次向该书作者——目前仍被中国政府拘留的宋永毅先生以及孙大进先生——为“文革博物馆”提供他们的研究成果表示感谢。〕

后记>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反论：异端思潮成熟在文化大革命中>后记

一九三六年的春寒陡峭之中，当鲁迅为被杀害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受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白莽作《孩儿塔》序）。岁月如流水，早已漂白了当年的血迹，但当我在编纂这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时，却刻刻反刍着当年那种由激情与痛楚酿成的躁动不安的心境。这种共鸣自然发端于相似的史实；在这本文革中异端思潮的集子里，也有着我相识或不相识的亡友的遗文，他们与当年的殷夫同样年轻、狂热、虔诚、富于献身精神。只不过事过境迁，物换星移，在鲁迅作这一序时，青年殷夫们所信仰、所引进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曾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异端思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它已经由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演变成了一种绝对正统的意识

形态。而这本集子里的所有文字，却恰恰是颠覆与反叛这种共产主义正统的另一种异端。或许，如同历史上任何一种倪端初露的异端思潮那样，迎接先驱者的决不是鲜花和美酒，而是牢房和子弹……。如果广泛而言之地论及这本集子里的文字所代表的一代人的觉醒，反窥这些今天看来已十分浅显的真理，而这一代人却倾注了他们的全部执着与希望，并在历史祭坛上付出了“乾坤特重我头轻”（遇罗克）的代价，更令人觉得“寝食不安”地要把这些文字“流布”出来。

这本集子的雏形，成于年湮代远的一九六八年的夏秋之交，时值红卫兵运动被它的发动者赶下历史舞台，流放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插队落户）之际。当时，上海市最著名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的一批已有反叛思想的造反红卫兵决定编辑一本名叫《思潮集》的油印文集，作为赠送给所有上山下乡战友们的礼物。这本数百页的沉甸甸的文集中，收集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动思潮”的文章：遇罗克的《出身论》，联动的“003通告”，“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编辑这样一本异端思潮文集，出自于这批年青人这样一种共识：因“四大民主”而“解放”于文化大革命中林林总总的“反动思潮”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作为一种思想，并没有被斩尽杀绝。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社会思想斗争中，必然又会以新的、更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变化。因此，有幸或不幸成熟于这场大革命中的我们，必须从今天起，就学习与研究这些异端思潮。三十年后重新审视当年对“思潮斗争”的预测，仍微微惊叹于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们对中国社会竟已有了并不幼稚的洞悉。例如，今天的人们仍相当普遍地把人民群众与“太子党”矛盾比作“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而兴盛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直接以李一哲们倡导“民主与法制”为其进军大纛的。当年参加《思潮集》编印工作的伙伴们除我外还先后有曾小逸、陈兼、郭秀君、张昭卿、戚显炯、闻震威、高哲民、许子明等，其中许子明因“四人帮”的迫害，已在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祭上了他仅二十三岁的生命……。

如同我在这本书“总论”中第三部分《反论：异端思潮成熟在文化大革命中》里所阐释的，一九六八年后的中国青年运动的走向已由狂热的革命造反转换成冷静的“地下读书”和自觉半自觉的“社会调查”。而一九六九年后中共中央所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一打三反”（一九七零），“清查五·一六”（一九七一）等镇压民众的运动，正是把这一代觉醒中的青年人作为“异端”和他们的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的。上述编印《思潮集》的伙伴们，都曾经受到过程度不同的迫害。《思潮集》的编印还曾经被上海中学工宣队专案小组作为一个疑案来进行清查。我个人的命运可能更不幸一点：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因组织“地下读书会”而被审查；一九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作为“反革命”身陷囹圄近四年；直到“四人帮”粉碎后的一九七八年才作为“纯属反‘四人帮’”平反。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我自己当年也曾是文革中成熟的异端思潮的一份子，更感到时时“捏着一团火”，要把这本异端思潮文集编纂出来。

幸运的是，尽管文革后期政治迫害中的多次抄家和中共中央对文革非官方材料强令收缴，这本《思潮集》仍被我的一个朋友精心保存下来。一九八九年我赴美留学时毅然把它藏匿于箱篋之中，带到了大洋彼岸。自然，我当时就怀着一个在将来的某一天以此为基点编纂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文集的“美国梦”。经历了六年的异域学海浮沉，我有幸在去年任职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和东亚研究中心，重新开始我的研究生涯。怀着一种几近于神圣的使命感，我开始编辑这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的文稿。

尽管三十年前的《思潮集》中的数十篇异端思潮的文章已为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蓝本，但要顾及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异端思潮，其代表性与典型性还是不太够的。例如，武汉“北、决、扬”这样的“新思潮”代表流派，《思潮集》仅收有一篇《北斗星学会宣言》。为此，我只能向海内外的文革研究者广泛求援，并得到了他们热诚的帮助。美国耶鲁大学王绍光教授首先捐赠给我他全部关于“北决扬”的个人收藏。明尼苏达州立学院的丁抒教授，柏克莱加大张国良先生，澳洲莫纳大学杨小凯（曦光）教授，国内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北京大学印红标教授，社科院哲学所徐友渔教授等都无私地捐献出他们的个人文革收藏，才使出版这本较为完整的异端思潮集的梦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能。杨曦光、王绍光两兄——一个作为当年“新思潮”的杰出代表者，另一个作为今日著名的文革研究者——欣然为本书作了热情洋溢的序，更为这项源起于一个十分冷酷年代的工程抹上一丝情与理的暖色。

照理，到本书公开出版为止，一个渊源于少年时代的“异端梦”应当告一段落了。我却仍然无法写下一个嘎然而止、余韵幽远的尾声。我蓦然间看到了自己已秋的霜鬓；当年亲历文革的十六七岁少年，今天已过了不惑之年——三十年的岁月足以稀释最强健的记忆。一瞬间，我又联想到三十年来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论”和至今在中国大陆作为学术禁区的“文革研究”以及那些“不准查阅”的任何一个图书馆的文革材料和永远锁在各级档案馆沉重的保险柜里的“中央机密”。我在突然中洞悉了当权者们“彻底否定文革”的底蕴：他们要人民遗忘，在歌舞升平中遗忘他们在血与火中已获得的历史启悟与真知。一丝透底的悲凉袭上我的心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个民族是否能抗拒这种难以抗拒的遗忘呢？

□原载《北京之春》第45期

取自"<http://www.recordhistory.org/media/wiki/index.php/%E5%90%8E%E8%AE%B0>"

本页面已经被浏览 51 次。最后更改 18:222006 年 1 月 9 日。